

马列主义 研究资料

4
1987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MALIEZHUYI YANJIU ZILIAO

1987年第4辑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哲学编译局
列 宁 斯大林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编辑部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新华书店总销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制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75印张 200,000字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北京第10次印刷

印数 0,001—3,450

ISBN 7—01—000110—5/Z·72

书号 17001·150 定价 1.70元



70485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1987年第4辑目录

(总第50辑)

约·布·菲尔《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公社》

- 一书摘要(续三)..... 马克思(1)
徐明译

第一次全国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学术研讨

- 会部分论文摘编..... 道木摘编(9)

- 略论人类学从摩尔根到马克思 贺麟(9)

- 马克思晚年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 艾福成(12)

- 马克思晚年的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方法 许苏民(15)

- 原始道德的形成、演变及其特征 张正霖(18)

试析《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 nation

- 一词的涵义 王明甫(22)

- 论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中的“人类学笔记” 荣钊(25)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写作

- 过程 (民主德国)约·海尔曼(30)
高凌贺译

《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的产生 王全民译(54)

从马克思探索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点的三次转变

- 看哲学和经济学的交融发展 高新军(66)

列宁论党领导管理苏维埃国家问题 王立行(84)

国外学术研究

- 当代对辩证法的研究 [苏] JI·D·文茨科夫斯基(97)
章沛译

当代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迫切问题……………毛卫平译(144)

卢卡奇的著作和思想研究

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匈]卢卡奇·捷尔吉 杜章智译(150)

作为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哲学批判者的

卢卡奇·捷尔吉……………[苏]T·И·奥伊则尔曼 莫立知译(175)

国外对卢卡奇思想的探讨……………劳 徒(188)

西方对马克思主义的探讨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它的当代“批评家”

——理论战线上的某些争论问题……………岑 川 译(205)

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一些现象的

思考……………[英]阿·齐曼斯基 李惠斌译(218)

读者·作者·编者

“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并不是被列宁

否定的“旧观念”——答张克明同志……………何宏江(234)

“统一战线”一词的由来……………夏洪跃(241)

书 讯

一部研究《资本论》中的经济规律和范畴

的专著……………王孝勇(241)

《政治体制的理论基础》一书简介……………王淑秋(246)



200010978

马 克 思

约·布·菲尔《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 村社》一书摘要(续三)^①

4)^② 谷物税

耕作者必须把自己收获的稻谷——如果他种了稻谷的话——拿出 $1/10$ 或若干份额缴纳给王室；在这个国家的有些地方，耕作者的其他谷物收成也要照此办理(214)。

在许多情况下，村社掌握在王室手中(在印度这叫作卡斯)，这是出于维持中央机构的特殊需要：这些村社里的摩特图瓦^③，在王室官吏监督下，使用徭役耕作，或以安达形式出租；生产所得的实物，按类别送入王室库房(伽贝达瓦)、兵器库(阿武德吉)或财库(阿拉木代尔)，个人应负担的徭役被使用于宫院或其他地方，以满足王室的某些直接需要。王室的村社或土地有各种各样的名称，如：拉特宁达或安达，这是本来就属于王室的土地；尼拉帕拉，这是因有人失职而归入王室的土地；马拉帕拉，这是由于受赐者亡故而归还于王室的土地(216、217)。

在葡萄牙人统治下，有时候在不同的几个省份同时存在着几个互不相干的土政权；而任何形式的总的行政机构都存在不了多久。村社制度，甚至在这个国家受外国影响和其他力量干扰最多的地区，在沿海低地，也仍然存在着；先是低地的土政权，继之是葡萄牙人，都是靠村社制度提供的徭役和贡赋而补充其军事力量和

① 本文前三部分见本刊1987年第1、2、3、4辑。——编者注

② 马克思笔记原文无3)。——译者注

③ 摩特图瓦，见本刊1987年第3辑第4页。——译者注

取得政府所需的资财。葡萄牙人在控制了岛上南半圈沿海地带以后，就占据了被他们所取代的土王公的位置，而把他们的财务和行政机构原封不动地接了过来(217、218)。

荷兰人在把葡萄牙人赶走以后，同样也控制了沿海各省，罢免了所有的当地土著首领和官吏；土地占有者应缴的各种赋税和应服的各种徭役，不管以前是提供给谁的，概由荷兰人的政府直接收受(218、219)。

轮到英国人掌握了沿海各省政府的时候，他们先是沿袭荷兰人的做法，使用凭徭役占有土地(因而免纳捐税)的人所服的徭役，也在库房等地收取从马拉帕拉、尼拉帕拉、拉特宁达或安达土地收来的产品实物中领主的份额，最后终于收取象以其他或不确定方式占有土地的人可提供的那种收益，包括缴纳的一定份额的产品和一定数量的稻谷(219)。

经 1800 年 5 月 3 日王室公告改为产品 1/10 税的这后一种贡赋，看来针对的是除开政府土地和凭对政府服徭役而占有的土地之外剩下来的土地。显然，私人领主和寺庙首领地位在荷兰人之前就已经不见了(219、220)。

1801 年 9 月 3 日公告宣布在沿海各省废除为占有土地而承担的徭役义务(从 1802 年 5 月 1 日起废除)，这样的土地，地势高的向政府缴纳产品的 1/10，地势低的缴纳产品的 1/5。同时，保留马拉帕拉、尼拉帕拉、拉特宁达或安达土地缴纳 1/4 产品的做法(220)。

虽然这样一来，徭役义务脱离了土地，但是总督保留有特别下令向一切种姓和经济地位的人们摊派付给足够报偿的劳役的权力。康提战争的需要又为政府提供了口实来重新普遍要求人民服劳役——这种劳役不是以土地占有为依据，而是以惯例和种姓为依据——，按政府规定的数额付给报偿；1809 年，使用无偿劳役修筑道路，劳役由道路所经地区的居民负担(221)。这些法律只在从荷兰人手里接过来的沿海各省实行。1815 年，英国人通过征服和订立条约把当时一向完全由当地土人政权管理的中部省即康提省的

政权也抓到了手。1818年11月21日公告规定，凡是在此以前应交到王室库房、财库、兵器库的捐税以及其他所有捐税一概取消，代之以稻田产量 $1/10$ 税，在某些特定的科尔勒，税额减至 $1/14$ (221、222)。同时，徭役土地（新税正是针对这种土地的）所应提供的劳役照旧保留，尽管规定了：劳役一般应按规定数额付酬；但是，修路和筑路，象在沿海各省，是规定为无偿劳役的(222)。1818年11月21日公告还规定，寺院土地的某些居民向政府服劳役的义务也保留不变（同上）。

以科尔布鲁克中校（此人和卡麦伦先生受命对锡兰的政治进行调查研究）在1831年12月24日提出的报告为依据，1832年4月12日政务委员会的命令中宣布：国王陛下的岛上土著臣民或印度臣民，同欧洲出生的臣民一样，在其土地占有方面一律不负担任何徭役，不论是出于种姓理由的还是出于其他理由的徭役。但是就在这项公告里也还保留了康提省王室村的土地占有者对王室要服徭役的规定，就在该省，对寺庙和一般土地所有者的徭役也保留了下来（同上）。

根据里贝罗、诺克斯、瓦伦廷的说法^④，在葡萄牙人统治以及更早的时代，在这个国家几乎没有货币的。除王室垄断之外的一切贸易都是以交换实物进行的。稻谷就是通常起钱币作用的商品。对一切劳务的报偿大都采取稻谷的形式，差不多所有付报偿或纳捐税的义务，都用收获时取自打谷场土的若干数量的谷物来履行(225)。

这个菲尔从康提的马拉伽瓦图书馆专家、“博学的”苏里雅戈达·乌南瑟那里获得了如下的值得重视的材料：

锡兰史书上最早提到人民为供养一位君主而负担某种捐税或贡赋的事，见于《迪伽·尼特拉雅》所载的《阿伽乌那·萨塔》（佛陀

^④ 指葡萄牙人里贝罗著《锡兰史》（1817年科伦坡版）、英国人诺克斯著《锡兰岛在东印度的历史联系》（1861年伦敦版）、荷兰人瓦伦廷著五卷本《新旧东印度》（1724—1726年阿姆斯特丹版）。——译者注

自己所作的一篇训诫)和《苏曼伽里·维拉萨尼》——饱学的佛教法师佛陀离沙为此作的注疏。训诫中的那段话是:“我们将付出我们稻谷的一部分。”佛陀离沙的注解是:“我们将从我们的每一块田地所生产的稻谷中按阿木南之数拿出一份来给你[“萨利”这个词本来是专指一种稻谷而言,这里则用来表示所出产的全部谷物]。你不必从事任何营生。你只做我们的首领”(227、228)。此外再没有提到过对掌权者纳税或承担义务的事,没有提到过徭役;菲尔认为徭役的起源较晚;最后常常又附加在徭役之上的稻谷税,出现得更晚,它是随着中央征敛权力的增强而来的(227、228)。僧伽罗语“奥图”一词——政府的税收或要求大都使用这个名称——意思是“一”,因此它只是等于一个部分或一个份额,而不表明这个份额在总量中占多大比例(228、229)。

英国人征收的 1/10 税看来也是根据荷兰人赏赐王室土地的做法。因此,谷物税的出现不会早于本世纪;在某种意义上说,又返回到从村社组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最早、最普遍流行的国税形式,但独特之处是:锡兰的雅利安人从同一个基础上产生的却不是这个,而是徭役制度(229)。

(3) 印度雅利安社会和土地制度的演化

现今,送交政府(在印度的政府)的每一份居留地报告中都会提出一些新组成的农业村社的实例并介绍其具体情况(234)。(要是菲尔不写那些臆想的胡言乱语,而是介绍这样的实例,那就好了!)

这头尊贵的驴子以为,“村社本身内部从一开始就有了不同程度的尊贵和雇佣关系”(1)(这头驴子还认为什么都是通过个体家庭产生出来的)(238)。

财产观念没有超出下述这样一种认识:一个家庭或个人认为属于自己的那一块份地,就是该家庭或个人有权耕种或请人为之代耕的那部分村社土地。分配土地(只要分配土地的做法还存在)、耕作顺序、保证供水、维修围栏以及其他一切有关村社这个小群体

共同利益的事务，都由占有一份村社土地的家庭的家长们在潘查亚特^⑤会议上安排(241)。

每一块小的居留地，即阿巴德(242)。尼吉，即私人土地(243)。

刹帝利种姓只是在婆罗门典籍中提到，现在肯定已不存在(见格婆泽著《玛士腊》)(第246页)。同样，只能在婆罗门著作中证实其存在的吠舍种姓(商人的种姓)也已不复存在(248)。最早定居者后裔的主体(指众多村社作为整体而言)不太注意保持血统的纯洁或保存移民种族后裔的任何特征……渐渐地各种各样的人就同他们混杂起来了，这些人有本地土人，有从其他居留地由于避穷、避仇或其他原因而出逃的人，他们当中有的来了以后还得到一份村社土地(248、249)。

很可能，婆罗门典籍中的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只是源出于史前时期的空想的阶级差别而已(250)。

总之，人们想到的，最多只是耕种土地的权利，以及这种权利的转让——转让给别人以取得一份产品作为报偿(255)。甚至首领在自己的私人土地，即尼吉上，也只享有亲自耕作或以分享产品为条件请别人耕作的权利(256)。首领从耕作者那里所能取得的产品份额不是由他自己任意决定，也不是通过讨价还价决定，而是由习俗或惯例决定，在这方面，村社潘查亚特是最高权威，首领无权剥夺耕作者的土地(257)。

将这些产品份额变成等值的货币支付(这种做法迄今还不是到处可见的)，并不是将其变成因为占用为他人所有和支配的土地而交付给该人的地租，而是变成向一个在上的统治权威缴纳的赋税……首领虽然在柴明达尔辖地之内是所有土地的柴明达尔，但他最多只是他的尼吉土地的地主(地主只是一个仅有权决定土地的使用和耕作的人)，有时可能也是荒地的地主。他的办事机构是他的卡查里^⑥，这是地区的权力中心，同它平行并存的是潘

⑤ 潘查亚特，见本刊1987年第1辑第16页。——译者注

⑥ 卡查里，见本刊1987年第1辑第14页。——译者注

查亚特，即老居留地的自治政府（257、258）。

在《摩奴法典》里，没有一处把土地视为一种被现代英国人理解为财产的东西。耕地的私人所有权是被承认的，但它只是耕作者的所有权；土地本身属于村社；地租连影子也没有；所有者只是耕作者的另一个名称。他有义务进行耕作，以保证首领即地主不缺实物贡赋的收入，但是他可以使用仆人耕种，或者商请别人耕种，以分享收成为条件（即巴泰制度，是分成制佃农的一种形式）。《摩奴法典》里另一处告诫每一个人要储备足够他一家人吃三年的谷物……几乎每一个人都因此被认为是一个实际耕作者……实行巴泰制度……实际上并没有导致出租土地，摩奴不知有任何形式的地租（258、259）。

出卖土地，甚至仅仅是出卖土地的使用权，什么地方也没有直接提到过……占一块田、给一块田、夺一块田，在《摩奴法典》里，都出现过，但是没有买一块田或卖一块田（259、260）。

稍晚一些，按照《密陀娑罗》，分了家的亲属们取得了处理他们各自分得的那份家产的绝对权力；这仅仅是个人耕种权的转移，个人耕种权是与个人在村社里的地位相伴随的，而且附带有向地主缴付其所应收的产品份额的义务。因此，办理这样的事就要有特定的正式手续；完完全全的出售，除非迫不得已，人们是不主张这样做的。此外，当转移并不是绝对的，而是有条件的，即作为还债保证的时候，则总是采取现今被叫作附有用益权的抵押^⑦这种形式（260、261）。凭实际耕作而享有的土地用益权——以作为村社耕作者中一分子的权利，而不是以土地本身为依据——，印度教法律编写者们使用的“所有权”一词就是指这种用益权而言的（261）。

关于这一点，头衔铜牌证、旧时的官府证书文件以及诸如此类的证物都可证实；这些东西都表明常有这样的事：一个权位较高的

^⑦ 附有用益权的抵押，见本刊1987年第3辑第10页。——译者注

人名下的征收权和别种柴明达尔权利，被赏赐给或转授给一个婆罗门或其他的人；一块从荒地划出的或柴明达尔的齐拉阿特^⑧里面的地块被赠给一个婆罗门或其他的人；但是个人通过买和卖实际转移土地的事是没有的，甚至以若干年为期把土地出租以收取地租的事也是没有的（261、262）。《孟加拉亚洲社会杂志》第六卷第456页译载的桑吉碑铭上讲的不是所有者私人之间的土地买卖，而是为了使土地成为德巴塔尔而实行的某种解放（例如免除向地主缴纳赋税的义务）（262，注1）。

最近发表的拉图什先生的《阿吉米尔和姆海尔马拉的居留地报告》（举出了这方面的事例），尽管菲尔认为，拉图什通过从封建欧洲借用来的术语把事实歪曲了（263）。所说的事情归结起来就是：村社的某些成员凭某种得到承认的世袭或已成惯例的耕种权，占用村社的永久性耕地或改良过的土地，这种耕种权有时被叫作所有权，有时被叫作产业权；他们把产品中的一个惯例份额缴付给有权收受该份额的人，这样，他们就认为自己有权持续地、不受干扰地占用和耕种他们的土地了，甚至也可以把地转让给另一个人；没有出租土地以获利这类事情；私人出卖土地的事实际上没有听说过，由民事法院出卖土地（这是英国人搞的一个革新）已经被禁止，因为这太有悖于古老的习俗了，无法实行；抵押几乎全都属于附有用益权的类型，在姆海尔马拉，在抵押者和承押者之间建立了一种分成制度；国家——代表着以前的最高首领——向耕作者征收赋税（这在现代就相当于旧时惯例的产品份额），征税是由一定的代理机构等等来进行的，有些土地则属例外，在那里首领把自己征收赋税的权利或别种权利以服军役为条件或为了其他目的转让给小的首领们——伊斯塔姆拉达尔或扎吉尔达尔；由国家及其受委者这样行使的权利之一是处理荒地的权利；虽然在国家征税的范围内，税收采取的是缴纳货币的形式，但是在所有的扎吉尔^⑨

⑧ 齐拉阿特，见本刊1987年第2辑第7页。——译者注

⑨ 扎吉尔，见本刊1987年第2辑第15页。——译者注

土地上，征税是按产品来计算，按货币计算是闻所未闻的（第263—265）。拉图什本人就这样说：“土地占有的情况，象我们意料中的一样，同毗邻各土邦的基本情况完全对得上号”（第266页）。

在欧洲，与东方不同，代替实物贡赋的是对土地的统治权——耕作者被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沦为农奴或劳工（266、267）。

在东方，在村社制度下，人民实际上自己管理自己的，贵族阶级的首领们的权利之争主要是争夺卡查里—塔比尔的控制权（271）。

（徐 明译）

第一次全国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 学术研讨会部分论文摘编

1986年12月3日至9日，在福州举行了第一次全国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学术研讨会。会上，许多专家和学者对马克思这些笔记的内容、意义、影响等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本刊限于篇幅，只摘要刊载他们的部分论文，以飨读者。

略论人类学从摩尔根到马克思

贺 麟

我想就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到马克思的《摘要》，并参照恩格斯的《起源》，来理出一条人类学从摩尔根到马克思的线索。

《古代社会》是摩尔根的代表作，是人类学研究的经典之一。它系统而广泛地研究了人类上古社会的分期及其标志，氏族部落的构成和发展，家庭和婚姻关系的演化，以及私有制和国家等一系列问题，对西方人类学研究和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产生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对人类学研究的贡献主要有：

第一、摩尔根对历史分期的尝试具有科学的价值，包含了历史唯物论思想，体现了他的思想的辩证整体观。以一种“发明和发现”作为历史分期的标志是他的主要功绩，他的历史分期根据是符合唯物史观的，对此恩格斯给以高度评价。

第二、摩尔根对氏族制度的研究。他弄清了氏族组织的基础，表明氏族作为原始基层组织是整个原始社会的原生细胞，人类全

部历史可以分为相应的“两种社会制度”为特征的两大时期：最早时期是社会组织，其基础为氏族、胞族和部落；晚生的时期是政治组织，其基础是地域和财产。摩尔根说：“氏族制度是社会赖以组织和维系的手段。”恩格斯认为，摩尔根“给我们阐明了国家产生以前原始时代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

第三、摩尔根对家庭发展史的研究。他赞同人类起初没有家庭，而是从杂交状态过渡到家庭、从母权家庭过渡到父权家庭的理论。但是，他是从亲属制度的称谓方面来分析和推论家庭的早期形态的，从而开创了家庭史研究的新途径并证明了母系社会先于父系社会。恩格斯说，确定原始的母权制氏族是一切文明民族的父权制氏族以前的阶段的这个重新发现，使摩尔根得以首次绘出家庭史的略图，这样就在原始历史的研究方面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正是由于哲学基本立足点(历史唯物论)的相近，以及马克思迫切想扩充自己关于原始社会的结构及其演变等方面的知识，马克思仔细研读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写下了《摘要》。研究马克思的《摘要》，一方面我们要了解摩尔根对马克思有哪些影响，另一方面还要了解马克思是如何分析、批判和补充发挥摩尔根的思想的。

摩尔根对马克思的影响：第一、对原始社会历史分期的观点。在阅读《古代社会》之前，马克思对原始社会了解不深。摩尔根的分期理论使马克思的认识产生质的飞跃，基本上接受了他的分期法，了解到氏族制度的起源、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过程。第二、对家庭和母权制与父权制关系的观点。摩尔根通过自己的研究指出，家庭是一个发展过程，母权制家庭先于父权制家庭。马克思接受了这一思想，并用来批判了梅恩的父权制理论。第三、对氏族在原始社会中的地位的观点。摩尔根认为，“家庭，即使是专偶制家庭，不可能成为氏族社会的自然基础…… 民族以部落为单位，部落以胞族为单位，胞族以氏族为单位，但氏族并不以家庭为单位”。马克思接受了摩尔根的这一思想。第四、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在

私有制和阶级产生之前，人类还经历了漫长的无阶级社会，对此，马克思曾认识不足，下过一条普遍结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但在看过《古代社会》之后，观点发生了变化。恩格斯在此基础上修正了上述原理：“（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马克思在《摘要》中对摩尔根的分析、批判和补充。第一、马克思十分重视摩尔根对原始社会研究的贡献，详细摘录了《古代社会》中有科学价值的篇章。特别是摩尔根的许多论述与马克思以往研究的成果颇为相似，引起了他的共鸣，在这些地方马克思都在边上加了竖杠，或在下面划了横线，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它们看成马克思的人类学思想。例如，生活资料生产在人类历史中的重要意义、私有观念及晚期私有制对瓦解原始氏族社会的重要影响。第二、马克思在《摘要》中改造了摩尔根原书的结构，从而使摩尔根的人类学体系得到了科学的整理，纠正了摩尔根唯物论的不彻底性，充分体现了唯物史观：“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第三、马克思在《摘要》中写下了许多评论，对摩尔根的某些论点作了重要纠正、发挥和补充。

《摘要》反映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为完善唯物史观、建立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摘要》的根本意义在于它是对历史唯物论的论证、补充和完善，因为它通过对生产技术、家庭、私有制、阶级和国家发展过程的分析，说明了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的必然性。与此相联系，它还有几点意义：第一，《摘要》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早期关于人的哲学的研究。马克思在血亲和亲属关系中，在氏族社会的演化中，在人由蒙昧到野蛮再到文明的进步中，在人的两种生产活动中，达到了对人的经验的理解，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论中人的思想研究。第二，《摘要》补充和丰富了马克思关于原始社会方

面的知识，对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原始社会理论，创立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学和民族学具有重大意义。第三，《摘要》进一步论证了马克思早期所创立的共产主义理论。摩尔根关于人类同源和人类理想目标一致的思想给马克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马克思在《摘要》中引录了摩尔根的话：未来社会“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这一段话和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思想极为相近，都包含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思想。

马克思晚年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

艾 福 成

总结民族学研究成果，进一步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加以补充、发挥和发展，是马克思民族学笔记的重要内容之一。马克思从来不把自己的唯物史观看作最后完成了的终极真理，而看作发展中的理论。

民族学笔记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概括起来大体可分为四类。1、摘录有科学价值的材料，肯定正确的观点。这一点在对待柯瓦列夫斯基和摩尔根的著作上表现最为突出。2、批驳错误的观点，剔除虚假的材料。如对梅恩和拉伯克的著作摘要。3、对民族学的科学成果进行加工、改造。对摩尔根的《古代社会》，马克思除作详细摘记外，还改变了原著内容叙述的次序，为自己预计要写的唯物史观著作做准备。4、进行理论上的提炼、升华。据不完全统计，在《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马克思共写了106条批注，除一些表示连接性的插语和名词解释外，有25条是马克思自己理论观点的概括，有27条是对摩尔根观点的阐述。从上述四方面可以看出，民族学笔记是马克思潜心研究取得的初步成果，有很强的理论性，有很高的科学价值。

民族学笔记的另一个特点，是探索性，它毕竟是供马克思自己研究之用的笔记，是为撰写科学著作的准备。有许多素材和理论“毛坯”，尚未上升到理论体系，没有进行充分的理论论证。有一些观点是在酝酿之中，有些问题正在斟酌、思考、选择之中，在不同的笔记，或同一笔记的前后，关于同一问题的看法和提法就有变化。

认识和把握了民族学笔记的特点，我们在研究时，首先应该充分发掘马克思的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和思想火花，不能低估笔记的科学价值和意义。其次，也要从笔记这种性质的著作实际出发，从其本身内容出发，进行恰如其分的分析，实事求是而不牵强附会地评价其意义。

民族学笔记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突出贡献，首先是对两种生产理论的进一步发挥和补充。虽然笔记中没有提到两种生产的概念，但我们不能单纯从概念字眼出发，而应从实际内容出发。人类自身生产是婚姻和家庭形式、亲属关系、亲属制度以及人口增殖这些因素的总和。我们应从这些因素的总和去把握人类自身生产的概念。这样来看，这方面的内容在笔记中几乎比比皆是。马克思充分肯定摩尔根关于群婚的发现及关于五种家庭形式顺序相承发展的观点，探讨了家庭发展的规律性及其与自然选择、物质生产发展的内在联系，研究了人类自身生产诸因素的特点及其相互关系。马克思不仅肯定了摩尔根关于亲属关系和亲属制度的观点，而且进一步深化了，他把家庭和亲属关系比作经济基础，把亲属制度比作上层建筑，视前者为人类自身生产中具有决定性的关系，而视后者为派生关系。这样就把人类自身生产诸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具体化、明确化了。这是马克思对人类自身生产理论的重要发展。

其次，马克思着重研究了婚姻家庭与原始社会制度的关系，批判了混淆家庭与氏族、氏族与部落的错误观点，揭示了人类自身生产对原始社会发展所起的主要支配作用，因为氏族制度作为原始社会的社会制度，是由血缘亲属关系决定的，是靠血缘关系的纽带来维持的。

再次，马克思在民族学笔记中，研究了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过渡、原始氏族制度的解体过程、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起源等问题，不仅为揭示私有制、阶级、国家的起源打下了基础；还考察了物质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在历史中所起的不同作用、它们的相互关系及其在原始社会发生作用的表现形式，为从两种生产相互关系及其作用方面表述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创造了条件。

以上说明，在民族学笔记中，关于两种生产的理论，关于原始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关于在原始社会和阶级社会两种生产所起作用的区别思想，关于私有制、阶级、国家起源的思想，都已经提出来成为轮廓清晰、昭然若揭的东西了，只是没有来得及以著作的形式写出来而已。这些思想的孕育、形成，无疑是对唯物史观的重要补充和发展。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写作，与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有着直接的密切联系。从基本内容来看，二者是一致的，根本谈不到有什么矛盾和背离。《起源》一书的基本线索，正是遵循马克思《〈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的结构顺序安排的。恩格斯在《起源》中得出的总结论，亦即贯穿于全书的总的思想，在第一版序言中做了概括的表述（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页）。这段精辟的论述至少表述了如下三点主要思想：

第一，表述了两种生产的不同含义，揭示了它们在历史中的不同作用及其相互关系。

第二，从上述思想的角度，对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作了更为完全的表述，指出两种生产是历史发展中的决定因素，一定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社会制度都受它们的制约，尽管两者所起的制约作用是不同的。

第三，科学地表述了原始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指出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制度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人类自身生产起了主要的决定作用。

这些基本思想和结论是在马克思民族学笔记基础上概括总结

出来的，对唯物史观作了重要补充和发展。虽然《起源》与民族学笔记在性质上和表达形式上有区别，但在基本理论上没有本质的不同。从这种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民族学笔记是《起源》的准备，而《起源》则是民族学笔记一部分重要内容的结晶。没有民族学笔记，也就没有《起源》对这些问题的发展。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在民族学笔记中所表达的关于两种生产、关于原始社会发展规律等思想就是极其宝贵的了，确实是对唯物史观的重要贡献。

马克思晚年的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方法

许 苏 民

马克思晚年的文化人类学手稿，蕴涵着马克思晚年关于文化人类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各民族社会历史进程的多样性，与寓于这种多样性之中，然而又是“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的统一；从特定民族具体的历史实际出发的主位研究法与在研究中贯彻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的客位研究法的统一。这些基本理论和方法，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化人类学研究，依然不失其指导意义。

一、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与“超历史的” 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的统一

马克思的一生，是以科学地揭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己任的。在这里，他碰到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即各民族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与他所要揭示的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他耗费了毕生的精力。

从19世纪50年代起，马克思开始对前资本主义诸形态进行全面研究。一方面，他看到了世界史上，原始所有制的三种形态，即亚细亚的、古典的和日耳曼的形态，规定了古代东方、古希腊罗马和日耳曼民族进入文明时代的不同历史途径。另一方面，他又试

图用历史和逻辑的一致的方法来表述社会历史依次演进的阶段。从世界历史演进的宏观角度上，马克思得出以下结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这里把独立地发展的“亚细亚的”排在“古代的”前面只是按照社会发展程度的高低，而并没有完全以历史年代先后为依据。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哲学认识的逻辑上，是下一定要以年代先后为顺序的。

1868年，马克思阅读了毛勒关于“马尔克公社”的著作。他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说，毛勒“详尽地论证了土地私有制只是后来才产生的，等等。……我提出的欧洲各地的亚细亚的或印度的所有制形式都是原始形式，这个观点在这里……再次得到了证实”。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遗迹在西欧的被发现，一方面支持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的见解。但另一方面，总是不能解释为什么古典型和日耳曼型的公社存在时间都很短，而亚细亚型却长期延续的事实。这种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关系问题，只是在马克思晚年的文化人类学手稿中才得到基本解决。

马克思晚年，对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论述显得审慎而又审慎。马克思深知，在历史的发展中，事实上并非一切民族都遵循同一条发展道路。然而，这下意味着马克思拒绝揭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他坚持的是仅仅把它看作是寓于历史的多样性发展之中然而又是“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理论。在马克思晚年的手稿中，他力求把社会发展的多样性与“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统一起来。

首先，他对社会发展的历史途径的多样性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在《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所有制……〉一书摘要》中，马克思针对柯瓦列夫斯基关于印度历史上土地关系上的变化是西欧模式的“封建化”的观点，作了大段的评注，他认为，无论如何，欧洲意义上的封建主义，即德意志—罗马形态的封建主义，在印度的广大地区中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其次，在晚年的手稿中，马克思对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也有了进一步的升华。在《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所有制……》一书摘要》中，马克思揭示了原始公社解体的必然性，即从原始的公有制向私有制发展的必然性，并且似乎确认了这样的观点：在公社土地所有制的外壳内部，先是发生了奴隶制形式的奴役，后来又开始了封建化过程。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马克思为了历史的和逻辑的一致地表达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重新调整了摩尔根这本书的结构，形成了从物质生产和家庭的发展经过所有制关系的变化到国家的产生的逻辑格局，在更加丰富的历史材料的基础上试图建立关于文明时代社会演进的一般历史哲学理论。从《古代社会》一书中，马克思发现了原始的共产主义，这就使他有充分的证据来立论：既然私有制和国家都只是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产物，那么，它也将在社会发展的更高阶段上消亡，未来的社会将是原始共产主义在更高形式上的复归。

最后，应该指出，马克思的演化论是包含了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在内的，他所试图建立的是既寓于历史的多样性发展之中又似乎是“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理论。他在论述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过渡的必然性的时候，既考虑到古希腊罗马从原始公社进入奴隶制社会的事实，也考虑到日耳曼民族从原始公社直接进入农奴制社会的事实。

总之，马克思的一般历史哲学理论体现着社会发展的多样性的统一性。它揭示了人类社会从原始公有制走向私有制、然后又在更高的基础上向公有制社会复归的必然性，但并不是说所有的民族不论所处历史环境如何都要经历同样的发展阶段，也并不是说差不多相同的发展阶段只能有一个模式。

二、主位研究法与客位研究法的统一

与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相统一

的观点相适应，马克思晚年手稿中所体现的文化人类学方法是从特定民族具体的历史实际出发的主位研究法与在研究中贯彻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的客位研究法的统一。

首先，马克思注重从主位的观点对不同民族的历史发展进行考察，不仅考虑造成其社会形态的特殊性的内在原因，而且注意体察人类在特定历史阶段上的心理状态，力求使其合乎历史的实际，以避免生搬硬套、牵强附会。

其次，马克思善于通过对不同民族的具体文化形态的研究去发现社会发展的共性，以便从中得出一般历史哲学的结论，并用这种历史哲学理论去指导进一步的研究。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的研究方法又可以说是一种客位研究法。但这种客位研究法，又是不排斥从各民族具体的历史实际出发的主位研究法的。

最后，在马克思晚年的文化人类学研究中，特别是对于人性的具体历史内容的研究，既从客位观点来体现其共性，又从主位观点来体现其特殊的历史内容。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单纯地使用客位研究法而排斥主位研究法，或者单纯地使用主位研究法而排斥客位研究法，都是片面的。一个研究文化人类学的学者，既应具备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的素养，又应有使自己的心灵直接同体现在各种不同的文化形态中的文化价值观念相交感的能力，才可能在研究中很好地把客位研究法与主位研究法统一起来。

原始道德的形成、演变及其特征

张 正 霖

摩尔根著作的《摘要》作为马克思晚年的重要著作，其理论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它利用摩尔根等人类学者的大量人类学史料，印证和丰富了唯物史观原理，同时又运用唯物史观原理和方

法，改造了资产阶级人类学，为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建立作好准备。下面仅从原始道德这一侧面来阐明《摘要》的这种双重意义，并力图从中对原始道德的产生、演变及其基本特征有一较为系统的了解。

作为社会上层建筑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道德，究竟产生于何时，这是我们研究人类学文明起源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根据《摘要》我们可以说，人类道德并不是随同人类社会一起产生的，它只是原始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具体地说，当人类还处在蒙昧中前期，规范其行为的是自然强制而不是道德强制。原始道德的萌生大约在蒙昧晚期和野蛮时期之交（有的民族更晚），其标志一是食人之风的消失，二是血缘家庭的出现。

《摘要》指出：“人类进步的一切伟大时代，是跟生存资源扩充的各个时代多少直接相符合的。”道德的产生当然也依赖于生存资源扩充的程度。在原始蒙昧中前期，由于生产水平极为低下，原始人靠采摘、捕鱼和狩猎得到的食物太不可靠，“人类便不得不采取食人的办法。”到野蛮时期，由于原始农业的出现，人们有了较稳定的淀粉食物，人相食作为一种普遍风气才告结束（但残余并未绝迹）。应当说，食人之风在当时，是无所谓道德与不道德的，因为这时人类刚从动物界分化出来不久，还受到同动物相去不远的自然控制，还不能把自身同环境区别开。而食人之风的消失则标明人类意识的萌生，标明人开始把自身同动物区别开来，标明个人把别人当作自己的同类相待，人类第一次朦胧地意识到同一群体成员生命的重要。只是在把对方当作同类相待、而不是把对方当成异类相食的时候，才可能产生所谓规范人类成员行为关系的道德。

人相食成风的蒙昧时代，在最能标志人类文明程度的男女两性关系方面，从另一侧面证明当时的无道德状况。《摘要》以大量史料表明，人类形成的初级阶段，曾经毫无限制地发生性行为。显然，这种杂乱的纯由生理控制的男女关系，是一种纯自然行为，同动物没有两样。后来，按摩尔根的说法，由于从纯粹的经验中，原

始人开始禁止上下辈人性交，从而形成最早的社会组织形式——“血缘家庭”。血缘家庭的出现，使人类性行为受到人类社会的第一次控制，表明男女间的自然关系开始打上文明的印记，宣告性道德萌生。

因此，在食人成风和杂交的蒙昧时期，应当是有人类社会（进化中的社会）而无社会道德，只有当生产发展到定居阶段，食人之风消失的时候，只有当形成第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形式——血缘家庭的时候，道德才得以产生。

随着生产的发展，交往的扩大，血缘家庭为普那路亚家庭取代后，血缘族内婚演变为普那路亚群婚、对偶婚和专偶婚等婚姻形态。从以上四种原始婚姻家庭的演进我们首先可以看到，原始“家庭是一个能动的要素，它从来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由低级的形式进到高级的形式”。家庭的这种变化，从一方面看，是受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变化决定的，物质生产方式决定人口生产方式；另一方面，婚姻家庭关系，又决定和影响着作为上层建筑的亲属制度、道德风尚。所以马克思特别欣赏摩尔根关于家庭是能动的而亲属制度是被动的提法，并进而引伸说，“同样，政治的、宗教的、法律的以至一般哲学的体系，都是如此”。据此我们可以认为，决定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虽然其主体部分应当是属于物质生产方式范围的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但作为人口生产方式的家庭婚姻关系，也应是其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过去，当我们研究上层建筑时，视野全部投向物质生产关系方面。对照《摘要》中马克思研究原始道德的方法，我们今后或许应当扩大视野，加强对各个时代人口生产方式的研究。

其次我们还可以看到，人口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经历了一个统一、分裂、再统一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经过这种发展，人类不仅在性关系方面一步步远离动物的自然状态，从经验中形成了对自身生理冲动的社会控制，使单纯的性交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婚姻。而且最后形成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家庭，以此取代了原始氏族

的地位,使家庭具有了独立生产和生殖的双重功能,加强了作为私有制社会细胞组织的能动作用。因此,无论从道德或历史的角度看,个体家庭这种显见的双重进步都应大胆地给予肯定。

最后也必须注意,原始婚姻在其早期的群婚阶段,尽管还有许多不文明的东西,而且始终也没有从中产生出男女间的情爱,自然不是什么理想的婚姻形式。但并不能因此肆意贬损。应当看到,在整个私有制社会,婚姻一般都不是以情爱为基础的;而且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在私有制社会也从未认真实现过,婚姻道德水平并不比原始社会高;相反,原始社会曾有过的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夫妻和睦等美德,倒是私有制所无的。正是在此意义上,恩格斯认为私有制上建立的不平等的婚姻比之原始公有制上建立的平等的婚姻,在道德上是一个退步。

如上所述,当原始社会处在蒙昧时期,还谈不上社会道德;血缘家庭时期,开始有了道德的萌芽,但这只是一种狭隘低级的血亲道德。以氏族为单元的原始社会,具有了真正的社会性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也随之复杂起来,因此,研究氏族道德,实际上是解剖典型的原始道德。除上述婚姻道德外,氏族道德主要表现为四:第一,维护氏族公有制的公有观念和均平意识;第二,协调氏族成员平等关系的民主原则;第三,氏族成员相互援助和相互保护的义务,“自由、平等、博爱,虽然从来没有明确表达出来,却是氏族的根本原则”;第四,氏族成员的个性道德,以上三种氏族公德在氏族成员个人身上,沉淀为诸如勇敢、勤劳、重名、守信等个人品德,标志着人类个性的萌生。

我们不难发现,原始人虽然有着上述为公、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勤劳、勇敢、诚实等美德,但这些主要不是原始个人进行道德选择的结果,不是“自律道德”,主要还是为生计所迫,由氏族利益的强制所使然。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氏族道德主要是从外部加以强制的习惯道德,或者说是一种“他律”道德,就道德意识的发展程度而言,还处于人类道德的低级阶段。但在漫长的原始社

会发展过程中，人类个性道德或道德个性也随着萌生。到野蛮时期的低级阶段，“人类较高的属性便已开始发展起来了。个人的尊严、口才、宗教感情、正直、刚毅和勇敢这时已成为性格的一般特点，但同时也表现出残忍、诡诈和狂热”。这说明原始人已有其个性，不过，由于这时个人同氏族在利益上是一致的，原始共同体给个人“带来满足和乐趣”，个性和共性是统一的，原始个性仍“湮没于氏族之中”。

试析《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 nation一词的涵义

王明甫

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补充和完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发展史及国家理论的科学体系，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在阅读马克思的《摘要》和恩格斯的《起源》时，对照参读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对于我们加深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乃至寻求某些疑难问题的答案，都是大有益处的。

我们在研读马克思的《摘要》一书关于管理观念的发展的篇章时，常常遇到 nation 这个词，一般都把它译作“民族”，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作为一个术语，在论述原始社会的著作中，nation 是用作社会组织称谓的，并非是人们共同体的“民族”。然而在不同学者的笔下，nation 一词的使用又是相当混乱的，有时指“部落联盟”，有时又指“部落”。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为了阐明他的理论体系，首先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概念体系。按照摩尔根的提法，关于原始社会的社会组织序列，在美洲印第安人那里是：氏族、胞族、部落和部落联盟，而在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则是：氏族、胞族、部落和 nation (或 pōpūlus)。摩尔根指出：nation 就是“在同一个共同领域内联合诸部落而形成一个氏族社会的集团”，

而“这种联合是比联盟更为高级的一个步骤”^①。可见氏族制度下的社会组织共有 5 个：1. 氏族；2. 胞族；3. 部落；4. 部落联盟；5. nation。这种 nation 正是古希腊、罗马部落所具有、而为美洲土著部落所未能达到的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社会组织形式。马克思在《摘要》一书中就是按照这个理论概念体系指出，某些历史著作中的 nation 或相当于“部落”，或相当于“部落联盟”。

其实，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在结成 nation 之前，也经历过“部落联盟”阶段，只是“因为事实真相都淹没在神话传说时代的迷雾中了”^②，对其组织的详情后人了解有限，而且也没有产生重要的后果，因此在序列中只好割爱，未列为“典型形式”。这就是美洲印第安人社会组织的序列有“部落联盟”而无 nation，而希腊人和罗马人社会组织的序列有 nation 而无“部落联盟”的原委。正是由于过去通常都是把这里的 nation 译解为“民族”，结果形成了原始氏族制度下的社会组织只有从氏族到部落联盟这样 4 种形式（或称为 4 个阶段）的比较固定的看法。继部落联盟之后，历史学家便确认国家的出现，民族理论家则把问题引到所谓“民族”形成的争鸣上去了。实践证明，这样一来不但模糊了“民族”概念本身，而且从原始氏族社会组织的递相发展的序列上摘走了带有决定性意义的一环，使马克思主义的古史分期和国家起源理论的科学体系残缺不全了。

作为社会组织发展的最高也是最后阶段的 nation，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由野蛮时代过渡到文明时代必经的一个阶段。北美印第安人就是因为没有发展到这个地步而未能踏入文明的门槛。nation 与“部落联盟”的具体区别就在于：后者是分散居处的独立部落之间结成的联盟，而前者是联合在同一个地域范围之内的部落共同体。而作为人类社会管理观念和制度的发展，后者是氏

① 《古代社会》1977 年商务印书馆版上册第 65 页。

② 同上书，第 132 页。

族酋长议事会和军事酋长“两权分立”的民主社会组织，而前者则是由氏族酋长会议、人民大会和军事酋长“三权并立”的民主社会组织。这里的“军事酋长”在希腊人那里叫做“巴赛勒斯”，作为时代的特征和标志，古史学家把这种“三权并立”的管理机构又称为“巴赛勒亚”。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希腊著作家用来表示荷马时代王权的巴赛勒亚一词（因为这一权力的主要特征就是军事的统率），在同时存在酋长会议和人民大会的情况下，其意不过是一种军事民主制而已。”^③在罗马人那里，“三权并立”的王政时代的“军事酋长”叫做“勒克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象英雄时代的希腊人一样，罗马人在所谓王时代也生活在一种以氏族、胞族和部落为基础，并在从他们当中发展起来的军事民主制之下。”^④由此可见，nation 阶段原来就是人们已经相当熟悉的、经典著作中所讲的英雄时代的“军事民主制”阶段。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把 nation 和军事民主制与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贯通起来。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好地理解恩格斯所明确指出的：军事民主制，“这是氏族制度下一般所能达到的最发达的制度；这是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模范制度。只要社会一越出这一制度所适用的界限，氏族制度的末日就来到了；它就被炸毁，由国家来代替了。”^⑤

然而，军事民主制所适用的界限又到哪里呢？我们知道：“在氏族的基础上不可能建立政治社会或国家。”^⑥当我们对照《起源》和《古代社会》来阅读《摘要》一书时，便可以发现，以财产和地域为基础的地缘关系的真正建立，并不是在未脱离血缘联系纽带的 nation 出现之前，也不是与其形成同步，而是在氏族制度下的这个最后的社会组织趋于瓦解之际才开始出现萌芽的。从氏族组织的逐步被排斥直至被推翻，到政治社会或国家的建立，其中间阶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第 512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124 页。

⑤ 同上书，第 142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第 438 页。

都属于过渡性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中，氏族制度逐渐消失，政治制度逐渐出现，二者在一段时期内长时间并存，甚至出现反复，终以地域结合的递进体系真正取代了以人身结合的递进体系，从而导致国家的形成。特别是直接由氏族社会逐步演进而形成的国家，这个过渡阶段持续的时间要更长一些。

我们不妨从反面再证明一下：如果把 nation 只习惯于译解为“民族”，恐怕不只是模糊了军事民主制阶段，同时也模糊了由氏族社会向政治社会或国家过渡的渐变过程。

应当看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对 nation 这种社会组织或发展阶段还有不同的称谓，诸如 pōpūlus、people、Volk 等。笔者曾试图主要通过对 nation 的阐释，将氏族社会最后阶段的这种社会组织译解为“部落联合”。我想这样来理解马克思《摘要》一书中的 nation，至少对我们理论联系实际地解决国家起源和古史分期问题是具有一定裨益的；同时，对所谓“民族”形成问题或许也可以得到某些程度的澄清。

论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中的“人类学笔记”

荣 利

马克思在晚年研究那些似乎和经济学研究没有什么直接联系的人类学著作，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理论动机？对这个问题，如果仅仅局限于马克思晚年笔记所摘录过的那些著作，是不可能得到可靠的答案的。因此，研究“人类学笔记”的性质及其在马克思思想史中的地位，必须结合马克思一生的理论著述，特别是要结合自 19 世纪 50 年代以来有关社会历史发展的论述。

在马克思以前，历史学家们都没有把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作为历史研究的核心内容。揭示这一历史规律的任务由马克思完成了，他一生全部的理论著述都是用来证明社会的发展是

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阐明社会历史发展——人类社会古往今来的历史及其规律，是马克思研究历史最基本的要求，这个要求内在地规定了马克思走向“人类学”的理论动机。马克思走向“人类学”，决非是为了建立一门人类学，以沟通他早期的哲学人本学和他后来掌握的关于原始人发展的经验材料之间的联系；而是为了阐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和史前社会的本质，其重要意义已远远超出了人类学所能包含的范围。

马克思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全部理论都旨在证明，“世界历史”的形成，即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形成的“世界观念”是马克思在 19 世纪 50 年代探索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主要理论基石。从全人类解放出发，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论述了这一思想，特别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深刻地揭示了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民族文化走向世界文化的必然趋势。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的形成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形成的必然产物，因为资本主义“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在“世界观念”的指导下，马克思精辟地提出了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理论，为世界历史发展勾勒出一条唯一的线索，这就是他在 1859 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的：“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马克思在 40 年代到 50 年代的著述中，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用“世界观念”来说明东方社会走向世界历史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他认为东方社会所固有的民族狭隘性只有在世界普遍交往的过程中才能得以克服。但是，东方社会如何从它以往长期停滞的状态完成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特别是这种转变的具体途径——究竟是通过资本主义的殖民统治，还是通过自身内部的社会变革？正是这些复杂的一时还难以确切把握其本质的历史现象使马克思的“世界观念”面临着和“西方中心论”的冲突，这就是说，当“世界

观念”只能借助于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而得以形成时，“世界观念”确实很容易蜕变为“西方中心论”，即完全用西方的模式来套东方社会的发展，尽管他的“世界观念”是和西方中心论根本对立的。问题的症结在于：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普遍规律和东方社会发展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或者更进一步讲，西方社会发展和东方社会发展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很显然，根本解决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的根据就在历史过程之中，马克思从70年代中开始走向“人类学”，就是为解决上述问题做的理论工作。

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历史的深入研究。马克思不仅致力于考察东方社会走向“世界历史”的必然性，而且也致力于考察东方社会基础的性质及其在社会发展总的序列中的地位，简言之，马克思是从东方社会的土地公有制中看到了人类社会“原生形态”的基本特点。马克思从历史和逻辑统一的原则出发，暂时抽象掉亚细亚生产方式中的国家专制这一因素，而将土地公有制突现出来，的确能够解决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的性质及其和私有制社会的关系问题。但是从历史上看，亚细亚生产方式不仅和其它私有制社会如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长期并存，而且在西方的封建社会趋向解体时，仍然保持着自己强有力的生命力。当马克思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置于人类社会各形态依次更替发展的过程中予以考察时，就内在地包含着一种逻辑和历史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取决于人类对史前社会的发现和认识，这无疑构成了马克思走向“人类学”的又一理论动机。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使他清楚地了解到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全部秘密，而且由此掌握了理解其他一切社会形态的钥匙。但是，马克思也认识到，对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把握，不能代替对各个不同的社会形态的“一切历史差别”的研究，正如他自己所说：“如果说资产阶级经济的范畴包含着一种适用于一切其他社会形式的真理这种说法是对的，

那末，这也只能在一定意义上理解”。进而言之，关于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理论也只能在最一般意义上反映和说明社会发展的基本过程。这就意味着，在完成对人体的解剖以后，还必须完成对猿体的解剖；人体的解剖只是提供了解剖猿体的一把钥匙，但却不能代替后者。因此，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内在地体现着走向“人类学”的必然性。虽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自亚细亚生产方式起的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过程已作了经典性的概括，但并没有历史地解决亚细亚生产方式所特有的社会性质及其发展道路等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中所包含着的国家专制这一因素，显然和人类社会“原生形态”所应具有的无阶级、无私有制、无国家的性质是不相吻合的。可见，把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缺乏充足的历史依据。因此，马克思关于史前社会的理论能否科学地完整地建立起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那个时代的人类学研究的进展。马克思从 70 年代末起开始转向“人类学”。到了 70 年代，人类学研究出现了根本性的转折。1877 年摩尔根发表了《古代社会》一书，揭示了氏族在原始社会中的地位，证明了母权制氏族在历史上先于父权制氏族。马克思敏锐地发现了摩尔根的氏族理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理论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在马克思看来，摩尔根最突出的贡献就在于他确立了氏族组织在史前社会中的决定性地位，证明了在原始氏族组织中，不存在阶级、私有制和国家；这样，人类社会发展序列中的“原生形态”便被真正发现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将不再以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的形式出现，将不再是原始社会的同义语。但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和其他社会形态的发展道路，仍然是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中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直接涉及到东方社会的未来命运。

如前所述，史前社会的发现使亚细亚生产方式失去了作为人类社会“原生形态”的意义，而把亚细亚生产方式区别于其他一切社会形态的特殊性质和特殊发展道路问题突现出来了。但是，马克

恩在晚年(1872年以后)却放弃了“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原因何在呢?这只能从马克思走向“人类学”的内在逻辑中予以说明。马克思通过阅读同时代人有关东方社会的著作,使他对东方社会的内部结构、所有制关系、农村公社和发展道路等重大问题有了新的看法。他看到了原始社会中氏族公社和东方社会中农村公社的重大区别,即农村公社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所以它同时也是向次生的形态过渡的阶段,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农村公社的这种双重属性构成了马克思把握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出发点,同时也是他决意放弃“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的主要依据,因为这一概念已经不能确切地说明东方社会的基本特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由此否定了东方社会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的特殊性质和特殊的发展道路。既然东方社会是处在向人类社会的“次生形态”过渡的阶段,那么它显然有别于处在次生形态上的奴隶制社会和农奴制社会。这样,不管是在理论的逻辑上还是在历史上,都存在着一个社会发展的“多线论问题”。很显然,马克思晚年走向“人类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动机就是为了彻底解决东方社会独立发展的可能性及其未来命运的问题。

综上所述,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和他的社会历史理论有着紧密的联系,这是他为了全面地系统地研究人类社会古往今来的历史及其规律,是为了科学地解剖史前社会的内部结构并确立其在人类社会发展总过程中的原初地位,是为了探索东方社会的特殊性质及其特殊的发展道路并阐述其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道木摘编)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的写作过程

〔民主德国〕约·海尔曼①

1884年2月16日，恩格斯在马克思的遗稿中发现对摩尔根的摘要以后，高兴地写信给卡尔·考茨基：“在论述社会的原始状况方面，现在有一本象达尔文学说对于生物学那样具有决定意义的书，这本书当然也是被马克思发现的，这就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1877年版）。马克思曾经谈到过这本书，但是，当时我正在思考别的事情，而以后他也没有再回头研究；看来，他是很想回头再研究的，因为根据他从该书中所做的十分详细的摘录中可以看出，他自己曾打算把该书介绍给德国读者。摩尔根在他自己的研究领域内独立地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最后还对现代社会提出了直接的共产主义的要求。……假如我有时间，我倒想利用马克思的札记来把这些材料加加工，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杂文栏或《新时代》写点东西……。泰罗、拉伯克及其同伙所搞的整个骗局，不管是族内婚、族外婚，还是其他各种荒诞无稽之谈，现在都被彻底揭穿了。这些先生们在这里拼命抵制这本书，它是在美国印刷的，五个星期以前我就订购了这本书，但直到现在还没有收到！”②

① 约阿希姆·海尔曼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科协主席、科学院院士和古代史与考古学研究所所长，曾于今年4月份来华访问。本文系根据作者的文章《历史唯物主义和人类史。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写作过程和影响》前两节译出，标题为译者所加。——译者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42—443页。

在同一年，即 1884 年 10 月 3 日，恩格斯完成对他的由霍廷根-苏黎世人民书店出版社出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一书的最后校订。^③不久后，即 1884 年 10 月 15 日，已有 30 本书被分送到“世界各地”，并且就该书译成波兰文、俄文和意大利文问题进行了商讨。^④恩格斯在 1884 年 2 月 16 日的信中谈到马克思对摩尔根著作的摘录时向考茨基所表达过的那些不确定的想法^⑤，不但已经明确，而且还付诸实现了，并且远远超过最初设想的目的。正如列宁后来所说，一部“现代社会主义主要著作”就这样问世了。^⑥

关于写作过程的时间顺序

虽然恩格斯写作《起源》的时间顺序是清楚的，但是首先仍然有必要去揭示看来对写作过程有重要意义的至今尚未受到重视的一些相互关系。显然，恩格斯在研究摩尔根著作摘录及其原书的过程中，改变了自己的写作构想。

恩格斯最迟在 1884 年 1 月初看到了马克思的摘录并且认识到了它的意义。接着他立即定购了摩尔根的著作，但是五个星期过后，即 1884 年 2 月 16 日仍没有收到。^⑦1884 年 3 月 7 日，他很可能得到了此书，但没有详细阅读。他——已经知道马克思的摘录——非常兴奋地写信给弗·阿·左尔格：“请读一读摩尔根(路易斯·亨·)的《古代社会》，是 1877 年在美国出版的。他巧妙地展示出原始社会和原始社会共产主义的情景。”^⑧3 月 24 日，他告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第 213 页。

④ 同上书，第 221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443 页。

⑥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43 页。另见《马克思恩格斯年鉴》1981 年柏林版第 4 卷第 53、60 页。

⑦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443 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第 127 页。

诉考茨基，他费了很大劲才弄到了这本书，如果他有时间，想对此书作一番加工。^⑨在这以后，他显然亲自阅读了这本书。4月11日，当他已经着手概括摩尔根这本书时，觉得这是一本“写得如此糟糕的书”。他希望一周后就能写好自己的书。^⑩在写作过程中，大约在4月中旬，恩格斯认识到，不能简单地“叙述”摩尔根的著作。因此，他于1884年4月26日写信给考茨基说：“这对我们的工人不会有什么帮助。”但是“这篇东西对于我们整个观点，将有特殊的重要性。……因此，这篇东西要认真加工，仔细推敲，从总体上作周密思考，但是在写作时不应当顾虑反社会党人法。”^⑪显然，本书的提纲以及章节划分已经拟定完毕，尽管恩格斯1884年4月18日曾向保尔·拉法格抱怨过他“忙得不可开交”^⑫。5月17日以前，恩格斯一直在按照这份提纲写作。5月10日，他说，他要“完成一部重要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⑬。5月17日说道：“稿子今天写完，还要再校阅一遍并作最后的润色，这需要几天的时间。……文章很长，约一百三十页八开纸，而且写得很密，标题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⑭5月22日，除了最后一章“还需要校订”外，稿子被寄往苏黎世。^⑮5月26日，全书写作完毕。^⑯但是，关于出版问题的谈判却拖了下来。六个星期以后，即1884年7月11日，恩格斯向考茨基抱怨说：“同狄茨打交道是一件麻烦的事。……因此，最后请你们决定采取一种积极办法！”^⑰不久，即1884年7月16日，考茨基告诉他，霍廷根-苏黎世的人

⑨ 同上书，第132页。

⑩ 同上书，第135—136页。

⑪ 参看上书，第144页。

⑫ 同上书，第143页。

⑬ 同上书，第147页。

⑭ 同上。

⑮ 同上书，第148页。

⑯ 同上书，第155页。

⑰ 同上书，第176页。

民书店出版社将出版这本书。^①7月28日，恩格斯寄还了校样，并且订购了30本书。^②10月3日，恩格斯把校样寄往苏黎世，校样中的最后几处勘误没有来得及被采纳。^③显然，本书是在九月底印刷的，《社会民主党人报》预告时说10月2日已经出版。^④1884年10月11日，恩格斯已经拿到他要的书。^⑤根据恩格斯自己的说法，可以作如下推论：

1. 他开始直接起草工作不会早于4月初。因为，3月24日他还拿不准是否有时间对“摩尔根的书”作一番加工。^⑥3月31日，他又向劳拉·拉法格抱怨，说他受到干扰和纠缠，不但时间，而且连房间和书桌都不属于他了。^⑦

2. 经过对马克思的摘要和摩尔根原书的研究，恩格斯改变了对自己著作的范围和目的的设想。最初，他打算只对摩尔根的书进行概括，4月中旬他改变了自己的计划。4月21日，书的章节分编完毕，5月17日，写完全文。种种情况表明，写作时间是短的^⑧，这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恩格斯在此期间已经成竹在胸，并且仰承他对希腊、罗马、凯尔特和日耳曼人的历史及史料具有广博的知识。这一点也是恩格斯之所以对摩尔根著作具有独立性，有可能根据自己的问题提法通过具体的历史分析在短期内对摩尔根不够详细或者几乎没有注意到的历史方面加以探讨的原因。

3. 恩格斯深入地研究了摩尔根著作中的所有制和国家问题，

^① 见《弗·恩格斯和卡·考茨基通信集》1955年维也纳版第133页，由贝奈狄克特整理出版。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85—186页。

^③ 见上书，第21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论丛》第3期第130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214页。

^⑥ 同上书，第132页。

^⑦ 同上书，第133页。

^⑧ 主要见恩·恩格尔贝格《社会形态的必然顺序问题》，载《历史杂志》1974年第2期第156—157页。

从而改变了他的写作计划。在研究过程中他发现，材料本身对于“整个观点”，即历史唯物主义，对于当时同国家社会主义的具有现实意义的理论斗争有着特殊的意义。同马克思的摘要相比，从《起源》一书本身也可以明确指出写作计划的变动。第一章《史前各文化阶段》和第三章《易洛魁人的氏族》是马克思摘记和摩尔根著作的概括或摘录。这一点从编排和内容上看大部分也适用于第二章《家庭》。但是，本章的第二部分却是恩格斯独立的阐述和评论，即使细节问题也是如此。马克思在他的摘要中就已经对家庭作过评价，比摩尔根阐述得更为确切和深刻，例如关于一夫一妻制家庭的社会经济特征。^②

写作计划的扩大使恩格斯能够在写作《起源》的过程中间接介入了1884—1885年的党内斗争，并且加强了革命力量在党及其目标的根本问题上反对改良主义思想的立场。^③

《起源》首先在工人阶级中迅速得到传播。^④截止1890年，已经印刷了根据封面来看是不同的3个版本，共5000册。1891年7月，恩格斯完成该书第4版的修订。1891年11月——印的字样是1892年——，由约·亨·威·狄茨出版社出了第4版。加上1894年出的第六版，恩格斯在世时德文版本共印了11000册。在其他国家出了12版。因此，《起源》是19世纪传播最广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之一。^⑤恩格斯在世时本书曾出版过意大利文(1885)、波兰文(1885)、罗马尼亚文(1885—1886)、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1887—1888)、丹麦文(1888)、捷克文(1891)、匈牙利文(1893)、俄文(1893)、法文(1893)和西班牙文(1894)等译本。1902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365—368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3页。

^③ 见《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性而斗争。早期德国工人领导人通信集。1884年12月至1885年7月》1977年柏林版第52页。

^④ 见上书，第54页。

^⑤ 见《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论丛》第3期第133—134页，《马克思恩格斯年鉴》第4卷第154—156页。

年出版第一个英文译本。^①那时以来，《起源》在世界各大洲曾用 50 多种语言出版。从 1917 年 10 月到 1961 年 5 月，单是在苏联就用 28 种语言出版过，总印数为 3 348 000 册。^②

关于本书的基础和目的

70 年代和 80 年代之交，马克思开始研究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这并非偶然。马克思在研究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1879 年在莫斯科发表）的过程中，就引起了他对摩尔根著作的注意，因为该书有对摩尔根著作的引文。^③柯瓦列夫斯基后来说，从美国旅行归来时，他曾亲自把这本书带给了马克思。^④大概是在研读完全书之后，紧接着在 1880 年夏，马克思就已经开始对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作摘录。^⑤马克思从 19 世纪 40 年代起一直在进行探讨，并且为了便于自己理解在 1857—1858 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专门系统地论述过的理论问题，他在这本书中找到了使之进一步完善的材料。因此，摩尔根这本书摘要的篇幅很长，计有 98 页 8 开纸（136 个印刷页），全是写得密密麻麻的。^⑥马克思首先摘录的是论述关于家庭观念和财产观念发展的第三编和第四编，然后是论述具体历史发展的段落。马克思洞

① 在英国，当 1901 年《起源》在翻译过程中，英国社会主义者领导人海德门就对此表示反对。他认为，这项翻译等于把煤运往纽卡斯尔，因为已经有了可同《资本论》相比拟的摩尔根用英文写的书，恩格斯在他的书中除了对他一窍不通的东西给予软弱无力的概括外，不外乎是一些粗制滥造（见 1901 年 4 月 20 日、27 日伦敦《正义报》）。

② 见《马克思主义史》1961 年莫斯科版第 375 页。

③ 见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1879—1880 年土地所有制史的比较研究。由汉斯·彼得·哈斯迪克从手写体遗稿中整理出版》1977 年法兰克福（美茵河畔）—纽约版第 25 页。

④ 同上书，第 6 页和注 11。

⑤ 同上书，第 217 页。

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第 328—571 页。

察到摩尔根关于日耳曼的论述十分粗略而且很不充分，便中断了摘录工作。由于摩尔根的这一缺陷，马克思才补充上自己的思想以及引自凯撒和塔西佗著作的材料，这两个人的著作是他在作摘要时阅读的。对于其余 20 页摩尔根论述中国及其他地区的材料，马克思一直没有加以重视。

摩尔根是达尔文主义的信徒，他用进化论的观点写成自己的著作。^②因此，他能够把通过几十年研究所获得的关于人类早期历史的知识纳入这样一个发展序列，这个序列从人脱离动物界后的原始状态开始，一直延续到阶级社会。

摩尔根把发展的思想运用于资产阶级社会最神圣的制度如家庭、私有制和国家，从而抹去了它们永恒的光环。这种批判是以揭示国家产生以前的社会基本联系为基础的。在摩尔根看来，以氏族为中心的氏族社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决定了这个社会本身，并且诸如人民大会、议事会和由群众选举并罢免首领这些民主制度，是与这种社会相适应的。

摩尔根认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在于“观念”或者说观念的发展，比如“财产观念”的发展、“管理观念”的发展，也就是说智力的增长。这些观念从箭头到铁路的发明和发现而得到实现，并且为人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③摩尔根的论证与达尔文 1871 年写的《人类的由来》一书中的论证几乎一字不差。^④根据摩尔根的观点，达尔文所理解的自然选择是体能和智能历史地实现的结果。“没有血缘亲属关系的氏族之间的婚姻，创造出在体质上和智力上都更强健的人种”。恩格斯从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实行氏族制度的部落便必然会对落后的部落取得上风，或者带动它们来仿效自己。”^⑤然

② 见《苏联民族学》，1978 年莫斯科版第 1 期第 15 页。——《民族学-考古学杂志》，1981 年柏林版第 516—580 页，特别是第 576 页。

③ 见摩尔根《古代社会》，1977 年商务印书馆版下册第 531、555—557 页。

④ 见查理·达尔文，《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1874 年芝加哥-纽约版第 46—47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42 页。

而，在达尔文想通过这些观念和他的进化论观点论证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是自然形成的社会的同时，摩尔根却根据一个没有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活跃的原始状态的存在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更高级形式上的这样一个社会是可能的，因此会得到复活。^④

尽管本原在于“观念”，摩尔根还是把财产看作历史的推动力：“无论怎样高度估量财产对人类文明的影响，都不为过甚。它是使雅利安人和闪族人摆脱野蛮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力量。”^⑤“人类的智慧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了。但是，总有一天，人类的理智一定会强健到能够支配财富。”^⑥关于历史的推动力他作了下列一般解释：我们的存在是以蒙昧的野蛮的祖先的劳动、社会和成功为基础的，它们是“上帝为从蒙昧人发展到野蛮人、从野蛮人发展到文明人而制订的计划中的一部分”^⑦。

这种历史观——由于它以经验论方法为基础——无疑导致了客观地、唯物地去认识历史。根据其世界观哲学本质，它是唯心主义和进化论的观点，^⑧是以达尔文的社会发展观点为依据的。

当然，马克思认识到了摩尔根的这种方法论基础，看到了摩尔根进化论的局限。他没有对摩尔根的“观念”展开论争或加以评论，而是在“观念”一字的后面加了个惊叹号。因此，他摘录道：“对财产的最早观念（！）”^⑨。在1881年3月8日给查苏利奇复信的第一篇草稿中，马克思在谈到摩尔根时写道，这位作家“是不可能

④ 见摩尔根《古代社会》下册第556页。

⑤ 同上书，第511页。

⑥ 同上书，第556页。

⑦ 同上书，第557—558页。

⑧ 现在还没有以摩尔根的著作为依据对他的哲学立场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厄·塞尔诺认为，摩尔根的观点由于并非辩证的“进化论思想框架”而受到局限；但是，从原则上讲，摩尔根代表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见《民族学-考古学杂志》1981年第575—580页）。I.L·安德烈也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摩尔根是唯心主义者”（见《苏联民族学》1978年第1期第35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378页。

有革命倾向的嫌疑的”^⑯。事实上，摩尔根在任何地方连想都未曾想过要做出超出进化论范围的革命变革。他寄希望于人的思想和自我认识的教育，这些人有责任去改变社会存在，也能够驾驭“人类的头脑中关于财产的观念”。^⑰

恩格斯对摩尔根的评断首先是在马克思摘要的基础上形成的。但是，在摘要中，马克思在有些地方的解释超出了原作者，对他的唯心主义没有加以考虑。因此，恩格斯认为，摩尔根“在他自己的研究领域内独立地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⑱在1884年《第一版序言》中，恩格斯对这一评价稍加限定，他写道，“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⑲。但是，他这些话决本不是说，摩尔根是个历史辩证唯物主义者。资产阶级自然科学家虽然没有自觉地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为指导，但也得出唯物主义的结论，揭示出辩证的自然史方面相互关联的事实，“这种情况不为少见”。^⑳恩格斯对摩尔根的评论应当理解成这样一种评价性的关联，特别是这种关联涉及到达尔文和恩格斯尊重这种涉及的时候。^㉑但是，80年代初恩格斯在写作《自然辩证法》时对达尔文主义的理论环境曾进行过研究。^㉒在《起源》序言的结尾处，他指出了——虽然不是争论——《古代社会》的局限性：“经济方面的论证，对摩尔根的目的来说已经很充分了，对我的

^⑯ 同上书，第19卷第432页。

^⑰ 摩尔根：《古代社会》下册第556页。

^⑱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43页。

^⑲ 同上书，第1页。

^㉑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4—385页。

^㉒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2页。

^㉓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50—655页。恩格斯使达尔文——和海克尔——的哲学观点接近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机械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它甚至倒退到毕达哥拉斯那里去了，他就曾经把数，即量的规定性，理解为事物的本质。”（同上书，第599页）在恩格斯看来，达尔文最重要的是他的自然研究，这种研究使他发现了“有机界的发展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4页）

目的来说就完全不够”，还应当重新加以改写。^⑤在正文中，恩格斯常常就是这样做的，并且就摩尔根所不懂得的经济和社会现象及运动的辩证法作了阐述。^⑥例如，在谈到雅典国家时曾写道：“各种形式的更替，基本上已由摩尔根描绘出来了，我要补充的大半是引起这种形式更替的经济内容。”^⑦这一点也完全适用于把“军事民主制”看作民族社会的最后阶段的阐述。这个阶段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推动力只是恩格斯才认识并加以阐述的。^⑧就摩尔根对历史形式的研究而言，他只停留于阐述各种形式的更替。

在资产阶级的著作中，有人把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对摩尔根所作的实事求是但有所保留的评价同恩格斯 1884 年 2 月 16 日给考茨基的信及 1884 年《起源》序言中所作的评价进行了比较，据此编造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存在着理论上的矛盾。^⑨恩格斯研究摩尔根的成果用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此已经谈到了一些，然而，恩格斯的研究却说明，不仅仅存在着同马克思的完全一致。而且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摘要和他们共同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论，必要时还对摩尔根的成果做了“颠倒”，并且揭示出摩尔根研究成果中的历史辩证的联系。但是，他也没有批驳摩尔根的唯心主义进化论的理论观点。恩格斯完全遵从马克思的设想，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3 页。

⑥ 见上书，第 21—23、52—55、59—61、70—72 页。

⑦ 同上书，第 105 页。

⑧ 《民族学—考古学杂志》1982 年第 11—31 页。

⑨ 见劳·克拉德：《再论马克思、恩格斯和摩尔根》，载《当代人类学》1977 年芝加哥版第 2 合订本第 333—336 页。克拉德说，恩格斯对摩尔根没有采取批评的态度，同马克思相反，他有自己另外的历史学说，认为主观力量起着主要作用，如“占有欲、贪欲和权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第 378—380 页）。除了蓄意编造，再也拿不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论观点相矛盾的论据，无论对摩尔根的态度和对其成果的正面阐述都是一样。克拉德找不到任何一个恩格斯没有接受马克思观点的地方，恰恰相反，恩格斯完全接受了马克思理论上的重要见解，或者凡马克思摘录风格与之不同而不易理解的问题都用自己的话来进行阐述。

根据他们两人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并且只是这样来阐明这些成果的全部意义”。^⑧

恩格斯经过短时间的犹豫和彻底了解马克思摘要的内容及摩尔根的成果后，就立即执行马克思在这方面的遗愿，尽管那时他已经六十三岁而且肩负着繁重的工作。他要同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向他求教的各国工人运动的代表进行广泛的通信。他要为马克思和他本人的一些著作的翻译和再版作准备。用多种文稿写成的《资本论》尚未发表的各个部分摆在他的面前。从他的信件中，人们可以感觉到促使他对《资本论》进行整理加工持续的内在压力，而且由于繁多的义务和阻碍（直至1883—1884年长达数月的病患），这种压力越来越大。最后，整理马克思遗物的工作也必须完成。所以，1884年冬春之际——马克思逝世后一年，是恩格斯工作最为繁重的一个时期。

因此，恩格斯写作此书必定有充分的理由。实际上，恩格斯写作《起源》既有科学理论方面的理由，也有现实政治方面的原因，因为他认识到，这个主题对于世界观方面的争论是有表现力的。

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详尽而彻底地研究摩尔根的着眼点，是进一步从理论上圆满地论证科学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合乎规律的归宿。从这一着眼点出发，自1845至1846年共同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以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了所有制和公社的发展阶段，^⑨ 50年代，马克思掌握了社会经济形态的历史更替并作了阐述。^⑩ 1857—1858年时，对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原始社会的认识仍不完备。马克思所掌握的资料来源于近代各种不同社会整体中曾经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页。

^⑨ 同上书，第1卷第26—29页。这里第一次阐述了从部落所有制开始经过古代封建所有制到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所有制发展阶段。

^⑩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71—518页。关于结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1—85页。这里确切地阐述了马克思对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历史时期社会经济形态更替的认识以及对历史规律的认识。

存在过和仍然存在着的原始公社的残余。正如马克思后来阐述的那样，这些公社在初生形态中继续存在是有其条件的。^⑩ 虽然从中可以得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关系的结论，但是它们在结构和职能上的相互联系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未知数。70年代末，唯物史观理论阐述上的这种缺陷被讲坛社会主义者，特别是被国民经济学家阿道夫·瓦格纳利用了。他在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重新搬出资产阶级惯用的“论点”来反对共产主义，说什么，到目前为止共产主义实际上从未在任何地方发挥过作用，并且也不可能发挥作用，因为没有私人资本家的生产过程是不可能有的。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不是暂时的现象。^⑪ 马克思用“在私人资本家出现以前”就存在的原始公社驳斥了这种论证。^⑫ 因此，从理论上阐述在其中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过程得以实现的形态，对于巩固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有着重要的意义。

70年代末，原始共产主义这一理论问题具有了进一步的实际意义，因为在剥削者国家，甚至在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存在着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公有制的公社和合作社。问题提法本身并不新鲜，而且马克思在1857—1858年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且就这个问题的某些方面作了主要是理论抽象的论述。亚细亚生产方式被揭示出来，或者——更一般地说——全部社会关系及其结构（包括古代）的问题已经被提出来了。70年代，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俄国的发展和农民问题迫切需要对这些历史联系研究出明确的观念。有鉴于此，恩格斯转而研究中欧和西欧的公社关系的历史。下列著作就是在这个研究的成果基础上写成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1—1882年写成的两部手稿；《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

⑩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0—434页。

⑪ 见同上书，第401页。

⑫ 见罗尔夫·德鲁贝克、雷纳特·梅尔克耳：《马克思恩格斯论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改造学说的发展》1981年柏林版第411—412页。

史》和《法兰克时代》以及 1882 年秋写的论文《马尔克》。^⑩ 在《马尔克》一文的开头写道：“在德国这样一个还有整整一半人口靠种地过活的国家里，有必要使社会主义工人，并且通过他们使农民弄清楚，当前的大小土地所有制是怎样产生的”。古代历史的几个基本原则，即“民族按亲属关系的划分和土地公有制”，恩格斯是知道的。^⑪ 恩格斯在文章结尾描绘农民的前景时写道：恢复马尔克，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的合作社。^⑫ 早在 1882 年恩格斯就从反面指出，在以阶级斗争为特征的历史以前曾经历过“原始状态”，虽然它的历史推动力尚不清楚，但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规律在这里还不适用。^⑬ 恩格斯把这种认识写进 1883 年 6 月 28 日写的《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⑭ 在研究摩尔根并写成《起源》以后，恩格斯在 1888 年英文版《宣言》中回顾了对这种社会形态的认识过程，对此，他在结尾处写道：“最后，摩尔根发现了氏族的真正本质及其对部落的关系，这一卓绝发现把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揭示出来了。”^⑮ 根据这一揭示，在《宣言》正文中作为唯一原理而提出的阶级斗争的原理就确切了。^⑯

1879 年，马克思开始研究已经提到过的柯瓦列夫斯基的著作，随即又研究了摩尔根的著作。早在 1881 年，在给维拉·查苏利奇的几个复信草稿中，他通过首先是对摩尔根的研究而得出关于原始状态理论上的结论。尤其是他从人类走向共产主义的角度成功地从理论上描绘了三种形态，这就是把历史按时代划分为原始共产

^⑩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376—443 页，第 19 卷第 478—538、539—599、351—369 页。

^⑪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353 页。

^⑫ 见上书，第 369 页。

^⑬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423 页。《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根据《反杜林论》改写而成的，1878 年在《反杜林论》中还没有这一思想。

^⑭ 见上书，第 1 卷第 251 页。

^⑮ 见上书，第 251 页。

^⑯ 见上书，第 237 页。恩格斯谈到了“氏族社会”。

主义——阶级社会——共产主义社会。^① 50年代以来，马克思多次研究了“次生的”原始状态公社问题，通过对摩尔根的研究，他对这个问题完全明确了。他能够独立地阐发对这些公社的命运的观点，这些公社在原始社会整体之外，好象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天地”似的继续存在。^② 这些思考是由于维拉·查苏利奇所提出的俄国公社远景的问题而引起的，马克思接着又考虑了这类公社在未来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地位。如前所述，恩格斯在提出类似问题的情况下对德国的马尔克进行了研究。

同样，一直不受重视的世界观方面的其他联系，也引起了恩格斯对古代历史的特殊兴趣。达尔文主义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提出了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人类的自然发展问题。达尔文本人通过自己在历史方面的发现得出了唯心主义的结论，并且导致下述观点，即阶级斗争是“生存斗争”，是产生出优秀社会和优秀社会阶级，首先是产生英国资本主义及其统治阶级的自然选择的手段。^③ 另一方面，主要是由于恩格斯的帮助，工人运动成功地在自己的世界观中吸收了达尔文的具有指导意义的自然知识。说明这一点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保尔·拉法格从1884年1月起所作的几次关于达尔文主义的报告，因为这些报告他同恩格斯商讨过。^④ 为了同达尔文在人类史方面的唯心主义进化论的论点进行讨论，恩格斯早在1876年就写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章，从哲学的角度论证了物质从自然史的运动形式向社会史的运动形式的质的转变，同时阐述了引起这种转变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相互联系。^⑤ 恩格斯从而确定了自然史和历史的界限。虽然该书在1896年才发表，但是它的成果却是恩格斯后来研究工作，首先是写作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4—435、444—445、450—451页。

^② 同上书，第436页。

^③ 见达尔文：《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1874年芝加哥-纽约版第615页。

^④ 见《社会民主党丛书。社会主义新理论和历史论文集》1885—1887年霍廷-根—苏黎世版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46—147页。

^⑤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08—519页。

《起源》一书的基础。

在巴黎公社失败后和反社会党人法时期，围绕着进化论而展开的斗争大为尖锐起来。这个理论是区分进步思想和保守思想、科学世界观和宗教世界观的分水岭。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认为，不管愿意与否进化论支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学说，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达尔文揭示并论证了，发展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这些观点在工人运动接受这种理论时有着重要的意义。与此相比，这一理论在论述社会时的局限性就微不足道了。马克思高度评价了进化论的杰出作用，早在 1873 年他就满怀崇敬心情向达尔文寄赠一本写有题字的新版《资本论》。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讨论了达尔文的研究成果。首先，他有力地批驳了把“生存斗争”套用到人类历史中去的作法。^⑤ 如前所述，他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章中阐发了历史的、辩证法的正面观点。恩格斯没有研究达尔文关于“观念”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观点。同样，对摩尔根从达尔文主义前提出发对历史所作的水平相似的重复解释也没有给予重视。

80年代初，在反社会党人法和俾斯麦国家社会福利政策条件下的这场意识形态的争论中，国家社会主义起着一种特殊的作用。俾斯麦社会立法镇压加“糖饼”的两手，目的是要摧毁独立的工人运动，并战胜科学共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论点，即带有普鲁士特征的福利国家的论点，对于特别是在国会党团中的社会民主党部分领袖从来都不是没有影响的。同国家社会主义进行斗争，目的还在于阐明剥削者国家合作社或合作社联合体的作用和剥削者国家社会福利政策，不使工人阶级对国家社会主义的进化产生幻想。通过空想社会主义、蒲鲁东和拉萨尔的观点以及 1875 年哥达纲领^⑥ 中的某些章节，已经在无产阶级当中助长了这些思想。

^⑤ “因此，把动物社会的生活规律直接搬到人类社会中来是不行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572 页）

^⑥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435—436、18—25 页。

另外，在80年代初，特别是由于洛贝尔图斯《第四封社会问题书简》在他死后以《资本》为题的发表，又使洛贝尔图斯学说死灰复燃。^⑧ 洛贝尔图斯宗法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必定会阻碍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国家，首先是反对俾斯麦国家和争取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斗争。鉴于洛贝尔图斯学说的影响，社会民主党的马克思主义的领袖们如考茨基^⑨ 纷纷发表文章同这一学说展开斗争。恩格斯从1883年开始研究这个问题，并且利用《哲学的贫困》德文第一版序言对洛贝尔图斯进行了批判。序言写于《起源》付印^⑩之际。正如恩格斯嘲讽地说道，洛贝尔图斯“是普鲁士所特有的社会主义的真正的奠基人，而现在也终于被公认为这样的人了”^⑪。小资产阶级宗法式的乌托邦，被冒充为社会主义并且有时十分幼稚地置阶级社会和国家的社会经济基础于不顾，这同样使恩格斯感到有必要去弄清原始共产主义制度的结构和作用方式以及导致私有制和国家形成的推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一个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并且在存在相应的国家的条件下，合作公社这个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形式的问题就更具有特殊的意义。

恩格斯为了这个目的而开展了工作，并且阅读了J·W·B·莫尼的《爪哇，或怎样管理殖民地》(1861年伦敦版)。1882年12月8日，他在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告知说，他从休伯特·豪·班克罗夫特的著作《北美太平洋沿岸各州的土著民族》(1875年伦敦版)的第一卷里作了摘要。目的在于，同时也是为了写作有关马尔克公社的论文，“最后彻底弄清楚塔西佗的日耳曼人和美洲的红种人间的相似之点”。1882年12月2日，他写信给奥古斯特·倍倍尔说，

^⑧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论丛·纪念奥古斯特·科尔纳斯的活动》1975年柏林版第20号第92—126页；《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概念(1848—1917)》1976年柏林版第93—106页。

^⑨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69—171页。

^⑩ 见上书，第164—165页。

^⑪ 同上书，第21卷第207页。

他“昨天已把小册子的最后一部分手稿，即关于马尔克制度和一般德国农民简史的附录寄往苏黎世”。他接着写道：“这是几年来我研究德国历史的第一个成果”。因此，由于同样的原因，他在 1884 年 2 月 16 日致考茨基的信中谈了他准备写作《哲学的贫困》《序言》(1884 年 10 月 24 日写完)的要点，他打算在序言中“揭穿关于洛贝尔图斯的神话”，谈了他研究古代共产主义公社被剥削者国家置于从属地位的问题，并且表示了对摩尔根著作及其意义和可能对它进行加工的想法，这一切肯定不是偶然的。早在一个月以前，即 1884 年 1 月 18 日恩格斯就曾嘲讽地指出，在爪哇，“荷兰政府在古代共产主义农村公社的基础上，把全部生产如此之好地‘社会主义式地’组织起来了……相形之下，俾斯麦简直是一个黄口孺子！”由于上面概要说明的原因，恩格斯在 2 月 16 日的信中又一次提到了这个问题，并且建议用爪哇的实例“来说明猖獗一时的国家社会主义……从这里可以看到，荷兰人怎样在古代公社共产主义的基础上以国家的方式组织生产，并且怎样保证人们过一种他们所认为的非常舒适的生活……这种情况是很有意思的，而且很容易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这也附带证明了，那里的原始共产主义，象在印度和俄国一样，今天正在给剥削和专制制度提供最好的、最广阔的基础(只要现代共产主义的因素不去震动这种原始共产主义)，并且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它和瑞士各旧州的独立的马尔克公社一样，成为极其引人注目的(或者应当被克服或者应当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历史遗迹。”^②接下来恩格斯对摩尔根的书和马克思的摘要作了介绍。

恩格斯阐述爪哇和国家社会主义时，从另外一个角度谈到了马克思 3 年前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从公社的角度探讨过的同样的理论问题。在恩格斯看来，这种“有益的教训”明显适用于国家社会主义，正如适用于原始共产主义公社基础上的专制国

^② 同上书，第 35 卷第 120、416 页，第 36 卷第 110、91、112 页。

家组织一样。

这样，恩格斯就从现实的角度出发，对于那些第一次是在1845—1846年他和马克思共同写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起过作用的思想和研究重新进行探讨。早在那时，他们两人就以这种观点作为出发点，即人类经历过一个原始状态，在这个原始状态中，部落所有制而不是私有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古代民族中，由于一个城市里同时居住着几个部落，因此部落所有制就具有国家所有制的形式，而个人的所有权则局限于简单的 *possessio*〔占有〕，…… 在起源于中世纪的民族那里，部落所有制先经过了几个不同的阶段——封建地产，同业公会的动产，工场手工业资本——然后才变为由大工业和普遍竞争所产生的现代资本，即变成抛弃了共同体的一切外观并消除了国家对财产发展的任何影响的纯粹私有制。”在部落所有制基础上，“所有者可以依靠个人关系，依靠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共同体来统治非所有者”。因此，部落所有制在这里被看作前资本主义对抗性社会关系的基础。这种认识在《共产党宣言》的开头部分得到了反映：“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⑨

1857—1858年，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一节中，重新研究了这种社会发展的最初状况。“这种以同一基本关系〔即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的形式，本身可能以十分不同的方式实现出来。例如，跟这种形式完全不矛盾的是，在大多数亚细亚的基本形式中，凌驾于所有这一切小的共同体之上的总合的统一体表现为更离的所有者或唯一的所有者，实际的公社却只不过表现为世袭的占有者。……剩余产品……不言而喻地属于这个最高的统一体。^⑩因此，在东方专制制度下以及那里从法律上看似并不存在财产的情况下，这种部落的或公社的财产事实上是作为基础而存在的，这种财产大部分是在一个小公社范围内通过手工业和农

^⑨ 同上书，第3卷第69—70、73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0页。

业相结合而创造出来的”^①。接下来是对古代和日耳曼公社及其同部落所有制关系的分析。因此，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本质在于，在按宗法制组织起来的国家的范围内，以共同使用土地、以部落或公社所有制为基础的独立公社是处于被剥削的地位的。所以，部落所有制根本不是古代共产主义的公共所有制。

在这个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不知道剥削者社会以外的和组织成为国家的社会以外的“部落所有制”的存在形式和发展形式。因此，70年代中期，他们还在把社会一出现就是组织成为国家的社会作为出发点。1876年中，恩格斯在他准备同杜林进行争论时作了摘记：“因此，在整个暴力论中，只有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形式，为了维持自身而需要暴力，甚至有时它们要用暴力来加以推行这一点是正确的。这种暴力，就其组织形式看，就是国家。因此，当人摆脱最原始的状态后到处就有国家存在的观点我们认为是没有意义的……国家和暴力恰恰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形式的共同特征”^②。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提到了个人的某些为了社会共同利益而必须具备的权限：解决争端、监督用水、执行宗教职能等，并且指出：“这样的职位，在任何时候的原始公社中，例如在最古的德意志的马尔克公社中，甚至在今天的印度，还可以看到。这些职位……是国家权力的萌芽。”^③上面的引述证明，剥削和国家权力最古老的形式是建立在部落所有制基础土的。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在他给巴·瓦·安年科夫的信中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史观时写道：“这样，正因为奴隶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所以奴隶制从创世纪时起就在各国人民中存在。”^④

随着研究工作的开展和对“原始状态”和古代公社知识的不断丰富，马克思和恩格斯逐渐怀疑，在历史上最古老的时期就已经存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72—47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论丛》1982年柏林版第12号第177—17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84页。

在剥削和国家权力的观点是不充分的。“古代原始共产主义共同体”的观念形成了，而且在我们引述过的 1884 年 2 月 16 日致考茨基的信中，恩格斯使用了这一概念。在这里，恩格斯出于现实的原因，从理论上极为明确地指出了原始共产主义公社以及以公共财产或共同占有主要生产资料为基础的公社和合作社同以私有财产关系为基础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对德国近代史的多年研究（关于马尔克公社的文章就是这些研究的成果之一）促使恩格斯在 80 年代初开始对日耳曼古代史和印第安古代史进行比较研究。显然，恩格斯看到了深入而普遍地探讨 1882 年在《马尔克》一文中讲到西欧时就遇到过的这一问题的必要性。

70 年代末或者确切说在 1884 年初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种原始状态的形态性质、基础和上层建筑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原始状态被看作史前史，从而被看作自然状态而置于历史之外。^⑧

马克思在研究了摩尔根以后超越了这个阶段，并在摘录中联系着原始状态抓住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及其作用方式的基本特征，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他从中得出了世界历史形态三段式意义上的结论：原始共产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阶级社会——共产主义。^⑨

显然，恩格斯不知道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1883 年春马克思逝世以后，他把 1862 年以前的信件作了清理。“1862 年以后的书信，马克思自己已经清理得相当好了。但是我们要弄清……这个阁楼的全部秘密，还得过些时候。”^⑩ 因此，在恩格斯的著作中，没有出现过 1881 年马克思创造的诸如原生形态或古代形态和次生形态的概念。然而，从《起源》可以看出，恩格斯所研究的理论领域是同一个：古代共产主义的“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社会”或

^⑧ 马克思这样写道：“……纯粹的渔猎民族还处于真正发展的起点之外”。

^⑨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109 页。1891 年恩格斯还没有得出这个结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505—506 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第 31—32 页。

者说氏族制度，被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充满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社会所炸毁和取代，“这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了直到今日的全部成文历史的内容”，而这个社会又将在行将到来的社会变革中由于“把……生产资料——变为社会所有”^⑩ 而被消灭。

同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的情况一样，恩格斯在说到这种形态的三段式时，毫无赞同一种无区别的前资本主义阶级社会形态之意，而是区分阶级社会中以三大奴役形式：奴隶制、农奴隶、雇佣劳动制来表明特征的“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⑪

促使恩格斯写作《起源》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家庭问题。“家庭”这一概念在标题中被放在最前面并非偶然，因为从理论和历史上看，从自然状态过渡到社会状态的问题是反映在家庭的历史之中的。“确定原始的母权制氏族是一切文明民族的父权制氏族以前的阶段的这个重新发现，对于原始历史所具有的意义，正如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对于生物学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一样。它使摩尔根得以首次绘出家庭史的略图；这一略图，在目前已知的资料所容许的限度内，至少把典型的发展阶段大体上初步确定下来了。非常清楚，这样就在原始历史的研究方面开辟了一个新时代。”^⑫ 1891年，恩格斯在他的序言中进行回顾时就是这样写的，这个序言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关于家庭史观点的一篇题外话。

同时，关于家庭的章节也是那些带有最具现实意义的观点和结论的章节之一。在大工业“迫使妇女走出家庭，进入劳动市场和工厂，而且往往把她们变为家庭的供养者”的条件下，婚姻和家庭问题从工人阶级斗争的角度以新的方式提出来了。“我们从过去的社会关系中继承下来的两性的法律上的不平等，并不是妇女在

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71页；另见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第163—165页。

⑪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2页。

⑫ 同上书，第14页。

经济上受压迫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争取妇女平等权利的斗争，是与“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个体家庭不再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⑨4} 联系在一起的，这个斗争已被列入妇女在其中成为主体力量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议事日程。对于工人运动来说，从理论上弄清家庭和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的起源与本质，已经成为迫切的问题。1879年，奥古斯特·倍倍尔正是出于这个目的发表了他的《妇女与社会主义》一书。他完全正确地认识到：“因此，所谓的妇女问题只是一般社会问题的一个方面……它只能随着一般社会问题的解决而最终得到解决。”然而，倍倍尔却通过下述论点来解释妇女过去的被压迫状况：

“在古代，造成妇女处于受奴役的状况，使这种状况维持数千年之久并且导致男女在身心方面的重大差别，从而加强了妇女的依附关系，其原因是妇女女性本质的特征”^{⑨5}。在这个基础上去描写妇女的作用、婚姻和家庭作用的历史是很难令人满意并最终解决问题的。所以，恩格斯在他给倍倍尔的信中（对倍倍尔寄来1883年所写的书表示感谢）可能有意不谈有关家庭的写作计划。相反，他着重指出倍倍尔对德国工业发展方面的描写是非常出色的。^{⑨6} 《起源》出版以后，倍倍尔在恩格斯理论的基础上彻底改写了自己的著作。倍倍尔的这本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最受欢迎的马克思主义读物之一，并且为传播恩格斯关于家庭史的认识作出了重要贡献。^{⑨7}

在《起源》发表以前，还没有一部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阐述婚姻和家庭历史的著作。因此，1883年9月18日恩格斯就考茨基在斯图加特出版的《宇宙》杂志（1882年10月至1883年3月）上

^{⑨4} 同上书，第68、69、70页。

^{⑨5} 引自奥古斯特·倍倍尔：《妇女的过去、现在和将来》，1883年霍廷根—苏黎世版第1、6页。

^{⑨6}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89页。

^{⑨7} 见奥古斯特·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1891年斯图加特版第VIII.5页。作者特别强调，《起源》是阐述家庭历史的基础。

就“婚姻和家庭的起源”所写的“关于婚姻的文章”写信说道：“无论如何，原始的性的共同体属于遥远的时代，并为以后进步的或退步的发展所淹没，现在无论在什么地方再也找不到它的原始形式的标本。可是，一切晚近的形式都可在这种原始的基础上找到它们的说明。不过我相信，只要您不完全放弃忌妒是社会的决定性因素（在原始时代）这种看法，就不可能正确叙述这一发展过程。

一般说来，在所有这些范围如此之广和材料如此之多的科学的研究中，要取得某些真正的成就，只有经过多年的工作才是可能的。”^⑧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思想上对家庭和社会关系的认识更加深刻。第一个成果就是 1883 年恩格斯为《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版所写的一条注释。在这条注释中，家庭和氏族的关系得到了新的确定。马克思开始时认为是家庭发展为氏族，通过恩格斯在注释中概括指出的后来“透彻的研究”，使马克思认识到，“氏族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人类社会的自然形成的原始形式”，从这种原始形式中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家庭形式。^⑨

因此，在 70 年代和 80 年代之交，历史唯物主义开始对当时社会状况压迫下的婚姻、妇女和家庭的作用进行深入的研究。在社会民主党内，对这个问题的兴趣非常强烈。然而，社会民主党的马克思主义领导人如倍倍尔和考茨基在家庭史和妇女在历史上的作用方面的观点本身是非常不明确的。

所以，在 80 年代初，有许多现实的世界观问题和政治问题需要解答。同马克思一样，恩格斯由于同工人运动及其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人之间联系密切，对这些问题 是了解的。同国家社会主义的斗争、对马尔克和古代农民公社以及妇女、婚姻和家庭作用所提出来的问题，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促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回过头去研究当时认识很不够、实质上根本不认识的人类社会的“原始状态”。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第 61 页。

⑨ 同上书，第 23 卷第 389—390 页脚注。

这一批有现实意义的政治问题使他们两人自 70 年代末以来，又重新深入研究有关“原始状态”的资料和书籍。

也正是这种整个因果联系促使恩格斯不顾 1884 年冬春之际极其繁重的工作，立即着手研究马克思的摘要和对摩尔根著作进行概括。如前所述，1884 年 4 月在进行概括时，他已经知道，在这项工作中，在多大程度上业已掌握解决过去几年对国家、公社、家庭、婚姻、社会历史大的时期和社会历史的推动力所提出的许多问题的答案。因此，他不只是从摩尔根著作作出总结，而是与此相联系对具有现实意义的历史的基本问题进行研究和阐述。

因此，对于恩格斯来说，有充分的理由，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为基础，对历史研究和民族学研究的最新认识和材料加以研究、检验、概括并用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世界观。

原载《马克思恩格斯年鉴》第 7 卷
第 9—24 页

（高爱贺译 王宏道校）

《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的产生^①

《资本论》是卡尔·马克思的主要著作，马克思为它花费了40年的时间。1843年马克思在巴黎开始系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其初步成果就是《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和《共产党宣言》等著作。1848年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流亡伦敦，重新开始了经济学研究，作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并先后写成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在此基础上，开始了《资本论》的写作。1863年5月29日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现在当我的工作能力有所恢复的时候，我想最后卸下这个包袱，把政治经济学誊清付印（并作最后润色）”。^②

在马克思完成他的著作《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誊清稿的过程中，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是他的最重要的写作基础。他首先通读整个手稿，在页边作了勾划和批注，如“利润”、“再生产过程”、“积累”，以此表明需要在相应篇章使用的段落。给个别句子和词加上着重号。在页边用号码标出一些举例说明的顺序。

要把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誊清稿的产生情况明确地完整地描述出来，至今还是不可能的。因为保留下来的1863—1867年时期的全部手稿或残稿都没有作者注明的日期，付印用的手稿还未能发现。

1885年5月5日恩格斯在他为《资本论》第二卷德文第一版写的序言中作出这样的评价：1861—1863年手稿中的第1—220页

① 本文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新国际版第2部分第5卷关于《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产生过程的说明。——编者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197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78页。

(第I—V本)和第 1159—1472 页(第 XIX—XXIII 本),是“论述《资本论》第一卷中……所研究的各个题目”的“现有的最早文稿”。随后关于 1861—1863 年手稿恩格斯继续说道:“按照时间的顺序,接下去是第三卷的手稿。这个手稿至少大部分写于 1864 年和 1865 年。马克思在基本上完成这个手稿之后,才着手整理 1867 年印行的第一卷。”③

1863年初,马克思为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拟定了一个计划,打算在《导言:商品,货币》后面写八章:1. 货币转化为资本;2. 绝对剩余价值;3. 相对剩余价值;4. 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结合;5. 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原始积累。威克菲尔德的殖民学说;6. 生产过程的结果;7. 剩余价值理论;8. 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④

马克思 1863 年 8 月 15 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的工作(整理手稿,准备付印),一方面进行得很好。我觉得这些东西在最后审订中,除了一些不可避免的 G—W 和 W—G 以外,已经变得相当通俗了。”⑤ 马克思这里所指的最有可能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章中的一些段落,这些段落在后来出版的书的第 107—117 页⑥。马克思要为他的著作付印一部誊清稿,他坚持这样作的一段时间里写作的手稿,至今发现的只有个别的页,这些页的页码是 24、25、96—107、259 和 260,编码是连贯的,每一章中都有删去的地方(很可能是为了计划中的“最后润色”)⑦。24 和 25 页的正文和脚注的内容有一部分逐字地又出现在德文第一版的 135—139、292 和 293 页上。在遗留下来的第 96—107 页上马克思论述了直接生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4 卷第 4、7 页。

④ 见上书,第 26 卷第 1 册第 446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 185 页。

⑥ 这里指《资本论》德文第 1 版的页码。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167—177 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9 卷。

产过程的问题，后来在第一版中在第 187—204 页论述剩余价值率和工作日问题时，在第 281—290 页论述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问题时，都以不同的形式又谈及了这些问题。稍后一些时间，不迟于 1865 年底，马克思决定把上面说的第 96—107 页并入当时计划写第六章《生产过程的结果》中。在遗留下来的第 259 和 260 页上所阐述的计件工资问题，经过修改又出现在第一版第 540—548 页上。^⑧但是所有这些片断都没有象马克思 1863 年年中所计划的那样成为 1867 年付印的誊清稿的组成部分，不论是正文还是脚注，马克思都再一次进行了加工。

从 1863 年秋开始，马克思由于处理母亲去世的事情到大陆去了一趟，由于建立和领导国际工人协会以及自己生病，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不得不经常中断写书的工作。

写作付印的誊清稿的过程，突然变成了一个新的研究过程。马克思遗留下来的个别页第 379 和 380 页以及遗留下来的页码为 441—495 的手稿《第六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⑨就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些片断中脚注没有连贯的编码；缺少对材料“在为了付印而最后加工的时候”如何重新编排所加的提示（见手稿《第六章……》第 441 页），这说明马克思在写这部分手稿时自己已经明确，这期间他没有再为第一册的付印誊清稿进行工作。马克思继续紧张地撰写他的著作，特别是在 1861 至 1863 年手稿中阐述得不够的那些部分。他附带研究了大量的经济的和技术的著作，其中有关于农业的著作、关于信贷和货币流通问题的著作、统计材料、议会文件、工业中使用童工的官方报告、关于英国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的著作等等。

这个时期还必须找到出版商。1865 年 1 月 30 日威廉·施特龙写信通知马克思：“我对于和奥·迈〔斯纳〕的会晤并不是不满意……目前取得的成果是，他说出版你的著作他将感到很高

^⑧ 参看上书，第 23 卷第 604—612 页。

^⑨ 见上书，第 49 卷。

兴……按入股的原则出版，他就不要求事先看稿子。”1865年2月9日签订了第一个合同，同日威廉·施特龙就把它寄给了马克思。1865年3月21日出版商奥托·迈斯纳从汉堡写信给马克思说，随信附上“作了所希望的修改的合同”。还说，“我完全省去看稿子的时间，只是请您尽可能做到，不要迟于在年内开始印刷，否则我们就不能在1866年前将书印出来”。预定《资本论》同时分两卷出版，总篇幅约五十印张。

从第一册“誊清稿”转向对资本的进一步考察，是同大约从1864年年中至1865年底对《资本论》第三册和第二册的初步编辑加工工作结合在一起的。^⑩这个写作时期还有一些书信。如1865年5月9日马克思写给恩格斯的信说：“希望我的书（尽管多次间断）能在9月1日以前彻底完工。事情很顺利，虽然我还没有完全恢复健康。”^⑪1865年7月31日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至于说到我的工作，我愿意把全部真情告诉你。再写三章就可以结束理论部分（前三册）。然后还得写第四册，即历史文献部分；对我来说这是最容易的一部分，因为所有的问题都在前三册中解决了，最后这一册大半是以历史的形式重述一遍。但是我不能下决心在一个完整的东西还没有摆在我面前时，就送出任何一部分。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在它们没有完整地摆在我面前时，不拿去付印。”^⑫恩格斯的回信没有发现。1865年8月5日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又谈到同一件事的实际情况：“你信中谈到‘艺术作品’的那部分我感到很有趣。你还是没有懂我的意思。整个问题在于，是把一部分手稿誊写清楚寄给出版商，还是先把整个著作完成？由于许多原因，我宁愿选择后者。就工作本身而言，这样做一点也没有浪费时间，但是，出版工作当然是耽搁了一下；另

^⑩ 见上书，新国际版第2部分第4卷。

^⑪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19—120页。

^⑫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196页。

一方面，如果开始付印，现在就不能有任何间断。此外，尽管注意到温度表的度数，工作进展得还是非常快，其他人就是丢开一切艺术上的考虑也未必能够如此。再加上规定我要以 60 个印张为最大限度，因此我绝对有必要把整个东西放在面前，以便知道，要压缩和删节多少才能在给我指定的数量范围内均衡地和匀称地阐述各个部分。”^⑬

很明显，马克思还在对第三册手稿进行加工时——如 271、415 和 454 页上的有关提示所表明的——就作出决定，第一册开头不仅有一个简短的导言，而且还有整个一章论述商品和货币。

1865 年 11 月，最迟是在 1866 年 1 月初，马克思重新开始准备付印的誊清稿。1865 年 11 月 20 日马克思要求恩格斯向他提供关于一个工人每周平均纺多少纱的材料，另外还说，“我在得到这些详细情况以前，就无法着手抄写第二章”^⑭。可见，马克思面前摆着他的最初计划中的第二章。事实上我们在德文第一版第 186 页《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一章中看到了补加的这方面的叙述。

1866 年 1 月 13 日马克思写给约·菲·贝克尔的信中说：他必须“誊写 1200 页手稿”^⑮；1866 年 1 月 15 日给路德维希·库格曼和给威廉·李卜克内西的信也是满怀信心，表示希望他能够在 1866 年 3 月亲自去汉堡把第一卷手稿的誊清稿送往出版社。1866 年 2 月 10 日马克思写信告诉恩格斯，自 1 月 1 日肝痛消失后他的工作已有出色的进展。“真正理论部分我无法推进。脑力太差，对此不能胜任。因此我对《工作日》一节作了历史的扩展，这超出了我原来的计划。我现在‘加进去的’是对你的书到 1865 年止的（简略的）补充……”^⑯ 马克思说的“加进去的”大概指德文第一版第 212 至 279 页一些片断^⑰；可见这些片断产生于 1866 年 1 月和 2 月初。

^⑬ 同上书，第 196—197 页。

^⑭ 同上书，第 198 页。

^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第 494 页。

^⑯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 199 页。

^⑰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272—334 页。

第一版第 222 和 223 页^⑩ 提到 1866 年 1 月 5 日农业工人的群众大会，提到 1 月 13 日的《工人辩护士报》和 1 月 20 日的《雷诺新闻》，这些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

1866 年 2 月 13 日马克思告诉恩格斯，他的主要著作理论部分，即第一、第二和第三册，于 1865 年 12 月底已经“完成”，但是手稿就其现在的形式来看，只有马克思本人才能编纂出版，他正好于 1866 年 1 月 1 日开始“誊写和润色”，在他又生病之前工作进展得“非常迅速”。在信中又向恩格斯重提他 2 月 10 日提出的请求，让他给他寄一本约翰·瓦茨的书，“因为我现在已经写到关于机器的一章了”。^⑪ 这个时候，马克思至少已经写完了《货币转化为资本》和《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这两章在《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章之前，马克思在后面这一章中有四处提到了《机器和大工业》。

从 1866 年 3 月 11 日起，马克思在马尔吉特休养了一个月。

1866 年 7 月 7 日马克思在信中告诉恩格斯：“我现在在顺便研究孔德，因为对于这个家伙英国人和法国人都叫喊得很厉害。使他们受迷惑的是他的著作简直象百科全书，包罗万象。但是这和黑格尔比起来却非常可怜（虽然孔德作为专业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要比黑格尔强，就是说在细节上比他强，但是整个说来，黑格尔甚至在这方面也比他不知伟大多少倍）。”^⑫ 在德文第一版第 314—315 页脚注 22a 中也包含有同样的思想。因此可以认为，这个脚注至迟写于 1866 年 6 月初。

1866 年 8 月 23 日马克思写给库格曼的信中说：“至于这部著作，我并不设想在 10 月以前能把第一卷（现在共分三卷）的稿子送到汉堡去。我一天只能做几小时的有效工作，否则身体就立刻感到不舒服……”。^⑬

^⑩ 参看上书，第 282 和 223 页。

^⑪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 201 页。

^⑫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第 236 页。

^⑬ 同上书，第 523 页。

1866年10月13日他告诉库格曼：“我的情况（由于身体情况和日常生活中的事情，工作老是被打断）迫使我只好先出版第一卷，而不是象我起初设想的那样两卷一起出版。而且现在看来总共可能有三卷。

全部著作分为以下几部分：

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

第二册。资本的流通过程。

第三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

第四册。理论史。

第一卷包括头两册。

我想把第三册编作第二卷，第四册编作第三卷。

我认为在第一册中必须从头开始，也就是必须把我从敦克尔那里出版的书加以概括而编成专论商品和货币的一章。我所以认为需要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叙述的完整，而且是因为即使很有头脑的人对这个题目也了解得不完全正确。显然，最早的叙述，特别是关于商品的分析，是不够清楚的。”^{②2}

根据至今了解到的事实还不能肯定，马克思这时是否已经写好了新的第一章《商品和货币》，从上述信件来看很有可能写好了。因此，从内容来看马克思已经指明，商品是资本产生的前提。

1867年3月很可能马克思的誊清稿进行到第一版的第638页^{②3}，就象那里的脚注100所表明的。在此以前，在第一版第385—484、486—492、565和636页^{②4}上，马克思已经——至少在脚注中——对1866年的事实和材料进行了加工。

看来——从材料出处注明的日期推论——属于这个创作时期遗留下来的还有如下一些没有编页码的分散的手稿页：脚注75—77、关于西里西亚被弗里德里希二世占领以前德国东部圈地的描

②2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201—205页。

②3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14页。

②4 见上书，第435—538、542—549、633和712页。

述(摘引古斯达夫·弗莱塔格的书《德国人民生活的新状况》)、论述农民和手工业者受剥削的正文、脚注 79 以及《煤矿工人》篇。^①所有这些文稿只有弗莱塔格书的摘录被收入最后的稿本中。这种看法是从同第一版 718 页脚注 220 ^② 的内容对照得出的。在付印的最后文稿中,马克思或者使用新的叙述代替了其他材料,或者用几句话在正文中说明事实情况。这从第 548 及以下各页、599—630、691—701 以及 652—657 页^③ 可以看出。

1867 年 3 月底马克思的第一册誊清稿进展到一个段落,相当于后来第一版第 657 页。在第一版第 676 和 684 页,马克思叙述了《童工调查委员会第 6 号报告》中的事实,这份报告最初发表于 1867 年 3 月底。在第一版第 697 和 757 页马克思援引了《工厂视察员报告。1866 年 10 月 31 日》,这份报告最初于 1867 年在伦敦公布,他还引用了 1867 年 3 月在白金汉郡举行的罢工。在第一版第 661、666 和 707 页马克思提到詹姆斯·罗杰斯的《英国的农业史和价格史》,这本书是马克思 1866 年 12 月 17 日写信请求恩格斯给他弄到的。

至迟在 1867 年初马克思决定,第一卷只收入第一册,第二册先不出。这时他才完成了第一册付印稿的誊清和“润色”。出版商等待稿件已经很久了。当时马克思同意第一册单独出版,这一册可以包括达成协议的计划中的两卷的第一卷的篇幅,即大约 25 印张。但是它的篇幅实际上要大得多。在写完第六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之后,很可能是在他写作第三册的手稿时,也就是大约在 1865 年上半年,马克思有一个 149 页稿本的初稿^④ 可用于第二册。但是,遗留下来的大量的第二册文稿表明^⑤,马克思认为这部

① 见上书,第 49 卷。

② 参看上书,第 23 卷第 801 页。

③ 参看上书,第 670 及以下各页、674—706、768—784 以及 728—733 页。

④ 见上书,第 49 卷。

⑤ 见上书,新国际版第 2 部分第 4 卷。

手稿不适用于付印。由于决定第二册不再纳入第一卷，与此相联系，《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章也决定从第一卷中抽出。这一章约有 1/3 的内容叙述的是向第二册的过渡。当马克思决定不再把第二册放入第一卷时，他认为对原来的《第六章》作一个简短的概括就够了。这个简短的概括印在第一版第 756 页上。为使读者易于接受思想上的联系，易于理解从第一册向第二册的过渡，马克思可能打算把第一册的结果放在第二册开头（类似他在《资本论》第三册开头所作的那样）。

1867 年 4 月 2 日马克思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下决心，只要不能够告诉你书已经完成，就不写信给你。现在已经写好了。”同时马克思估计，他的手稿“大概在 25 个印张以上”。^⑩

1867 年 4 月 10 日至 12 日，马克思乘船赴汉堡，把他的手稿送交出版商奥托·迈斯纳。1867 年 4 月 13 日马克思写给恩格斯的信谈到了这件事：“手稿便立即送往他的出版社，锁在保险柜里。几天之后就要开印并且会印得很快。……他现在想把书分成三卷出版。尤其是，他反对照我原来打算的那样缩减最后一本书（历史文献部分）的篇幅。”^⑪ 马克思在第 XXII 页第一版序言中预告了整个著作分为三卷四册这种划分。1867 年 4 月 16 日手稿被寄往莱比锡奥托·维干德的印刷所。4 月 16 日至 5 月 14 日前后马克思到汉诺威，在库格曼家里作客。4 月 29 日维干德开始排字；马克思在自己生日那天，即 1867 年 5 月 5 日，在汉诺威收到《资本论》的第一批校样进行校对。马克思在他的 1867 年日历上每次都记下正文或脚注的最后几个字，这样每个印张寄走之后在下几个印张来时好联结起来。

1867 年 5 月 7 日马克思从汉诺威写信给恩格斯说：“要在这里等到全书印完，是不可能的。第一，我担心，书印出来会比我原先估计的厚得多，第二，他们没有把原稿退给我，因此，许多引文，特

^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第 283 页。

^⑪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 208 页。

别是有数字和希腊文的地方，我只好查对留在家里那份手稿……”。^② 6月22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又写道，他在手稿中提到了霍夫曼的分子理论^③，他1865年在伦敦曾听过霍夫曼关于这方面的讲演。马克思又途经汉堡返回伦敦，1867年5月19日抵达伦敦。

1867年6月1日奥托·迈斯纳登出广告，预告《资本论》将于7月份出版。

马克思在汉诺威逗留期间，库格曼向他建议，写一篇附录，比较通俗地论述价值形式问题。这件事从马克思1867年7月13日给库格曼的信中可以看出。恩格斯——他也从马克思那里得到校样——1867年6月16日也向马克思提出过类似的带有详细说明的建议。他说，马克思掌握许多关于价值形式的材料，“你一定能就这个问题写出很好的补充论述，从而用历史方法向庸人证明货币形成的必然性并表明货币形成的过程。”

你造成了一个很大的缺陷，没有多分一些小节和多加一些小标题，使这种抽象阐述的思路明显地表现出来。这一部分你应当用黑格尔的《全书》那样的方式来处理，分成简短的章节，用特有的标题来突出每一个辩证的转变，并且尽可能把所有的附带的说明和例证用特殊的字体印出来。这样，看起来就可能有点象教科书，但是对广大读者来说要容易理解得多。”^④

至迟在1867年6月27日马克思写完了关于价值形式的附录，它印在第一版第731—784页。然后在同一天他就把“这一附录的结构——章节和标题等等”^⑤告诉了恩格斯。7月13日马克思写给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说，他“两天前”已把附录寄到莱比锡去了。

^② 同上书，第211—212页。

^③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42、34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213—214页。

^⑤ 同上书，第220页。

1867年7月25日马克思最后在序言上签了字。^⑤

1867年8月1日和9日莱比锡《德国书报业行市报》刊登了奥托·迈斯纳的广告，其中声称：“收到的预订八月份出版的著作《资本论》的有约束力的订单出乎预料的多……使我不得不对寄发每一份新书采取严格限制”。

1867年8月16日马克思告诉恩格斯，他刚刚校完最后一个印张（第49印张），而且序言也已校完于昨日寄回。

八月奥托·迈斯纳单独到莱比锡维干德处，让他印一份有大量序言摘录的内容广泛的四页宣传材料，以便寄往报纸编辑部。1867年8月24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中也谈到了这个情况。序言的摘录发表在如下期刊和报纸上：9月4日柏林《未来报》，9月6日柏林《社会民主党人报》，9月7日伦敦《蜂房报》，9月13日《汉堡消息报》，9月14日《海尔曼。伦敦德文周报》，9月27日那不勒斯《自由和正义》，9月第9期和10月第10期日内瓦《先驱》，10月1日巴黎《法兰西信使报》，10月13日布鲁塞尔《自由报》，1868年1月4日和11日莱比锡《民主周报》，1868年2月14日晚版《汉堡交易所报》。

1867年9月14日，《资本论》第一卷出版的消息由官方发表在莱比锡每日（星期日除外）出版的《德国书报业行市报》上。《德国书报业出版消息栏》的广告是由莱比锡的“J·G·欣利希图书公司”提供给《行市报》广告部的。截至19点收到的广告要编入下下一期。为14日发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的简讯，欣利希图书公司至迟必须在9月12日发出有关的报道。在此之前，莱比锡的奥托·维干德印刷所必须把书送到欣利希图书公司，为《行市报》提供的广告册也必须已经编完。因此人们可以认为，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是在1867年9月11日出版的。

《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得“很简陋”（用行话说，就象用线串起来的毛装书），只用了黄色的纸封面，标价3塔勒10新格罗申（3¹/₂塔

^⑤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3页。

勒)。封面上的书名字样和白色扉页上的字样不同。黄色封底上，奥托·迈斯纳刊登着他的出版社的出书广告。

《资本论》第一卷的手稿显然在印刷完毕后由维平德寄回汉堡奥托·迈斯纳出版社。手稿在那里存档——作为版权凭证。出版社拥有版权至少到1922年，这一点从那一年出版的全部三卷《资本论》的版本看得出来。后来，可能是1929年，《资本论》出版者的长孙奥托·海因利希·迈斯纳在柏林把手稿转交给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的一位代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注有日期和收件人姓名的移交单据，在1943年汉堡出版社遭到轰炸时被毁。手稿后来又经历了什么样的道路，它是否还存在，在什么地方，至今不得而知。

原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新国际版
第2部分第5卷附卷（略有删节）
(王全民译)

从马克思探索政治经济学理论 基点的三次转变看哲学和 经济学的交融发展

高 新 军

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必然要求建立在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对于马克思来说，寻找这个理论基点，却经历了一个十分艰苦的过程。因为，过去的“经济学家们毫无例外地都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既然商品有二重性——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那末，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也必然具有二重性。而象斯密、李嘉图等人那样只是单纯地分析劳动，就必然处处都碰到不能解释的现象。实际上，这就是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①在这中间，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对现实经济关系的解剖和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为主体的哲学和经济学理论的交融过程。正是在这种过程中，理论被深化了，科学的基点被提到了首位。这种在实际的批判活动中逐步确立的抽象的理论基点，在马克思的科学探寻过程中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变。

一、从否定劳动价值论转变到肯定劳动价值论，以此为基础阐明资本同劳动的不平等交换的根源(1844—1847年)

经济科学的研究，对于马克思创立新的社会历史理论有着重大的作用，同样，这种崭新的社会历史理论一经形成，又成为马克

^①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197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50页。

思突破古典经济学羁绊的有力武器。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可以追溯到1843年以前。当时，作为把自己的理想和信仰寄托于黑格尔哲学的马克思，一开始进入实际的社会生活，就遇到了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情况。在发现理论和现实再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的巨大分离和矛盾之后，马克思开始对自己原有的理论信仰进行反思和清算。1843年底，他在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以后，由于受到恩格斯天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书的启发，马克思明确地意识到市民社会的钥匙必须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②因此，1843年底马克思开始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系统研究。他广泛阅读了当时收集到的斯密、李嘉图、萨伊等十几位经济学家的著作，同时做了大量的摘录和发挥。这次批判研究的成果，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得到初次的系统总结。马克思这时对古典经济学的最大成果劳动价值论是持否定态度的。在《巴黎笔记》中，他同恩格斯一样，把价值看作是生产费用与效用的关系，^③用供求的竞争关系来解释价值规定，从而把商品的价格不断脱离价值，围绕价值波动，当成了劳动价值论的否定。由于客观经济事实和工业实践的伟大力量同理想人格之间的巨大冲突，使得马克思在他进一步的经济学哲学研究中，越来越在许多具体问题上注意到了生产力和交往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从而逐渐改变自己以前对待劳动价值论的否定态度和克服费尔巴哈的抽象人性论的影响。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通过对于工业革命的历史和法国大革命史以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已经在许多具体观点上接近或达到了历史唯物论的水平。在那里，马克思指出：“生产某个物品所花费的劳动时间属于这个物品的生产费用，某个物品的生产费用也就是它值多少，即它能卖多少钱（如果撇开竞争的影响）。”^④列宁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7—10页。

^③ 见上书，第1卷第605页。

^④ 同上书，第2卷第61页。

在《哲学笔记》中针对这句话说：“马克思接近劳动价值的理论了。”^⑤ 在《布鲁塞尔笔记》中，马克思已开始注意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例如在批判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的摘要中，马克思就明确地认识到，李斯特所谓坚持“生产力理论”同“斯密—萨伊学派”所阐发的“交换价值”理论的对立，反对以交换价值为生产目的，主张以生产力的发展为主要目的的观点，不过是一种在形式上割裂生产力和交换价值关系的做法。^⑥ 这种从以资本主义社会三大阶级的对立为基础，通过抽象的人性论武器来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向以经济学中体现的生产力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关系为基础，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目的的过程，充分体现了在新的历史理论创立过程中经济学的哲学化。

1846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是不寻常的一年。这一年的下半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完成了创立新的社会历史理论的伟大任务。从此，对历史的说明再也用不着种种臆想和猜测，而是可以象对自然界那样，被看成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被这种新的历史理论当作出发点的，已不是任意想出的什么教条，而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的行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这种崭新历史理论的前提和出发点包括了三个方面，即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由新的需要引起的再生产；人类自身的生产（家庭）。这三个方面构成了人类社会存在的双重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往关系。只是在这双重关系的基础上，“我们才发现，人也具有意识。”因此，“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彼此之间可能并且一定会发生矛盾。”^⑦ 正是这三个层次的矛盾统一关系，构成了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结构。它们矛盾运动

⑤ 《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8卷第13页。

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54、258—259页。

⑦ 同上书，第3卷第23、31—36页。

的发展和解决，则体现为历史上各种社会形态的更迭和演进。

新的世界观的创立，给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开辟了新的广阔天地，使他有可能根据已得到的科学世界观对庞大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和现实进行一番新的思索和探寻，从而促使他的经济学观点产生新的变化。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不仅不再象过去那样把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称为“抽象的”、“不实际的”，而且还高度赞扬了它，认为“李嘉图的价值论是对现代经济生活的科学解释。”^⑧这种变化，对于已具有崭新世界观的马克思来说是很自然的。既然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既然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既然劳动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那么，用这些观点来研究经济问题的必然逻辑结论就是承认劳动创造价值。

这一时期，虽然马克思还没有系统的经济学观点，而主要接受了李嘉图的经济学思想的影响，但是不能不看到，这时的马克思已经明确区别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他指出：“货币不是东西，而是一种社会关系”，它“也象任何其它经济关系如分工一样，是一种生产关系”。“机器正象拖犁的牛一样，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才是生产上的社会关系，才是经济范畴。”^⑨这种思想已大大超过了李嘉图的经济理论，并使得马克思在以后的经济学研究中逐渐发现了劳动二重性的理论。

我认为，这一时期马克思突破李嘉图理论局限的最大成果，是体现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中对于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资本与劳动不平等交换的根源的揭示。它预示着劳动二重性理论诞生的萌芽。

选择对“雇佣劳动”这种特殊商品进行分析作为克服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体系的突破口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更加深刻的含义。首

⑧ 同上书，第4卷第92—93页。

⑨ 同上书，第119、163—164页。

先，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一切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劳动价值论则是这一原理在经济学方面的反映。劳动创造价值，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正是雇佣工人的劳动才创造价值和资本。因此，分析“雇佣劳动”这种特殊商品对于解剖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无疑有着首要和决定的意义。其次，李嘉图批判了斯密把价值由耗费劳动决定和由购得劳动决定混为一谈的错误，但是他自己实际上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甚至于没有看到价值规律同资本和劳动交换之间的矛盾。这正是导致李嘉图学派最后破产的两个主要原因之一。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不仅注意到了，而且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还用李嘉图批判斯密的观点批判了蒲鲁东的同样错误。因此，解决这个问题不仅对说明资本同劳动的不平等交换的根源有直接意义，而且还有着许多较为直接的思想资料来源。再次，马克思作为共产主义者，关注人类解放始终是他的责任。人类解放就是无产阶级的解放，就是雇佣工人的解放。因此，关心现实，注重无产阶级的地位和命运，理所当然地是马克思首先要加以考虑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则有赖于说明雇佣工人之所以处境悲惨的经济原因，从而揭示工人受剥削的秘密。

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原理，要求对资本与劳动相交换这一资本主义社会中最普遍的现象进行完全不同于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既然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由此产生的“人与人”的关系是社会生活最基本的关系，并且由此产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构成了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既然工人阶级是生产力中最强大的因素；既然在现象上都可看出雇佣工人的贫困正是由于资本家剥削的结果，那么，只有联系资产阶级，重新对雇佣工人的劳动创造价值这一根本问题进行全新的探讨，才能寻找出其受剥削的秘密所在。因此马克思认识到，由于“雇佣劳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已成为商品，可以自由买卖，那么它本身也必然具有一般商品所具有的两种因素：而商品的价值由耗费劳动决定和由购得劳动决定是两个不相等的量，那么雇佣工人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

的量同他们所领到的工资之间也必然是不相等的。但是，在古典经济学那里，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是被形而上学地割裂的。由于研究如何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迅速增殖资本始终是古典经济学注意的中心，因此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发现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运动关系，从而就更无从谈起来揭示隐藏在“雇佣劳动”这种特殊商品背后的这两个因素的特殊运动规律了。但是，在马克思看来，李嘉图所揭示的商品价值由耗费劳动决定和由购得劳动决定是两个不等的量及其在“雇佣劳动”这一特殊商品身上表现的内在机制，正是要从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运动中加以揭示，这种运动正是社会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一种普遍的表现形式。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发现了雇佣工人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同他作为工资所领到的价值不等的根源在于生产过程中“雇佣劳动”这种特殊商品的使用价值和它的交换价值的不等，并在1847年底所做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讲演中，对“雇佣劳动”这种特殊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作了区分，从而揭示了雇佣工人受剥削的秘密。虽然在用语中马克思还未明确区别劳动和劳动力，把工人出卖劳动力还称为出卖劳动，从而表现出新事物出现时所必然带有的旧理论形式上的痕迹，但是实际上马克思在这个一直困惑着古典经济学的疑难问题上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个理论成果的获得，是同他刚刚创立的新的社会历史理论紧密相联系的。

在如何评价《雇佣劳动与资本》的问题上，理论界存在着分歧。有人认为，这部著作实际上并没有解决在价值规律基础上资本和劳动不平等交换的根源问题，因此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都还没有区分劳动和劳动力，而只是接近于解决这个问题。^⑩ 我认

^⑩ 参看图赫舍雷尔：《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1981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41—242页；巴加图利亚：《马克思的经济学遗产》1981年贵州人民出版社版第41—42页；马雷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198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版第200—201页。

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诚然，这一时期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从总体上来说，还未摆脱李嘉图经济学思想的强烈影响。例如，在价值理论上，马克思还未能区分价值和生产价格，因而同意了李嘉图关于价值规定的观点。同时他还接受了李嘉图关于商品的价值是由“最不利的条件下进行生产的人所必须投入的较大量劳动”决定的思想，^①认为，“劳动的自然价格无非就是工资的最低额”，“工资的最低额始终是工资市场价格趋向的中心”。马克思还接受了李嘉图在地租方面的错误观点，甚至接受了错误的“货币数量论”。^②但是，只要我们认真研究一下马克思这一时期的经济学和哲学思想，就可以发现，犹如马克思在他早期世界观的转变过程中从总体上仍然受到费尔巴哈抽象人性论思想的影响，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已突破了这种束缚一样，马克思这时的经济学思想也在这一具体问题上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其根据有以下几点：第一，马克思实际上已区分了劳动和劳动力，并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数次使用了“劳动能力”概念。他指出：“除劳动能力以外一无所有的阶级的存在是资本的必要前提。”资本家“用五银格罗申换来的劳动力使他得到了十银格罗申”。他认为，工人的生产活动是一种“创造力”，“工人为了换到生活资料，正是把这种贵重的再生产能力让给了资本家。”^③第二，马克思是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来论述劳动力商品的价格即工资的。这实际说明了在价值规律基础上资本主义剥削的内在机制。我们知道，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不平等交换，这个现象是可以观察到的。这里的关键不在于象古典经济学那样承认这一事实，而在于用价值规律去说明这种现象。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实际做到了这一点。他指出：“工人拿自己的劳动换到生活资料，而资本家拿归他所有的生活资料换到劳动，即工人的生产活动，亦即创造力量。这种力量不仅能补偿工人所消费的东

①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962年商务印书馆版第60页。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94—95、105、107、125页；第6卷第485页。

③ 同上书，第6卷第488、489—490、488—489页（黑体为笔者所加）。

西，并且还使积累起来的劳动具有比以前更大的价值”。他还指出，“农场上每天付给他的一个短工 5 银格罗申。这个短工为得到这 5 银格罗申，就整天在农场主的田地上干活，保证农场主能得到 10 银格罗申的收入。农场上不但收回了他付给短工的价值，并且还把它增加了一倍。可见，他有成效地、生产性地使用和消费了他付给短工的 5 银格罗申。他拿这 5 银格罗申买到的正是一个短工的能生产出双倍价值的农产品并把 5 银格罗申变成 10 银格罗申的劳动和力量。”^⑩ 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在这里“不仅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而且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它是怎样‘产生’的。”第三，马克思区分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把它看作是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马克思指出：“一个棉纺织厂的工人是不是只生产棉织品呢？不是，他生产资本。他生产重新供人利用去支配他的劳动并借他的劳动创造新价值的价值。”^⑪ 这里，马克思已开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原理来解剖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了。从这一角度来看待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突破，不仅是很自然的，而且是必然的。

二、从对“雇佣劳动”这种特殊商品的分析转变到对古典经济学的一些主要经济范畴的批判，形成了未来《资本论》的雏形(1850—1858年)

席卷欧洲的 1848 年革命打断了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计划，使它中断了三年之久。当 1850 年马克思又重新坐在大不列颠博物馆的阅览大厅里时，才发现有对所有经济学理论进行重新和全面研究的必要。这一方面是因为在 1847 年底完成的对雇佣工人受剥削秘密的揭示，使马克思有必要用全新的观点来重新审视一番已

^⑩ 同上书，第 489 页。

^⑪ 同上书，第 24 卷第 12 页。

有的经济学资料，另一方面出于英国当时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其地位远远超过法国和比利时，因此当马克思来到这个中心的首都伦敦时，便更加感到有大量经济学文献需要阅读和加以分析。从 1850 年 9 月至 1853 年 8 月，马克思阅读和研究了大量的专著、官方文件和定期报刊杂志，写下了整整二十四本摘录笔记。由于广泛而深入地研究了经济学，使马克思这一时期的经济学思想产生了新的变化。过去一直支配着他的那些李嘉图的经济理论，现在逐渐成为他批判的对象。这种变化突出地表现在马克思对于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和级差地租理论的批判中。40 年代末，在批判蒲鲁东的所谓“劳动货币”的过程中，马克思曾经接受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的观点。但是经过 50 年代初马克思对 80 多位经济学家关于货币问题论述的深入研究，已经明确地认识到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之间的辩证关系。流通是商品生产的流通，是在生产基础上的流通。因此，作为在流通中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它在流通中的数量并不能决定商品的价格，恰恰相反，商品的价格应由生产该商品的劳动时间来决定。而且货币本身也只有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才能得到科学的说明。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马克思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流通中的货币量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商业业务发展决定的，“只有在业务迅速发展，需要更多的流通手段来进行这些业务的情况下，货币流通才会增加。……因此，货币流通在这里不是原因。货币流通的增加归根到底是投资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相反。”^⑩ 同样，在 40 年代末，马克思虽然批判了李嘉图把资本主义的地租关系永恒化的错误，但在同蒲鲁东进行论战时，他仍然接受了李嘉图把地租的产生同“土地收益递减论”联系起来的观点。在 50 年代的理论研究中，马克思逐步发现把地租同所谓“土地收益递减论”联系在一起是和历史事实相矛盾的。因此马克思认为，李嘉图提出的地租“不过是最坏的土地的产品为补偿它的费用……所必需的出售价格和最好的土地的产品所能得到的出

^⑩ 同上书，第 27 卷第 194 页。

售价格之间的差额”的观点，同人口增长，同从优等地到劣等地的耕种次序，以及同谷物价格的上涨并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可见，级差地租并不是以土地肥力的递减为前提，而仅仅是以“土壤肥力各不相同或连续使用于同一土地上的资本所产生的结果各不相同为前提。”^⑦马克思这个批判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因为他过去接受了李嘉图把决定商品价值量的社会必要劳动量理解为最劣等生产条件下生产该商品所花费的劳动的观点，才认为工人工资是由再生产它的最低限度的时间来确定的。^⑧马克思对李嘉图地租理论的这个批判，无疑是对他过去认为的那种最低工资是工资波动趋向的中心的观点的一次巨大冲击。

1856年底，随着新的经济危机的最初征兆的出现，马克思加紧了他的经济学研究，并开始写作他的《政治经济学》。这一时期，马克思的经济学思想大大地深化了。这可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之前写的两篇文章中明显地看出来。一篇是写于1857年8月批判巴师夏和凯里“经济和谐论”的文章片断。在那里，马克思第一次指出了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庸俗经济学的反历史主义的倾向，他们已完全陷入了调和阶级矛盾，为现存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进行无耻辩护的泥潭之中。另一篇是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根据自己得到的唯物辩证的历史理论，在抽象形态上论述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和方法。在这里，“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生产关系，这种在40年代末被马克思看作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的东西，经过了50年代的经济学研究之后，已被概括为一个以生产为基础的生产、分配、交换（流通）、消费辩证统一的矛盾运动体系。生产，生产资料（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同国家形式和意识形态以及法的关系，家庭关系的关系被描绘成三个层次之间的两种不同

^⑦ 同上书，第175、179页。

^⑧ 见上书，第4卷第105、107、183页。

的矛盾运动，从而构成了全部社会运动的整体。整个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就是一个以符合现实历史发展为基础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而形成整个经济理论体系的辩证过程。在这篇《导言》中，马克思还第一次制定了自己《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结构。按照他当时的计划，整个著作将分为五篇：“(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4)生产的国际关系……(5)世界市场和危机。”可以看出，这种划分方法体现了马克思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试图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进行详细考察的一种尝试。以后，虽然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结构又经历了一些演化，内容上有所取舍，但以对生产关系的分析为主，从而形成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三者之间的两对矛盾运动，则始终保存着，并在内容上大大地深化了。所以，《导言》充分说明，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被进一步经济学化了，成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方法和理论结构的灵魂，另一方面证明，在《导言》之后的《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所体现的基本思想和所要得出的基本结论的精髓，正是历史唯物主义所表述的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马克思这一时期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成果是《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为了贯彻《导言》中的方法论思想，全部手稿力图按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顺序来安排，从而第一次显示了未来《资本论》的雏形。从整个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过程来看，这部手稿正好处于中间阶段。正因为如此，它又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首先，从形式上看，手稿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趋势。中间的《资本章》占去了全部手稿的 5/6 的篇幅。手稿以《货币》作为阐述自己经济理论的出发点，而后来在《资本论》中作为理论出发点的《商品篇》只是在手稿的结束前冠以《价值》之名列于最后，并只写了两页，给人以明显地言犹未尽之感。其次，从内容上看，手稿表现出强烈的批判色彩，其强烈程度在某些部分中甚至完全压倒了正面的阐述。

例如在《货币章》中对蒲鲁东主义者达里蒙的“劳动货币”的批判就是如此，致使整个正面论述缺乏周密的连贯性。同时，手稿还表现出较为浓厚的哲学味道，其中有许多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使用过的论证方法和术语，不过这些论证方法和术语已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但是只要比较一下成熟形态的《资本论》，我们就可以看出，这种强烈的哲学味道仍是马克思当时经济学思想不够成熟的表现之一。第三，从方法上来看，由于已确立的一般方法论原则同这种原则的实际运用之间的巨大差距，致使手稿的整个论述缺乏周密的有机联系。虽然从总体上来说，手稿贯彻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认识论叙述性原则，但是由于这一时期马克思的经济学思想尚未完全成熟，许多问题尚待在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过程中加以解决，因此整部手稿呈现出叙述的方法和研究的方法并存，从抽象到具体和从具体到抽象同在，并以后者为主的特点。这一特点同后来在成熟形态的《资本论》中以前者为主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但是，《经济学手稿(1857—1858 年)》作为后来《资本论》的第一稿，确实在很多地方都使马克思经济学思想大大深化和具体化了。这一时期，马克思已在过去成功地解剖了“雇佣劳动”这种特殊商品的基础上，开展了对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体系其它方面的批判活动。这时，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主义者达里蒙的“劳动货币”的过程中，建立起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他纠正了李嘉图关于价值量决定于最坏劳动条件下生产该种商品所花费的劳动量的错误观点，认识到“由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只是商品的平均价值”^⑩，是由当前在平均或中等劳动强度条件下生产该商品所花费的劳动时间。同时，他明确地区分了价值和价格，认识到商品的价值存在于价格的不断变动之中。他深刻地阐明了价值的质的规定性，阐明了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它体现着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把价值同商品的自然属性——使用价

^⑩ 同上书，第 46 卷上册第 80 页。

值结合起来加以考察，从而阐明了商品的二重性以及商品生产劳动的二重性，揭示了商品的内在矛盾，从而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奠定在真正科学的基础上。^② 可以看出，处于这一时期的劳动二重性理论，虽然还是作为批判研究的结果出现的，尚未构成作为叙述出发点的逻辑基础，但是它的发现，却在整个经济学理论发展上划出了一个时代，它预示着科学而完整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诞生。

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在 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以此为基础，向着那些以前研究过和尚未研究过的各个领域展开了广泛的批判活动。他不仅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更加明确地阐明了资本同劳动交换的实质；从概念的内容和形式上都正确地区分了劳动力和劳动，^③ 而且以此为根据说明了简单商品生产向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转化的机制，明确指出了“资本”决不仅仅是简单的关系，它是一种运动，是一个过程，是“在流通中并通过流通保存自己，并且使自己永存的交换价值。”^④ 马克思还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二重性质：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研究了剩余价值生产的两种方法：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制定了关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理论等等，并且初步制定了自己的资本原始积累理论；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以及经济危机理论等。

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的开始部分，马克思是以“货币”作为自己研究出发点的。这反映出马克思当时尚未发现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细胞是商品，而且在《货币章》中他还曾沿用过古典经济学家的说法，把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看作是价值的二重性。^⑤ 但是在实际的理论批判过程中，马克思通过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矛盾的分析，逐渐发现了生产商品劳动的二重性，并在此基础上更深入地分析了商品的二重性及其矛盾；^⑥ 分析了商品生

^{②③} 见上书，第 80、154、92、85、88、253、250、227 页。

^{④⑤} 同上书，第 217、93 页。

产的基本矛盾——商品生产劳动的私人性和社会性的矛盾；阐明了货币的本质、职能和起源。这一切，无疑使他逐步认识到了商品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使用价值和价值则仅仅是它的规定性。同时他发现了在这个规定性极其简单的对象中，孕育着资本主义经济一切矛盾的萌芽，它应该成为阐述的，也就是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出发点。正是由于这样一个原因，在写作《货币章》的后半部分时，马克思产生了在《货币章》之前增加《价值》章的想法，^②并于1858年5月下旬，在完成了《资本章》之后，为自己的经济学著作补写了《价值》章。在这一章的一开头，马克思便明确指出：“表现资产阶级财富的第一个范畴是商品的范畴。”^③商品的本身表现为两种规定的统一。可见，这时他虽然仍把这一章叫作“价值”，而不是“商品”，但是，事实上他已经把商品作为研究的基本出发点了。可见，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作为马克思经济理论创立过程的中间站，尤如一个大的试验场。在这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被运用于对资本主义各种经济关系的分析之中，也正是在这种具体的分析研究中，马克思发现了劳动二重性原理，制定和初步制定了其它一系列具体的经济学原理，从而为他以后构筑经济学理论大厦打下了基础。

在如何评价《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的问题上，理论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苏联经济学家维戈茨基认为，马克思对“表面的”经济范畴进行分析的那些理论的成熟程度，是马克思对“深处的”经济范畴进行研究的理论的成熟程度的标志。^④ 1857—1858年手稿是从分析货币理论开始的，因此在这本书中马克思的货币理论的成熟程度就成为他的价值理论成熟程度的标志。我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首先，这种标志的适用范围十分有限，尤其对处于演变和研究过程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更是这样。在手稿

^② 同上书，第142、153页，下册第411页。

^③ 见维戈茨基：《资本论创作史》1982年福建人民出版社版第6页；巴加图利亚、维戈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遗产》1981第贵州人民出版社版第140—141页。

中，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过程处于主导地位，马克思正是通过对于达里蒙“劳动货币”的批判，逐渐发现并创立劳动二重性理论的。因此，如果说这时劳动二重性理论已建立了的话，那么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却没有达到相应的成熟程度。因为不仅在 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还是在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都还没有认真地探讨过价值形式的变化。这种成熟形态的货币理论只是在 1863—1867 年手稿中才真正形成。其次，维戈茨基在书中曾举出了马克思对李嘉图货币数量理论的批判来说明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 年）》中马克思的货币理论的成熟程度是他价值理论成熟程度的标志。这一点亦不能成立。40 年代末，马克思虽然基本上同意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并运用它来批判蒲鲁东，但在 50 年代初，当马克思又重新研究了大量有关货币和货币流通的著作后，就批判和抛弃了货币数量论，从而改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来说明货币流通的规律。这时候，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理论还根本没有创立。再次，这种标准强调了现象和本质的一致性，却没有考虑到从现象到本质（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本质到现象（从抽象到具体）的差异性。如果说这种标准对于后者来说是正确的话，那么对于前者则不适用。因为对于研究过程来说，本质研究的成熟程度和现象研究成熟程度是不一致的。所以把此标准用于《经济学手稿（1857—1858 年）》这种研究过程占主导地位的著作，也就失之偏颇了。

三、把作为批判研究结果的劳动二重性理论当作 叙述方法的起点和逻辑分析的基础，构成了 《资本论》的逻辑体系的特色（1859年）

1859 年 6 月，马克思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这本小册子里，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基础——商品和货币关系作了冷静分析。在这种既不能用显微镜，又不能用化学试剂进行分析的

一般社会运动规律面前，唯有科学的抽象力能够承担此项重任。在这里，劳动二重性理论第一次被当作理论阐述的基础和出发点，显示了它作为经济学化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巨大威力。在这部著作的《序言》中，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经典表述。在这里，我没有必要去赘述这篇著名《序言》中已为人们所熟知的深刻思想，而是想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在《序言》中表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比较在此之前的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而这恰恰又来自马克思对经济学的研究。早在四十年代末，马克思就认识到经济危机作为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对抗性矛盾的凶猛爆发，对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具有强大的冲击作用。因此，他根据 1847 年爆发的危机同 1848 年革命的联系，把革命形势的到来与经济危机直接联系在一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过高估计了危机的破坏力。例如 1850 年他指出：“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象新的危机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⑦ 在整个 1851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充满着等待作为革命形势前奏的危机到来的心情。这从当时他们之间的通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1857 年秋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他从 10 月起开始了“发狂似的”制定经济理论的工作。马克思思想在“洪水之前”，即革命到来之前（他当时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创作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但是，1857 年的危机并没有造成他所期待的革命形势。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 年）》中，马克思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他发现固定资本的更新是周期性危机的物质基础，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是使危机从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的条件。危机使“资产阶级经济一切矛盾”达到强制性的平衡，“迫使资本主义生产飞速地达到……它在自己的界限内只能非常缓慢地达到的水平。”^⑧ 由此可见，经济危机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的表现，它本身还不能完全证明，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第 514 页。

^⑧ 同上书，第 26 卷第 2 册第 567、582 页，第 3 册第 130 页。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没有发展的可能了。因此，马克思根据自己的经济学研究，在《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做出了重要的补充。他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② 这一事实充分说明，历史唯物论的发展，必须到经济学的研究中去获得真理。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在探索科学基点的道路上，适应着经济学研究的三次转变，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的交融发展过程。1846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形成了新的社会历史发展理论，就立即成为马克思解剖“雇佣劳动”这种特殊商品背后的不同规定的劳动性质的有力武器，从而发现了劳动和劳动力的区别；1857年，为了整理五十年代以来经济学研究的成果，马克思又一次以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形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概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发现了劳动二重性原理；1859年，当马克思阐述经济学理论基点的时候，又一次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作了经典表述，从而奠定了整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马克思在他经济学研究的不同时期，再三强调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巨大方法论意义，一方面说明了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基础、底色和灵魂，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历史唯物论在逐步经济学化，逐渐穿上了经济学的外衣，并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由哲学一般变为经济学的特殊和具体了。这种一般到个别的转化在1859年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从此，整个理论体系的阐述，才逐渐走上了马克思所设想的以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为主导的逻辑道路。

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史来看，这一过程实际上是马克思在不同层次和领域里重新走过了他本人在早期思想转变过程中走过的路程。1842年，当马克思在实践中发现黑格尔的国家观念同现实的不平等状况之间的巨大矛盾之后，他接受了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

^② 同上书，第13卷第9页。

主义观点。为了在经济学中寻找解剖市民社会的钥匙，他运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理论，通过对私有财产的批判，找到了“异化劳动”这一理论基点，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以异化劳动为基石的人本学理论体系，用以说明私有制的历史过渡性和共产主义的必然性问题。由于继续深入地研究了政治经济学、工业革命历史和法国大革命史，马克思逐渐认识到仅仅靠诉诸抽象的人性，用伦理道德来解释历史发展的致命缺陷。在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他发现了“生产关系”这一基本概念，从而认识到“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社会历史理论的基石。至此，马克思彻底批判和抛弃了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理论，而代之以由他自己创立的、建立在生产方式矛盾运动基础上的新的社会历史理论体系——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从 40 年代中期到 50 年代末期对于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基石的探寻，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更高层次上的重复，是获得了更大收获的重复，是从一般走向具体的重复。

总之，综观马克思探寻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点的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经济学研究的三次转变是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发展和深化过程紧密联系和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作为科学的方法不断被具体地运用于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各个方面的分析批判之中，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创立过程的曲折前进的阶段性，另一方面，随着这种崭新的经济学理论基点的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又被具体化和深化了，逐渐融入和渗透到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之中，构成其核心和灵魂。我们只有在这种动态的历史考察中，才能准确地把握住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之间的辩证发展关系，从而深刻理解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对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意义。

列宁论党领导管理苏维埃国家问题

王立行

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执政党怎样领导管理社会主义国家，是社会主义史上的新情况新问题。列宁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执政党的主要缔造者，领导俄国共产党（布）组织对苏维埃国家的管理和建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列宁的这个宝贵遗产，奠定了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理论的基础，初步揭示了这个新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其各个要点之间的联系，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从而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宝库。总结列宁关于党领导管理苏维埃国家的思想和经验，对于我们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探索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的正确途径，无疑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理论意义。

管理国家是党的主要任务

1917年10月革命胜利后，俄国无产阶级及其布尔什维克党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国际的和国内的、政治的和经济的、革命的与和平的等问题，千头万绪，亟待解决。列宁从这种由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政治局势，分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特点，卓有远见地指明了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任务。他指出，从整个革命的全局来说，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说服大多数人民相信党的纲领和策略的正确；第二个任务是夺取政权并且镇压剥削者的反抗。而当无产阶级执掌了国家的时候，历史就进入一个

新的过渡时期，党和苏维埃国家必须确定新的方针，提出与之相适应的新的任务。这就是管理国家的任务。组织对国家的管理，是无产阶级执政党首要的中心任务。列宁指出：“从说服人民群众这一过去列为首位的任务，从夺取政权和对反抗的剥削者进行军事镇压的任务过渡到管理国家这一现在列为首位的任务——正是这种过渡构成我们所处的时期的主要特征。苏维埃政权的困难很大程度上在于，如何使人民的政治领导人以及劳动群众中所有的有觉悟的分子都清楚地理解这种过渡的特点。”^①列宁进一步分析道，现在提到日程上来的主要任务是如何管理俄国。组织正确的管理，坚定不移地执行苏维埃政权的决定，这就是苏维埃的迫切任务，这就是苏维埃型的国家取得完全胜利的条件。只是在形式上发布命令成立这种型式的国家并且在全国各地加以推广，那是不够的，还必须在正规的、日常的管理工作中对这种型式的国家加以整顿和检查。

管理国家的任务不是由党来直接管理

党领导管理国家的任务并不是由党来直接管理，并不是由党代替国家行政机构和经济机构进行工作。否则，就会产生严重的官僚主义。

列宁深刻地分析了党在解放初期直接管理国家和社会的弊端及其根源。其一，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针对象进口法国罐头这样的具体事务都要提到党中央政治局来决定，列宁在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在我们党同苏维埃机关之间形成了一种不正确的关系，这一点是我们一致承认的。我方才举的一个例子，说明有些具体的小事情都搬到政治局去解决了。……一切问题都从人民委员会搬到政治局来了。”^②其二，国家机关不能履行应有的职能，官

① 《列宁文稿》197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卷第47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653页。

僚主义严重。1923年初，列宁深刻地总结了苏维埃国家几年来的实践，指出：“我们的国家机关，除了外交人民委员部，在很大程度上是很少经过比较认真改变的旧机关的残余。这些机关仅仅在外表上稍微粉饰了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③“官僚不仅在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党的机关里也有。”^④“我们所有经济机关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对国家银行来说，最危险的就是变成官僚主义机关。”^⑤其三，国家机关职责不明，工作人员缺乏责任心和主动性。“人们不对自己的工作负责，不把决议提交人民委员会，不知道自己有这个责任，反而躲藏在各种委员会后面。在这些委员会里，乱七八糟，一塌糊涂，谁都弄不清是谁负责；结果，作出决定由大家共同负责。”^⑥其四，机构臃肿，文牍主义。1922年11月，列宁在第九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常委会上指出，我们的机构缺点很多，膨胀了一倍有余，往往不是为我们工作而是反对我们，这是实际情况，不必害怕说出来，即使在我们共和国最高立法机关的讲台上讲出来也没有关系。英勇肯干的人可能只有几十个，而游手好闲、怠工或半怠工、躲在公文堆里的人却有几百个，这种对比往往使我们生气勃勃的事业断送在文牍的汪洋大海里。我们应当极其详尽地研究这个以前无法研究的问题。^⑦列宁还特别指出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两个机构的问题。他在给亚·德·瞿鲁巴的信中说，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最根本的缺点是对执行情况缺乏检查。污浊的官僚主义使我们陷入滥发文件、空谈法令、乱写指示的境地，而生动活泼的工作却淹没在这浩如烟海的

③ 同上书，第693页。

④ 同上书，第705页。

⑤ 《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5卷第552页。

⑥ 《列宁选集》第4卷第653—654页。

⑦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3卷第355—356页。

公文中了。^⑧ 其五，工作作风拖拉，贪污浪费。列宁在给全俄苏维埃工作人员认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的信中指出，在最近的几年内，最重要的迫切任务就是通过缩减苏维埃机关，改进组织，消灭拖拉作风、官僚主义和减少非生产开支，来不断地精简苏维埃机关和减少其开支。^⑨ 对犯有官僚主义、拖拉作风、不尽职、疏忽大意等过错的人给以行政处分，情节严重者必须撤职，并送交法院审办，由司法人民委员部进行公审。^⑩ 对于这一时期苏维埃国家机关问题，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作了一个比较实事求是的总结。他指出，国家机关问题是我国整个建设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国家机关是廉洁奉公，还是贪污受贿；是实行节约，还是浪费人民财产；是在工作中弄虚作假，还是全心全意为国家服务；是劳动者的累赘，还是帮助劳动者的机关；是培植无产阶级的法制思想，还是以否定这个思想的精神腐化人民的意识；是在向过渡到没有国家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个方向前进，还是向普通的资产阶级国家的腐朽官僚制度倒退，——正确地解决这一切问题，对于党和社会主义不能没有决定意义。我们的国家机关有很多缺点，机构臃肿，开支浩大，9/10已经官僚主义化，而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又在对党和党的组织施加压力，妨碍我们为改善国家机关而斗争，——这些情况是未必可以怀疑的。同时很明显，只要我们的国家机关摆脱了某些主要的缺点，它就会成为无产阶级手中以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精神教育和改造广大人民阶层的极强大的工具。^⑪

列宁分析了执政党直接管理国家，造成党政不分的弊端的原因。首先是战争。由于外国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一方面，国家机关的创始和组建不得不全力以赴地为战争服务，以战争

^⑧ 见上书，第35卷第537—538页。

^⑨ 见上书，第33卷第402页。

^⑩ 见上书，第303页。

^⑪ 见《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217—218页。

为基础和目的；另一方面，刚刚诞生的国家机关还不可能独立地履行职权，发挥应有的职能作用。严峻的战争环境，许多重大问题千钧一发，需要当机立断，不允许党和国家机关有丝毫犹豫和过多考虑，这就客观上形成党和国家的一个决策中心，不可能履行正常的党政关系，不可能划分党和国家机关之间的职权范围和界限，不可能实行正常的国家机关工作程序。党的十一大决议在正确分析造成党政关系不正常的战争因素时指出，由于战时主要起鼓动和宣传中心作用的苏维埃变成实际领导当地经济生活的机关，因此，党有可能和有必要摆脱一些过去不得不亲自处理的纯属苏维埃方面的问题。^⑫其次是领导人兼职。列宁在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曾分析了造成党政不分的兼职因素。他在分析了党同苏维埃机关之间形成一种不正确的关系之后指出，一切问题都从人民委员会搬到政治局来了。这里我的过错也很大，因为人民委员会和政治局，很多都是通过我个人来联系的。一旦我离开工作，两个轮子立刻都转不动了；加米涅夫为了保持这种联系，就不得不加倍地工作。^⑬

正确处理党同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

党领导管理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正确处理它同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

首先，明确党领导管理国家是实行总的领导，划清党同国家以及国家机关之间在权利和职责方面的界限，实行党政分工；党不是行政机构，不能越过或代替国家机构进行工作，也不能对国家机构进行过多的繁琐的干涉。针对多年来党政不分的严重状况，列宁在为筹备党的十一大给莫洛托夫的信中明确指出：“必须十分明确

^⑫ 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151页。以下简称《苏共决议汇编》。

^⑬ 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653页。

地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职权，提高苏维埃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机关的责任心和主动性；党的任务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而不是象目前那样过分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对细节的干涉。”^④他在党的十一大报告中谈了党同苏维埃机关之间形成的不正确的关系。根据列宁提议，党的十一大决议作了明确规定，指出：“当前极重要的任务是规定党的机关和苏维埃机关之间的正确分工，明确地划清两者在权利和职责方面的界限。”^⑤“党在保持对苏维埃国家的全部政策实行总的领导和指导的同时，应将党的日常工作和苏维埃机关的工作、党的机构和苏维埃的机构划分开来。这种有步骤的划分，一方面可以保证苏维埃机关更有计划地讨论和解决属于经济性质的问题，可以提高每一个苏维埃工作人员对本身工作的责任感，另一方面，可以使党在必要的程度上把精力集中于党的基本工作上，即对一切负责教育和组织工人群众的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⑥“党组织无论如何不应当干预经济机关的日常工作，应当不要发布在苏维埃工作方面的行政命令。党组织应当指导经济机关的活动，但是无论如何不应当硬去代替经济机关，或者使经济机关处于无人负责的状态。”^⑦俄共(布)十二大继续坚持贯彻十一大决议精神，指出，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确认，必须始终不渝地执行过去历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关于党组织和苏维埃组织之间必须有明确的分工、关于使每个工作部门的经济工作人员和行政工作人员更好地专业化、关于严格遵守对受托工作的个人负责原则，只有在某一方面的经济问题真正要求党作出原则性的决定的情况下，党组织才能亲自解决这方面的经济问题。无论如何不应把党组织的职能和国家机关即苏维埃的职能混淆起来。这种混淆会带来极危险的后果。

④ 《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3卷第221页。

⑤ 《苏共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181—182页。

⑥ 同上书，第151页。

⑦ 同上书，第182页。

其次，党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是通过国家机关来实现的。列宁在重视党领导苏维埃的同时，强调指出“党的全部工作都是通过苏维埃来进行的”^⑯。1920年，列宁同托洛茨基就工会问题发生了争论，他在阐述党、工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时明确地指出：“党要实现国家职能，“必须通过一系列的也是新型的特别机关，即通过苏维埃机关”^⑰。因为，苏维埃是俄国适合于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即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唯一的国家类型，“是被剥削劳动群众自己的直接的组织，它便于这些群众自己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来建设国家和管理国家”^⑱。俄共（布）代表大会对列宁的上述观点给予充分肯定，在党的多次决议中作了明确规定。党的八大决议明确指出，党应当通过苏维埃机关在苏维埃宪法的范围内来贯彻自己的决定。党的九大决议又进一步作了具体规定，在分配党员从事经济工作方面，党组织绝不应当代替苏维埃，或者有任何同苏维埃竞争的现象，党组织的全部工作都应当通过相当的苏维埃机关来进行。

再次，明确和扩大国家机关的职权，履行和发挥其职能作用。列宁领导制定的第一部苏维埃宪法明确规定，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是全俄最高权力机关，地方各级苏维埃代表大会是地方各级权力机关。党的八大决议对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职能特别提出来，指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职能在苏维埃宪法中没有详细规定，下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必须根据一切实际经验迅速地规定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权利和义务，并划清它和人民委员会的职能范围。党的十大决议也明确规定，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应当真正成为制定基本条例的机关，首先是制定有关恢复农业、工业和财政工作的各项基本条例的机关，同时应当真正成为不断监督各人民委员部和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机关。到1922年，列宁

^⑯ 《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1卷第30页。

^⑰ 《列宁选集》第4卷第403—404页。

^⑱ 同上书，第3卷第634页。

领导党管理国家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实践经验，在召开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他把扩大和发挥国家机关的职能作用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指出：“我希望代表大会能大大重视这个问题，根据应该解除政治局和中央的琐碎事务并加强负责人员的工作的精神来批准一些指令。要使各人民委员对自己的工作负责，不能先把问题提到人民委员会，然后又提到政治局。……要提高人民委员会的威信，各部的正人民委员——而不是副人民委员——应当多参加人民委员会的工作，应当把我最近一年所没有做到的事情做到，即改变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性质，更多地注意检查执行情况。”因此“应该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更加努力地工作，使例会能够正常地举行，会议的时间应当长一些。”如果这样做了，“就能抓住那种在我看来是目前政治局势的整个关键和本质的东西”^②。

管理国家必须向人民管理的方向发展

人民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人民管理国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体现。列宁认为“苏维埃政权是群众立即开始学习管理国家和组织全国范围内的生产的机构。”^③“苏维埃政权的实质在于：正是受资本主义压迫的阶级即工人和半无产者（不剥削他人劳动并经常出卖哪怕是一部分自己的劳动力的农民）的群众组织，是全部国家权力和全部国家机构的固定的基础。正是那些在法律上有平等权利、实际上却受到各种排挤不能参加政治生活和享有民主权利和自由（甚至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也是这样）的群众，现在被吸引来经常参加对国家的民主管理并在其中起决定作用。”^④人民管理国家也就是发展和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大家在公有制基础上享有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管理经济、管理文化的

^① 同上书，第4卷第653—654页。

^② 同上书，第3卷第483页。

^③ 同上书，第724页。

最高权力，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党在社会主义阶段的历史任务就是要组织和吸收人民群众参加管理国家和社会，支持他们当家作主，直到全体人民都来履行管理国家和社会的职能，直到政党、阶级和国家的消亡。列宁说：“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就是普遍吸收所有的劳动者来管理。这是十分艰巨的任务。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一个党所能实现的。只有千百万人学会亲自做这件事的时候，社会主义才能实现。我们认为我们的责任在于大力帮助群众立即亲自去做这件事情，而不是从书本上或从讲课中学习这一点。”^④他在分析苏维埃政权的民主制和社会主义性质时指出：“苏维埃不仅把立法的权力和对执行法律的监督权集中在自己的手里，而且通过苏维埃全体成员把直接执行法律的职能集中在自己手里，以便逐步过渡到由全体劳动居民人人来履行立法和管理国家的职能。”^⑤

从党领导管理国家过渡到人民管理国家的过程，也就是人民管理国家必须经历的一个从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在十月革命前和革命胜利后的初期，列宁曾设想让千百万人民群众直接监督和调整生产和分配，直接管理社会甚至国家。经过一两年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实践，列宁感觉到，普遍吸收劳动群众来管理国家并不是轻而易举的，而是十分艰巨的任务。1919年，列宁已明确认识到，人民管理国家必须经过一个长期的逐步发展的过程。他在党的八大的政治报告中分析了这种情况后指出，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苏维埃在原则上实行了高得无比的无产阶级民主，对全世界作出实行这种民主的榜样，可是这种文化上的落后却限制了苏维埃政权的作用并使官僚制度复活。说起来苏维埃机构是全体劳动者都可以参加的，做起来却远不是人人都能参加，这是我们大

^④ 同上书，第483页。

^⑤ 《列宁文稿》第3卷第79页。

家都知道的^⑨。人民不能立刻直接管理的主要原因，是俄国经济文化落后和人民普遍的文化知识水平不高。

党支持和组织人民参加管理，主要途径和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发展和完善苏维埃制。列宁指出，必须努力不懈地发展各地的苏维埃组织和苏维埃政权组织。现在有一种使苏维埃代表变为“议会议员”，或变为官僚的小资产阶级趋势。必须吸引全体苏维埃代表实际参加管理工作来防止这种趋势。在许多地方，苏维埃的各部逐渐与各人民委员部合并成了一个机关。我们的目的是要吸收全体贫民实际参加管理工作，而实现这个任务的一切步骤，——其形式愈多愈好——应该详细地记载下来，加以研究，使之系统化，用更多的经验来检查它，并且定为法规。我们的目的，是要使每个劳动者，除做八小时“份内的”生产工作外，还要无报酬地履行对国家的义务。过渡到这个制度是特别困难的，可是只有实现这种过渡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彻底巩固起来。这种转变乃是一种创举。在苏维埃国家制度下，人民群众对于国家机构和国家管理的决定性作用，是靠下述两方面达到的：第一、选举的程序和经常进行选举的机会，以及改选和召回代表的条件，对于城乡的工人来说，比在最好的资产阶级民主形式下都容易和方便得多。第二，基层选举单位和国家建设的基本单位不是按地域划分，而是按经济和生产单位划分。国家机构同人民群众这种紧密的联系，就建立起了更高的民主制。在国家行政管理上应当采取的措施是：第一，使每一个苏维埃委员必须执行一定的国家管理工作；第二，使这些工作不断变换，包括与国家管理有联系的整个事务和一切部门；第三，采取一系列逐步的、经过慎重选择而又坚决实行的措施，吸引全体劳动人民自动参加国家的管理工作。这样，苏维埃把这两种权力合而为一，使国家机构接近劳动群众，就拆除了资产阶级议会制这道围墙，为人民群众参加国家管理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⑨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155、150页。

二、建立和健全监督制与罢免制。仅仅由人民选出的代表管理国家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建立和健全广泛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制和罢免制，吸收全体人民来参加检查工作，监督国家机构。“任何由选举产生的机关或代表会议，只有承认和实行选举人对代表的罢免权，才能被认为是真正民主的和确实代表人民意志的机关。”^⑦列宁提出要建立一种特别形式的罢免制和自下而上的监督制，对于那些由人民选出而不能满足人民要求和愿望的代表，人民一经提出，就应予以罢免。他说：“这是苏维埃与劳动‘人民’接近，才造成一种特别形式的罢免制和另一种自下而上的监督制，现在应该极力发展这些形式。”^⑧“无论是工人、无论是士兵、农民、铁路员工，一切劳动者都可以自由地把自己的代表选进苏维埃，自由地罢免那些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和愿望的代表。”^⑨关于改选问题，“绝对不能只由被改选的机关来决定改选，这就是说，不能让当选人因为要保持自己的代表资格而阻挠人民实现罢免自己代表的意志。”^⑩列宁十分重视人民群众的罢免权。1917年12月，他草拟了苏维埃的《罢免权法令草案》，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议上作了关于罢免权的报告。为了从国家体制上切实实施人民群众的监督权和罢免权，列宁领导建立了国家的工农检查院和俄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他晚年认为，党和国家必须花费很大的气力来改造现行的国家政治体制，以便建立和完善苏维埃的监督制和罢免制。

三、发挥群众组织的作用。列宁认为，群众组织是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国家机构的基础，广大人民群众可以在自己的群众组织里开始学习并实际参加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他说：“苏维埃政权在历史上第一次不仅从各方面为受资本主义压迫的

^⑦ 同上书，第33卷第102页。

^⑧ 《列宁选集》第3卷第526—527页。

^⑨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299页。

^⑩ 同上书，第102页。

群众的组织提供方便，而且使这种组织成为自下而上、由地方到中央的整个国家机构的持久的和不可缺少的基础。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制度，使大多数人即劳动者实际参加国家的管理。”^① 在这方面，城市工人阶级具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地位，起着十分特殊的作用。列宁认为，一方面，工会包括了全体产业工人，把他们吸收到自己的组织中，它是一个当权的、统治的、执政的阶级的组织，是实现专政的阶级，行使国家强制的阶级的组织；工会是一个教育、吸引和训练工人的组织；是一个学习管理和学习主持经济的共产主义的学校。另一方面，“工会是国家政权的‘蓄水池’”^②。党把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吸收到自己队伍中来，这个先锋队就实现着无产阶级专政。而没有工会这样的基础，就不能实现专政，就不能执行国家职能。要实现这些职能，就要通过一系列的苏维埃机关。结论就是，工会建立起先锋队与群众之间的联系。同时，还应当利用无产阶级的优越地位，使落后的分散的农村劳动群众同先进工人紧密地联合起来，教育和组织他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参加国家和社会的管理。

四、选拔群众中的优秀人材直接参加管理工作。列宁认为，“老百姓”中，即工人和农民群众中，有很多有组织才能的人。而我们还不善于发现他们，扶持他们，提拔他们。我们应以全部的革命热忱来学会选拔他们的这项工作，要力求尽量仔细地耐心地去考验和识别真正的组织家，即那些具有清醒头脑和实际本领的人才，他们既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又能埋头苦干，使苏维埃组织下的很多人都能坚强地团结起来，同心协力地工作。只有这种人才，经过多次考验之后，才应该提拔起来，从担任最简单的任务到担任最困难的任务，使他们能担负领导人民进行劳动的职务，领导管理工作的职务。我们还没有学会这一点，但是我们一定能学会的。1923年初，在谈到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的时候，列宁认为，应该到国家

① 同上书，第36卷第83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402—404页。

根基最深的地方去发掘新的力量，即到基层群众中去选拔人材。他建议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从工人和农民中选出75个至100个新的中央监察委员，并且享有中央委员的一切权利。当然，当选者也象一般中央委员一样，应该经过党的审查，质量要求高些。

当代对辩证法的研究

〔苏〕П·Э·文茨科夫斯基①

研究作为完整的知识体系的辩证法问题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面临的中心任务。辩证法在认识世界、革命地改造世界中的世界观意义和方法论意义正在增长。列宁经常强调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的不可分割的统一。辩证法贯穿在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一切形式之中。辩证法是人类思想运动的“活的灵魂”和形式，它本身按照辩证法的规律在变动、变化和发展着，并表现在各种各样相互矛盾但又内在相互联系着的形式和变态之中。

正如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科学是现代的最重要的动力之一。这不仅就数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来说，而且就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来说都是正确的。要有意识地对待和实际运用科学去革命地改造社会，要为人类的利益合理地利用自然界，就必须先掌握科学认识论的基本原理。近年来苏联哲学家在发展和完善唯物主义辩证法理论、科学认识和活动的辩证方法论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同社会主义社会现代发展的迫切问题联系起来。

本文的目的是向科学界和教育界介绍近年来即80年代出版的论述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的最重要的著作。

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完成了对辩证法问题有重大价值的研究。苏联哲学出版物中有许多著作专门分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家著作中作了深入研究的唯物主义辩证法。E·M·凯德洛夫院士《论辩证法的

① 作者是苏联科学院社会科学情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译者注

叙述方法：三个伟大的意图》^②一书就其概括性和方向性来说，是近年来出版的著作中比较突出的。该书专门阐述了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法问题，并运用这种方法去叙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中的辩证法本身。该书是作者本人论述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在辩证法方面的意图的许多其他著作的直接继续，或者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是它们的综合。

作者也注意到黑格尔的理所当然地得到马克思改造的东西。从列宁《哲学笔记》^③中的摘要来看，对黑格尔《逻辑学》的分析证明，在黑格尔看来，科学的方法是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它的合理涵义在于，它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向前发展原则的逻辑表现。这里下述三个阶段有本质的意义：发展的起点；包含在起点中的诸矛盾的展开；所达到的结果。结果与发展过程的开端相连，因为只有在结果中才能彻底显露出一开始就寓于整个过程的起点中的东西。这个合理的环节被黑尔格神秘化了，因为他把发展过程解释为纯粹观念——它先于自然界存在并产生了作为自己的异在的自然界——的发展过程。

对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第一卷以及他的来往书信^④进行的比较分析，揭示了马克思撰写辩证法专著的意图。马克思未能实现自己的意图，但是，一般辩证方法，尤其是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在马克思的上述著作中却相当全面和深刻地阐明了。

近几十年来，苏联学者在许多著作中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著作及其来往书信里的辩证法问题进行了研究。当前正是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家的理论遗产去分析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的角度来看，从执行列宁关于“要继承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事业，就应当辩证地研究人类思想、科学和技术的历史”^⑤的指示的角度来

② 1983年莫斯科版。

③ 《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8卷。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35卷。

⑤ 《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8卷第154页。

看，重温马克思的著作和他对黑格尔的方法的批判理解，再次是合理的。

可以说，近年来这类著作基本上是和当代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例如，我们可以举出Ф·Ф·维亚克列夫编辑的列宁格勒作者们撰写的一本书《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论和现代科学》（1984年列宁格勒版）。该书分析了《资本论》的逻辑和方法论的原则，研究了它们对现代科学发展的意义。它特别注意研究《资本论》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核心——作为发展的内在源泉的矛盾，同时指出，在分析运动的具体过程时，关于矛盾是对立关系的规定，不完全是动态的。对立面的一致、相互渗透，是内在的、本质的矛盾所固有的。矛盾通过自己运动的规定是最能表现动态的矛盾规定；“矛盾范畴意味着某一本质的相互作用着（相互否定、相互排斥）的两极的关系，这就说明可以把矛盾规定为本质的自己运动、自己发展的源泉。”^⑥

书中指出，在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时，马克思运用了由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到具体的连续过渡的方法。资本主义社会在自己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作为具体的事物表现出来。由具体到抽象的过渡是“活生生的整体”之分解为它的各个抽象的组成部分；由抽象到具体的过渡是在思想上把这些组成部分综合为客体（更确切地说，关于客体的完整知识）。《资本论》的方法是辩证的分析和综合的统一，它表现为两个方面即完全相反的分析和综合与历史的分析和综合的统一。

为了揭示客体的本性，分析时不仅要看清各个不同的部分，而且还要看清对立的部分。对客体的分析和综合就其展开的形式来说应具有完全相反的性质。对科学理论形成史进行比较分析的结果的总结，表明现象和本质是最复杂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最“具体的”）对立。描述客体是从现象方面认识客体（现象学考察方法），解释客体则是从本质方面认识客体。

^⑥ 《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论和现代科学》第32页。

“对客体的历史分析指的是由客体发展的现代阶段连续追溯到它的最早阶段，直至弄清最简单的（或原初的）阶段（即“细胞”，客体就是从它历史地发展起来的）。”^⑦ 历史地分析与马克思同时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其最终目的是揭示它的“细胞”——商品。

马克思把商品看作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系统的基础。这个基础的基元性是同它的内在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联系在一起的。由抽象合乎逻辑地上升到具体，由实体合乎逻辑地上升到系统，反映了资本产生和发展的客观历史过程。成熟阶段再产生原初基础，即自己的抽象的普遍的基础。商品—货币关系不仅是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的起点，而且也贯穿在这种关系的整个发展系统中。

揭示原初的发展“细胞”的方法论原则，在各种极不相同的研究领域都是富有成果的。例如，列宁在研究认识论时揭示了反映——它以物质基础本身为依据——这一起始原则。分析各种不同的科学领域中的反映原则，使人们能更深入地理解反映——它是认识活动的起点，同时也是认识过程中实际起作用的要素——的内容。由此可得出重要的认识论结论：从逻辑上分析所研究的领域的发展起点的关键，必然包括在该领域自身之中。

书中连续展开了一幅运用《资本论》的辩证方法论的图景，首先是运用由抽象上升到具体、到社会认识、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到批判资产阶级观念、到人和社会意识的问题以及上升到现代自然科学，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的方法的图景。作者们得出结论说，现代哲学出版物中的系统性原则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立足于对《资本论》的逻辑分析的结果。他们的结论引起了极大的兴趣。正是在《资本论》中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的系统得到运用，这一系统使我们能再现我们所认识的作为一个发展着的整体的客体。系统性原则是各种不同的科学领域中的现代系统研究的普遍基础。《资本论》的辩证法是系统研究的逻辑，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成熟阶段，这时“系统具有有机整体的性质，这个

^⑦ 同上书，第43页。

整体的功能受内部决定因素的制约。在自己决定的系统中，它的规律达到最高的发展阶段，‘以纯粹的形式’呈现在研究者面前。”^⑧

这样的结论在现代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在浩瀚的书籍中，有些著作过分扩大了“系统结构的考察方法”，而《资本论》的方法，即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却被形式化了，被阉割了。《共产党人》杂志在编辑部文章《马克思主义实在论的革命辩证法（纪念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发表60周年）》中注意到这一点。其中谈到：“过分扩大认识活动的形式方面，致使一些哲学家得出下述结论：固定在特殊规律中的认识的辩证法，不是外部世界的再现。这就公然摒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映论。”^⑨

马克思制定的《资本论》的方法保证对所研究的现实领域的真正系统的再现。恩格斯也打算把辩证法充分运用到自然科学中去并写成《自然辩证法》一书。B·M·凯德洛夫在其著作^⑩中提到，恩格斯写作《自然辩证法》的最初意图是想固定对黑格尔《自然哲学》进行唯物主义改造的思想，并固定作为其基础的、黑格尔解释中的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以应用于当时自然科学的最新发现。恩格斯认为这个方法与发展的思想在逻辑上完全相符，在发展中由抽象到具体的运动与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现实运动过程是一致的。认清了自然界发展中的物质和过程或自然科学发展中的事件的历史连续性，就使我们能够通过随后的逻辑加工去论证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这个方法能用来认识无机界和有机界。然而，恩格斯强调指出，由化学过渡到生命，尤其是人工合成活蛋白质的问题，尚未解决，因而这种情况成了把这个方法运用于全部自然界的严重障碍。把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运用于全部科学认识上最困难的问题是由自然的、生物的东西向社会的、人类的东西过渡。

⑧ 同上书，第39—70页。

⑨ 《共产党人》1985年第1期第44页。

⑩ 凯德洛夫：《论逻辑叙述的方法：三个伟大的意图》1983年莫斯科版。

凯德洛夫指出：最可能的是，写成的《自然辩证法》应该实现这样的想法，即把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运用于与恩格斯同时的自然科学和数学科学的整个系统中去。这会意味着把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引导到人的产生（通过劳动），而且有可能引导到现代社会，以便《自然辩证法》能与马克思的《资本论》结合起来。这就是辩证法的范畴和规律运用于分析自然科学和数学，最后把辩证方法积极运用于批判自然科学中形形色色的反辩证法思潮。

凯德洛夫详细分析了列宁撰写关于辩证方法的哲学著作的意图。

列宁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叶直到1913年秋的科学活动和党的活动期间彻底贯彻了下述思想：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学说的哲学基础。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他捍卫并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把重点放在它的认识论问题上。在俄国掀起革命高潮的环境中必须编写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教程。由某些局部情况出发过渡到阐述它的作为“革命的代数学”的一般形式，这样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B·M·凯德洛夫指出，可以有把握地认为，列宁撰写辩证法方面的哲学专著的意图，可能产生于1913年秋天他研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的过程中或拟写《卡尔·马克思》一文期间。到1914年9月初意图无论如何已经确立。

由于研究了黑格尔、拉萨尔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草拟了写作唯物主义辩证法著作的四个计划。这些计划的共同点是要求对辩证法的叙述和研究必须服从对象本身的内在逻辑，对象的客观发展的辩证法就是这样的内在逻辑。在研究作为科学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场合，人的思想——它反映永恒运动和永恒发展着的物质——的发展的辩证法就是这样的逻辑。辩证法考虑到这种发展的方向，即由最简单的判断开始上升到内容日益丰富和详尽的思维形式，这些形式能更全面和深刻地反映客观世界并指导实践活动。

列宁未能实现自己撰写辩证法专著的意图，但和马克思一样，他在十月革命前的时期，在完成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革命后的年代撰写的许多著作中却实现了他的这一意图。《哲学笔记》中包含的列宁研究和叙述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四个计划，可以归结为一个总计划，从这个计划的两个方面即起源方面和结构方面来看，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它的核心。

在我国的哲学出版物中有许多著作专门分析了列宁《哲学笔记》中的辩证法。80年代也不例外。例如，在这类著作中可以举出B·П·费多托夫的《列宁〈哲学笔记〉中的辩证法问题》（1984年列宁格勒版）。该书详细考察了列宁进一步发展唯物主义辩证法、它的规律、作为它的主要概括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原则的历史前提和理论前提。作者强调了列宁突出辩证法的关键问题对于制定关于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学说的重要性。这个学说是以完整理解社会主义建设现阶段的社会变化的全部总和为依据的。

在一些出版物中指出，列宁留下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后时期详细研究唯物主义辩证法问题方面的丰富遗产，不只限于《哲学笔记》。例如，B·П·科哈诺夫斯基在《反对诡辩和折衷的辩证法：列宁为确立作为革命思维的逻辑和革命活动的方法的辩证法而斗争》（1984年顿河畔罗斯托夫版）中指出，不仅《哲学笔记》、《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和其他哲学专著，而且列宁的所有著作都贯穿着辩证法。对于列宁来说，辩证法不仅是理论、普遍的认识方法，而且也是实际改造现实的一般方法，革命行动的方法。作者分析了列宁在《再论工会》、《论国家》等著作中运用辩证方法的情况。他研究了列宁著作中的辩证法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辩证法的联系。尤其是，列宁在论国家问题方面划分了马克思的思想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三个基本阶段。《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国家问题提得很抽象，只提出最一般的概念和说法。在《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表述了马克思学说中关于国家的主要结论——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在《法兰西内战》中已经谈到

用巴黎公社式的国家来取代这个被摧毁的国家。由抽象到具体的思维运动反映了真正的现实，真正的历史经验。

为了撰写能体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三个伟大的意图的辩证方法方面的总结性著作，凯德洛夫在自己的书中得出结论说，除了《哲学笔记》和《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指出的那些材料以外，应对下述原始材料作出辩证的评价和分析：一、关于现代社会历史的发展、国际革命运动、我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资料、关于民族解放运动和整个世界的帝国主义体系的危机的资料；二、列宁的所有发展了唯物主义辩证法以及用它具体解决了各种不同问题的著作；三、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苏共代表大会和苏共中央决议的材料；四、关于反映了科技革命的自然科学和技术学科中的现代科学发展的资料；五、批判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各种流派以及右的和左的修正主义的材料。对这些材料的利用应通过下述方式来实现：全面分析所研究的整个现象，经常回顾这个现象，以便尽量更全面和更深刻地揭示隐藏其中的辩证法。

党的定期刊物特别注意利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遗产，以便深入研究唯物主义辩证法，并把它应用于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现代世界革命进程、资本主义总危机等问题以及科学、首先是社会科学的发展。例如，《共产党人》杂志发表了上面已提到过的《马克思主义实在论的革命辩证法》、B·戈洛博科夫的《辩证法：理论遗产和创造性的探索》（1983年第9期）等文章；《真理报》上刊载了B·M·凯德洛夫的《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列宁阶段》（1984年11月16日）等文章。这证明了党赋予进一步深入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的意义。

苏联哲学家遵循列宁所指出的方针做了许多工作。苏联学者注意到当前要求深入研究唯物主义辩证法问题，近年来撰写了许多有分量的学术著作。

П·Н·费多谢耶夫院士的《哲学和科学知识》（1983年莫斯科

版)就是其中之一。书中考察了哲学在世界观中的地位和功能、社会生活中的辩证法以及哲学和具体科学相互联系的辩证法。

作者用大量事实材料揭示了哲学在世界观中的地位和功能，注意到世界观的复杂结构。专门的科学知识促进了一般科学世界观的建立，这种世界观的依据是一切科学材料的总和，是对自然界规律、人的社会活动和精神活动的规律的认识。在这一点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依靠的是作为真正科学知识的哲学基础的唯物主义辩证法。

从列宁的传统即巩固哲学和现代自然科学的整个体系的结合的角度来看，书中详细考察了自然科学的最新材料，弄清了自然科学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在研究哲学和局部科学知识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补充的辩证法的场合，作者谈到哲学的概括功能、它对具体科学最新材料的概括功能同它的积极定向的功能的有机联系。以科学成就为依据的哲学概括，继续下去，直至洞察现象的最深刻和最普遍的联系，为增加新知识作出特殊贡献。哲学和具体科学的相互联系的辩证法是这样的：哲学由于概括了各门科学的理论结论而得到丰富和完善，同样，各门科学也由于作为科学认识的一般方法论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理论的发展和具体化，而获得顺利前进的可能性。

书中研究了列宁用唯物主义辩证法分析自然科学的原则以及自然科学和现代的联系。主要原则就是分析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和辩证法的密切联系，“从各方面深入研究”辩证法的必要性。另一个原则是哲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的辩证统一和发展。在对自然科学材料进行认识论的分析中，列宁指出哲学观念和具体科学观念的共同来源，同时也划清了它们的界限。“应归入关于认识过程的辩证法、关于认识由不全面的即相对的真理到更为准确和全面的认识即绝对真理的运动的学说”^⑩，列宁分析科学进步的哲学问题的主要原则的还有：因果关系原则和关于因果关系、空间和时间

^⑩ B·П·费多谢耶夫：《哲学和科学认识》第113页。

的客观性质的学说。列宁还有一个原则性的要求，这就是无情批判反唯物主义观点的一切形式和变种，始终不渝地贯彻党性原则。

所有这些原则在当前具有最重要的世界观意义和方法论意义，并对发展现代自然科学和深入研究它的哲学问题有巨大影响。

日益深化的综合、科学知识的一体化，不同学科之间的新联系和转化的发生以及新的学科间的知识领域在它们的结合处的形成，以新的内容充实了列宁关于哲学和自然科学知识相结合的思想。

作者特别分出了科技革命条件下的自然科学发展的辩证法的一般规律；科学实验的工业化和自动化；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它的逻辑和方法论的、概念和数学的资料的根本改变；方法论研究在解决科学探索的迫切问题中的作用的急剧增长；系统的方法和进化的即从起源进行研究的方法的相互渗透；向新知识迈进的途径和方式的变化；组织科学活动的方式的根本改变；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相互作用的加强。近年来许多对于全部科学知识来说是共同的重大问题的哲学方面，具有日益重要的作用。

书中强调说，辩证的发展思想现在确实渗透到所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发展思想尤其在物质构造的研究中占主要地位。总的来说，现代自然科学的进步日益深刻地表明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概念的方法论效果。

作者在叙述现代科学知识发展过程时，强调两个具有代表性的趋势：一方面力图反映世界的完整图景，表明世界是一个整体，另一方面则力图更深刻和更具体地了解物质的各种不同结构和系统以及各种不同形式的规律性和质的特点。前者表示知识的综合、一体化的过程，后者表示专门化和分化的过程。这些趋势的相互联系具有真正辩证的性质，因为这些对立面互为条件和有机地相互补充。例如，通过新科学的产生表现出来的知识分化，实际上具有一体化的性质，因为它消灭了这些科学之间的界限，建立了对它们来说是共同的研究领域并使综合考察方法有了新的形式。

П·Н·费多谢耶夫的著作大部分论述的是社会认识的辩证法和方法论，现代的哲学问题，共产主义形态形成的哲学问题和社会生活的辩证法。与片面的形而上学观念相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论证了真正科学的方法论的分析社会过程的方法，这种方法把发展原则和历史主义原则同全面考虑社会机体的结构和功能结合在一起。马克思哲学继续并深化对历史过程的辩证分析，把它看作是社会发展的进化阶段和革命阶段的依次更替和必然联系。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富有成效地保证从理论和实践上对社会过程和现象的把握。

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把目标对准社会实践问题，这一点在成熟的社会主义阶段特别有力地表现出来。对社会现象的辩证唯物主义分析被有机地编排在重大的实际决策的过程中。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在新社会公民的精神面貌、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社会主义文明的形成中的作用正在不断增长。

作者力图说明社会科学在研究现代下述迫切问题中的潜力：生产效率的提高，无阶级社会结构的形成规律，社会生活国际化，社会主义人民政权和社会意识的发展，共产主义教育的任务等等。现代科技革命的社会意义，现实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政治和精神发展的特点，世界革命过程的一些问题在书中得到详细分析。书中还考察了最重要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本性的问题。П·Н·费多谢耶夫的著作在许多现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辩证法问题方面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发表了许多著作。在八十年代以前主要是研究辩证法的某些范畴和规律。同时，许多范畴的深入研究上升到理论的水平（矛盾论、因果论等等）。当时广泛地阐明了关于作为逻辑和认识论的辩证法问题，研究了使范畴系统化的各个原则的建设性的潜力，并试图构成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不同方案。然而，其中许多方案收效甚微；它们在阐述辩证法的基本规律时经常把这些规律彼此割裂，在研究一些范畴时脱离

了完整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体系，因而使这些范畴失去了哲学本质。

随着研究成果的积累，越来越觉得有必要系统叙述辩证法的范畴和规律及其内在联系，在辩证法领域内不能局限于研究个别原则、范畴、规律这一事实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同时，正如《哲学问题》杂志社论所指出的：“整个国际局势的急剧尖锐化，世界发展过程的复杂化，在成熟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完善中质上全新的任务的提出，科学和技术中的革命改革，等等，都要求真正深入研究认识它们的新现象、事件和趋势的形式和方法，因为这些新现象、事件和趋势的最充分地反映社会实践和科学的现代发展阶段的规律性和特点。因此，迫切需要进一步研究唯物主义辩证法，即认识复杂过程和发展着的客体的一般理论和方法。”^⑫ 系统研究和发展辩证法理论的必要性也成熟了。

许多学者的集体努力是解决这种艰巨任务的最合适的道路。这样的道路是由集体创作辩证法著作的方法开辟的。П. Н. 费多谢耶夫院士领导下的创作组撰写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理论概述》（1980年莫斯科版），就是80年代初第一批集体撰写的著作之一。该书阐述了辩证法在科学发展和实践活动中的世界观意义，分析了辩证法的最重要的范畴和原则，揭示了它同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观念的对立。书中强调了辩证法的发展原则同世界的物质统一原则的有机联系，提出了关于从哲学上探求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辩证规律的特殊意义的问题。

作者在强调作为发展学说的辩证法的实质时指出：“代表向前发展的各阶段的各种运动形式的辩证相互联系，在世界的物质统一原则中得到自己的具体表现。不与物质世界及其统一的原则有机结合，发展原则便不能彻底实现。”^⑬ 作者表明发展的动力、发展的内在机制是辩证法的理论体系——关于认识的发展、认识的矛盾等的学说——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作者从运动着的认识矛

⑫ 《唯物辩证法：理论和方法的迫切问题》，载于《哲学问题》1985年第1期第7页。

⑬ 《唯物辩证法：理论概述》1980年莫斯科版第34页。

后中分出两大类。“观念的结构(理论、假设、概念)和事实之间的”矛盾^⑭ 属于第一类。第二类矛盾就是所谓的二律背反。第一类矛盾是“认识内部的尚处于其表面的矛盾，而二律背反则是出现在理论或概念内部发展过程中的理论或概念本身的矛盾”^⑮。

书中非常注意揭示唯物主义辩证法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有利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成果。例如，唯物主义关于自然界中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是无限多样的命题，对于现代自然科学发展具有原则性的世界观意义。对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辩证规律的哲学探索，在当前具有特殊意义。“分析社会发展的主客观因素的辩证法，分析作为社会主要生产力同时作为历史的‘自我目的’的人的发展的辩证法，在这里有决定意义的方向之一。”^⑯ 辩证法的矛盾和规律性既在人的独特发展也在人的历史发展中表现出来。这里特别指的是：人身上的社会的东西和生物的东西的辩证相互关系；社会因素和社会环境在个人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个人行动中的物质的东西和观念的东西的相互作用。

作者们特别注意主体和客体在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中辩证法。

书中强调指出：作为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典型特征的关于辩证法、逻辑和认识论是同一的思想，换句话说，“本体论和认识论方面的不可分割的作用”^⑰ 的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认识的目的——真理，也就是存在于客观现实本身中的东西的确切的再现。”^⑱

书中阐述了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一些原则，历史主义原则、系统性原则、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的原则，等等。

^⑭ 同上书，第49页。

^⑮ 同上书，第50页。

^⑯ 同上书，第36页。

^⑰ 同上书，第178页。

^⑱ 同上书，第190页。

唯物主义辩证法理论的概述，开创了一批集体撰写的概括性的辩证法著作，这批著作于80年代开始出版。

80年代初的特点是开始创作多卷本的概括性著作：《唯物主义辩证法：理论概述》、《作为一般发展理论的唯物主义辩证法》^⑨、《唯物主义辩证法》^⑩、《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⑪、《唯物主义辩证法：规律和范畴》^⑫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过程理论》。^⑬在这些出版物中提出了一些很有意义的问题，使近几十年来积累的材料系统化了。虽然这些多卷本的著作尚未出齐，但可以说，它们已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理论工作作了重大贡献。

不同的集体著作反映不同的探讨和叙述辩证法理论的方法以及不同的研究纲要。不同观点的叙述、讨论、对比，是深入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原则问题的必要条件。集体撰写的辩证法著作，其中包括上边提到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理论概述的出版，使我们能够比较不同的研究纲要和审议最佳方案。

在已出版的概括性著作中，深化了对许多范畴的理解，着重说明了辩证法的范畴、规律之间联系，把世界的物质统一和发展的原则更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就为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概念进行更广泛的批判提供了可能。

唯物主义辩证法理论方面的概括性著作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哲

^⑨ 《作为一般发展理论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第1卷《发展理论的哲学基础》1982年莫斯科版，第2卷《科学认识的发展的辩证法》1982年莫斯科版，第3卷《现代科学中的发展问题》1984年莫斯科版。

^⑩ 《唯物主义辩证法》第1卷《客观辩证法》1981年莫斯科版，第2卷《主观辩证法》1982年莫斯科版，第3卷《自然辩证法和自然科学》1983年莫斯科版，第4卷《社会发展的辩证法》1984年莫斯科版。

^⑪ 《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第1卷《作为科学体系的唯物主义辩证法》1983年莫斯科版，第5卷《生物界的辩证法》1984年莫斯科版。

^⑫ 1983年塔什干版。

^⑬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过程理论：历史过程。现实、物质的基础、第一性和第二性的东西》1983年莫斯科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过程理论：历史过程。整体性、统一性和多样性、形态阶段》1983年莫斯科版。

学和自然科学相结合的思想。

现在我们来谈谈 Ф·В·康斯坦丁诺夫院士和 В·Г·马拉霍夫共同编辑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五卷本专著。这部著作的第一卷《客观辩证法》中首先考察了唯物主义辩证法理论的原则和对象。一些原则表现了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逻辑、价值论和社会学方面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特征。作者们在这些原则的体系中强调了发展原则的特殊意义。作者们认为对客观现实的哲学研究要从研究物质客体开始。这样的客体通过相互对立的和内部相互矛盾的诸属性的统一得到实现，它是现象和本质的统一。诸如质、变化、规律、可能性、因果关系及其他等等属性，说明现象和本质的不同方面或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不同方面的特征。作者们把物质客体发展的一般理论称作客观辩证法的理论（主观辩证法属于认识过程）。

作者们也突出了党性原则——全部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的指导性原则。

作者们所制定的客观辩证法是物质客体的发展理论。实际上，第一卷和五卷本的作者们把辩证法理论的基础建筑在“物质客体”及其发展的概念上。作者们把物质客体的概念当作辩证法理论的核心概念的观点，在对该著的最初反应中就遭到反驳。例如，В·戈洛勃科夫在其文章中指出：“按照作者们的意图，物质客体不是某个现实对象、现象或现实过程，而是一般客体，存在着的现实客体的模式。”这样的“模式”是“由抽象概念、一般原理、特征、特性等等构成的。‘物质客体’是运用这些抽象的结果，而辩证法则是运用这些抽象的理论”。^{②4}

П·В·阿列克谢耶夫在《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论唯物主义辩证法发展的几个问题。理论问题》一文中对作者们就物质概念的

^{②4} 《辩证法：理论遗产和创造性的探索》，载于《共产党人》杂志1983年第9期第122页。

著作^②所作的解释感到惊讶。因为他们认为：“一般物质概念是由于概括了各种物质客体而形成的”；在实际活动中，人“从来不和所有无穷尽的物质打交道”，而只和“物质客体”打交道。马克思主义者中未必有人在什么时候否认过“物质客体”概念的重要性。“但是，把这一概念和‘物质’范畴对立起来并把物质归结为物质客体（论题的第一部分），这样做是否合理？”^③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给物质概念下的定义，是科学的哲学思想的最有价值的成就之一，应极其珍惜。“因为在列宁的物质观中包含着——别的不谈——世界观的而不是局部科学的知识的真正特性；只有在读数系统（即“人和世界”的系统）中，人周围的物质现实，其中包括物质客体，才通过人的价值关系来透视。”^④

五卷本的第二卷《主观辩证法》专门研究科学认识的辩证法。作者们把生动的直观上升到抽象的思维和抽象的思维上升到实践的原则看作认识的基本原则。辩证法被看作是逻辑、科学认识和实践——二者作为统一过程的相对独立方面处于统一和相互联系之中——的方法论。该卷详细考察了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所研究的辩证法要素的方法论意义，分出了辩证逻辑的两个方面：辩证的思维理论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

该卷表明感性和逻辑、经验的和理论的辩证法是认识活动的这些层次相互制约性。理性层次的形成是和思维的范畴概念资料的产生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资料也是经验层次的必要前提。作者们区别了客观事实和经验事实，前者可能不是认识的客体，后者则被作为认识因素列入理论范围并表现某种一般的东西，它是借助于规定的研究方法取得的，因而是复制的东西。

② 《唯物主义辩证法》第1卷《客观辩证法》1981年莫斯科版。

③ 《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论唯物主义辩证法发展的某些问题。理论问题》，载于1983年8月17日《真理报》第2—3版。

④ 同上。

作者们在分析理论和方法的辩证法时，以下述方式表达了它们的差别：“知识的真理性问题和认识的正确性问题，是逻辑和认识论的最重要问题。理论的根源在第一个问题，方法的根源则在第二个问题。理论反映对象在现实中的发展，方法则反映对象的认识过程中的研究活动。”^⑧ 方法是用于科学实践的研究理论。

该卷考察了真理问题。客观真理被规定为思想和现实之间的一致，是认识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接近的高级阶段。

对科学发展中一体化和分化过程的分析，是以世界的物质统一原则和物质运动形式的质的特殊性原则为依据的。数学的求积分作用的加强不应产生下列错觉：数学的客体是无质的，质可归结为量，内容可归结为形式等。科学的发展包含着分化阶段和一体化阶段在一体化趋向的决定性影响下的更替。

在这些著作^⑨得到的反应中，人们对辩证法划分为“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提出疑问。例如，M·H·阿列克谢耶夫在《论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定义及其功能》^⑩一文中指出，在一些辩证法著作中把辩证法划分为“本体论”辩证法和“认识论”辩证法，并称之为“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这是不正确的。任何“主观”辩证法都是客观的，即受客体制约的。因此恩格斯在谈论“所谓的”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黑格尔作的划分）时都加上引号。

在五卷集的第三卷《自然辩证法和自然科学》中，用自然科学和数学的材料在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的体系中揭示了世界的物质统一原则；提出为“物质运动的基本形式”这一概念下定义的任务；提出首要任务是说明特定物质运动形式的物质形成和体现者。然后揭示了关系系统的特点。对于为物质运动的基本形式下定义来说，自己运动的基本原则十分重要，这一原则表明，主要是诸物质系统自身的相互作用决定所有物质系统的运动和变化

^⑧ 《主观辩证法》第2卷，1982年莫斯科版第166页。

^⑨ 《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

^⑩ 《莫斯科大学学报》（哲学类）1985年第1期第3—12页。

的方向。同时，也必须考虑到历史主义即从起源进行论证的原则，它使我们能创立物质运动的基本形式的分类法。

该卷考察了数学认识的辩证法，数学的客体和对象，数学中量变和质变的辩证法。数学的客体是各种不同类型的量规定性和质规定性、无限和有限、非间断和间断、宇宙及其元素的结构多样性的统一。数学的对象是客体的理论形象，是它的抽象的和理想化的概念。数学的对象的变化依赖于数学的发展水平、认识方法、邻近科学的发展和社会历史实践。

该卷叙述了世界的物理图景的演变。在现代物理学中，在描述所研究的现象时主体活动的方法和手段的作用增强了。抽象的理论思维加强了所使用的抽象概念和数理逻辑的资料在科学描述中的作用。但是，知识对获得知识的方法的依存性，是以这种知识具有客观内容为前提的。

作者们仔细考察了化学、天文学、地质学、控制论的发展辩证法，智能问题中自然的东西和人工的东西的辩证法。在揭示生物学的辩证法时，注意到结构功能的认识方法和历史的认识方法的接近。在研究遗传学辩证法中，说明了在遗传学创立中哲学思想的斗争，遗传学和达尔文主义的综合等问题；注意到人类的起源是物质发展中的过渡状态，物质发展的内容是社会规律性的产生和形成。

该卷得到的初步反应是良好的。例如，П·В·阿列克谢耶夫和А·Я·博格丹在文章中写道，书中表明的自然界发展的一般图景，符合于有关我们所知的宇宙各部分的历史的现有具体科学资料以及关于物质运动形式的螺旋形发展的观念：“奇异状态、元粒子的等离子体和类星体在物质的运动形式发展中是第一个螺旋圈；随后又产生了第二个螺旋圈：类星体、原始星体物质、星体；第三个是：星体、气态尘云、行星系；第四个是：物质运动的地质、生物和社会的形式。自然界发展的这种一般图景，就本质特征来说，不仅综合了自然科学的材料，而且就特定关系来说，还综合了社会科学的

材料。”^①总的来说，该卷对物质运动形式所进行的分类，是有科学根据的哲学假设，而且它的方法论的效果可能在当代自然科学理论的预言中表现出来。

第四卷《社会发展的辩证法》是目前出版的几卷中的最后一卷。其中考察了社会及其结构、物质运动的社会形式、客观制约性、社会发展的性质和方向。

作者们指出，社会发展的辩证法可以看作既是现实历史过程的客观辩证法，又是这一过程的一般理论，也是方法、工具、“劳动工具”、认识真正历史现实的“最锐利武器”^②。财富——它是劳动在自然力的配合下从自然材料中创造的——的生产和消费的客观辩证法是社会物质生活的基础。物质生产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是社会的东西在自然的东西中直接形成的过程。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的客观必然的协调，是这种关系的最一般原则，是人类支配自然的所有措施是否合理和富有成效的一般标准。

作者们把“社会经济形态”的范畴选作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核心概念。“社会”概念——它对“社会经济形态”概念来说是类概念——反映物质运动的社会形式的质规定性，“社会历史形态”范畴则反映社会发展的类型和历史阶段的质规定性。

作者们从社会关系首先是生产关系的本质中引伸出人的本质并对这些关系进行了分析，这种做法是由真正人道主义的原则和社会决定论的原则决定的，后一原则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人是自然界的万能力量，但人的存在方式是社会的，人的发展取决于劳动、教育、科学、自然历史的条件、生产关系、社会需求、阶级斗争和许多其他因素。劳动是人的存在的决定性因素，是人的社会本性的内在需要和表现方式。劳动是完整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社会生活观的基础。劳动是物质的社会形式内部固有的物质存在

^① 《自然辩证法和自然科学》，载于《苏联科学院和苏联哲学协会情报资料》1984年第4期第38页。

^② 《社会发展的辩证法》1984年莫斯科版第9页。

方式。

人们有目的的活动表现为任何社会过程中的必要环节，因此社会决定论首先包括群众的自觉的劳动活动。人们的活动也始终是由物质原因、经济条件决定的。

社会发展的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处于辩证的统一之中。客观因素包括人们借以创造历史的环境和过程。要确定客观因素的结构，就需要具体的历史考察方法。主观因素指的是历史主体活动的社会政治方面和精神方面的总和。历史主体活动的目的在于实现社会发展的一定目的和任务。

作者们在考察社会生活诸领域的决定性联系时指出，决定经济过程是分析整个社会决定的起点。作为一个系统的社会生产是由生产的规律性和需要决定的；消费也取决于生产。

该卷极为重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是通过辩证的矛盾发展的。矛盾的运动、发展是划清社会主义条件下合乎规律的、矛盾展开的各个质的阶段的基础。作者们认为这些阶段是：矛盾各方的统一和一致；矛盾各方的分裂和不一致；矛盾的解决和克服。

作者们在考察社会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时认为，在对这一问题的方法论分析中有两种相互联系的考察方法——自然科学史考察方法和主体考察方法。在第一种考察方法中，历史表现为人类社会“诸断面”的关系，表现为象生产关系等这样的社会因素的关系。主体考察方法表达作为人民群众活动结果的历史。劳动活动是发展的源泉。主体因素在发挥发展的动力功能时表现为起控制作用和指明方向的因素。

该卷中指出，现代主导的社会矛盾是世界革命过程的三大主流——世界的社会主义体系、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形成和发展的源泉。现代的世界革命过程不仅是由原来的社会主义运动、无产阶级运动、而且还由民主主义运动、反垄断运动形成的，同时“现代社会发展的经验证实，共产党客观上担

任着世界解放运动的一切潮流的政治先锋的角色”^③。

该卷中用很大篇幅分析了社会系统的动态，社会发展的进化和革命的辩证法，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的辩证法，社会进步和科技进步的辩证法以及社会的辩证发展的其他问题。

目前该卷是八十年代的直接考察社会生活辩证法的问题的多卷本出版物中为数不多的著作之一。看来，在其他的多卷本著作中也应能期待到有关社会发展的辩证法的专著出现。总的来说，苏联哲学出版物中唯物辩证法的专著从八十年代开始更积极地掌握社会生活领域。

至于谈到多卷本著作，那么在Φ·B·康斯坦丁诺夫院士领导下集体撰写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过程理论》中从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观点阐述了历史过程。这部著作的第一卷^④包括一些重要的问题：自然史和人类史；历史现实的存在和发展的方式；历史过程的物质基础；历史过程中第一性和第二性的东西。

该卷中考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类社会的形成及其在阶段——社会经济形态——更替过程中发展的理论。社会的人是运动的社会形式的体现者。该卷中区分出处于统一中的社会的人、人们和人们再造的物质生活资料的总和，以之作为社会的物质主体。

该卷中活动范畴表现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起始范畴。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人的万能性是通过活动范畴表现出来的。作者以活动范畴为中心建立起反映社会存在和进步的范畴和原则的体系和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由于劳动才有活动。劳动是作为社会活动形式的社会关系的源泉。在劳动过程中，活动是以运动形式或对象性（劳动产品）形式和联系（人们之间的关系）形式存在的。交往使社会关系具体化和人格化了。社会关系和交往以社会联系的两个

③ 同上书，第259页。

④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过程理论：历史过程、现实、物质基础、第一性和第二性的东西》1983年莫斯科版。

方面的统一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两个方面形成社会系统的结构，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同时，社会关系归根结底决定交往的历史形式的运动。

作者们把社会决定论原则称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则之一，并通过活动的决定因素——需要、利益，通过作为活动的产物和活动的特殊方向标的价值把这一原则同人们的活动联系在一起。无论物质的组成部分还是观念的组成部分都包括在社会决定的链条之内。

作者们在分析历史过程的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辩证法时是以活动范畴为起点的。客观的社会决定向主观的社会决定的转变，取决于对需要、利益和价值的了解，并且是主观因素形成和发挥功能的前提。作为社会能动性的最重要因素的目的这一范畴是同活动相联系的。该卷中强调指出：“上述由客观到主观的运动道路以集中的形式包含在目的之中；利益、价值、评价、功用、对现在的态度、对未来的看法均汇合和融化在目的之中。目的是道路的最高点，从这里重新开始由主观向客观的转变”，^⑤即目的在实践中的实现。

实践是同具体的历史的主体联系着的。作者们把实践分为两种基本形式：物质生产实践（改造自然）和社会改革实践（改革社会关系和社会设置）。同时，活动范畴的外延广于实践范畴的外延：“实践在这样的地方，也只有在这样的地方开始，那里活动的对象性和感性的形式发生效力，那里世界不是在思想中，而是在它的实际对象中发生变化。”^⑥

该卷中把社会生产作为历史过程的最重要范畴提了出来，物质生产的概念也列入这一范畴。同时颇为注意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生产方式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的原理；通过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辩证法揭示了历史过程的总方向；经过社会经济形

^⑤ 同上书，第209页。

^⑥ 同上书，第195页。

态的更替走向共产主义；指出社会生产基本形式的辩证法：劳动分工和劳动协作，实现社会劳动协作的发达形式，只有过渡到社会主义才有可能。

该卷考察了历史过程的两个基本层次即第一性的东西（物质）和第二性的东西（观念）的辩证法，社会存在对一切社会现象来说的第一性。社会存在和社会生产方式不是等同的，它们是反映历史现实的不同范畴系列。社会存在范畴反映作为物质运动的社会形式的历史过程的实体特征，与此不同，社会生产方式范畴则反映单个社会过程的内容。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这是社会结构的第一性结构和第二性结构的相互关系。上层建筑对基础来说永远是第二性的。

该著的第二卷^⑤考察了下述主要问题，如历史现实的整体性，历史过程即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和更替过程的形式的统一性和多样性。该卷中提出了列入历史过程理论的范畴资料。历史过程的分期的依据是社会经济形态的范畴。在这一考察方法的范围内，可以对历史过程进行较狭或较广的分解，可以使我们关于历史过程的观念具体化或概括化。

历史时代这一范畴表明“处于一般本质、特殊和个别的统一中的现实历史的一定阶段。历史时代包括不同历史类型的各种共存的社会机构的全部多样性、它们的多结构性、它们的相互交错和相互作用。”^⑥作者分出社会结构这一范畴作为社会生活诸领域——经济、社会、政治和精神的生活领域——的联系方式。这些领域的形成取决于人的活动的内容、独特的手段和结果。

社会环境是和社会的历史类型联系着的，它不仅表现为就人

⑤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过程理论：历史过程。整体性、统一和多样性、形态阶段》。

⑥ 同上书，第24页。

的社会关系来说的人本身。社会环境也是和人活动的对象化了的结果分不开的。宏观层次（社会的社会结构）和微观层次（家庭、初级的劳动联合和人们交往的整个环境）说明了社会环境的特点。

作者们分析了社会科学中生活方式，这样一个重要的概念：规定生活方式是社会的东西在个人中的表现方式，是稳定的历史上具体的社会关系所固有的、人们的个人生命活动和集团（阶级，民族）的生命活动的形式。

社会系统的基本矛盾是在革命的飞跃，否定旧的社会制度的进程中解决的。作者们指出了旧事物和新事物之间的承续性；革命只归结为进步的发展；进化变化的进步方向；进化变化同革命变化的联系。

我们想从关于社会现象的辩证法的集体著作中举出《马克思列宁主义论革命和反革命的辩证法（同反革命作斗争的经验和现代）》这一专著。它是由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编写的，主编是M·II·姆切德洛夫。

该书注意分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如何考察无产阶级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进行的反对各种反革命势力的斗争，这一时期包括1848—1849年的欧洲革命、1871年的巴黎公社、帝国主义时期的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05—1907年的革命和1917年的二月革命）以及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书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对反革命的社会基础和本性、反革命的种类、活动的形式和方法的深刻揭露，使我们能在当代有充分准备地分析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问题。阶级斗争的辩证法、亲如兄弟的各国共产党同反革命势力斗争的经验总结，使我们得出结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中没有也不可能有使工人转到反革命营垒的任何长期的巩固的基础……正是以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体现者面貌出现的工人阶级，是这种关系的主要保障，因此在马列主义政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在粉碎反革命势力中作出

了决定性贡献。”^⑨

作者们令人信服地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反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政治的斗争，是反对反革命势力的重要因素；这一斗争与共产党所提出的社会主义道路结合在一起，就能使革命无产阶级周围的广大的劳动群众巩固地团结在一起，能使国内外反动派的任何相互勾结的企图难以得逞。

回过来再谈谈多卷本的出版物。在几·Ф·伊利切夫院士领导下集体编辑的四卷本《作为一般发展理论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理论》，现在已有三卷问世。

第一卷《发展理论的哲学基础》（1982年莫斯科版），论证了列宁关于辩证法是最深刻和最全面的发展学说的定义；分析了作为世界观和革命实践和现代科学的方法论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作用。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世界观功能和方法论功能是不可分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作为完整的哲学学说，包括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个解决一切最重要的哲学问题的根本基础^⑩。该卷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发展学说的基本原则即世界的物质统一、决定论、反映等原则；考察了发展、进步、倒退和时间的相互关系。系统考察方法是世界统一的思想在相互联系的层次上的具体化，因为系统表现为相互作用的结果。从知识发展的角度来看，世界的统一表现在宇宙中起作用的诸规律的单一性。应用在复杂的动态系统上的唯物主义决定论的主要思想，这就是系统本身的存在和自己发展的内在条件的思想。作者们非常注意考察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该卷用很大篇幅批判了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发展观念。

在《作为一般发展理论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这一著作的第二卷《科学知识发展的辩证法》中考察了科学理论认识和社会生产实践

⑨ 《马克思列宁主义论革命和反革命的辩证法（同反革命作斗争的经验和现代）》1984年莫斯科版第377页。

⑩ 《作为一般发展理论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第1卷《发展理论的哲学基础》1982年莫斯科版第90页。

在各个不同历史时代的联系的性质。实际需要始终是科学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作者们在分析科学认识发展的社会历史决定论时采用了“社会记忆”的概念，这一概念指的是积累的知识、思维的逻辑结构、社会价值及其在物质文化和社会意识的形式中的定形。社会记忆在科学认识中的决定功能表现在：“物质的社会实践和精神生活的产物”的总和，“是信息关系中的最重要因素之一”^④。

分析科学革命和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的辩证法，是以关于科学——一个复杂的形成一定结构的统一整体——的观念为依据的。可以把科学中的革命变化分类为理论认识的变化、社会体制的变化、科学技术的变化和社会科学的变化。这些变化只有借助于一定的稳定结构和科学认识的转化才能发生，而科学认识的转化是“流逝着和不断变化着的现实的真正客观转化的反映或思想理论形式。”^⑤ 科学发展的一切因素归根结底是历史地决定的。

作者们指出，不仅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中的而且在人文科学中的科学认识的实验方法构成现代科学方法论武库中的最重要部分，这是因为科学知识的高度数学化、学科间研究的扩大、科学和生产直接联系的扩大和深入。实验是认识和实践的统一的特殊形式。这一形式的产生和发展由科学本身的需要、研究活动专业化的必要性社会地决定的，没有这种专业化，无论科学还是实践都不能进步。

实验是科学的研究的处于动态的不断加强发展的环节，它的特点在于：它包含着理论反映的要素，并同世界的一定的理论图景相对应；它借助于物质的实践的活动预先确立同所研究的现实发生的物理的联系。

该卷考察了现代科学认识资料的发展的辩证法问题。主体和客体的历史统一的揭示是辩证唯物主义真理观的基础，这种统一

^④ 同上书，第2卷第53页。

^⑤ 同上书，第87页。

又是以对象性的实践活动为根据的。关于真理的问题不仅是关于思维的特性的问題，而且也是关于实践的特性、人的生活的特点的問題，不仅是意识的变化而且也是世界的变化的問題。真理是世界的积极的创造性的反映，这种反映揭示世界发展的趋势和倾向。

认识中的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相互联系的特点是由所研究的客体的具体内容和这些方法本身的历史发展水平决定的。作者们指出，历史方法存在于两种基本形式之中，一种形式尚未同所研究的客体的历史分离，而且似乎是历史在思维中的重复（经验阶段），历史方法的另一种形式是关于所研究的客体的不断发展的理论和思想的历史（理论阶段）。这些方法成为逻辑方法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科学理论在它发展的每个阶段上的内容，首先决定于所研究客体的历史形成过程，其次决定于理论本身的内在逻辑。

该卷强调了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的意义，它是客观的物质对象和系统的形成和发展的理论反映的最适合和最准确的方式。

关于认识过程的矛盾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中心問題。在该卷中一般地把这些矛盾看作是反映在科学认识中的矛盾的内容和结构同它们的原型即客观矛盾不完全符合——这种符合是受历史制约的、不断变动的——的结果。二律背反是科学认识在挑选二者必择其一的假设时产生的，它们只是认识过程的客观矛盾的间接表现，因为二律背反的事实指出了认识中的辩证矛盾，并且只有通过这种辩证矛盾才能指出被认识的客体中矛盾的存在^⑨。不管怎样，要解决认识过程的辩证矛盾，就需要作另外的更深刻得多的说明^⑩。

作者们强调指出，在认识过程中辩证法的一般规律通过认识的辩证法的特殊规律起作用。在其特殊规律中，“反映出认识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的辩证法，即客体化了的认识过程的辩证法——

^⑨ 同上书，第172页。

^⑩ 同上书，第177页。

认识者的主体和被认识的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⑩。理想化和抽象化是保证认识的相符合性和有效性的方法。

作者们对现代科学认识中的新形式和新趋向进行了分析。概念、判断、假设、规律和原则被看作深入研究相应理论的必要成分。对认识从假设到理论的发展的分析表明，新理论的“创立是为了消除认识发展进程中产生的不一致、矛盾”^⑪，假设则是确定与先前的知识的承续关系，它不是随意的猜测，而是经过事实和理论论据论证了的定理。“可以把理论的建立看成是具体的现实在具体的理论知识中的反映过程。”^⑫ 假设的概念资料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相对地说变得愈来愈复杂和抽象了。假设体系的演绎的有序性是建立科学理论道路上的第一步。

作者们把科学的世界图景列入在现代科学认识中起重要作用的概括性的概念形式。科学的世界图景的发展包括处于统一之中的自然现实和社会现实，并以活动的范畴和原则为根据。在科学技术革命日益深入的情况下，科学的世界图景满足了急剧增长的对科学知识系统化和一体化的需要，对论证一切科学领域的内在统一的需要。哲学的范畴和原则是科学的世界图景的基础，在科学世界图景的形成和更替时期，它们的作用大大增长。

该卷试图以科学中的新东西的形成为例完整地考察科学认识的特征。科学中各种新发现的方法论意义在于，它们发展了科学思维本身、它的形式和方式。思维的独特方式是同每一种基础科学联系着的。在一体化趋势迅速增长的今天，这一概念推广到基础科学和研究倾向的总体。它根据自己的内容，越来越明确地同知识体系的内部结构的特征联系在一起，在知识发展中起作用的规律性赋予知识体系以统一性和完整性。

该卷中对资产阶级的科学发展理论进行了批判分析，主要是

⑩ 同上书，第 186 页。

⑪ 同上书，第 314 页。

⑫ 同上书，第 334 页。

针对 K·波佩尔、T·库恩和 I·费耶拉边德的观念材料。

在所说的著作的前两卷^④中，阐述了本来意义上的辩证法理论——辩证思维的核心。B·戈洛博科夫在对这两卷书的评论中指出，对辩证法理论的阐述和进一步研究，要求彻底贯彻和发挥其中的基本原则，这就使辩证法理论成为具体的发展着的整体。他写道：“可惜，作者们未能完全克服习惯的考察方法，即把辩证法说成是彼此并列的原则、规律、范畴的总和。这也不是说，没有注意它们之间的联系。可是这里仅仅是指出、举出了这类的联系，而未以应有的方式说明它们。”^⑤想揭示、详细叙述内在的辩证联系或表达作为过程的某个辩证法规律的尝试也未能成功。须知，把辩证法的规律、范畴、原则彼此孤立地分开考察，就不能发展所考察的过程中的发展思想。

B·戈洛博科夫分析了该著对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的叙述，以此说明该著的上述缺点，并指出，它不是在相互关系中、而只是彼此“并列地”叙述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作者们在单独叙述每个规律时，不可避免地忽略了发展的思想本身，即他们的全部著作的中心思想，基本的辩证规律变成特征和特性的堆砌。对辩证法的范畴和原则的叙述也有类似的缺点。

因此，评论者作出结论说，编写组未能成功地叙述作为辩证法的规律、范畴和原则的完整体系的辩证法理论。“然而，在多卷本著作中已经把辩证法的基本范畴和规律汇集到一起，这一点具有积极的意义：在辩证法的整体中深入研究辩证法的必要性更明显地显露出来，”^⑥；它拥有丰富的资料，可供进一步研究和创造性思考。

^④ 《作为一般发展理论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第1卷《发展理论的哲学基础》和第2卷《科学知识发展的辩证法》。

^⑤ B·戈洛博科夫《辩证法：理论遗产和创造性的探索》，载于《共产党人》1983年第9期第119页。

^⑥ 同上刊，第120页。

《作为一般发展理论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这一著作的第三卷是《现代科学中的发展问题》(1984年莫斯科版)。它专门分析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发展思想。它研究了发展原则的世界观功能和方法论功能，各个不同科学学科的形成和发展的逻辑中的普遍规律性的表现形式，它们的概念体系，科学知识的辩证法及其同社会历史实践的统一。

该卷的第一篇谈的是自然科学——物理学、天文学、化学、地质学、生物学中的发展思想，并且考察了控制现象和信息概念。发展的思想是在现代自然科学所研究的物质运动的各种形式的辩证法及其相互联系的辩证法的范围内考察的。这里分析了所研究的自然科学的物质运动的各种不同形式中的发展过程的源泉和方向，阐述了自然现象中矛盾的辩证法，物质发展中的间断性和非间断性的辩证法。

第二篇分析了关于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通史、法学、军事史、考古学、美学和伦理学中的发展思想。社会科学中的发展思想是在客观和主观、物质本原和精神本原经常相互作用的角度进行考察的，否则便不能揭示这些科学所研究的社会生活各个不同方面的客观规律性。这里有关研究该卷中所提到的社会科学的问题的材料，有关研究相应的发达社会主义的规律性和特征的问题的材料，占有很大篇幅。

莫斯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八卷本专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主编是M·F·米丁)，也是集体撰写的辩证法著作。

由A·II·谢普图林编辑的该著第一卷是《作为科学体系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该卷序言中简要地叙述了全部八卷本著作的基本原理，考察了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组成部分及其结构、原则和方法。按照作者们的意见，使用了辩证法概念的三种基本意义：1、“自然辩证法、社会辩证法和作为思维过程的客观方面的思维辩证法……”在该场合“辩证法”这个术语是在“客观辩证法”意义上使用的；2、“主观辩证法，辩证的思维”^⑨；3、“‘辩证法’这个术语是

在关于辩证法的哲学学说、辩证法的理论的意义上使用的。后者是主观辩证法，只是第二层次的主观辩证法：它是反映的反映。”^⑤该卷中第一个术语“辩证法”是在第三种意义即学说、理论的意义上使用的^⑥。

可见，所考察的著作的第一卷中研究的是唯物主义辩证法。这一理论也在上边提到的多卷本著作中分析过：在《客观辩证法》这一卷中着重考察了唯物辩证法理论的原则和方法；《主观辩证法》这一卷中把辩证法看作是科学认识的逻辑和方法论；《发展理论的哲学基础》这一卷中把唯物主义辩证法看作是一般的发展理论；《科学认识发展的辩证法》这一卷中表述了认识过程的一般的辩证规律性，并且突出了现代科学认识发展的辩证法的关键。所考察的著作的第一卷还使用了系统考察方法去分析唯物主义辩证法理论。所有这一切都符合于各个编写组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的共同想法。

作者们的根据是，唯物主义辩证法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而“唯物主义辩证法理论则以系统形式反映唯物主义辩证法及其各个部分、规律、范畴的现状”。“表现在物质世界和认识中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是唯物主义辩证法理论的对象，“这一理论从意识对存在的关系的角度研究最一般的发展规律，这就使它成了哲学科学。”^⑦进一步深入探讨唯物主义辩证法理论，是以党性原则、同实践联系的原则、对当前具体科学的概括、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以及世界观和方法论一元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等原则为基础的。该卷中强调指出，辩证法“只有表现在完整的

⑤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第1卷《作为科学体系的唯物主义辩证法》1983年莫斯科版第6页。

⑥ 同上书，第7页。

⑦ 同上。

⑧ 同上书，第8页。

体系中，才能顺利地发挥自己的最重要的功能。在这个体系中，每个规律、每个范畴都各占有严格确定的地位，并处于同所有其他规律和范畴的必然的相互联系之中”^⑤。

作者们把抽象上升到具体，逻辑的东西和历史的东西的统一、辩证法、逻辑和认识论的同一等原则视为构成唯物主义辩证法范畴体系的起始原则。作者们在该卷中把物质、意识、实践、认识、矛盾视为辩证法的起始范畴。这些范畴反映所研究的整体的那些决定客体的形成、发挥功能和发展的关系。

该卷在建立唯物辩证法体系的范围内弄清了体系和要素、要素和结构、结构和功能等范畴的相互联系的问题。要素具有相对稳定性，质的规定性，它与其他要素相互联系在一起，共同形成完整的体系。结构概念反映诸要素排列的形式、它们的各个方面、各种特性的相互作用的性质。结构是体系的属性，它的内部组织，诸要素的联系规律。正是由于结构，体系才能再现自身，并以相对不变的形式存在一定时间。

作者们从体系的角度研究了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及其许多范畴：事物、特性、关系、空间和时间、个别和一般、一般和特殊、同一和差别、质和量、原因和结果、必然性和偶然性、可能性和现实性、内容和形式、整体和部分、本质和现象、否定，等等。

该卷根据分析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的方法论作用的结果，分出了认识的基本原则：客观性、对认识过程中的主体的能动性的重视、决定论、一分为二、历史主义、由抽象上升到具体、分析和综合的统一。系统考察方法作为唯物主义辩证法原则的一定总和在认识中起了特殊的作用。

目前这部八卷本著作的以后卷次中第五卷《生物界的辩证法》(1984年莫斯科版)已经问世，它是由 H·II·杜比宁和 T·B·普拉托诺夫院士编辑的。从这部多卷本著作对唯物主义辩证法进

^⑤ 同上书，第 18 页。

行分析和研究来看,这一卷是补充,并在本质上阐明了两卷书^⑤中对生物的辩证法的考察和对生物科学关于生物的研究材料的考察。这一卷还分析了人和社会中的东西和生物的东西的辩证法。

该卷中指出,生物界的辩证法的结构包括三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了生命的本质。第二部分研究了有机界发展的辩证法,辩证法基本规律在有机界中表现的特点。第三部分从哲学上分析了生物界同社会、人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

作者们把生命看作物质运动的形式,给生命下了定义:“生命是物质运动的最高自然形式;它的特征是具有各种不同层次的开放性系统的自己更新、自己调节和自己再生,这些系统的物质基础是蛋白质、核质酸和磷的有机化合物。”^⑥同时他们注意到,生命的本质是动态的,生命的定义不能一成不变,它应当根据科学发现——科学所不断发现能说明生命本质特征的新的特点和方面——的成就而变得更准确。

作者们把系统和结构考察方法运用于研究生物界。处于与发展原则统一中的整体性原则,是这种分析法的方法论基础。有机界的整体性问题,这不仅是生物的质的独特性及其独立性和自体组织的问题,而且也是生命和其他现象的联系问题。生物界有三种价值表现形式:个体、种群和群落。对生物组织的分子层次和细胞层次、单个机体的层次、作为生物组织的基本层次之一的物种以及生物圈层次和生物地理群落层次的具体分析,是组织的结构层次概念的基础。这一概念是作为完整物质系统的生物界的辩证法中最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的概括之一。

该卷分析了生物界中辩证法的基本规律的作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考察方法使人们能够了解进化过程这一生物界不断发展的客观存在的现象。唯物主义进化论是遗传性和变异性的最重要的自

^⑤ 《唯物辩证法》第3卷《自然辩证法和自然科学》;《作为一般发展理论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第3卷《现代科学中的发展问题》。

^⑥ 《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第5卷《生物界的辩证法》1984年莫斯科版第53页。

然科学原理之一，它确认了生物界的现实进化和发展的辩证法的基本规律的联系。发展的实现有赖于生物界中诸矛盾之间的复杂的相互关系。正在产生的矛盾或由于种群的遗传变异而被抵消，或引起遗传结构的或快或慢的改变，或引起种系发生的变化。发展的实现也靠这种情况。进化的变化根据量变到质变的规律进行：“新质的有机形式的产生这一事实本身，进化中的转折点和关键阶段的存在，种系发生的某些发展的加速，——这一切说明，进化包括渐进过程的中断”^⑧，也就是飞跃、转化。作为生物界的进步发展的进化本身是否定之否定规律的特殊表现。

作者们在分析生物界中反映形式的进化基础上，考察了意识和物质的相互关系问题。在生物界中形成意识产生的前提——比非生物界中更高级的反映形式：兴奋性和应激性，无条件反射和条件反射，在此基础上产生动物的感觉和形象的联想的思维。意识发展的辩证法证明了生物界各种不同层次上的反映机制的作用。“反映活动在自己的发展中从生物轨道过渡到社会轨道时，发生质变。”^⑨ 意识本身就这样产生了，它和动物的心理作用保持共同的基础。

对人类起源和发展的哲学问题的分析，使作者们能够仔细考察社会的东西从生物的东西中产生的辩证法。对人及其最近祖先的社会的东西和生物的东西的相互关系的考察，证明了人的辩证本性：一方面是人和动物共有的本性，另一方面是他的质的独特性和社会继承机制所决定的社会本质。人刚出生时“没有社会本质。只是在出生后，在每个人身上由于活动过程中的社会程序的影响，才发生意识、思维、语言形成的复杂过程。社会程序通过人的智力、意志以及感觉和情感的领域反射出来，并形成作为个性化了的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个性。”^⑩

^⑧ 同上书，第148页。

^⑨ 同上书，第148页。

^⑩ 同上书，第196页。

该卷也考察了社会和自然相互作用的辩证法，分析了人、社会和生物界相互联系的总体方面，社会生态学的方法论问题。“社会和自然相互作用的辩证法是这样的：人在对自然进行相当大规模的改造时，几乎摆脱了自然条件所加的限制，但又遇到地球范围本身所造成的另外限制。”^⑩ 其后果是全球性的发展危机，发展的辩证法和解决危机的可能性已经遇到阶级社会发展的特殊社会辩证法的阻碍。资本主义使危机加深，而社会主义则预示危机解决的前景，这就是自然、人和社会的辩证的相互联系的发展的两极。一方面是人毁坏自然并有可能毁坏自己的辩证法。另一方面是共产主义的协调，人、自然和社会相互发展的真正辩证法。

在结束多卷本的辩证法专著的评论时，还必须提一下塔什干、莫斯科以及国内其他城市的学者们集体撰写的一部著作。该著的第一卷是《唯物主义辩证法：规律和范畴》（1983年塔什干版），该卷的责任编辑是 A·II·谢普图林。

在这一卷中特别注意唯物主义辩证法诸功能中的世界观功能。按照创作组的意图，认识论功能和逻辑功能将在以下几卷中考察。

该卷作者们的写作目的是解决下述任务。首先，分析辩证法范畴的内容。其次，揭示这些范畴之间的辩证的相互联系，以完整的体系的形式介绍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理论，而且这种体系是开放的，允许把新的范畴列入自身。第三，拟定社会认识的发展道路，阐明社会认识向本质运动的基本阶段，即通过概念体系再现客体的处于自然相互依存中的全部必然特性和联系的基本阶段，从而证明，辩证法范畴的体系包括认识论和辩证逻辑及其能帮助人认清他的认识活动和具体改造活动的方向的全部原则。

作者们首先决定，什么样的辩证法范畴是构成它们的体系的起始范畴，什么样的方法论原则应该运用于对它们的分析，以便从

^⑩ 同上书，第294—295页。

这些原则中推论出范畴的整个体系。他们把物质、意识、实践和矛盾视为起始范畴，而把历史的东西和逻辑的东西的统一，抽象上升到具体，辩证法、逻辑和认识论的同一视为起始原则。

该卷把辩证法的范畴和规律的体系的发展看成是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是渗透和深入现实现象的本质的阶段。在该卷中是按照这样的顺序来考察这一上升过程中的辩证法诸范畴的，这就是它们在人们的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于认识之中产生的顺序。作者们认为，这样的考察方法不仅能使人们确定辩证法范畴形成的真正的历史顺序，而且也能揭示它们的内在逻辑联系，即实现历史的东西和逻辑的东西统一的原则。该卷强调说，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在实现这一方法的过程中运用了历史的东西和逻辑的东西的统一的原则以及辩证法、逻辑和认识论的同一的原则——使有可能实现列宁的精辟思想之一——辩证法的各个范畴是认识发展的各个阶段。

在该卷中分析了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的关系，并把规律解释为现实的最一般的联系，而把范畴解释为最一般的概念，借助于它们来反映这些联系。可见，从范畴的角度来看，叙述唯物主义辩证法理论，必须要把辩证法规律有机地列入该理论之中。

作者们把下述范畴包括在所考察的范畴体系之中：同一和差别，特性和关系，现象和本质，有限和无限，非连续性和连续性，个别、特殊和一般，抽象和具体，逻辑的东西和历史的东西，原因和结果，必然性和偶然性，矛盾和协调，结构和功能，可能性和现实性以及许多其他范畴。

该卷中深入研究了唯物主义辩证法体系的范畴和规律，同时批判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观念。

我们在上面已经谈了对集体撰写的已出版的多卷本辩证法著作的初步反应。可以预料到，今后还有对这些著作的仔细而又全面的分析。不管怎样，可以有把握地说，这些著作中提出了有意义的新问题，并把近几十年积累起来的资料系统化了。

同时，现在也已经谈出某些重要的意见。其中一部分上面已经讲了，例如，B·戈洛博科夫在《共产党人》杂志中发表的意见。^⑫我们还要提一下 M·H·阿列克谢耶夫在《论唯物主义辩证法及其功能的定义》一文^⑬ 中所提的一些一般意见，其中评论了《作为一般发展理论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第二卷^⑭、《唯物辩证法》第一卷和第二卷^⑮ 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第一卷^⑯ 中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理论问题。

M·H·阿列克谢耶夫认为，当计划出版的卷次全部问世时，对上述著作将给予充分而全面的评价。作者在评价已出版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理论方面的)各卷时，就这些卷中所谈的关于辩证法的定义和功能的问题提出意见。他认为，所提出的关于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界、社会和人的思维的最一般的发展规律的科学的定义，只有从辩证法同形而上学对立的角度来看才是正确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引用这个定义来说明辩证世界观和形而上学世界观的对立。但是，这个定义对于揭示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不同的特点来说是不够的。定义中没有强调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第一性和思维意识的辩证法的第二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彼此不可分割的。阿列克谢耶夫提出了下述定义：“唯物主义辩证法是关于物质世界的发展及其在人的意识中的反映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⑰

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功能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是一致的。然而，苏联哲学出版物中，其中包括多卷本的辩证法著作，对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哲学功能的理解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某些作者不正

^⑫ B·戈洛博科夫：《辩证法：理论遗产和创造性的探索》，载于《共产党人》1983年第9期第116—124页。

^⑬ 该文载于《莫斯科大学学报》(哲学类)1985年第1期第3—12页。

^⑭ 《科学认识发展的辩证法》。

^⑮ 《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

^⑯ 《作为科学体系的唯物主义辩证法》。

^⑰ 《莫斯科大学学报》(哲学类)1985年第1期第4页。

确地把功能同结构要素混为一谈，并根据辩证法要素的数量来确定功能的数量。但是，辩证法的功能是同它对其他科学和实践的作用联系着的。哲学和辩证法的真正功能有二：世界观的功能和方法论的功能，它们是彼此联系在一起的。“指导人们活动的对世界和人在其中的地位的最一般观点的完整体系，称为世界观”^⑩。辩证法之所以实现世界观的功能，是因为它把握了物质过程和精神过程，它是关于世界的最一般观点的体系。辩证法的方法论功能决定于它是认识和行动的最一般方法。

应该指出，前几年和近几十年在辩证法的世界观功能和方法论功能问题方面出版了不少著作。特别是 80 年代出版的尼·Ф·伊利切夫院士写的著作《唯物主义辩证法问题（论辩证法的世界观功能和方法论功能）》（1981 年莫斯科版），其中专门谈了关于辩证法的世界观功能和方法论功能的问题。这一著作是这位学者以前在这方面的专著的继续。

苏联哲学出版物（包括 80 年代的在内）注意的中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矛盾问题。列宁指出：“就本来的意义说，辩证法就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⑪

马克思主义对发展思想的分析，要求承认物质系统的内在矛盾性。系统考察方法有助于这种分析获得成功，它帮助说明自己发展着的客体中的矛盾的多样性，确定主要矛盾及其解决的合理方式。上述多卷本著作中关于唯物主义辩证法理论的著作，用这些观点研究了矛盾问题。

除这些多卷本著作之外，在 80 年代出版的其他著作中也研究了矛盾问题。由于本文的范围所限，不能讨论所有这类的著作。同时应该指出，某些著作中对矛盾进行理论分析时使用系统考察方法，这引起了批判性的意见。可以举 B·B·博罗德金《唯物主义辩证法中的矛盾问题》一书（1982 年莫斯科版）作例子。作者从现代

^⑩ 同上刊，第 6 页。

^⑪ 《列宁全集》中文第 1 版第 38 卷第 278 页。

的实践和科学认识的经验的角度考察了矛盾。注意的中心是矛盾的结构,发展和解决的规律性,对立面的等级,迫切的逻辑和方法论的问题。作者把深入研究矛盾的学说同量和质的统一、系统性和整体性的统一原则结合在一起。关于矛盾的学说由于对现代数学、自然语言和形式逻辑的概念资料的分析材料而具体化了。

同时 C·П·杜杰利在《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矛盾学说的发展吗?》一文(载于《共产党人》杂志1983年第7期)中对这本书进行了批评。杜杰利认为,在这本书中,辩证矛盾的哲学理解和研究被从机械论解释的系统考察方法偷换了;解决辩证法问题的哲学层次被“社会科学层次”偷换了。这就导致对立面统一和斗争的规律失去普遍性的地位,辩证法的矛盾由内在的矛盾变成外在的矛盾,“动态平衡”规律在 B·B·博罗德金那里成了包罗万象的东西,列宁关于对立面统一的相对性和斗争的绝对性的基本方法论原理被“系统的”平衡论方案偷换了。该书的作者在认识论方面背离了列宁的反映论的根本原则。杜杰利作出结论说,作者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矛盾学说的关键要素的方法论观点是错误的。

由此又产生了《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矛盾学说的发展吗?》一文中所作的另一结论。不注意社会现实,不注意社会发展中矛盾的独特性,便不能对矛盾问题进行一般哲学的研究。这对于积极、确实地影响社会过程是必须的。可是,该书的作者在从事分析社会主义的矛盾的方面犯了严重错误。这是可想而知的。该书对唯物主义辩证法理论的分析所表现出来的杂乱无章和前后矛盾,不能有助于分析社会主义矛盾——社会主义向前发展的源泉、促进因素——的任务。

当前正开展对现代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矛盾的研究。E·M·凯德罗夫院士在1984年11月16日《真理报》发表的《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列宁阶段》一文中写道,与社会主义矛盾有关的辩证法问题,要给予极大的注意。辩证法中对立面的统一并不意味着它们的调和,而是相反,意味着它们的斗争,即以斗争着的对立面中的

一方——矛盾中反映向前发展的进步性质的一方取得胜利而告结束的斗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新和旧、垂死的东西和新生的东西之间斗争就是这样的矛盾。它们的解决是发展过程的动力，进步的源泉。在发展着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总是有某种过时的、要求克服和更新的东西。除了这类矛盾之外，还产生其他的矛盾，这就是社会主义建设同敌视社会主义本性的现象（受贿、侵吞国家财产、酗酒、蒙骗以及其他等等）的矛盾。对于上述现象则要进行尖锐的、不可调和的斗争。

这些矛盾不是由于社会主义建设而产生的。它们和资本主义的对抗性矛盾也不相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它们表现为整个社会和个别人之间的矛盾，并在社会主义社会自身范围内得到克服。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靠提高苏联人的觉悟，提高他们的一般文化水平，加强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感，培养对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在社会起决定作用的前提下——的正确理解。

P·И·科索拉波夫在1981年7月20日《真理报》发表的《社会主义和矛盾》一文中指出了与我们社会中新旧斗争相应的两种矛盾。一种是集体主义原则、社会生活方式的准则、新的共产主义的东西的幼芽与私有制关系的残余之间的矛盾。另一种是共产主义幼芽、集体主义的社会关系的最成熟形式、具有最强大的潜在力量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与过去某个时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产生、现在已经过时、不再适应已经变化的条件和更加复杂的任务的事物之间的矛盾。这两种矛盾具有一般辩证的性质并且是自然历史过程的任何阶段所固有的。

在广泛战线上日益增长的自觉性和自发性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所特有的。自觉性同先进科学紧密结合在一起，改变着自然历史过程本身。同时，具有自觉性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力量先锋队、工人阶级、在世界观和政治方面成熟的劳动者阶层，而具有自发性的是公然的反动分子，或是没有自己的明确生活态度的落后分子。自觉性是社会发展的不可分割的本质属性，它参与

揭示、研究和解决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矛盾。对社会活动的正确知识使得由这种知识所指导的活动变成历史过程的有效因素。列宁要求党及其领导者和思想家走在自发革命运动的前面，给它指明道路，要求他们善于比其他人更早地解决这一运动中的各种不同的问题和提高群众的自觉性。这一要求仍象从前一样是现实的。

P·И·科索拉波夫也注意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既不归结为新旧斗争也不归结为自觉性和自发性决斗的矛盾。在这些矛盾中，构成矛盾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不能认为是否定的方面。例如，在寻求劳动权和劳动义务、对劳动的物质刺激和道德刺激、社会主义民主体系中的社会原则和国家原则等的最佳结合时产生的矛盾，就属于这样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彼此不可分的、舍其一便不可思议的诸方面的相互关系发生变化时，这类矛盾便产生了。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社会中存在的对抗性社会矛盾，在建成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消失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没有社会对抗，但有个人的对抗（社会对抗的个别形式），它不是产生于社会条件，而是产生于人们的个人的（或小集团的）生活条件。个人的矛盾是局部冲突尖锐化，从个别人的相互不友好起到分散的反社会的犯罪分子对抗整个社会为止。个人矛盾的代表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的必然成分，因此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观点是正确的。

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劳动和生产的全面社会化，使对立面结合在一起。所有制的全民形式和合作社形式不只是同大机器生产联系在一起。繁重体力劳动和普通手工劳动在工业中的消灭，农业劳动之变为工业劳动的一种形式，是克服由于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和简单技术相结合而产生的矛盾的道路。民主原则和集中原则作为民主集中制——社会主义管理原则——中的对立面而相互发生作用。对立面的有意识的结合是对立面统一和斗争规律的作用形式，是计划化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的解决方式。

可见，深入研究唯物主义辩证法理论是同解决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本问题、社会主义进步、共产主义教育的实际任务相关联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发展问题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所有其他世界观问题和方法论问题集中在自己的周围，因为辩证法同时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认识论和内容丰富的逻辑。

在所有考察过的多卷本著作中都包含着对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理论的批判。例如，在集体撰写的著作^⑩ 第一卷《发展理论的哲学基础》中，用很大的一篇批判了形而上学的发展观念：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的发展问题、宗教的发展观念中的天主教异说、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和发展原则、现代资产阶级的社会进步观念、修正主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学说的歪曲^⑪。在其余的多卷本著作中批判了其他的形而上学的反辩证法的观点。

在 80 年代出版的批判反辩证法观点的多卷本著作中，只打算提两部著作。其中之一是 B·П·科哈诺夫斯基的著作《反对诡辩和折衷的辩证法：列宁为确立作为革命思维和革命行动的逻辑的辩证法而斗争》（1984年顿河畔罗斯托夫版）。书中考察了为确立作为革命思维的逻辑和革命行动的方法的辩证法的列宁思想的意义，以及这些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批判中的运用。该书中与现代条件有关的观点是非常有意义的。

例如，在历史的巨大转变时刻，即历史运动的矛盾尖锐化时刻，只有辩证的考察方法能预告谨防错误的发生，——这就是列宁的结论。辩证法是创造社会生活的新形式的强大工具。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的牢固统一是列宁主义的最重要的特征。可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理论家至今仍硬说，列宁首先是政治家、实践家、实用主义者。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的敌人、存在主义

^⑩ 即《作为一般发展理论的唯物主义辩证法》。

^⑪ 对该卷的这一篇的摘要，载于苏联科学院社会科学情报研究所的摘要文集《思想斗争和社会科学（摘自 1977—1982 年的苏联出版物）》1984 年莫斯科版第 44—54 页。

者和修正主义者——“实践派”，顽固地坚持说，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中似乎没有人的地位。同时，他们悄悄地抛弃作为一般的发展理论和认识理论的辩证法。

作为逻辑和认识论的辩证法及其同诡辩和折衷的根本区别的问题，列宁在《哲学笔记》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和苏维埃政权初期的著作中作了深入研究。列宁认为诡辩和折衷——反辩证法的形式、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的实质是对概念的全面性，普遍的、达到对立面的同一的灵活性^② 的主观任意运用。辩证法反映客观过程的全面性，是世界发展的反映。折衷和诡辩不同（尽管它们有相似之处），折衷的典型手法只是主观地抽取对象的个别方面并机械地把它们结合在一起。诡辩和折衷的第一个特征是极端的主观主义；它们的第二个特征和怀疑主义相似，即相对主义；第三个特征是片面性；第四个特征是表面性（诡辩和折衷停留在外表、表面的层次上，达不到本质）。现象离开本质，就不能认识规律性。诡辩和折衷的第五个特征是把对象的历史性、多变性绝对化，离开了对象在具体条件中的稳定性。第六个特征是不能理解作为对立面的同一的对象，找不到现象的本质本身的矛盾。第七个特征是表面的逼真、虚假的证明、貌似科学、“客观性”。第八个特征是玩弄辞藻，夸大认识的形式方面，寄生于词的多义性，对这些词所表现的概念的具体内容缺乏研究。列宁 1906 年在土地国有化问题上批评了普列哈诺夫的类似的文字游戏。由此得出诡辩和折衷的第九个特征，即烦琐性，在哲学争论中缺乏任何实际内容。

当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的歪曲是由下述两种基本情况促成的：第一，由于科学技术革命的开展，资本主义国家中，其中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小资产阶级成分增加了；第二，反帝国主义阵线的扩大，这种情况总的来说具有积极意义，但同时也有相当多的

^② 参看《列宁全集》中文第 1 版第 38 卷第 112 页。

非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阶层的人参加到这一阵线中来。列宁所制订的辩证法原则，对于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修正主义仍具有很大意义。现代的意识形态敌人实际上利用马克思主义叛徒的老一套狡猾手段为帝国主义辩护和恶意中伤社会主义（以“完善”社会主义为幌子）。

帝国主义的现代辩护士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歪曲它的实质。例如，这是现代哲学古义钩沉学的特点，它企图贬低革命学说的科学意义，损害现实的社会主义的威信。现代资产阶级的“革命社会学家”歪曲革命概念，无视它的基本特征，玩弄诡辩的花招，把思维和语言混为一谈，或用语言偷换思维，实证主义地把表达思维的语言形式绝对化。

折衷主义原则是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用以对抗现实社会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概念的方法论基础。“民主社会主义”似乎克服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片面性。但是，现在已经弄清，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资产阶级国家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属性。这也是后工业社会、技术至上社会、后资产阶级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特色。这种全面性原则反映在右倾修正主义思想家们（勒费弗尔、科西克、弗兰尼茨基、马尔科维奇）用实践范畴所耍的诡辩花招之中。

辩证法的具体性原则是同折衷和诡辩所固有的、没有统一性只有多样性的原则相对立的。作为展开的全面性的具体性考虑到当时对象的存在和发展的一切条件。只有在认识的理论阶段上，所研究的对象才能作为由统一的根据引伸出的诸规律的体系、作为一个非常具体的东西揭示出来。书中还有其他类似的批判材料。

这类书的第二本专著是И·Т·雅库谢夫斯基的《辩证法和反辩证法：对苏联学家们的概念的批判分析》（1984年莫斯科版）。这本专著批判分析了近年来哲学反共主义的代表人物、苏联学家们的出版物。他们专门从事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特别是辩证

法的理论和历史。该书特别注意揭露对于苏联学家来说最有代表性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方式和手段。

马克思主义的篡改者把辩证法说成是过时的和不科学的体系，内部有矛盾的体系。他们在解释辩证法时，把虚伪和真实混在一起，以便造成客观叙述的假象。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们通常不分出作为独立的历史形式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极力对它的存在保持沉默，或贬低它的真正意义。苏联学家们对辩证法解释的有代表性的趋势之一是否定辩证法的客观性。辩证法似乎只在精神方面运用，至于在自然界和社会方面，只有依据唯心主义地理解的思维和存在的原则，才谈得上运用辩证法。但是，由世界的物质统一和物质运动所决定的现象的普遍联系和相互制约，是客观辩证法的有力证明。客观辩证法已被社会历史实践和科学全部矛盾的发展所证实。

苏联学家们歪曲辩证法的主要方针是把辩证法的实质、基本规律和范畴简单化、庸俗化，以便把它变成“假科学”。为此，唯物主义辩证法被说成是主观主义地精选出来的彼此矛盾的“教条”、陈腐的和明显错误的原理的混合物。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把辩证法归结为实例的总和。辩证法被贬低为获得政治成就而使用的实用主义武器。但是，辩证法和革命的有机联系产生于它们的实质本身。作为普遍适用的科学理论的辩证法，是社会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的方法论基础。

辩证法的基本规律被苏联学家们说成是虚假的、彼此矛盾的、缺乏客观性质的；这些规律的实质被归结为庸俗的、简单化的原理。规律似乎不能得到科学的证明，而只能用一些实例来证明。苏联学家们反对从自然科学论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因为对自然的研究能不断证明辩证法的真理性。在马克思主义中唯物主义辩证法是自然科学的科学方法论。

苏联学家们首先反对辩证法核心——对立面统一和斗争的规律，因为他们认为这一规律是阶级斗争的哲学论证。为了推翻这

一规律，他们从资产阶级哲学中借用了否定矛盾的现实性的方法，妄称该规律是没有科学根据的，无法证明的。马克思主义的篡改者们形而上学地把矛盾和运动相提并论，否定运动的矛盾性。苏联学家们企图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说成是合法的黑格尔派。但是，在黑格尔那里，按照这一规律，对立面归根结底调和了，矛盾中立化了；而在马克思主义中，矛盾则是通过对立面斗争来解决的，对立面斗争导致两方面同归于尽，或者至少其中的一方面灭亡。

“批评家们”攻击量变到质变的规律，因为他们认为这一规律中是社会革命的哲学论据。苏联学家们再次断言，规律没有客观意义和科学论据。但是，正如我们的反对者反复说的那样，创造的必然性不是从量和质的规律引伸出来的，不是“强加给历史”的。这种必然性是由马克思列宁主义发现并论证的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预先决定的。

苏联学家们发表了反对否定的否定规律的意见，因为他们认为这一规律是社会进步的理论论证。批判家们宣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所谓“共产主义的末日论”是以这一规律为依据的。苏联学家们不认为这一规律有普遍性和客观性，把它归结为黑格尔的三段式。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否定的否定规律反映发展的方向和一般趋势，揭示它的基本特征：承续性、前进性、螺旋性。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诸规律是客观的和普遍适用的，它们表现在存在和意识的各个领域中。它们彼此密切联系着，并揭示作为统一的现实过程的物质运动的各个不同方面。

苏联学家们否定认识过程的客观矛盾和辩证性质，事物的辩证法对思想的辩证法的制约性，反共主义的思想家们极力论证认识论中的多元论，否定真理的客观性，特别是否定社会科学方面的真理的客观性，企图把社会理论和假设混为一谈。反共主义者们歪曲或否认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核心的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原则，贬低列宁对认识论的贡献。

书中还包含有揭露反辩证法的世界革命过程、社会主义建设

的诠释者的有意义的材料。社会学家、宣传家和党的工作者们在上述两本书中将获得对宣传工作和反宣传工作有用的丰富材料。

原载《辩证法、认识、社会发展》

1986年莫斯科版第8—70页

(章沛译 单志澄校)

当代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迫切问题

1985年9月16—19日，在梯比利斯举行了全苏第二次马列主义哲学中的价值问题讨论会。这次会议是由苏联哲学协会和格鲁吉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组织的。这次讨论会的指导思想是，把科学的价值理论的创造性潜力全面运用于解决加速社会发展的任务。在讨论会上，主要围绕价值理论怎样才是可能的问题展开了热烈争论。

H·恰夫恰瓦泽在讨论会的开幕词中指出，20年前在全苏第一次价值问题讨论会上，关于马列主义哲学范围内的价值问题的提法本身在许多人看来就是值得商榷的。那次讨论会证明，价值概念对进一步发展我们的哲学科学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由于运用这一概念，我们开始更深入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和应用社会学、伦理学和美学的问题；确立这一概念，大大促进了我国哲学科学中新的研究方向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的概念、文化哲学等的发展。此外，我们开始更好地理解我们的哲学的实质本身，理解它的人道主义的含义。

同时，20年来在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论方面也积存了不少难点和模糊不清的问题。第二次讨论会的任务就是要讨论并试图弄清这些问题。

价值(这里指的是高尚的、有目的的价值)按其本性而言是观念的。这就是说，价值只能作为人的价值意识的内容的客观因素而存在。价值同比如说逻辑真理和数学真理的区别就在于：人把价值看作是并应当看作是自己的存在、自己活动的目的的意义和

理由，而逻辑真理和数学真理只是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

与会者把关于价值的争论与当代现实联系起来，指出了价值对于调动人的积极因素的作用，提出了反映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新的价值标准的形成问题，以及当代世界中价值现象学的问题，论证了和平的价值是当代文明的主要价值。人们把对价值论原则的理论分析，同国内现实问题和社会发展现阶段的矛盾的分析结合起来。

讨论会上讨论的主要问题是：

一、价值概念的哲学论证和价值理论的建立。

价值——这是高尚的精神上的绝对命令，人的行为举止的动因，是理想、神圣东西的领域。高尚的价值观念反对仰给予人的生活态度。把握了价值会产生一种特有的开朗高尚的激情并使感情得到净化。古代的伦理学范畴在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中并没有消失，而是发展为类似概念的总和。这就是信念、希望、爱、睿智（创造性的智慧）。这些概念的特点在于，它们反映了“人中真正人的东西”，是积极的因素。人的精神的潜能有5个层次：虚构（思维的无意识层次，在这里观念的东西和实在的东西融合在一起）；艺术形象（观念的东西和实在的东西的融合具有假定性，具有“表演”原则）；悟性的形式（抽象的知识）；理性（具体概念）；智慧（哲学），它把所有形式的知识结合起来，并使之与行为相联系。价值存在于各个层次上，但这首先是艺术和哲学领域。哲学应当从人的活动的结构中演绎出价值，价值关系是在人的活动中发生的。不同种类的价值是由不同的学科（社会心理学，历史科学，民族学，文化学，教育学，伦理学，美学，艺术理论，符号学，宗教学）加以研究的，而哲学考察价值本身及其在文化各领域中表现的规律性。哲学必须从方法论上把这一切组织起来，为它们提供价值关系的统一的理论模式，这种模式能说明这些学科对于研究价值关系的必要性和充分可能性。

价值本身是什么？怎样和以什么样的认识手段才能发现和揭示它呢？当然，价值不是事物本身，同时，它又是事物所客观固有的东西，是“感性而又超感性的事物”，是事物的特殊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不是自然的，而是社会给予的。在交换价值中，人们的社会联系是脱离个人的差别和特点而存在的。物作为交换价值（商品），不是使人们联合，而是使人们分离的条件，更确切地说，是人们的这样一种联系的条件，这种联系同他们的个性、个人无关而纯粹抽象地存在着。与交换价值不同，价值是事物的这样一种社会特性，它同价值创造者的个人、个性是分不开的。因此，价值可揭示为一定的、客观存在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不是排斥人的个性存在，恰恰相反，而是以发达的人的个性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它不是抽象的关系，而是把作为个人的人们联系起来的非常具体的关系。

如果说，历史仿佛向我们展示了价值的客观演绎法，那么社会系统就表明了价值的等级、价值系统的相互渗透。建立科学的价值理论的困难在于，用于价值的概念和方法与用于物理对象的概念和方法是一样的，而价值并不是物理对象。当价值与自然科学所采用的时间概念进行对比考察时，这一点特别明显。在人文学科中，时间还是本着 19 世纪自然科学的精神去理解的。必须制定历史时间的特殊概念，这可能是建立价值理论的关键。与会者有人谈到改进一般价值理论的问题。有人认为，对于研究价值领域的方法论来说，克服心理主义，揭示价值关系中的非心理成分具有特殊意义。评价活动本身并不是纯粹心理的、心灵的过程，它是一种精神活动，而作为这种活动与心理活动不同，它具有对象的性质，它以对象为目的。有人认为，价值是特殊类型的实在，价值的存在方式有两个层次：现实的和潜在的。与价值存在的现实层次相联系的，是价值的未来定向性这种特性。这是暂时的、非固定的价值特性。然而正是这种特性使价值达到完整的整体，从而使它具有真实的状态。

二、价值领域的范畴。

价值论的基本范畴有：“应有”、“意义”、“规范性”。“应有”这个范畴反映了价值关系主体对理想的追求及实现理想的可能性。“意义”范畴使人们能够把观念的东西与物质的东西（其中包含了价值的自然因素）的联系具体化。“规范性”范畴揭示了价值关系在社会现实中的功能本性。文化的规范性质规定了价值关系主体在该文化系统中的自由。价值具有规范性质，不过，任何规范作为计量的独特单位，都是被人为地绝对化了的相对的东西，它执行绝对的东西的全部职能。这就是说，价值具有虚假的绝对性。这里表现出绝对的东西和相对的东西在价值论范畴中的辩证统一。作为哲学问题的规范性同作为精神病学问题的规范性本质上不同。在将规范性与异化现象的对比中，可以更深刻地阐明规范性的本质。从马克思的观点看来，不能认为异化是正常状态。但成为异化的东西并不意味着有某种心理缺陷或心理疾病。异化的人处于另一价值领域中，他受作为手段的价值的限制。规范性是情愿要作为目的的价值而不要作为手段的价值的一种价值秩序。

三、社会意识结构中的价值意识。

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本身，把评价标准的可靠性和整个评价反映的真理性的问题提到了首位。评价标准和评价反映的客观基础可以在某些类型的社会历史经验中找到：诸如人们作用于自然客体，并由他们创造准自然客体；超个人的（生产的、阶级的、民族的等等）和个人的人的关系。科学是精神生产的特殊形式，它以旨在满足人的内心需要的充满生机的、令人激动的活动为前提。人的本质力量在科学中得到表现，而由科学合成的知识，在历史上不仅必然成为关于自然的知识，而且必然成为关于人本身及其目的、切身利益和任务、人的活动途径和方法的知识。换句话说，科学发展成为社会过程进行合理的自我调节的因素，科学被纳入价

值系统。

至今仍未彻底克服的那种忽视人的世界，忽视社会、历史、社会认识的特殊性的倾向，以及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归结为历史发展天定论、绝对历史主义的观点，曾经妨碍了对价值问题的提出和探讨。历史同人类生活的客观方面直接有关，而忽视人的内在世界，忽视人的价值定向，的确，就不可能理解人类生活的客观方面。价值在历史哲学中的地位取决于此。

任何一个世界观体系中都表现出它的双重的指向性，即既想认识世界上现有的东西，又想认识世界上应有的东西的意愿。世界观的这两种功能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总是很复杂的。对什么是作为存在的世界这个问题的回答，在一个长时间内曾处在关于应有的东西的观念强有力影响之下。有时被思想家们当作世界的本体论图景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关系和反映这种关系的价值观念的折射。使真理适应于应当的东西这件事证明，在发现唯物史观以前绝大多数世界观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意识形态的发生要比科学早得多。马克思所提出的作为发展人的全部本质力量（把自身发展的完整性当作目的本身）的人类生活的理想，是组织那种真正合理的人类生活的理想。在确定了类本质是能够从事具有自由意识的、普遍的社会性质的合目的性活动之后，可以认为合理的理想是这样的生活：当人有意识地对给予他的自然材料和社会材料进行加工时，他是在按照确证其类本质的某种价值秩序的样式组织这些材料，用这些材料制成独特的、独一无二的统一体，从而达到个性存在的水平。

四、价值论思想史。

在西方，目前正试图把以传统为基础的价值定向返回到哲学议论中来。对康德哲学的巨大兴趣就是明证。力求使尼采哲学获得新的形象的意愿，可以说给人的印象最为深刻。尼采不是作为推翻有关资产阶级道德首先是基督教道德的传统规范的人，而是

作为新价值体系、新道德的预言家，生活的新含义的宣扬者被抬了出来，但是，尼采宣扬的生活的新含义是以——这一点特别为现代尼采主义者所推崇——素有的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意识具有高贵性为基础的。

俄国哲学史既是有关作为对普遍的东西的行为方式的思想的各种理论构成的历史，又是有关作为对意义（包括最普遍的东西的意义）的行为方式的思想的各种价值构成的历史，在历史的这些阶段上，哲学所取得的重要成就正是同思想在生活材料的价值方面的作用相联系的。在这方面，俄国哲学史为研究价值领域及其同知识和世界观的辩证联系提供了独特的材料。

H·恰夫恰瓦泽在闭幕词中指出，这次讨论会对于交流最近几十年来国内价值论研究的情况具有重要意义。它为论证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论提供了新材料，弄清了对一系列问题的看法和解释上的争论点。

原载苏联《哲学问题》1986年第9期

（毛卫平译 星汉校）

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①

〔匈〕卢卡奇·捷尔吉

组织问题虽然有时处于论争的中心地位（例如在讨论合并的条件时），然而是理论家们最不关心的问题。共产党的概念遭到所有机会主义者的反对和诽谤，被优秀革命工人本能地捡起来当作自己的东西，然而它却常常被看作纯粹的技术问题，而不是革命的最重要的精神问题之一。不是缺乏对组织问题进行这种理论上深入探讨的材料。第二次和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提纲、俄国党内的路线斗争和最近几年的实际教训，提供了过于丰富的材料。但是各国共产党（俄国党总是除外）的理论兴趣，似乎过多地被经济和政治形势问题以及它们的策略含义和理论基础所吸引。结果是似乎没有剩下任何真正生动的理论精力来研究共产主义理论中的组织问题。如果说在这个领域做了许多正确的事情，那更多地是由于正确的革命本能，而不是由于任何明确的理论见解。另一方面，有许多错误的策略观点（例如在关于统一战线的论争中），是从对组织问题的错误观点中产生出来的。

在组织问题上的这种“无意识”完全肯定是运动不成熟的象征。因为成熟还是不成熟的问题只能这样来判断，即看一种关于应做什么的见解在行动的阶级和领导它的党的意识中是以抽象和直接的形式存在呢，还是以具体和有中介的形式存在。就是说，当一个客观目标还在达不到的远处时，具有特别敏锐洞察力的观察者将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看到目标本身、它的性质和它的社会必然

① 《历史和阶级意识》包括八篇文章，其中有六篇是原先发表过的，只有《物化和阶级意识》和本文是专为这个集子撰写的。——译者注

性。然而，他们将不能够清楚地分辨会导致那个目标的具体步骤或是从他们无疑正确的洞察力中推断出的具体手段。

的确，空想主义者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应该作为出发点的形势。他们之所以是空想主义者，是因为他们把这种形势只看作一种事实，或至多是要求解决的问题，但未能认识到这个问题本身既包含着解决办法，又包含着导致解决办法的途径。例如，“他们认为贫困不过是贫困，他们看不出它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②这里强调的教条主义者和革命科学之间的对立比马克思所分析的情况更为广泛，是革命阶级的意识发展中的典型对立。当无产阶级沿着革命的道路前进时，贫困不再只是某种特定的东西，而是开始被包融到行动的活生生的辩证法中去。但是——根据阶级所达到的发展阶段不同——它会被别的现象所取代，无产阶级理论会按照非常近似马克思在这里所分析的结构来对待这些现象。要是以为，既然马克思已克服了乌托邦主义的最初的粗疏表现，革命的工人运动就把乌托邦主义完全克服了，那纯粹是幻想。

归根到底，这个问题同“最终目标”和“运动”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也就是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一回事。在革命发展的每一个决定性阶段它都要重新出现，只是形式更发展了，内容变化了。因为一个任务总是起初以抽象的可能性出现，以后才以具体的形式得到实现。只有在这第二个阶段达到时，在有可能看到那个注定成为环境及其实现途径的具体总体时，问题的提法是否正确才有讨论的意义。例如，在第二国际最初的论争中，总罢工是一种纯粹的乌托邦，只有通过第一次俄国革命和比利时总罢工才得到具体的形式。同样，只有经过多年尖锐革命斗争之后，工人委员会(苏维埃)才有可能摆脱它的乌托邦神话性质，不再被看作解决一切革命问题的灵丹妙药；经过多年以后，俄国以外的无产阶级才有可能看清它本来的真实情况。(我的意思不是说这个澄清过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22页。

程已经完成。事实上我对它非常怀疑。但是这里只是举工人委员会作例子，我不打算细谈。）

正是组织问题在这种乌托邦主义的昏暗中呆得最久。这决不是偶然的。大的工人党大多数是在这样的时期中成长起来的，那时革命问题只是被看作以理论方式发生影响而不是指导日常生活一切行动的问题。因此似乎没有必要以具体理论方式阐明革命的性质和可能的进程，以便推论出对无产阶级觉悟部分应该如何有意识地行动的要求。然而，如何组织革命党的问题只能从革命理论本身中有机地发展出来。只有当革命成为日常的问题时，革命组织的问题才会迫切要求进入群众及其理论家的意识。

而且即使在那时也只是逐步地进入。甚至当革命成为事实时，甚至当不可回避要立即对它采取立场时，就象在第一次俄国革命期间和以后那样，也没有产生出任何正确的见解。部分原因是机会主义已在无产阶级政党中深深扎根，使得不可能在理论上产生对革命的正确理解。但是甚至在不是这种情况的地方，甚至在对革命的动力有明确理解的地方，这种见解也不能够发展为革命组织的理论。阻碍这一点的，至少一部分是现存组织的不自觉的、理论上未消化的、仅仅“有机的”性质。

俄国革命明确地揭露了西欧组织形式的限制性。它们在群众自发运动面前的软弱无力，在群众行动和群众罢工问题上暴露无遗。对这种行动的“组织准备”概念所包含的机会主义幻想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已清楚地表明，这种组织总是一瘸一拐地落在群众的实际行动后面，不是促进而是阻碍这种行动，根本谈不上领导。

罗莎·卢森堡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看到了群众行动的意义，她的观点比这一批评更深刻得多。她认为传统组织观念的缺点在于它对群众的关系：“对组织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中的作用的过高估计或错误估计，往往伴随着对未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群众及其政治上的不成熟的轻视。”^③她自己的结论一方面导致她反对这种

^③ 罗莎·卢森堡：《群众罢工、党和工会》，第2版，第47页。

对组织的过分强调，另一方面导致她分析党的职能。她认为党的职能“不在于对群众罢工的技术性准备和指导，而首先在于对整个运动的政治领导”。④

这是在理解整个组织问题上向前跨出的一大步。由于剥掉了组织问题的抽象孤立性（由于纠正了“过高估计”组织的倾向），罗莎·卢森堡就使得有可能确定它在革命过程内部的真正职能。然而还必须再向前跨一步，从组织方面考察政治领导的问题。就是说，她应该阐明那些使无产阶级的党能够进行政治领导的组织因素。我们已在别的地方讨论过阻碍她跨出这一步的考虑。这里必须指出，这一步在前几年、即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关于组织的论争中已经跨出了。

罗莎·卢森堡很清楚地了解问题之所在，然而她在这个问题上站在落后的、阻碍发展的党（孟什维克派）一边。决非偶然，造成俄国社会民主党分裂的因素一方面包括对即将到来的革命的性质和由此产生的任务的理解（与“先进”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不然就站在农民革命方面进行斗争），另一方面包括组织问题。对俄国以外的运动具有灾难性后果的是，当时没有任何人（甚至包括罗莎·卢森堡在内）认识到，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不可分的辩证的统一体。结果没有抓住机会在无产阶级中广泛宣传革命组织问题，以便至少在思想上使无产阶级为未来事件做好准备（当时超出这一点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甚至罗莎·卢森堡、潘涅库克等人的正确政治见解，也未能变得足够具体——甚至作为政治思潮。用罗莎·卢森堡的话说，它们仍然是潜在的、纯粹理论上的，它们与具体运动的联系仍然带有乌托邦的性质。⑤

④ 同上书，第43页。关于这个问题以及下面将要讨论的其他问题，参看J·列瓦伊的一篇很有趣的文章《共产主义的自我批评和列维事件》，载《共产主义》第2期第15—16页。我当然在这里不能详细讨论他的结论。

⑤ 关于这种形势的结果，参看列宁对尤尼乌斯的小册子以及德国、波兰和荷兰左派在世界大战中的态度的批评（《反潮流》）。但是甚至斯巴达克纲领在它关于革命进程的概述中仍然包含有对无产阶级面临的任务的高度空想和抽象的说明。参看《关于德国共产党成立代表大会的报告》第51页。

组织是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中介形式。正象在每一种辩证的关系中一样，这一辩证关系的两项只有在这一中介中和通过这一中介才能获得具体性和现实性。组织在理论和实践之间进行中介的能力，最清楚地表现在它对各种不同思潮表现出比政治思想和行动的任何其他领域更大、更准确、更可靠得多的敏感性。在纯粹理论中，各种不同的观点和思潮可以和平共处，它们的对立只是采取讨论的形式，讨论可以在同一个组织中进行，而不必把这个组织炸毁。但是只要这些问题被赋予组织的形式，它们立刻就会变得尖锐对立起来，甚至彼此完全不能相容。

任何一个“理论”倾向或意见分歧，如果想要超出纯粹理论或抽象意见的水平，就是说，如果它真的想要为它自己的实现开辟道路，它就必须立即变为组织的东西。然而，要是以为每一种有组织的行动都能够成为各种对立意见的正确性、甚至它们之间的可相容性或不可相容性的真正可靠的标准，那也同样是错误的。每一种有组织的行动——就其本身而论——都是各种个人和集团的个别行为的纠结。把它或是解释成为在社会和历史方面有充分根据的“必然”事件，或是解释成为个别人“错误”决定或“正确”决定的结果，都同样是错误的。这种本身是混乱的感觉，只有在它的历史总体中来理解，才能获得意义和现实性。就是说，它必定拥有在历史过程中的职能，必须理解它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的中介作用。然而，从对未来的教训来看待有组织的行动，把它看作对问题“我们将怎么办？”的答案，这已经是从组织方面提出问题。这种问题的提法试图在对形势的估量中，在对行动的准备和领导中，找出那些必然地从理论导致最合适的行动的因素。因此它试图找出把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的本质决定因素。

很明显，真正有成果的自我批评，对过去“错误”的真正有成果的分析，只有按这种方式才有可能。关于事件是由“必然性”产生的观点导致宿命论；同样，空洞地假定个人的“错误”或熟巧是失败或成功的根源，又不能为未来行动提供任何有决定创造性的学说。

从这个观点看，这个或那个人处在这个或那个岗位上，犯这个或那个错误，等等，必然显得多少带有“偶然的”性质。发现这样一个错误，只不过表明当事人不适合于他的工作岗位。这个看法如果正确的话，不是毫无价值，但是对于本质的自我批评说来它只能是次要的。这种观点过分夸大个别人的重要性这一点，就表明它不能客观反映这些个人所起的作用以及他们如此决定性地和以特殊方式决定有组织的行动的能力，就表明它象客观宿命论看待整个过程那样宿命论地看待这些个人。但是如果问题涉及的不单是纯粹孤立和偶然的现象，如果假定个别人的正确或错误的行动不是对全部复杂事件没有任何影响，而且除此以外，即使认可就是这些人占着这些岗位等等，完全有理由研究他们行动的可能性的客观范围——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又再次进入组织领域。^⑥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注意把行动者联系在一起的一致性，研究它对这特定行动是否合适。就要问是否选择了正确的组织方法来把理论变为实践。

当然，“错误”可以出在理论中，出在对目标的选择或是对形势的估计中。但是只有侧重组织方面的分析才使得有可能从实践观点对理论进行真正的批评。如果理论和行动直接并列，而没有弄明白理论应如何影响行动，即没有明确表明它们之间的组织联系，那么对理论就只能从它自己内部的矛盾来进行批评。组织问题的这一方面使得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机会主义总是极其厌恶从任何理论分歧中推论出组织结论。

德国右翼的（社会主义）独立派和塞拉蒂的追随者对第二次代表大会规定的加入条件的态度、他们想把与共产国际的实质性分歧从组织领域转到“纯政治”领域的企图，就是从他们正确的机会———。

⑥ 在组织问题上进行的方法论上正确的批评的范例，可以举出列宁在俄国共产党第11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他在那里集中谈了经过考验的共产党人在经济问题上的失败，表明了个别错误的象征性质。很明显，这并没有改变他对个人的批评的尖锐性。

主义本能中产生出来的，因为在政治领域中分歧可以很长时期维持一种潜在的、不实际解决的状态，而第二次代表大会从组织上提出问题，则迫使立即作出明确决定。

然而这种态度决不是什么新东西。第二国际的全部历史充满着这种把各种各样事实上尖锐对立、相互排斥的观点综合在一个对它们全都公平对待的决定或决议的理论“统一”中的企图。结果不言而喻，这些决议不能为具体行动提供任何指导，总是模棱两可，可以让人做出各种不同的解释。正是因为第二国际在这些决议中有意回避了一切组织结论，它能够在理论上从事许多事情，而丝毫不感到必须在实践中和任何具体路线联系起来。例如，它可以通过非常激进的斯图加特战争决议，虽然在这个决议中没有采取任何一定具体行动的组织义务，没有关于应采取什么行动的组织方针，也没有关于这个决议是否能付诸实现的组织保证。机会主义少数派没有从它的失败中得出组织结论，因为它认识到，这个决议不会有任何组织结论。正因为如此，在国际垮台以后，所有的派别都能够引用这个决议。

国际中的所有俄国以外的激进派别的弱点是，当它们的革命立场与公开修正主义者和中派的机会主义发生分歧时，它们既不能够也不愿意给它们的革命立场以任何具体的组织形式。结果，它们的对手，尤其是中派，能够在革命无产阶级的头脑中抹掉这些差别。它们的反对立场丝毫没有妨碍中派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部分面前装扮成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捍卫者。这里不可能对中派在战前时期的统治地位做出理论和历史的解释。我们只想再一次指出，中派的态度之所以行得通，是因为在运动的日常生活中，革命和革命问题的反应不是迫切关心的事情。这种态度包括既反对公开的修正主义，又反对要求革命行动；理论上拒绝前者，但是并没有认真努力把它排除于党的实践之外；理论上肯定后者，然而又否定它在当前的迫切性。尽管如此，象考茨基和希法亭这种人还是能够坚持时代的一般革命性质，认为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虽然并不感到

必须把这种观点运用于当前的决策。

由于这个缘故，对无产阶级说来，这些意见分歧一直只是不管怎样仍然是革命的工人运动内部的意见分歧，不可能对各种不同派别进行明确的区分。然而这种缺乏明确性也对左派本身的观点产生反面。由于这些观点不可能与实践有任何交互作用，它们也不可能通过为了付诸实施而要求有成效的自我批评而使自己具体化或进一步发展。甚至在它们很接近真理的地方，它们也带有强烈的抽象乌托邦性质。例如，可以想一想在群众行动问题上潘涅库克与考茨基的论战。由于同样的理由，罗莎·卢森堡也未能进一步发展她关于革命无产阶级的组织是运动的政治领袖的正确思想。她对工人运动中的机械组织形式的正确反对，例如在党和工会之间以及有组织的群众和无组织的群众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使得她过高估计自发群众行动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她从未完全能够使她关于领导的观点摆脱纯粹理论和宣传的味道。

二

我们已经在别处说明过^⑦，我们讨论的决不只是这位重要的开拓思想家的偶然的东西或“错误”。在这个上下文中，这种论点的本质可以最好地概括为对一种“有机的”、纯粹无产阶级革命的幻想。机会主义的、“有机的”发展学说设想无产阶级会通过缓慢的扩展逐渐争取到人口的大多数，通过纯粹合法的手段获得政权，在反对这种机会主义理论的斗争中产生出了一种革命的“有机的”自发群众斗争理论。^⑧尽管这种理论的最优秀的维护者提出各种

⑦ 在《对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的批评意见》一文中。

⑧ 关于这一点，参看罗莎·卢森堡针对大卫以美因茨决议的论战，《群众罢工、党和工会》第59页，以及她关于合法主义的“圣经”即恩格斯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的论述，《在德国共产党成立代表大会上的纲领演说》第22页及以下几页。

聪明的保留条件，它最终还是意味着这样一种观点，即经济形势的不断恶化、由此必然产生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因此日益临近的革命群众斗争时期，会以社会和历史的必然性激起无产阶级的自发群众行动。在这过程中，领袖们关于革命的目标和方法的明确理解会得到充分证明。然而，这一理论默默地假定，革命将是纯粹无产阶级性质。

当然，罗莎·卢森堡对“无产阶级”概念范围的理解完全不同于机会主义者。她极其深刻地表明了革命形势将会如何动员迄今未组织起来的而且的确是组织工作达不到的广大无产阶级群众（农业工人等）。她表明了这些群众将会如何在他们的行动中表现出甚至比敢于傲慢地对待他们、认为他们不成熟和“落后”的党和工会高得无法比拟的阶级意识。尽管如此，她的这一概念仍然是建立在革命的纯粹无产阶级性质的基础之上的。按照这种概念，一方面无产阶级在战场上是统一的，另一方面，这里正在研究其行动的群众是纯粹无产阶级的群众。也只可能是这样。因为我们发现对革命行动的正确观点只能深深地固定在、本能地深深扎根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中，为了沿正确的道路进一步发展行动，只需要启发意识，只需要一种明确的领导。然而，如果其他阶层也决然地参加了革命，他们可能在一定的情况下推进它。但是他们也很容易使它偏向反革命的方向。因为在这些阶层（小资产阶级、农民、被压迫民族等）的阶级地位中，没有任何东西、也不可能有任何东西使他们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这样理解的党必然不能顺应这种阶层：无论是他们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前进运动还是他们的行动有助于反革命事业而形成的障碍，都会使它受挫。

这种党在与无产阶级本身打交道中也会受挫。因为它的组织符合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中的这样一个阶段，这时它只求使未被意识到的东西被意识到，使隐藏着的东西变得明确起来，等等。更确切地说，在这个阶段，获得意识的过程对无产阶级说来不意味着是一种可怕的内在意识形态危机。我们在这里不是要驳斥机会主义

者对无产阶级“不成熟”、从而不能夺取政权和维持政权的担心。罗莎·卢森堡在她与伯恩施坦的论战中已给了这种反对意见一个决定性的打击。

我们在这里的目的是指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并不是和客观经济危机平行，在整个无产阶级中以同样的方式发展的。无产阶级的大部分仍然在思想上受资产阶级的影响；甚至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也不能动摇他们的态度。结果是，无产阶级的态度、它对危机的反应远不及危机本身的激烈程度。^⑨

这种使得孟什维主义可能存在的状况，无疑不是没有客观的经济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早就已注意到，由于当时英国的垄断利益而获得比自己同阶级伙伴优越的地位的那些工人阶层已趋于资产阶级化。^⑩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这个阶层得到普遍发展，这毫无疑问是工人阶级中产生普遍趋向机会主义和反革命的思潮的重要因素。

然而按照我的看法，单是这一事实并没有提供关于孟什维主义的充分说明。首先，这一特权地位已经在许多方面被破坏了，而孟什维主义的地位却没有相应地削弱。这里也是无产阶级的主观发展在许多方面落后于客观危机的步调。因此，我们不能认为这一因素是孟什维主义的唯一原因，除非我们也同意它有这样一个舒适的理论地位，即从无产阶级没有彻底和明确的革命热情可以得出没有客观革命形势的结论。第二，革命斗争的经验决没有明确证明，无产阶级的革命热情和斗争意志以任何直接的方式与其不同部分的经济水平相符。这里对任何简单的、直接的平行性有

^⑨ 这个观点不简单地是所谓革命缓慢发展的结果。早在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列宁就曾表示担心，“斗争将十分迅速地展开，工人群众的意识会跟不上这种发展”。同样，斯巴达克纲领认为共产党不应该只是因为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民主”已经破产就去夺取政权，这个观点也是建立在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客观崩溃可以先于无产阶级革命阶级意识的确立的信念之上的。《关于德国共产党成立代表大会的报道》第56页。

^⑩ 在《反潮流》第516—517页上可以集中看到他们两人这方面的论述。

很大的偏离，而且在经济地位相同的工人阶层内部阶级意识的成熟性有很大的差别。

然而这些真理只有在非宿命论的、非“经济主义”的理论中有真正的意义。如果历史的发展被解释成这样，即资本主义的经济过程将通过一系列危机自动地和无情地向社会主义前进，那么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因素则只是一种错误诊断的产物。它们事实上只是表明，资本主义的客观上决定性的危机还没有出现。因为在这种观点看来，根本不能设想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落后于经济危机，不能设想有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危机。

如果对危机的观点在保留基本的经济宿命论的情况下成为革命乐观主义的东西，就是说如果认为危机不可避免，资本主义不可能有出路，那么情况不会有很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这里考察的问题也根本不能被看作是问题。只是以前是“不可能”，现在是“还没有”罢了。现在，列宁已非常正确地指出，没有任何一种形势是没有出路的。不管资本主义可能处于什么形势，总是会有某种“纯粹经济的”解决办法。问题只是这些解决办法从经济学的纯粹理论世界进到阶级斗争的现实中时是否可行。对资本主义说来，应急办法本身肯定是能想得出来的。然而，它们能否付诸实现却取决于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行动给资本主义堵住了危机的出口。自然，无产阶级在这时取得政权这一点，是由于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但是这些“自然规律”只是决定危机本身，赋予它一种使资本主义不能“和平”发展下去的规模。然而，如果让它们自由发展（在资本主义的意义上），它们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的简单崩溃或向社会主义的顺利过渡。它们会引起漫长时期的规模越来越大的危机、国内战争和帝国主义世界战争，然后导致“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和新的野蛮状态。

而且，这些力量在它们自己的“自然规律”驱使下，已创造出了这样一种无产阶级，它的肉体的和经济的力量使资本主义很少有可能按照以往结束危机的方式，强制实行一种纯粹经济的解决办

法，即无产阶级在其中只是作为经济发展客体起作用的解决办法。无产阶级的这种力量是客观经济“规律”的产物。然而，把这种潜在的力量变为现实的力量、使无产阶级（今天真的只是经济发展的客体，只是潜在地参与决定的主体）能够在现实中作为主体出现的问题，不再由这些“规律”以任何宿命论的和自动的方式决定。要确切地说，这些规律的自动的和宿命论的决定不再支配无产阶级力量的基本核心。既然无产阶级对危机的反应纯粹按照资本主义经济的“规律”进行，既然这些反应至多表明为自发的群众行动，它们表现出与革命以前时期的运动在许多方面相似的结构。这些反应自发地爆发（一个运动的自发性只是它由纯经济规律决定这一事实的主观的、群众心理上的表现），几乎毫无例外地是作为对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有时也是政治上的进攻的自卫，作为对资产阶级为危机寻求“纯经济”解决办法的自卫。然而，当它们的直接目标达到了或者看来不可能达到了，这种爆发就同样自发地停止，逐渐消失。因此，看来好象是它们完成了自己的“自然的”进程。

如果这些运动不是抽象地，而是放在它们的真正环境中、放在世界危机的历史总体性中去考虑，那么这种现象带有欺骗性就很明显了。这种环境就是危机扩展到一切阶级，而不仅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经济发展在无产阶级中引起自发群众运动的地方，社会作为整体基本稳定的形势和发生一切社会力量的深刻重新组合、统治阶级的权力基础遭到动摇的形势之间有根本的质的差别。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理解非无产阶级阶层在革命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和理解它的非无产阶级性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少数人的统治只有在它设法使不受革命直接影响的各阶级在意识形态上跟着革命走的时候才能维持下去。它必须设法获得它们的支持或者至少是中立。（不言而喻，也必须设法使革命阶级本身的某些部分保守中立。）

对资产阶级说来特别是如此。资产阶级直接掌握的实际权力远远少于过去时代的统治阶级（例如希腊城邦的公民或者封建制

度鼎盛时的贵族)。一方面，资产阶级必须更严重得多地依赖与在它之前掌权的阶级修好或妥协的能力，以便利用它们控制的权力机关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另一方面，它不得不把实际权力(军队、下级官僚机构等)交给小资产阶级、农民、被压迫民族的成员等。如果这些阶层的经济地位在危机之后发生变化，如果它们对资产阶级领导的社会制度的幼稚的、浅薄的忠诚遭到动摇，那么资产阶级的全部统治机构可以说一下子就会垮台。那时，无产阶级就可能不打一次认真的仗，不真正获得一次胜利，而作为唯一有组织的力量，作为胜利者出现。

这些中间阶层的运动是真正自发的，而且只是自发的。它们真正只不过是盲目地按“自然规律”起作用的社会自然力量的果实。作为这样一种情况，它们本身在社会意义上是盲目的。这些阶层没有任何可能影响整个社会改造的阶级意识。^⑩ 因此它们总是代表特殊的阶级利益，甚至从不假装代表整个社会的客观利益。客观上把它们与整体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只是因果性的，就是说，它们只是由整体内部的运动造成的，而不能被用去改变整体。因此它们与整体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所采取的意识形态形式都带有偶然的性质，即使它们的产生可以按因果必然性来理解。由于这些运动的性质，它们的行动是由它们本身之外的因素决定的。不管它们最终选择什么方向，它们是否试图加快资产阶级社会的崩溃，它们是否默许资产阶级对它们的剥削，它们是否因努力无效又重新陷入消沉，它们所做的一切都不是在这些运动本身的内在本质中预先确定了的。相反，一切都取决于能够意识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行为。不管它们后来的命运可能采取什么形式，这种运动的爆发本身能够很容易导致把资产阶级社会维系在一起并使之运转的全部机器陷于瘫痪。这足以使资产阶级至少在短期内失去行动能力。

^⑩ 参看《阶级意识》一文。

从法国大革命以来的一切革命越来越清楚地表现出这种格局。当革命爆发时，专制君主制以及后来中欧东欧的资产阶级经济垄断建立在其上的半专制半封建的军事君主制往往“一下子”失去它们对社会的控制。社会权力被扔在大街上，无人过问。只有在没有任何革命阶级利用这种无主的权力的情况下，复辟才有可能。

新生的专制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格局。因为在那，相互斗争的各阶级能够更直接得多地从它们自己的队伍中建立权力机关，因此阶级斗争也更直接得多地是一种权力反对另一种权力的斗争。例如，可以回想一下法国专制主义诞生时福隆德派的斗争。甚至英国专制主义的垮台也走了类似的道路，而护国公执政和甚至更资产阶级化得多的路易十四专制主义的崩溃则更接近于现代革命的方式。那里从“外部”，即从还完好的专制国家或从仍然实行封建制的领土（如旺代省）上搬来了直接的权力。

相反，纯粹“民主的”权力综合体在革命进程中可能很容易处于类似的地位：它们在崩溃时刻几乎是自己产生出来，掌握了一切权力，而现在，它们由于那些支持它们的各种错综复杂阶层的后退运动同样突然地被夺去一切权力。（例如克伦斯基和卡罗尔伊。）这种发展在西方资产阶级先进民主国家中将如何进行，还不能完全清楚地看出。尽管如此，意大利从战后直至大约 1920 年处于一种非常类似的地位。它从那时起为自己创立的权力组织（法西斯主义）是一种相对独立于资产阶级的权力机关。我们还没有看到崩溃征候在有大量殖民地的高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影响。特别是，我们不知道殖民地的起义对小资产阶级、工人贵族（从而武装力量等）的态度将有什么影响，这种起义在某种程度上起着国内农民起义的作用。

结果无产阶级处于一种会使得自发群众运动获得与在稳定资本主义制度下完全不同职能的社会环境。即使这些群众运动在孤

立考察时保有它们以前的特征也是一样。然而，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在相互对立的各阶级的地位中产生了非常重要的质的变化。首先，资本集中得到进一步发展，这反过来又引起无产阶级的进一步集中——即使后者在意识上和组织上不能完全跟上这种发展。其次，资本主义的危机四伏的状况使得越来越难以通过微小让步摆脱来自无产阶级的压力。只有通过加强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才有可能逃脱危机，找到对危机的“经济”解决办法。由于这个缘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策略提纲非常正确地强调指出，“每一次大罢工都有变为国内战争和直接夺权斗争的倾向”。

然而只是倾向。这种倾向即使在经济和社会前提往往充分具备的情况下仍然没有变为现实——**这正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危机**。这种意识形态危机一方面表现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客观上极端危险的处境在工人们的头脑中还具有它昔日的一切稳定性；无产阶级在许多方面还受到资本主义的思维和感觉方式的严重束缚。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化在孟什维主义的工人党以及受这些党控制的工会中获得了自己的组织形式。这些组织现在有意识地设法使无产阶级的仅仅自发的运动（它们取决于直接的诱因并且按行业、地域等分割开）停留在纯粹自发的水平上。它们极力阻止这些运动向总体性发展，无论是在行业、地域等的联合上，还是在经济运动和政治运动的结合上。在这方面，工会的职能是使运动原子化和非政治化，掩盖它和总体的关系，而孟什维主义的党的任务则是使无产阶级意识中的物化在意识形态上和组织上固定下来。它们这样就确保无产阶级的意识停留在相对资产阶级化的一般阶段上。它们能够完成这一任务，只是因为无产阶级处于一种意识形态危机的状况中，因为在意识形态上向专政和向社会主义的自然发展甚至在理论上对无产阶级说来都不可能，因为危机不仅在经济上破坏资本主义，而且同样使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在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发生变化。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变化的确是由于经济危机以及由它创造

的夺取政权的客观可能性而产生出来的。然而它的实际进程并不是以任何自动和“必然”的方式与客观危机本身的进程平行发展的。这种危机只能由无产阶级的自由行动来解决。

列宁以一种只是从形式上、而不是从实质上嘲讽的方式说道，“以为有一支队伍在一个地方排好阵式，喊道：‘我们赞成社会主义’，而另一支队伍在另一个地方排好阵式，喊道，‘我们赞成帝国主义’——以为这种形势就是社会革命，那是迂腐可笑的。”^⑩革命阵线和反革命阵线的产生充满了各种变化，往往极端混乱。今天为革命工作的力量完全可能明天转向相反的方向。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方向的变换决不简单地和机械地取决于有关阶层的阶级地位或甚至意识形态。它们受到与历史形势和社会力量的总体的不断变化的关系的决定性影响。所以，如果说某位凯马尔巴夏在一定条件下代表一种革命势力，而某个庞大的“工人党”则可能是反革命，那决不是什么奇谈怪论。

在这些决定方向的因素中，无产阶级对自己历史地位的正确理解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1917年的俄国革命进程是这一点的经典例证。因为我们在那里看到，在关键时刻，和平、自决权和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口号如何把动摇不定的阶层熔铸成一支革命所需要的军队，完全瓦解了反革命的全部权力机构，使之丧失活动能力。如果反对说，土地革命和群众的和平运动没有共产党或甚至和共产党对抗也能胜利完成，那是不够的。首先，这一点绝对无法证明；作为反证我们可以举出匈牙利，那里有一次同样自发的土地运动在1918年10月遭到了失败。甚至在俄国，也有可能通过所有“有影响的”“工人党”的“统一”（即反革命的统一）把土地运动镇压下去或让它自行消失。其次，如果这“同一个”土地运动是和城市无产阶级对抗而得到实现的话，那么它在社会革命方面将带有反革命性质。

^⑩ 参看《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22卷第350页。

单是这个例子就已经表明，用机械的宿命论的标准来判断在社会革命的尖锐危机形势中的社会力量组合是多么愚蠢。它表明了，无产阶级的正确观点和正确决心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危机的解决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无产阶级本身。我们还应该指出，与西方国家相比，俄国的形势是相当简单的。那里的群众运动更多地带有纯粹自发性质，相互对立的力量没有任何深深扎根传统的组织。因此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我们的分析在更大程度上适用于西方国家。更何况俄国的不发达性质、缺乏工人运动的长期合法传统（如果我们暂时忽略一个完备的共产党的存在的话）使得俄国无产阶级有可能更快地克服意识形态危机。^⑬

因此，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把社会的命运交到了无产阶级手中。恩格斯把人类在革命实现以后完成的过渡描写为“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⑭。对辩证唯物主义者来说这是不言而喻的：尽管这个飞跃是一个飞跃，或者正因为这是一个飞跃，它必须在本质上是一个过程。恩格斯本人不是在刚才提到的那段话中说，导致这一方向的变化是“在日益增长的程度上”发生的吗？唯一的问题是决定这一过程的起点。当然最容易的是从字面理解恩格斯，把自由王国看作只是将在社会革命完成后产生的状态。这就要否认这个问题具有任何现实性。只是要问，问题是不是真的就仅仅止于这个无疑符合恩格斯字面意义的提法呢？一个状态如果不是由一个漫长的过程准备起来，如果它的各种因素不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即使是以在许多方面很不完备、需要经受一系列辩证变化的方式），这个状态是不是能够想象，更不用说能够成为社会现实呢？如果我们把“自由王国”和注定使它产生出来的过

^⑬ 这并不是说，就俄国而言，这个问题已最终解决了。相反，只要还有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它就会存在。但是在俄国将采取与欧洲不同的（大概是较弱的）形式，以符合那里资本主义的思维和感觉方式对无产阶级的影响较弱的情况。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266页）。

^⑭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3页。

程截然分开，如果我们从而把一切辩证的过渡都排除在外，我们是不是会陷入一种与上面已经分析的把最终目的和运动分开类似的空想观点呢？

然而，如果把“自由王国”与导致它的过程联系起来考察，那么毫无疑问，无产阶级在历史舞台上的最初出现就已经表明了对它的向往——自然是以完全无意识的方式。不管无产阶级的最终目标是如何不能——甚至在理论上——直接影响这个过程开头的个别阶段，然而它是一个原则，一个统一的因素，因此决不可能与这个过程的任何方面完全分开。然而不应该忘记，进行决定性战斗的时期和以前的时期之间的差别并不在于战斗本身的规模和激烈程度。这些量的变化只是表明这些战斗与以前的战斗之间有根本质的差别的征候。在以前的阶段上，用《共产党宣言》的话说，甚至“广大工人群众的团结，还不是他们自己联合的结果，而是资产阶级联合的结果”。然而，无产阶级这种成为独立、“组织成为阶级”的过程在越来越高的阶段上重复着，直至资本主义最终危机来临的时候，也就是越来越多地由无产阶级掌握决定的时候。

这种状况决不意味着客观经济“规律”不再起作用。相反，它们在无产阶级胜利很久以后仍将有效，它们象国家一样，只有在完全由人类控制的无阶级社会实现以后才会消亡。现在的形势中的新东西只是一只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盲目力量在驱使社会走向深渊。资产阶级不再有力量帮助社会在短暂的动摇之后打破由它的经济规律所造成的“僵局”。无产阶级拥有通过有意识地利用现存趋势使发展走上另一方向的可能性。这另一方向就是有意识地调节社会的生产力。有意识地要这样做，就是希望有“自由王国”，就是为实现它采取第一个有意识的步骤。

这一个步骤是由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中“必然”产生的。然而，这一必然本身带有飞跃的性质。^⑩对整体的实际关系、理论

⑩ 参看《历史唯物主义的变的职能》一文。

和实践的真正统一，迄今为止只是所谓无意识地出现在无产阶级的行动中，现在明确地和有意识地表现出来。在发展的早期阶段，无产阶级的行动也常常以一系列飞跃的方式被驱向一个顶点，它们与以前的发展的联系和连续性只是在后来才能变得有意识，并被看作是那一发展的必然产物。（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 1871 年公社的国家形式。）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必须有意识地采取这一步骤。所以毫不奇怪，所有囿于资本主义思维方式的人都不敢采取这一步骤，他们以他们的全部思维力量紧紧抓住被他们看作自然规律、看作现象“重复规律”的必然性。因此，他们也拒绝任何崭新的、我们还不可能有任何“经验”的东西，认为这种东西不可能产生出来。托洛茨基在与考茨基的论战中最明确地强调指出了这种差别，虽然以前在关于战争的论争中已经有所触及：“因为最根本的布尔什维克偏见正是在于认为，只有牢牢地坐在马背上时才能学会骑马。”^⑩但是考茨基以及与他类似的人只有作为事态的象征才具有意义：他们是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危机的理论表现，他们象征着工人阶级正处在这样一个发展时刻，这时它“又一次在自己目的的模糊庞大面前退缩”，对自己必须承担的任务表示踌躇。如果无产阶级不想分享资产阶级的命运，并在趋向崩溃的资本主义的危机中屈辱地和痛苦地死去，它就必须以充分有意识的方式完成这一任务。

三

如果说孟什维主义的党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危机的组织形

^⑩ 《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第 82 页。托洛茨基反对考茨基的论战在政治领域中重複了黑格尔反对康德认识论的基本论据（自然不是在哲学意义上），我认为决不仅仅是偶合。参看《黑格尔全集》第 15 卷第 504 页。顺便说一下，考茨基后来说，资本主义的规律无条件地适用于未来，即使对发展趋势不可能达到具体的认识。参看《无产阶级革命及其纲领》第 57 页。

式，那么共产党就是对这种飞跃的有意识态度的组织形式，从而是走向自由王国的第一个有意识的步骤。我们已经阐明了自由王国的一般概念，说明了它的接近决不意味着经济过程的客观必然性突然之间不再起作用。现在我们必须更仔细地来考察自由王国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

有一点首先必须弄清楚：这里的自由并不是指个人的自由。这不是说，充分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将不知道任何个人的自由。相反，它将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严肃对待这种自由并使它成为现实的社会。然而，甚至这种自由也决不会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家今天所想象的那种自由。为了获得真正的自由所必要的社会前提条件，必须进行斗争，在这过程中，今天的社会连同它所产生的那种人将会消失。

马克思说道，“现在这一代人，很象那些由摩西带领着通过沙漠的犹太人。他们不仅仅要夺取一个新世界，而且要退出舞台，以便让位给那些善于对付新世界的人们。”^⑦因为现在活着的人们的“自由”是由于本身被物化、同时又使人物化的财产而孤立的个人的自由。这是一种与其他（同样孤立的）个人对立的自由。一种利己主义、自我封闭的自由，一种把团结和联系至多只看作不起作用的“调节思想”的自由。^⑧要给这种自由注人生气，就意味着在实际上拒绝真正的自由。孤立的个人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或内在气质、不管对别人发生什么情况而可能获得的这种自由，在实际上就意味着，只要当代的社会取决于个人，它的不自由的结构就将永存下去。

对自由王国的有意识的要求，只能意味着有意识地采取将真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68页。

^⑧ 参看康德和费希特的伦理学的方法论；这种个人主义在实际阐述中是被相当淡化了的。但是，例如费希特强调，（在他的体系中）“限制你的自由，使你的邻居也能自由”的提法（与康德的提法极为相近）没有绝对的效准，而只有“假设的”效准（《天赋人权的基础》第4章第7节，新版《全集》第2卷第93页）。

正导致它的步骤。鉴于在当代资产阶级社会中，个人自由是建立在他人不自由的基础上的单方面特权，因此只能是腐败的和腐蚀人的东西，这种要求必须意味着拒绝个人自由。它意味着有意识地使自我从属于那注定要真正实现真正的自由、并且今天正在为实现它而认真地采取最初一些艰巨的、无把握的和试探性的步骤的集体意志。这个有意识的集体意志就是共产党。它象辩证过程的每一方面一样，它也包含着——自然只是以萌芽状态、以粗糙的、抽象的和不发展的形式包含着适宜于它注定要实现的目标的决定因素，即与团结统一在一起的自由。

这里的统一因素是纪律。只有通过纪律，党才能够把集体意志付诸实现，而接受资产阶级的自由概念阻碍这种集体意志的形成，并把党变成一个没有行动能力的、松散的个人集合体。更重要的是，甚至对个人来说，也只有纪律使得有可能采取那导致今天已可能的自由的第一个步骤，这种自由虽然还很原始，但符合社会发展的阶段。这是那种致力于克服现在的自由。

任何共产党按其本质都是比任何资产阶级政党或机会主义工人政党更高类型的组织，这表现在它对它的个别成员的要求上。这一点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一次分裂时就已表现得非常清楚。对孟什维克说来（和对任何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说来一样），简单地承认党纲是入党的充分条件，而对布尔什维克说来，入党意味着积极地亲自参加革命工作。党的结构的这一原则在革命进程中没有改变。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组织的提纲说道：“承认共产党纲领只是表示成为共产党人的意愿……认真实现纲领的第一个前提条件，是一切成员应该参加经常的、日常的合作。”当然，在许多情况下这个原则直到今天只是停留在纸面上。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它的根本重要性。因为，正象自由王国不可能一下子、在某种程度上作为 *gratia irresistibilis*（不可拒收的礼物）赠送给们一样，正象“最终目标”不是简单地在过程以外的某个地方等待着我们、而是寓于过程之内的每个具体阶段上一样，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

意识的革命形式按本性说来也是一种过程。罗莎·卢森堡非常清楚地看到了，“组织必须作为斗争的产物产生出来”。她的错误只是在于过高估计过程的有机性质，过低估计有意识组织的重要性。

但是，既然我们已看到这一错误的实质，就不应矫枉过正，以致忽略组织形式中的过程因素。尽管俄国以外的党（因为有俄国的经验可资借鉴）从一开始就完全了解组织的原则，让它们的组织措施模糊它们产生和成长的过程性质将是错误的。组织措施的正确可以极大地加快过程；可以为澄清意识提供极大的帮助，因此是任何组织存在的必不可少的前提。然而，共产党的组织只有通过斗争才有可能建立起来，只有每一个成员通过亲身经验认识到这种统一形式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之后才有可能实现。

因此，重要的是自发性和有意识控制的交互作用。就其本身而言，这在组织的历史上不是什么新东西。相反，这是新组织形式产生的典型方式。例如，恩格斯描写了某些军事行动的形式在士兵的本能中作为对形势的客观要求的反应自发地产生出来。^⑩发生这种情况时，并没有任何理论上的准备，还常常和流行的理论、因此也和既存的军事组织相冲突。尽管如此，这种军事行动的形式流行开了，只是后来才在组织上被固定下来。

共产党形成过程中的新东西是自发行动和有意识的理论预见之间的新关系，是不断反对资产阶级的物化的“直观”意识的纯粹 post festum（事后）结构和这种结构的逐渐消失。这种改变的关系是基于在这个发展阶段上，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已经有不再是仅仅事后认识自己的阶级地位以及与之相应的正确行动路线的客观可能性。尽管对于每个个别工人说来，由于他自己的意识被物化，获得客观上可能的阶级意识以及他能用以消化这种阶级意识的内在态度的道路必须通过他事后对自己的直接经验的领会过程，就是说在每个人中仍然保留着意识的事后性质，情况依然

^⑩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07—209页。

是如此。个人意识和阶级意识之间的这种冲突在每个个别无产者身上决不是偶然的。因为共产党在这里表明它有两点优越于所有其他的党组织：第一，有史以来第一次，阶级意识的能动和实践方面直接影响所有个人的具体行动；第二，同时它有意识地帮助决定历史过程。

能动性的这种双重意义——它同时既对体现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个人又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也就是人和历史之间的具体中介——是现在正在诞生的组织的决定性特征。在旧的类型的党组织中（不管这里是否包括资产阶级政党或机会主义的工人政党），个人只能作为“群众”、作为追随者、作为零出现。马克斯·韦伯给这种类型的组织下了一个恰当的定义：“它们的共同点是：掌握着能动领导权的核心加上一些基本上起较被动作用的‘成员’，而广大成员只起客体的作用。”^⑩ 他们的客体作用并没有因为形式上的民主、因为在这些组织中得到承认的“自由”而有所减少；相反，这种自由只是使它得以固定和继续存在。这种“虚假意识”，这种在客观上不可能借助有意识行动干预历史进程，在组织上反映出来就是不能建立起能在每个成员的行动和整个阶级的行动之间起中介作用的能动政治单位（政党）。因为这种阶级和政党在客观历史意义上不是能动的，因为它们表面上的能动性只是它们由它们不理解的历史力量宿命论地产生出来的反映，它们必定表现出从物化意识的结构中、从意识和存在、理论和实践的分离中产生出来的一切征候。这就是说，作为总体看，它们采取一种对发展进程纯粹直观的立场。

与此相适应，必然同时出现两种互为补充但同样错误的关于历史进程的观点：唯意志论地过高估计个人（领袖）的能动意义和宿命论地过低估计阶级（群众）的意义。党被划分为能动的部分和被动的部分，后者只是偶尔而且只是按照前者的命令起作用。所

^⑩ 《经济和社会》第169页。

以，这种党的成员所拥有的“自由”，只不过是多少处于外围的而不是全身心参加的观察者对宿命论地展开的事件或个人的错误作出判断的自由。这种组织永远不能占有其成员的全部身心，甚至不可能作出这种努力。这些组织象文明的所有社会形式一样，是建立在精确的、机械的分工、官僚化以及权利和义务的确切划分之上的。成员们只通过他们存在的抽象理解方面与组织发生联系，而这些抽象的联系则体现为权利和义务。^②

一个组织的所有成员真正积极的参加一切事件、采取真正实际的态度，只有投入全身心才有可能做到。只有当一个共同体内部的行动成为每一个参加者最关心的个人事情时，才有可能消除权力和义务的分裂这种人与他自己的社会化分离以及他被控制他的社会力量肢解的组织表现形式。恩格斯在描写氏族的结构时特别强调这一点：“在氏族制度内部，权利和义务之间还没有任何差别。”^③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权利关系的特征是，“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的尺度”，但是必然不同等的个人“要用同一的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他们……再不把他们看做别的什么，把其他一切都撇开了”。^④

因此，与这种方式、这种撇开人的整体个性、把它归入一个抽象观点的做法决裂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都是为结束人的意识的物化而采取的步骤。然而，这样的步骤必须以整体个性的积极投入为前提。因此完全清楚，资产阶级组织中的自由形式只不过是一种关于实际不自由的“虚假意识”；就是说，是这样一种意识结构，即人在其中从一种形式自由的立场观察他自己被融入一种异己必然性体系的情况，并把这种观察的形式自由与真正的自由混淆起来。

^② 在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组织提纲中，可以看到对这些类型的组织的很好描述（第2节第6点）。那里把这些组织和资产阶级国家的组织作了恰当的比较。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55页。

^④ 同上书，第3卷第12页。

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才能解决我们前面的论断表面上的自相矛盾。我们在前面曾说，共产党的纪律、每一个成员无条件的全身心的投入运动实践，是实现真正自由的唯一可能途径。不仅整个运动只有借助这种组织才能获得达到这种自由的客观社会前提的杠杆，而且对单个人、对党的单个成员来说也是如此，他只有通过这种办法才能希望为他自己获得自由。

因此，纪律问题一方面是党的基本实践问题、它真正发挥职能所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它决不仅仅是技术和实践问题；它是革命发展中最崇高和最重要的精神问题之一。这种纪律只能作为革命阶级的最觉悟部分即先锋队的自由的和有意识的行为，才能够产生出来。没有这个阶级的思想前提，它不可能实现。没有每个党员对整体性格和党的纪律之间的联系的至少本能的理解，这种纪律就必然蜕化为一种物化的和抽象的权利义务体系，党就会重新陷入资产阶级政党类型的组织状况中。因此很明显，在客观上，组织将极其敏感地对理论观点和思潮是否有革命价值作出反应。在主观上，革命组织必须以很高度的阶级意识作为前提。

（待续）

杜章智根据《历史和阶级意识》
1976年卢西特汗特德文版和
1972年麻省英文版译出

作为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哲学 批判者的卢卡奇·捷尔吉

〔苏〕T·И·奥伊则尔曼①

杰出的匈牙利哲学家、文学理论家、美学家、社会活动家、本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著名代表卢卡奇·捷尔吉在1985年4月过了诞辰100周年。

匈牙利哲学家的这个纪念日，社会主义各国哲学界进行了广泛的庆祝。在匈牙利和民主德国，为研究他的创作举办了大规模的学术会议。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举行了专门的学术会议，邀请了匈牙利的著名哲学家参加。西方也对这个日子表现了浓厚的兴趣。

对卢卡奇的周年纪念这样关心，决不是偶然的。在本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发展中，他的出现不仅是个很重要的现象，而且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非单义的、自然也是引起（而且还在继续引起）尖锐争论的现象。他的哲学观点的发展也很复杂，充满矛盾。他的早期著作中有许多论点他后来自己进行了批判，然而这些论点对赫·马尔库塞和法兰克福学派其他成员的形成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而且在以后的几十年中，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批评者和小资产阶级“拥护者”们还一再回到这些论点上来。卢卡奇的后期著作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了极为尖锐的讨论和评价。

卢卡奇著作的矛盾性，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客观的复杂性，由

① 作者是苏联著名哲学家，科学院院士。——译者注

于他所提出的那些对确立马列主义世界观极为重要的问题没有得到足够的研究。卢卡奇在企图解决这些问题时，表现出了极为渊博的学识、进行多学科综合分析的能力和对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绝对忠诚。但是这位匈牙利哲学家没有能够避免错误，没有能够克服对纷繁复杂的科学和思想材料进行分析和评价时的一切困难。

可是，正象按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发表的《纪念卢卡奇·捷尔吉诞辰100周年提纲》中指出的那样，他“作为共产党人成长为一位不断同自己的失误进行斗争、为着马列主义思想的本质而斗争的科学家、思想家”。这一点最充分地表现在卢卡奇对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哲学进行批判的著作中。这些著作不仅是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一些最有影响的思潮最广泛和深刻的分析，而且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著述中对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哲学的深刻的、最有份量的评述。在这些著作写成之后过了三十多年的今天，它们还不仅保存着自己的现实性，而且迫使哲学史家更深刻地思考自己研究的方法论原则、首先是在哲学史过程研究中的历史主义观点。

例如，马列主义的哲学史研究不能不估计到哲学的现状，不管研究者与它所研究的时代相隔多远。因为哲学的过去并不在时间之流中消逝；它在每个新的历史时代中重新出现。被重新解释、重新思考、被发展并且纳入新的观点体系中。对资本主义形成和确立时代的哲学学说的研究，由对当代反动资产阶级哲学的批判分析而得到新的推动。但是更重要的，是在研究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哲学时回头看看资产阶级哲学发展的历史进步时代。因为唯心主义哲学思维的最新变种，是在一定程度上抛弃了古典哲学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加深了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哲学中就已经存在的那些反动倾向。

列宁的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对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哲学进行完整的、估计到历史联系多样性的马克思主义研

究的伟大典范。它的特点是把最初发展阶段的现代主义唯心主义哲学——马赫主义、经验批判主义等——与古典的、但决非进步的哲学学说加以比较。列宁强调指出，资产阶级哲学的古典作家并不企图回避哲学上的分野、在折衷主义的庇护下躲过进行哲学选择的必要性。他们毫不妥协地把主要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哲学派别相互对立起来。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完全是另一种做法。他们在反对唯物主义的同时表现为唯心主义的敌人，自以为克服了哲学基本问题所确定的分野。但是实际上，他们只是革新了唯心主义，用它的改变了的形式来与古典唯心主义学说对立起来。

列宁极其明确和深刻地揭示了马赫主义和19世纪末其他唯心主义学说与资本主义社会走向没落的发展之间的客观联系。但是他也研究了马赫主义思潮的理论的、与非哲学知识的发展有直接联系的来源，以及这一模仿的、然而被许多同时代人看作哲学上的真正新成就的学说产生影响的原因。这些来源就是19和20世纪之交的物理学的方法论危机，古典力学借以发展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危机，特别重要的是机械唯物主义根本不足以从世界观上理解物理学领域的新的杰出发现。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列宁用辩证唯物主义不仅与唯心主义而且与已经过时的机械唯物主义对立起来，列宁后来在《哲学笔记》中所提出的原则，即辩证的唯心主义比陈旧的、机械的唯物主义更接近辩证唯物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就已经有所表现了。

列宁分析帝国主义时代唯心主义哲学的方法、列宁要求对唯物主义各种历史形式也进行批判分析的哲学党性原则，鼓舞着卢卡奇写成了哲学史巨著《存在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1948年）和《理性的毁灭》（1954年）。这两部著作不仅是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一些最有影响的流派的最广泛深刻的分析，而且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著述中对整个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哲学的深刻的、最有份量的评述。

卢卡奇在确定作为他的研究的出发点的原理时，说明了列宁批判马赫主义的原则的方法论意义。“列宁对马赫主义进行的认识论的批判带有根本性，对帝国主义时代所有其他哲学流派都有意义……以为列宁的批判只适合于马赫主义，后来的资产阶级哲学已经克服了列宁所批判的观点，那就大错特错了。”^②这一论点是直接针对当代资产阶级哲学妄想贬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意义的企图的，卢卡奇在阐述这个论点时表明了：列宁所揭露的妄图在哲学中发现新的、排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立的“第三条道路”的做法，在帝国主义时代全部资产阶级哲学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这种做法最明显地表现在假装放弃唯心主义、故意令人注目地批判唯心主义（但是是从唯心主义的立场！）。一些历史上声名狼藉的唯心主义派别被代之以否认物质和精神之间、主观和客观之间对立的理论。这样来试图消除使得必须在原则上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认识论绝对命令。正如卢卡奇公正地指出的，“实际上，自然一切都只不过是革新唯心主义、制造反对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新斗争形式”。^③卢卡奇表明了，正是列宁系统地驳斥了哲学中“第三条道路”的概念，而且就在这一概念刚刚在历史舞台上出现的时期。在资产阶级哲学以后的发展中，想要发现新的、“第三条道路”的企图越来越多，这一事实令人信服地证实了列宁批判分析的杰出意义。例如，不管E·胡塞尔的现象学和J·-P·

② 卢卡奇，《存在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1951年柏林版第132页。卢卡奇这一论点的现实性可由这一事实表明，即当代资产阶级哲学家还依旧把马赫主义解释成哲学中的创新流派，企图以此贬低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杰出作用，它对批判分析当代资产阶级哲学的原则意义。例如，接近新托马斯主义的美国哲学家E·斯密特断言：“当代的物理学、20世纪的物理学之所以达到了杰出成就，主要是由于它按照马赫的主张，使思想落实到世界的可用感觉观察到的方面上”（《思想——今天的人》1950年密尔沃基版第196页）。另一个美国哲学家E·纳格尔对最新的实证主义概念与马赫主义的思想亲缘关系闭口不谈。关于列宁这部著作， he说道，“这本书中所包含的论战，与西方哲学的现状再没有直接关系”（《没有形而上学的逻辑学》1956年纽约版第393页）。

③ 卢卡奇，《存在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第128页。

萨特或M·海德格尔的“无神论”存在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马赫主义及其他唯心主义经验主义变种有多大的差别，它们都同样具有在哲学中继续走“第三条道路”、凌驾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似乎片面的对立之上的反动空想愿望。

卢卡奇遵照列宁的方法论原则，给自己提出了高度重要的研究任务：揭示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哲学的起源、考察它的发展的基本阶段、揭露它的反动内容——这种反动内容的极端表现就是法西斯主义的仇视人的世界观、它的种族主义的历史哲学和反理性主义的神话。这位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者用他的一系列著作首先是获得广泛承认的巨著《理性的毁灭》，来解决这个任务。虽然这部著作的直接主题是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哲学，它的很大部分是详细分析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以前发展过程中就已出现的反动哲学倾向。他从这一观点来考察晚期谢林的学说、叔本华的唯意志论体系和克尔凯郭尔的宗教哲学。正象卢卡奇表明的，资产阶级哲学的没落、唯心主义的危机在上世纪前半叶、即在西欧完成资产阶级民主变革和产生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卢卡奇认为，唯心主义哲学危机的最明显、令人印象最深刻和最本质的表现，特别是在帝国主义时代，是**哲学非理性主义**，对此不能不同意。当然，非理性主义的唯心主义在以前也存在过。在基督教的黎明时期、在中世纪、在资产阶级哲学的进步发展时期，我们都看到过非理性主义。然而以前的非理性主义（也包括17—18世纪某些资产阶级思想家的非理性主义在内），主要是宗教神秘的学说，往往是与哲学对立的东西。非理性主义哲学的影响在18世纪、甚至在20世纪前半叶，都是微不足道的。卢卡奇指出，很能说明问题的是，“非理性主义”这个名词本身只是在19世纪才在哲学中出现的。^④

在帝国主义时代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潮的哲学非理性主义，

④ 参看卢卡奇，《理性的毁灭》1955年柏林版第75页。

是唯心主义的一种崭新的变种。这是一种把自己与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和正统独断的基督教神学对立起来的唯心主义。叔本华体系中的“世界意志”自然远非关于至善的神的开端、绝对理性等的传统基督教概念。按照叔本华的学说，宇宙意志是变化为能动实体的绝对破坏性的、彻底反理性的、无人称的全面的恶。不过，克尔凯郭尔基本上是宗教的哲学也是挑衅性地与基督教正统和任何神学独断主义对立起来的。难怪某些资产阶级研究者把克尔凯郭尔的学说解释成为宗教的无神论。可惜，卢卡奇在他这部著作中只是顺便触及这些美化哲学信仰主义的企图，虽然这些企图正是对非理性主义色彩的哲学家们说来最具有典型性的。

正如卢卡奇令人信服地表明的那样，非宗教的非理性主义的最突出的、最咄咄逼人的代表是尼采。然而，不管他如何反对基督教的神学独断主义，他归根到底扩大了宗教的世界观基础，虽然这一点是通过否定传统唯心主义的精神概念达到的。尼采用神化“活的生命”、肉体、躯体来对抗关于超自然的非物质的现实性的超自然主义理论。但是他所谓的“独立自在的物质性”，检验起来却是物质的神秘化、作为本能与理性、思维的无意识的绝对化。因此，非理性主义的唯心主义断言，本能、思维、意识是第二位的，是由“生命”即凌驾于物质和精神的“有限”对立之上的实体的独立自在的现实性派生出的。因此，尼采主义是又一种想要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的企图。在它那里理性的概念归结为神话，而唯心主义哲学则被指控制造神话。揭露理性被宣布为哲学的最重要任务。

现代的哲学非理性主义，从西美尔、施本格勒、谢勒、存在主义者和新黑格尔主义者开始，到亲法西斯的和法西斯的“生命哲学”、种族主义的假社会学为止，都认为自己的划时代的使命是发现和达到据说是科学、理智所不能达到的最高现实性。这种似乎是亘古以来就存在的现实性也就是非理性——盲目的力大无边的自发性，自作聪明的“知识分子的”理智企图为它规定法规或行为规则。

但是非理性主义者断言，法规只对那些“必须遵守”的人们存在。而真正的现实——非理性——不知道任何规律性、任何限制。在非理性中笼罩一切的是无法无天、本体论的任性、不能预见或控制的命运。

卢卡奇仔细观察了尼采、叔本华同存在主义、新黑格尔主义及其先行者之间的理论继承性，他坚决反对把现代非理性主义的历史解释成为纯粹理论的、哲学的过程。卢卡奇强调说，尼采哲学的本质不是建立了一种新的、继承了叔本华学说的“生命哲学”。“尼采的非理性意义的生命哲学是对反动的、反民主和反社会主义的帝国主义行动主义的公开号召……”^⑤。资产阶级的哲学史家、特别是非理性主义的信徒，力图把这种哲学流派的基本发展阶段描述成为达到非理性现实性的一连串阶段，描述成为向新的、真正的哲学形式的过渡。与这种执行为非理性主义辩护的意识形态职能的唯心主义概念相反，卢卡奇从唯物史观的立场来说明这个流派的发展，他把唯物史观的原理具体地运用于所研究的对象。与对非理性主义历史的唯心主义解释、特别是非理性主义解释相反，卢卡奇表明了，“非理性主义历史的不同阶段是对在阶级斗争进程中产生的问题的反动回答。因此，非理性主义对社会进步的反应的内容、方法、形式、色彩与其说是决定于非理性主义的内部辩证法，不如说是决定于斗争的条件、反动资产阶级不得不反对的敌人。正是这一点应该作为研究非理性主义发展的根本原则确定下来”。^⑥例如，近代的非理性主义是作为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反应产生出来的。它的进一步发展决定于资本主义社会对抗性矛盾之深化、无产阶级之成为威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独立政治力量、以及对进步资产阶级哲学成就作批判理解和科学加工的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产生。哲学非理性主义之成为亲法西斯的、然后是法西斯的帝国主义恐怖和劫掠的意识形态，也不是简单地决定于非理性

^⑤ 同上书，第24页。

^⑥ 同上书，第10页。

主义基本论点的发展。这种意识形态过程的基础，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总危机、帝国主义链条在最薄弱环节被突破、伟大十月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

不难理解（而这一点在专著《理性的毁灭》中很好地表明了），当代非理性主义的中心论题不是某个本来意义上的原理，而是被称作社会进步的现实历史过程。非理性主义不仅是否定社会进步的存在——而且对它进行斗争。

在我们今天，已经不可能直截了当地否认，社会进步（例如，与科技进步不同，虽然它们之间有密切联系）只有通过受到客观和经济条件制约的由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向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过渡才能实现。很有意义的是，当代非理性主义通常并不否认科技进步。非理性主义否定的对象是社会经济的进步、合理改造社会关系的可能性、也就是改善人们的社会生活条件的可能性。

当代的哲学非理性主义与越来越成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的社会悲观主义合流。卢卡奇指出，社会悲观主义“首先意味着在哲学上肯定任何政治行动都毫无意义。这就是这种间接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形式的社会职能。为了论证这个结论，首先就必须贬损社会及其历史”。^⑦如果说垄断前的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们力图证明一切社会灾难都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够而产生的，因此将在它的进一步发展进程中被克服，那么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辩护的当代非理性主义通常坚持认为社会的恶是自古就有的、不能根除的，而对美好未来的希望只不过是一种自我欺骗。当代非理性主义的宣扬者们把合理组织社会生活的思想看作孕育着可怕灾难的荒唐空想，几乎看作对清醒地、不存醉人幻想地看待人类生活、人的本质的做法的隐蔽的恐惧。

正如卢卡奇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哲学和社会学进行的批判分析所表明的，对资本主义的哲学辩护发生非理性主义的变形是

⑦ 同上书，第 165 页。

完全合乎规律的，当代资产阶级的非理性主义与以前的哲学学说不同，并不否认资产阶级社会中已经变得很明显的社会灾变的现实性。

忽视资本主义内在固有的对抗性矛盾的过时的破产了的观点，被代之以对这些矛盾的非理性主义神秘化。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现在被描绘成“技术文明”的危机、一般人类生存的危机、过于自信和不负责任地擅自处理人类理智的致命后果。

因此，我们看到，卢卡奇在他对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哲学的批判中，正象马列主义的方法论所要求的，首先揭示这种哲学的意识形态职能、它与特定历史时代的密切联系以及它内在固有的矛盾。对帝国主义时代矛盾的分析使得有可能理解，为什么当代资产阶级的辩护哲学采取了表面自相矛盾的形式，例如打着浪漫主义反资本主义的幌子，或者表现为对任何社会交往的存在主义批判。

大家知道，马列主义不限于分析唯心主义哲学的阶级根源。正象列宁强调指出的，还必须揭示唯心主义认识论的根源。从这个观点，列宁关于绝对相对主义是对我们认识的辩证相对性的歪曲的分析是极有教益的。遵循这些原则，卢卡奇为了揭示当代非理性主义的认识论根源，着手分析非理性主义对辩证法的态度。匈牙利哲学家提醒人们，认识只是近似地反映客体。因此在反映和被反映之间必然有矛盾。这一矛盾在认识进步的道路上被克服，然而在这过程中，在已获得的知识和客观现实之间又产生出新的矛盾。“既然客观实在在原则上甚至比我们思维的最发达的概念都更丰富、更全面、更复杂，思维和存在之间的冲突就是必然的。在社会发展特别迅速、促使新的自然现象不断被发现的时代，非理性主义就有可能借助各种各样的神秘化把这种进步描绘成倒退。”^⑧ 在法国大革命时代、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自然科学大发现的时代，

⑧ 同上书，第 78 页。

就是这种情况。

因此,非理性主义对反映是最重要认识现象的否定、关于“理智无能为力”和认识是徒劳的反辩证法谈论,反映了(自然是以形而上学的方式)认识的现实矛盾——对这些矛盾,从唯物辩证法的立场,不仅要发现,而且还要加以解决。列宁对这些矛盾作了原则性的说明:“如果不把不间断的东西割断,不使活生生的东西简单化、粗糙化,不加以割碎,不使之僵化,那么我们就不能想象、表达、测量、描述运动。思维对运动的描述,总是粗糙化、僵化。不仅思维是这样,而且感觉也是这样;不仅对运动是这样,而且对任何概念也都是这样。这里也有辩证法的本质。对立面的统一、同一这个公式正是表现着这个本质。”^⑩

列宁肯定在认识一反映过程中有歪曲现实的必然性,同时表明,认识的主体发现这种歪曲(真理和谬误之间的必然辩证对立的合乎规律的表现),会越来越准确地认识客观现实。可是非理性主义不能理解这种“辩证法的本质”,把认识的矛盾性解释成为不可能获得关于现存事物的真正的、有客观内容的知识,卢卡奇在说明非理性主义的认识论根源时表明,被这种学说神秘化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得到了合理的解决。

卢卡奇对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哲学的批判分析,主要限于考察哲学非理性主义。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把当代一切唯心主义学说都归结为非理性主义哲学。匈牙利哲学家警告要防止这种片面态度,他强调指出:非理性主义“只是资产阶级反动哲学的重要倾向之一”。但是这种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切反动唯心主义学说所固有的。虽然“反动资产阶级哲学的领域比严格意义上的非理性主义哲学要广泛得多”,但是“几乎不存在不带一定非理性主义成分的反动哲学……”^⑪。这种理论考虑完全能说明,为什么卢

⑩ 《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8卷第285页。

⑪ 卢卡奇:《理性的毁灭》第5页。卢卡奇通过对非理性主义者柏格森同实证主义者马赫的非常恰当的比较来说明这一正确思想。“马赫对感知的主观直接性的

卡奇在他对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哲学的批判中专门突出非理性主义，赋予对它的批判以头等重要的意义。不过，应该指出，卢卡奇远非总是始终一贯地按他提出的方法论原理行事。非理性主义常常被他解释得过于广泛，结果这种思潮不能与那个通常称作反理智论的内容更繁杂的哲学流派充分区别开来。例如，唯心主义经验论的拥护者（从贝克莱和休谟开始到新实证主义为止）是反理智论者，可是他们并没有哲学非理性主义的信念。卢卡奇把所有的不可知论学说都归入非理性主义，也是不能令人同意的：在柏格森或雅斯贝斯的不可知论与休谟主义的不可知论认识论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更不用说那些被恩格斯称作“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者”的自然科学家不可知论者了。大家知道，赫胥黎、杜布瓦-雷蒙、亥姆霍兹和许多其他的杰出科学家都是这种人。

对非理性主义的扩大理解往往导致把主要哲学流派——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放到非理性主义和理性主义哲学的斗争之后，虽然后者常常是在唯心主义本身的范围内展开的。难怪卢卡奇在一次谈话中把关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斗争构成哲学史过程最重要内容的观点看作简单化的观点，提出“理性主义哲学和非理性主义哲学之间的斗争”^⑩ 来与它对立。

在总结对卢卡奇著作中对哲学非理性主义的批判的分析时，必须强调指出，决定他的研究的这种方向的不仅仅是理论考虑，而且首先是政治考虑。非理性主义不仅仅是反动的哲学理论，它是

纯粹不可知论的召唤，在柏格森那里变成一种建立在彻底非理性主义直觉之上的世界观”（同上书，第23页）。马赫主义蕴涵着的这种非理性主义倾向，在马克思主义著述中第一次是由列宁指出的。俄国的马赫主义者认为认识的任务是“把理性，逻各斯导入非理性的知觉流”，列宁援引了这句话之后写道，“我们面前是一个穿着班驳陆离的、刺人眼目的‘最新’术语所作成的小丑服装的主观唯心主义者。在他看来，外部世界、自然界和自然规律都是我们认识的符号。知觉流是没有理性、秩序、规律性的，是我们的认识把理性导入其中的……‘最新实证论’的最新成就乃是费尔巴哈已经揭露了的那个陈旧的信仰主义说法”（《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14卷第170—171页）。

^⑩ 《卢卡奇自传》1986年社科文献出版社版第150页。

恐怖主义的法西斯专政的思想准备。希特勒意识形态从非理性主义的理论武库中吸取了它的主要世界观原理。正是因为如此，辩证唯物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立，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帝国主义反动势力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的主要方向的哲学表现。

资产阶级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在伟大十月革命之前很久就开始了，自然并没有在希特勒主义在军事上和思想政治上被粉碎之后就宣告结束。卢卡奇正确地指出，反对共产主义的“十字军征讨”现在由美帝国主义领头，他强调指出在反共主义、冷战政策和帝国主义宣传所利用的非理性主义哲学之间的有机联系。卢卡奇写道：“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知道，在哲学领域中，在理性和非理性之间、唯物主义辩证法和非理性主义之间的伟大决定性战斗，早已成为保卫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它只有随着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建成社会主义、从而战胜资产阶级，才能以最后胜利告终。”^⑫然而，既然帝国主义是全面的反动势力，既然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进攻劳动者的民主成果，反对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及其非理性主义哲学外衣的斗争就不仅是社会主义的任务，而且是一般民主的、人道主义的任务。卢卡奇说道，“群众站在理性方面，用示威游行来宣布自己直接参与决定世界命运的权利。他们永远不会再放弃这个用自己的理性来决定自己的事情、从而全人类的事情的权利，以便不生活在军国主义疯狂的混乱中，而是生活在被合理组织和领导的世界中。”^⑬

因此，对资产阶级哲学危机及其最明显的非理性主义表现的理论分析，在卢卡奇的研究中变成了对社会主义和民主力量在客观上必须一致反对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科学论证。对纳粹仇恨人类的意识形态的揭露，因此不仅成为对反动的历史过去的研究，而且成为与那些现在仍继续从事希特勒主义

^⑫ 卢卡奇：《理性的毁灭》第 674 页。

^⑬ 同上书，第 79 页。

肮脏勾当的反动势力进行斗争的战斗号召。

卢卡奇不是把当代资产阶级哲学、特别是非理性主义仅仅当作一种理论体系、一大堆谬误等等进行研究的书斋学者。他很好地懂得，“在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的选择从来不是‘内在的’哲学问题”。^④他经常强调指出，哲学上的冲突不仅是认识问题：它们反映了社会实际的矛盾。正确理解哲学思想的运动，要求一定的社会政治立场。卢卡奇写道：“真正的和杰出的思想家必须是自己时代、自己国家和自己阶级的儿子。”^⑤这句话无疑适用于他本人，他尽管犯了一些错误，却是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有觉悟的思想家。

卢卡奇对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哲学的批判，是对马列主义科学的宝贵贡献。在30年前发表的总结这种批判的专著《理性的毁灭》，丝毫没有失去它的理论的、意识形态的和科学的现实性。这不仅证明杰出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者的这部著作有重大的科学意义，而且直接表明它有马列主义的党性，它与活生生的生活、与争取社会主义、社会进步和民主、反对一切形式的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斗争保持有机的联系。

原载《苏联科学院通报》1985年第11期

(莫立知译)

④ 同上书，第674页。

⑤ 同上书，第79页。

国外对卢卡奇思想的探讨

劳 梓

卢卡奇·捷尔吉(1885—1971)在哲学、美学、文学批评，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多年来，他一直是共产主义运动中和国际学术界引起争议的人物。在卢卡奇·捷尔吉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世界许多国家都举行了纪念活动，对他的生平事业和学术成就作了广泛的介绍和重新评价。现将匈牙利、苏联和意大利对卢卡奇的纪念活动以及对他的思想的探讨概述如下：

一、匈牙利

匈牙利是卢卡奇的祖国，卢卡奇的漫长一生的头25年和最后25年都是在布达佩斯度过的。卢卡奇是匈牙利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美学家、文学批评家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他自始至终都忠于匈牙利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可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一生中多次受到批判(20年代中期和末期、40年代末期、50年代末60年代初)，因此在很长的时期内卢卡奇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成了修正主义的象征。这种状况并不符合卢卡奇的本质，也不利于匈牙利人民的事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从60年代中期起就已注意纠正这种状况。在卢卡奇于1971年逝世以后，匈牙利党利用1972年他逝世周年纪念、1975年他诞辰90周年纪念和1981年他逝世10周年纪念等机会，通过纪念会、报告会、纪念文章和发表卢卡奇遗作等方式为他恢复名誉，对他进行重新评价。按照匈牙利党中央的决定，

在卢卡奇的故居建立了卢卡奇档案馆，作为收藏、整理和研究卢卡奇思想遗产的中心。卢卡奇档案馆与布达佩斯大学、匈牙利科学院以及出版社合作，出版了卢卡奇的许多重要著作，如《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青年时代的美学手稿、日记、书信以及逝世前不久写的自传提纲等等；也出版了不少研究和介绍卢卡奇思想的专著，如赫尔曼·伊什特万的《卢卡奇·捷尔吉的思想世界》、1980年匈牙利卢卡奇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卢卡奇·捷尔吉和匈牙利文化》等等。可以说，在纪念卢卡奇诞辰100周年以前，实际上已全面恢复了卢卡奇在匈牙利的政治和精神生活中以及在国际学术界所应享有的崇高地位。

匈牙利对卢卡奇诞生100周年进行隆重纪念，是要全面地介绍卢卡奇的政治和理论活动，以带动研究工作的深入进行。纪念活动的准备工作从1983年就已开始。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文化政策小组根据政治局的决定在1983年8月拟定了《纪念卢卡奇·捷尔吉诞辰100周年提纲》，发表在党的文化政策刊物《社会评论》1983年第8期和第9期上。这个文件说，预料全世界都将纪念卢卡奇诞辰100周年，这个《提纲》就是为迎接这一事件而拟定的，它对卢卡奇的生活道路和哲学生涯作出系统的阐述和评价，不是要对卢卡奇一生中有争议的问题作出最后结论，而是要“以此推动对卢卡奇哲学遗产的更有计划和有效的研究，更加广泛和深入的分析、进一步的批判继承和发展”。

《提纲》指出，在评价卢卡奇一生的时候，应该考虑到其内在的发展，考虑到卢卡奇坦率的探讨愿望和对自己思想道路的批判态度。“卢卡奇的一生，包括所有重大的、决定性的变化，构成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其内部逻辑的主线是马列主义活动的充分发挥”。卢卡奇是作为资产阶级思想家开始自己的生涯的，在长期的思想发展过程中接近了马克思主义，自1918年以后始终同工人运动、共产党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密切联系在一起。他是“封建匈牙利的不可调和的批评家”、“匈牙利和国际工人运动中的积极战士”。

“他的毕生理论工作，为 20 世纪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是“20 世纪的一位伟人，马列主义思想的卓越代表”。“他研究过历史的发展和当代的重大问题，他经历过并且深刻地分析了我们这个时代许多根本问题，不懈地研究和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和手段。利用他的理论工作成果和发展道路上的教训，有助于我们今天进行的斗争。向整个进步人类揭示继承他的遗产的价值，是我们的光荣义务。”

《提纲》在系统阐述卢卡奇的生活道路时，对他所受到的几次批判作了分析。关于《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提纲》认为，其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资本主义的异化关系、资产阶级的思维方式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解释，以一种新的方式充实了辩证法和许多概念，至今仍然是正确的”。“卢卡奇强调马克思辩证法的一贯的历史性、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革命批判的普遍性和严密的统一性”，是应该肯定的。这本书的错误是包含有“革命主观主义、救世主式的左的倾向和对客观的自然辩证法的否认”，“认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具有创造历史和现实的‘救世’力量”。这些错误应该受到“合理的批评”，可是不少批评是“教条主义的指责”。《提纲》坚决反对将《历史和阶级意识》解释成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里程碑。关于《勒鲁姆提纲》，《提纲》认为，尽管这个文件打上了当时宗派主义的烙印，但是卢卡奇在那里提出以实现工农民主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当时党的战略目标，不失为一种“具有历史远见的立场”，这一目标不久之后就在人民阵线政策中得到了贯彻。当时卢卡奇所受到的批判“反映了党内的派别斗争和日益增长的教条主义”。关于 1949 年对卢卡奇的批判，《提纲》指出，这次批判的背景是“向无产阶级专政过渡的问题以及在这当中所出现的曲解和在冷战气氛中不断扩大的宗派主义思想文化政治的后果”，对他的现实主义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党性的论点进行的批判，“实质上是教条主义的攻击”。关于在 1956 年匈牙利事件后于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对卢卡奇开展的

大规模批判,《提纲》指出,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卢卡奇总结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领导人(拉科西)所犯的严重错误和在建设社会主义中所出现的偏差的教训。他完全正确地强调同错误坚决地进行决裂,要求民主化,但对由于世界力量对比而产生的危险缺乏实事求是的估计。他在反革命时期虽然参加了纳吉·伊姆雷的党政领导机构,然而他坚持反对宗派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做法,不过他低估了修正主义和反革命的危险,因此“犯了政治错误”。当时对他的批判“反映了巩固阶段的内部斗争”。由于把对他一时错误的批判“扩大到他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一生,认为他的政治错误同所谓错误的理论观点有直接的联系”,因而“对他在理论上所作的努力和某些政治著作的评价往往是片面的”。

《提纲》指出,对卢卡奇及其观点的争论在他生前和去世后始终没有停止,这表明了他的著作的意义。然而,过去对他的观点的评价和讨论,受到他本人曾积极参加的政治斗争的很大影响,反映了各个时期工人运动、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理论的历史地位、发展和内部矛盾以及观点的对立。《提纲》认为,目前,社会主义社会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条件日益允许和要求对卢卡奇的活动及其理论和实践遗产进行客观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评价。它号召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担负起这样一个任务:“分析卢卡奇在寻求马克思、列宁的道路上所出现的矛盾,捍卫他活跃的、充满创造力的哲学遗产,反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对他的占有与排斥”。

1984年1月,在布达佩斯组成了庞大的卢卡奇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筹委会,由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负责文化事务的政治局委员阿策尔·捷尔吉任主席,由教育部长和科学院院长任副主席,共有34名委员,包括各界人士,其中有4名卢卡奇以前的学生(沃尔西·伊什特万、阿尔马西·米克洛什、赫尔曼·伊什特万和若尔陶依·德奈什)。委员会计划要出版许多纪念出版物,例如,《卢卡奇·捷尔吉和恩斯特·布洛赫通信集》(也是为了纪念布

洛赫诞辰100周年)、卢卡奇的《关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札记》考证本、《卢卡奇·捷尔吉和希尔达·鲍威尔通信集》(希尔达·鲍威尔是卢卡奇青年时代的挚友巴拉日·贝拉的妹妹，卢卡奇最早的恋人之一，巴拉日·贝拉原名赫伯特·鲍威尔)，还计划出版希尔达的《日记》(因为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谈论卢卡奇的)，等等。计划届时要举行国际性的卢卡奇学术讨论会、举办卢卡奇创作展览会、为卢卡奇纪念碑揭幕等等。

1985年4月在布达佩斯举行了以《卢卡奇·捷尔吉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为题的国际理论讨论会。它是由匈牙利科学院、教育部、党史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及中央高级党校联名发起举办的。除了匈牙利的学者以外，还有苏联、民主德国、保加利亚、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以及联邦德国、意大利、美国等国的哲学家和文艺理论家参加。

会上作的许多报告和发言可以大致分为三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对卢卡奇哲学创作的一般评价、他在不同阶段上对资产阶级哲学的态度以及资产阶级哲学中对卢卡奇的解释。第二个主题是阐述卢卡奇的社会政治观点、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以及他对文化概念的解释。第三个主题是卢卡奇关于匈牙利的历史和文学艺术的观点。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党史研究所所长胡萨尔·伊什特万在开幕词中强调指出，卢卡奇从他进行创作活动的一开始起就致力于参加解决我们时代最复杂最广泛的冲突。他在为这些冲突形势寻找出路时，站在工人阶级方面。尽管围绕着他的思想有过许多争论，但直到他生命终结，他始终忠于这一立场。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政治局委员、纪念活动筹委会主席阿策尔·捷尔吉在致会议参加者的贺信中说，卢卡奇是杰出的共产党人思想家，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对他的遗产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卢卡奇有时犯错误，但是他能够认识自己的错误。他一生中最后的、最富成果的时期是在党的行列中度过的，他和党一起为

争取社会主义而进行了斗争。

在分析卢卡奇哲学观点的报告中，特别引起人们注意的有苏联T·H·奥伊泽尔曼院上的报告《作为黑格尔哲学研究者的卢卡奇》和民主德国中央哲学研究所所长M·布尔院士的报告《卢卡奇和当代资产阶级哲学》。奥伊泽尔曼不仅详细阐述了卢卡奇的观点，而且谈到了他在解释黑格尔哲学中的观点演变情况。他认为，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在许多方面还站在黑格尔的立场上，追随黑格尔把“对象化”和“异化”等同起来。他来到苏联，读了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后，才放弃了他这本著作的许多观点。卢卡奇在《青年黑格尔》中第一个对象异化和马克思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批判分析这种极其重要的问题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批驳了资产阶级对马克思《1844年手稿》的歪曲。

布尔首先提醒与会者，卢卡奇40年代和50年代的许多著作，如《青年黑格尔》、《理性的毁灭》、《歌德及其时代》等，都是在民主德国第一次发表的。为了纪念卢卡奇诞辰100周年，在民主德国按照社会统一党中央的决定于1985年3月在柏林举行了国际讨论会，并且重新出版了卢卡奇的许多著作。布尔在报告中强调指出，当我们在分析卢卡奇和当代资产阶级哲学的关系时，既要注意到卢卡奇对资产阶级哲学的影响，20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发展中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提出的许多问题都曾受到他的启发（卢卡奇对海德格尔、曼海姆、马尔库塞、阿多尔诺等人影响很明显），同时也要注意到卢卡奇是这个阶段的资产阶级哲学的批评者。从30年代直至50年代，卢卡奇的研究基本上是为了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为法西斯主义鸣锣开道的东西。布尔认为，卢卡奇这方面的著作至今还保有现实意义。

苏联学者M·A·赫维什在报告《资产阶级哲学中对卢卡奇的创作的解释》中，分析了资产阶级哲学为什么对《历史和阶级意识》那么感兴趣，对在黑格尔研究中造成了革命的《青年黑格尔》毫无热情，而对敌视一切非理性形式的《理性的毁灭》则持极端否定

的态度。他说明了西方从 70 年代中期起对卢卡奇的评价变得越来越否定的原因（新保守主义流行）。A·Г·梅思里夫钦科的发言考察了资产阶级马克思学和修正主义的书刊中对卢卡奇的解释。他认为西方把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的许多思想解释成为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来源，是企图把卢卡奇与列宁主义对立起来，是企图把统一的、国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分解成各种不同的变种。

卢卡奇档案馆馆长西克拉依·拉兹洛考察了卢卡奇的《理性的毁灭》和那些似乎是这本书的准备阶段的著作。他认为那些不赞同卢卡奇从尼采和其他非理性主义形式到法西斯主义划一条直线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卢卡奇写这本书的目的不是要叙述那个时代的德国哲学，而是要解决意识形态、社会心理的任务，即法西斯主义为什么能那样蛊惑人心地利用尼采哲学来欺骗群众。他认为卢卡奇这本书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

这次与以前的卢卡奇学术讨论会不同的地方，是对他的早期著作谈得较少，而关于他最后一部综合性著作《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则有不少发言。很多人把这部著作看作卢卡奇的创作道路的总结。匈牙利学者、卢卡奇的学生阿尔马西·米克洛什教授介绍了这部著作产生的历史。苏联学者 И·С·纳尔斯基教授作了题为《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本体论的理论特征》的报告，着重说明这部著作作为出发点的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认识社会存在、生活的方法和理论，而且是社会的本体论。卢卡奇在这里改正了早期著作《历史和阶级意识》中的错误，明确指出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只能建立在自然界的本体论的基础上。卢卡奇反对丁片面的认识论主义，揭示丁人们劳动活动的本体论结构。捷克斯洛伐克学者 И·泽列内在题为《卢卡奇晚年创作中的唯物辩证法问题》的发言中说，卢卡奇的《本体论》“在对辩证法的解释方面后退丁一步”，因为他似乎只局限于解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而完全没有注意现代自然科学和数学的发展。泽列内认为，《审美特征》可

以被看作卢卡奇对唯物辩证法的进一步发展，因为那里研究了一系列问题，如对世界的科学反映和美学反映的异同等。对《社会存在的本体论》进行分析的还有苏联哲学博士H·B·皮里本科、罗马尼亚教授A·波波卡、民主德国教授X·霍尔茨、意大利学者A·斯卡尔波尼等。

关于第二个主题，即卢卡奇的社会政治观点、他对文化问题的解释，有匈牙利科学院通讯院士推凯伊·费伦茨作的题为《卢卡奇政治哲学中的民主和社会主义问题》的报告，匈牙利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卢卡奇·尤若夫院士作的题为《卢卡奇论民主和社会主义文化的社会意义》的报告，匈牙利教育部长凯佩奇·贝拉院士作的题为《卢卡奇在1945—1949年对文化的观点》的报告。还有匈牙利安契尔·安德莱教授、哲学所研究员若尔陶依·德奈什论述了卢卡奇对艺术的社会和道义使命的理解。

就第三个主题即卢卡奇对匈牙利历史、不同发展阶段的文化和文学的解释问题发言的，也全都是匈牙利学者，他们都密切联系到卢卡奇的社会哲学思想、美学思想来考察这些问题，因此也触及到了对卢卡奇创作的一般评价以及他在发展匈牙利和欧洲文化中的作用。特别引起人们兴趣的报告有：《卢卡奇论匈牙利诗人奥第的创作》、《卢卡奇和匈牙利的人民民主》、《卢卡奇和匈牙利工人运动(1918—1930)》、《卢卡奇论匈牙利历史》等。

整个说来，这次纪念卢卡奇·捷尔吉诞辰一百周年的国际学术会议重新提请人们注意，卢卡奇的遗著不仅仅有历史意义，而且与探索解决马列主义哲学的现实问题有密切联系。这将有力地推动匈牙利和国际学术界对卢卡奇思想的研究。

二、苏联

卢卡奇·捷尔吉从30年代初直到1945年德国法西斯崩溃为止是在苏联度过的。他曾在莫斯科马列研究院和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工作，参加了苏联 30 年代的文艺理论讨论。他的许多文艺理论和美学著作都是在苏联写成的。他的《历史和阶级意识》曾在苏联受到批判，他的美学思想曾受到唯心主义和缺乏党性的指责。苏联学者积极参加了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对卢卡奇的所谓“修正主义”的国际性批判。1958 年《哲学科学》第 2 期发表了 C · И · 波波夫的评介文章《匈牙利和德国报刊上对卢卡奇·捷尔吉的修正主义观点的批判》，《哲学问题》第 6 期发表了 M · A · 赫维什的文章《对卢卡奇观点的批判》，1959 年《哲学科学》第 2 期发表了 З · Н · 麦列申科的文章《论卢卡奇哲学观点中的修正主义》。卢卡奇很长时期在苏联被描写成为修正主义者。他的著作在苏联很少出版，苏联的出版物对他也很少介绍。在 1964 年出的《哲学百科全书》中，关于卢卡奇的词条只占两栏篇幅，而且没有照片。从六十年代末起，苏联开始注意对卢卡奇进行重新评价。1970 年苏联曾授予卢卡奇一枚列宁诞辰一百周年纪念章。在 1971 年 6 月卢卡奇逝世后，《哲学问题》杂志编辑部的悼念文章中对卢卡奇作了一分为二的谨慎评价，指出了他的缺点错误，同时也肯定了他的功绩，说“苏联哲学界将记住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卢卡奇·捷尔吉，他对世界哲学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出色的贡献”。在卢卡奇逝世以来的十几年中，苏联出版物中反映出来的对卢卡奇的评价总的来说还是这个精神：一分为二，只是肯定的成分越来越多。苏联学者认为，尽管卢卡奇有缺点错误，但是他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是属于马克思主义、属于列宁主义的”。他们驳斥把卢卡奇列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而使之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的观点。

这次纪念卢卡奇诞辰 100 周年，苏联除了派出以 Т · И · 奥伊泽尔曼为首的哲学家代表团参加匈牙利的纪念活动以外，还在 1985 年 5 月举行了自己的纪念性学术会议。这次学术会议是由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举办的。除了苏联学者外，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匈牙利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卢卡奇·尤若夫和卢卡奇档案馆馆长西克拉伊·拉兹洛。

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 Г·Л·斯米尔诺夫在开幕词中提请与会者注意，卢卡奇在莫斯科生活和工作了将近十五年，有好几年是哲学所的工作人员。卢卡奇在哲学所写出了他的广泛闻名的著作《青年黑格尔和资本主义社会问题》，也是在这里把它作为博士论文进行了答辩。

卢卡奇·尤若夫院士作了分析卢卡奇创作中的类本质概念的报告。他说，对卢卡奇说来，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实践问题。历史过程的内容就是人变为人、表现出他的类本质。每一个人，不管他是否意识到这一点，都是这一普遍历史过程的积极因素。卢卡奇认为，在历史过程中，这种人变为人、也就是表现出自己类本质的现实可能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第一次产生出来的。报告人说，卢卡奇创作的目的是为了探寻解决时代和个人之间冲突的途径，其中包含的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和观察问题的角度，在今天还很有意义。

M·A·赫维什分析了卢卡奇对西欧一部分知识分子产生影响的原因以及这种影响的演变情况。他说，在20年代和30年代对卢卡奇产生浓厚兴趣，一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引起资本主义危机后，左倾激进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态度加剧，对马克思主义发生强烈兴趣，二是在20年代有一系列欧洲国家革命失败，引起人们对失败原因的探索，卢卡奇的著作《历史和阶级意识》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无产阶级的组织进行了救世主式的解释，正好适应这种需要。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对卢卡奇及其早期著作重新发生浓厚兴趣，是由于这时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加强了，同时一部分激进知识分子怀念未曾发生的革命。但是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由于资产阶级意识转换方向、开始流行新保守主义，在西方书刊中对卢卡奇的态度发生了某种转变，不是宣布卢卡奇过于“资产阶级”，不能成为左派的理论源泉，就是说他过于“教条”，他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无可取之处。报告人认为，我们再也不应该把象卢卡奇这样的思想家交给资产阶级哲学去摆布，早该

对他的全部创作进行认真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思考了。

西克拉依·拉兹洛考察了卢卡奇的创作的莫斯科时期。他说，卢卡奇一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富有成果的时期。卢卡奇来到莫斯科后，不仅成了苏联公民、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文学评论》杂志的工作人员、苏联作家协会的会员，而且找到了他在许多年中非常想望的一切——相互理解和共同的科学语言。他和里夫希茨以及一大批参加 30 年代文学讨论的文艺理论家们的结识和共同创作，对他的创作生涯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И·С·纳尔斯基考察了卢卡奇的异化观点的演变情况。他说，卢卡奇是二十世纪初在列宁之后第一个提出异化的作用问题的人。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对异化的解释在许多方面还是唯心主义的，还是按黑格尔的精神把异化与对象化和物化等同起来。在《青年黑格尔》中，他已经在克服黑格尔的公式。而在《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卢卡奇不再把异化看作社会发展中的唯一冲突，他考虑到意识形态对经济、政治及其他生活领域有巨大影响，因而对分析异化的意识形态形式予以极大的注意。报告人指出，探寻摆脱异化的出路是争取发展无产阶级意识的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使群众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意识形态准备工作的重要因素，在当前世界上的尖锐思想斗争中，决不能把这位杰出的匈牙利思想家的遗产奉送给马克思主义的敌人。

Л·Ф·杰尼索娃回忆了卢卡奇在 1946 年第一届国际哲学家社会学家会议上发言的情况。她认为，他的发言《马克思主义还是存在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反对当时有强大影响的存在主义的第一个发言，具有重大的意义。

Г·Л·斯米尔诺夫在闭幕词中指出，对卢卡奇的兴趣无论在马克思主义者中还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中都在与日俱增。卢卡奇决不是一个历史的插曲。他的创作与我们时代的现实密切联系在一起。这种情况应该引起哲学史家的注意，对卢卡奇的遗产进行进一步批判研究的任务应该提上日程。斯米尔诺夫告诉与会者，

苏联将出版卢卡奇的著作，他相信这会促进对这位思想家的哲学、美学遗产的认真的科学的研究。

Г·И·奥伊泽尔曼院士在这次会上重复了他在布达佩斯国际学术会议上的发言《作为黑格尔哲学研究者的卢卡奇·捷尔吉》。此外，他还在《苏联科学院通报》1985年第11期上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作为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哲学批判者的卢卡奇·捷尔吉》。他说，卢卡奇对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哲学进行批判的著作（《理性的毁灭》等）“不仅是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一些最有影响的思潮最广泛和深刻的分析，而且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著述中对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哲学的深刻的、最有份量的评述”。他认为这是卢卡奇“对马列主义科学的宝贵贡献”。这些著作虽然是在30多年前写的，可是至今“丝毫没有失去其理论的、意识形态的和科学的现实性”。他称卢卡奇为“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有觉悟的思想家”。

在《哲学问题》、《哲学科学》等苏联著名学术刊物上也都发表了文章，作者是纳尔斯基、别索诺夫等著名学者，他们都对卢卡奇的理论成就作了充分的肯定。

苏联的出版机构为迎接这个纪念日，出版了卢卡奇的美学巨著《审美特征》和哲学名著《青年黑格尔和资本主义社会问题》。

三、意大利

意大利是资本主义世界中一个有庞大共产党的国家，马克思主义思想一向很活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卢卡奇的许多著作在意大利出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先进思想是由卢卡奇传给意大利的左翼青年，许多意大利的知识分子是由于卢卡奇而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在意大利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为了纪念卢卡奇诞辰100周年，于1985年10月17至19日在罗马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召开了以《卢卡奇和欧洲文化》为

主题的学术会议。主办者为罗马的匈牙利学院和葛兰西研究所。除了意大利对卢卡奇感兴趣的各方面人士以外，还邀请了匈牙利大使和好几位匈牙利学者参加。围绕着会议的主题，对卢卡奇思想的许多方面作了广泛的讨论。

代表葛兰西研究所致开幕词的尼古拉·巴达洛尼强调指出，卢卡奇曾竭力使他的思想具有普遍性，他认为知识分子若对后工业社会制度进行反对，就有可能防止我们时代的操纵现象。

出版家阿尔贝托·斯卡尔波尼指出，卢卡奇不仅是一个扎根于第三国际的工人运动理论家，而且是他那个时代的典型的世界主义知识分子。他认为，文化是一个社会的道德本质，人们必须总是力求达到个人和运动的统一；历史的起点是在没有操纵、反对各种异化的真正日常生活的民主中活动的人。

匈牙利塞格德大学教授萨博·蒂波尔把卢卡奇与葛兰西进行了比较，声称这两人都是在列宁之后要求最彻底地改革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家。两人都经历了走向马克思原来思想的漫长道路，卢卡奇对斯大林、而葛兰西对克罗齐进行了斗争。然而，萨博认为，他们的批判都有局限性，并没有考虑到所批判的主题的整体。卢卡奇的思虑不是集中在经济上，而是集中在人上。他并不认为主观因素会随着社会存在中的变化而自动改变，因此要求发展民主，同时也把民主看作道义的要求。葛兰西也反对经济能自动决定社会生活的其他部分，在这一点上他依靠阶级斗争的实际经验。

意大利学者科斯坦佐·普勒沃通过对卢卡奇的日常生活范畴的分析，说明卢卡奇致力于补救已受到操纵的日常生活，他的观点与一般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比较起来是一种质的飞跃。他驳斥了西方一些人关于卢卡奇是斯大林主义者的说法，声称卢卡奇永远不可能真正成为一个斯大林主义者，相反，他是一个在21世纪将真正受到尊重的含蓄的思想家。

朱泽普·伯德什教授分析了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所表述的政治思想。他认为，卢卡奇的这种政治思想在很大程

度上是建立在列宁的这样一个论点的基础之上的，即社会主义意识并不直接来自工人阶级的斗争。两者是同时诞生的，但来源不同。工人运动的自发发展会导致工联主义，列宁主义的党才知道无产阶级的历史利益何在，才有资格作出决策。他认为，卢卡奇是列宁的思想的最早拥护者，卢卡奇坚持无产阶级必须服从于共产党，必须团结一致并受到纪律约束。按照卢卡奇的观点，只要采纳任何形式的资产阶级自由，就会破坏这种行动一致，而这种行动一致同时保证着明天的自由。伯德什教授认为卢卡奇曾一度是斯大林主义者，因为他把斯大林主义说成是马恩列路线的直接继续，他虽然在事后谴责了三十年代的莫斯科审判案，但仍然认为这些审判案在政治上是正确的。按照伯德什教授的看法，卢卡奇的全部著作都没有摆脱他青年时代的宗派主义的、救世主义的立场。

道德哲学家朱泽普·普勒斯提皮诺教授考察了卢卡奇1933至1953年间的著作，特别是他的现实主义思想。他认为，卢卡奇在那个时期面对着必须在好的文学和坏的意识形态同好的意识形态和坏的文学之间作出选择的困难局面。卢卡奇的观点中反映了自然主义的倾向。普勒斯提皮诺还认为，卢卡奇在这个时期对主客体统一的信念发生了动摇，因为他很快就主张，艺术必须提供一种提高到本体论水平的现实景象，而表现历史运动的方向只是次要目的。

卢卡奇档案馆馆长西克拉依·拉兹洛谈了卢卡奇写作《美学》的情况。他援引了卢卡奇在1963年5月写给里夫希茨的信中说的话：《美学》是一座从过去架设到未来的桥，即使只是一座浮桥。他说，卢卡奇正确地看到，在他那个时代马克思主义美学既存在，同时又不存在。他依靠列宁的遗产架设起了这座桥。卢卡奇的范畴同时既是历史的抽象，又是与历史的分离。

布达佩斯大学的阿尔马西·米克洛什教授对《美学》进行了本体论的探讨。他指出，卢卡奇的本体论第一次是在《美学》中提出

来的,《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两种相互联系的思想之上:全文充满了本体论观点和认识论观点之间的隐蔽争论。他认为,卢卡奇的基本本体论思想是,一件作品有它自己的世界,它的形成过程也表现出对艺术家的独立。作家往往偏离自己的意图,接受者的再创造也有重要意义,因此艺术是一种多元的领域。

安提摩·纳格里教授讨论了卢卡奇的本体论和以劳动为中心的著作。他认为,卢卡奇虽然认为人是社会存在物,然而却想要建立内在论的美学,让他的机械的和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为先验的目的服务。卢卡奇把劳动范畴放在他的本体论的中心。纳格里认为,劳动赋予事物以新的客观形式,但是人通过制造工具甚至能更有效地干预自然,今天有决定意义的不再是人的劳动,而是机器的工作,因为技术世界在过去15年中已经完全改观。

匈牙利法学研究者谈了卢卡奇对法律的观点。卢卡奇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对认识论过于强调,可是正义的尺度必须到法律中去寻求。卢卡奇确认法律有它自己的规律,他的本体论使得有可能把法律解释成为生动活泼的、能动的司法实践,即给予法律一种社会承认。

卢齐奥·科莱蒂教授谈了卢卡奇和德国对社会的浪漫主义批判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的黑格尔主义历史哲学要求一种消灭了一切冲突的否定的社会总体。马克思没有考虑社会中介及其领域市场,他和德国古典思想家们一样渴望社会是有机统一的“共同体”,因此马克思主义是德国浪漫主义传统的一部分。卢卡奇也继承了这种传统,在他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模式中,在阶级之间以及社会和国家之间不存在差别。科莱蒂认为,按照空想和古代模式来解决现代社会的矛盾,是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矛盾。

由于在70年代以来,西方有许多人把卢卡奇描绘成为非理性主义者,在会上有许多发言谈到卢卡奇对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看法。在巴黎教书的罗马尼亚人尼古拉·德尔图良谈了卢卡奇反对非理性主义的斗争。他认为,卢卡奇的遭到许多人非难的著

作《理性的毁灭》以高屋建瓴之势剖析了德国哲学的魔鬼研究、非理性主义从尼采到国社党蛊惑宣传得势不断增加的过程。德尔图良说，卢卡奇反对非理性主义的斗争本身引起了斯大林主义者的反感，他们说他通过把注意力集中在非理性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对立上，牺牲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

布达佩斯大学的费赫尔·伊什特万教授说，卢卡奇把非理性主义看成理性主义的补充，而不是看成它的对立面。随着纳粹主义上台，需要在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之间作出选择，在许多人看来，非理性主义是理性主义的歪曲，而卢卡奇却认为非理性主义是理性主义的隔山兄弟。

德语讲师西萨尔·卡塞在谈卢卡奇和德国文学的联系时，也强调指出他反对把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指启蒙运动和狂飚运动）对立起来。卢卡奇认为德国的非理性主义文学总是对法国革命的反应。

布达佩斯大学哲学系主任凯莱门·亚诺什把波培尔和卢卡奇的理性理论进行了比较。他说，波培尔认为非理性是由情绪和激情统治着，而卢卡奇认为非理性是一种与社会问题和历史变化对立的立场，没有任何完整和一贯的历史，因为它本身只不过是对已发生的过程的反应。波培尔认为，理性主义只能建立在非理性主义的基础上，而卢卡奇认为，在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之间的选择不是一个内在的哲学问题，而是决定于社会形式，理性主义的基础是历史本身。卢卡奇认为非理性是反人性的，因为选择它就是否定历史。

此外，还有卢卡奇·尤若夫谈了宗教和非理性主义在哲学家工作中的作用。若尔陶依·德奈什讨论了卢卡奇和战后和平运动的联系，描述了卢卡奇所走过的从 1946 年日内瓦的国际会见到 1948 年的弗罗茨瓦夫大会的思想道路。

总起来说，匈牙利学者在这次会上的发言对卢卡奇思想发展的各个方面作了很好的阐述，引起了与会者很大的兴趣。意大利

学者们大多是从后现代哲学的立场来考察卢卡奇的著作的。他们把这些著作的统一观点与他们的多元论观点加以对比，大多数人都强调卢卡奇著作中那些既是丰富的宝藏、同时也充满自相矛盾的成分。特别受到重视的是卢卡奇的民主的、伦理的和反操纵的方面。

参考资料：

M·A·赫维什关于匈牙利和苏联举行卢卡奇学术会议的报道（苏联《哲学问题》1985年第11期和《哲学科学》1986年第1期）；

伊伦·基什《卢卡奇和欧洲文化》（《新匈牙利季刊》1986年春季号，总102期）。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 它的当代“批评家”

——理论战线上的某些争论问题

《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组织马克思主义学者和专家就理论战线上的某些争论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交换了意见。参加这次讨论的有：匈牙利的哲学博士阿尔图尔·基什、民主德国社会科学院院士阿尔弗莱德·科辛和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候补委员、教授、历史学博士马里安·奥热霍夫斯基。现把讨论的几个问题和他们的发言摘译如下。

怎样评价现在某些资产阶级理论家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感兴趣这一事实？

马·奥热霍夫斯基：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一种胜利地体现在现实中的理论，它的威望的不断增长不能不对当代整个思想形势产生影响。资产阶级思想家一方面仍旧公开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进攻，同时却更多地“希望”（甚至是要求）它发展。其有关背景是：认为存在着马克思主义的，包括“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东方马克思主义”（指苏联和其他国家建成的现实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的某些“教条主义形式”。在这方面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科学世界观相对立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们宣称，西方马克思主义来源于马克思，却遵循第二国际改良主义领袖们所奠定的“创造性的”、“人道主义的”传统。

美国的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家 P·海尔布罗涅尔的话基本上符合实际：“今天有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捍卫着真正的马克思的事业，也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企图改变它的几乎整个内容……有些马克

思主义者想引伸到宗教和心理分析，也有些马克思主义者感受到这完全是资产阶级的一种诱惑；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大声宣布自己是正统的，另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退化为一种意识形态，而且这正是达到人道社会主义的最大障碍。”^① 显而易见：由于有包括海尔布罗涅尔本人在内的这样一些人企图改变马克思主义的“几乎整个内容”，想“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人大大大增加了。

正因为如此，在意识形态方面关于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理论的标准问题，也就是关于哪些新发现、哪些变化（实际上根本不是什么新发现和变化）可以认为是真正丰富了它的内容的问题，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尖锐。

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的主要标准是什么？

阿·基什：为了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和其他有关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问题，首先应当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因为我们的学说本身所包含的十分明确的一般哲学观念揭示了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多方面的规律性。马克思主义既用客观事物的存在和稳定性观点，也在变化和变革过程中分析我们周围的实际。它把稳定性同变化之间相互联系的辩证原则也列为其内容。

从这一原则出发，我们认为发展科学认识的第一个标准，应当是新事物，即不断用揭示现实新领域的那些材料来丰富其内容。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论将首先为了更深入认识客观世界而提出关于新事物的问题。这是一个我们的认识能多么完整准确地反映现象的本质和周围现实规律性，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实际变革活动基础的问题。

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我们关于它发挥作用的内在机制、完善的途径的概念也在不断丰富和精确。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前夕，列宁曾说过^②：“我们并不苛求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者知道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切具体情况。……我们只知道这条道路的方

^① P·海尔布罗涅尔：《马克思主义：拥护和反对》1980年纽约—伦敦版第10页。

向，我们只知道引导走这条道路的是什么样的阶级力量；至于在实践中具体如何走，那只能在千百万人开始行动以后由千百万人的经验来表明。”^②从那时起，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在后来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随着对社会主义认识的经验的积累，产生了许多具体的、生动的内容。

马·奥热霍夫斯基：阿·基什所指出的向更深认识水平的转变是认识发展的共同标准，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来说也是这样。资产阶级马克思学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借口这种哲学采用了例如必然性和偶然性、空间和时间、物质和意识等等绝对的、似乎是形而上学的概念而把它污蔑为“教条”和“形而上学”。同时，辩证唯物主义被说成是对马克思观点的教条主义解释，而这种解释成为恩格斯著作的基础，后来又是列宁著作的基础，并且成为当代“苏维埃马克思主义”的基础。

“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恩格斯的过错在于没有摒弃关于“伟大的物质的共性”、“终极实体”和“终极原因”等传统的哲学问题。例如，M·科尔福尔特写道：“马克思主义者偏离到创立教条主义的学说——‘辩证唯物主义’一边，断言‘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宇宙结构相对立，并妄想能对恩格斯称为‘辩证法’或‘关于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进行全面的研究和使用。”^③

然而，众所周知，“终极原因”、“终极实体”等概念与马克思有关物质、物质的运动和发展的学说是格格不入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范畴确实具有多方面的意义。这些范畴的内容在当代科学资料的基础上得到了极大的丰富。绝对和相对的关系被越来越全面地揭示出来了。例如，有关必然性和偶然性相互联系的概念就在概率论基础上大大地具体化和精确化了；相对论在各个领域（不管是专门的，还是一般的）被采用，就更加深刻地证明了空间、时间、物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116页。

③ M·科尔福尔特：《共产主义和哲学。当代教条和马克思主义的修正》，1980年敦伦版第57页。

质和运动之间不可分割的统一。

科学并没有为放弃基本哲学范畴提供根据。然而，马克思主义者在考虑当代自然科学的许多假说的含意^①时，恰恰提出了总结某些范畴和原理的可能性问题（不是放弃它们）。这里指的是向那些不仅反映宏观和微观世界的重要特性、而且也反映物质的次要和初级水平的结构组织的更加一般的范畴过渡。这些假说是否能得到证实，未来会作出结论。事实说明，马克思主义者哲学家正处于当代科学的先进行列，力求制定出最适合现代科学要求的方法论方针，指出科学的研究的远景方向。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经常说什么要把某些部门社会学科或自然学科的研究新成果包括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去的必要性。自然，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学者们要考虑控制论、信息论、人类学、系统工程、生物学等等的思想和实际资料。但是，我们的批评家所操心的与其说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真正具体化，不如说是用部门学科的一些概念，用一套经验主义的事实和总结逐步地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和范畴。归根到底这就变为把经验主义的总结，部门学科的概念普遍化，把它们的含意和意义过分夸大，提高到一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基本规律的水平。

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发展的必然性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具体条件下的运用为前提吗？

阿·科辛：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收集在一起的一套一般原理，而是一种与生活、与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密切相联的理论。因此，它不仅仅要求反映客观过程变化的内容，而且还要考虑这些过程所由产生的条件的变化。这种考虑同样也给理论原理的具体化、阐述实现一般规律性的各种形式提供了可能性。由于对这种或那种一般理论原理所适应的特殊条件进行了分析，就能够总结

^① 例如，有关存在超光速粒子夸克的假说，有关我们的宇宙产生于宇宙中的奇异物质（密度很大的物质的凝聚块）的假说等等。

共产党和工人党活动的多方面经验，它们在历史发展时期的迫切任务。在这一基础上形成一些具有部门学科性质和一般性质的新的理论原理。

列宁写道：“我们决不想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⑤

马克思主义正确地制定了理论与经验相互关系的现实机制，这一机制反映出一般和特殊的辩证法。每一个兄弟党独立地分析和评介自己国家和国际舞台的形势，独立地制定战略、政策，并选择为实现当前和长远目标、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斗争的这样或那样的道路。共产党人积累的经验是宝贵的国际财富。

资产阶级理论家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的继承性问题？作为其发展标准的这一原则有什么样的作用？

阿·基什：某些资产阶级思想家承认不同时期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之间的联系这一事实本身已经证明：不能认为，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继承性的标准问题，它的内容中应保留什么东西和应如何保留等问题是无所谓的。例如，资产阶级学者和假马克思主义者中有人打算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对古典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而承认它的历史价值。另一些人甚至也承认列宁主义，但只是把它作为俄国的特殊经验和历史的一种反映。一些人赞成把马克思主义学说作为一种道德观体系予以承认。美国的反共分子之一C·胡克反映了资产阶级马克思学的最近思潮，他写道：“20世纪后半期的一种奇怪现象会使未来的历史学家对人类的智力发

^⑤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161页。

展感到困惑，这就是马克思的第二次降世。在他第二次降世中，他不再是穿着经济学家陈旧衣服的《资本论》的作者，不是革命的长裤汉，不是《共产党宣言》的鼓舞人心的撰写人。他是一位穿着哲学家外衣的用欢乐的信息预言人类自由的讨人喜欢的预言家，具有超越阶级、政党和团体的狭窄圈子的能力。”^⑥

然而，马克思主义任何时候都不仅仅是经济的、政治的或伦理的学说。它也不仅仅是这个或那个国家的某些特殊性的反映。这是一种建立在革命变革实际基础上的科学世界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为依据的政治纲领，恰恰最不合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口味。这就是共产主义世界观的现实完整性和普遍性受到排斥的原因，也是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识中的继承性的命题被夸大的原因，似乎这种继承性只是把一些人和作品奉为经典，或者是以教条式思维为基础的传统的一种表现。按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观点看来，指导共产主义运动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就象对圣经一样地对《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盲目迷信。

所以，重要的不仅是弄清楚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发展中的继承性，而且要说明它的客观基础。不是任何时候现代的东西就一定真是新的东西，而新的东西也不一定是现代的东西。科学中某些几百年前发现的真理可能是现代的东西。例如，借口牛顿定律是17世纪发明的而拒绝运用它，那就很荒唐。这个简单的例子已表明整个问题相当复杂。同样，对整个认识、特别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认识的真实性、继承性发展和现实性问题则应当更深入地观察，在观察时，不要把研究的过程简单地分为新的和旧的。可以说，在这些过程中，也有某种保存下来的、稳定的东西，这种东西不是新的，却是现代的。

正如上面所表明的那样，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科学认识的概念直接把理论中新的认识与真理问题联系起来。这必须以客观地揭

^⑥ C·胡克：《革命、改革和社会正义。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学习》1975年纽约版第1页。

示新东西为前提，而这种新东西首先是某些客观趋势的特殊结果，另一种稳定性质的规律性。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新的东西反映了历史过程的必然进程。这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要求具体地分析问题，辩证地考虑“新”、“旧”概念中绝对和相对的东西。不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发现的规律重新对观察的现象和事物进行对比，就很容易偏离到对新事物作出主观主义的说明。

这种把新事物看成与旧事物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主观主义的观点，正是资产阶级和假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特点。这种关于“绝对新的”狭窄观点实际上也是教条主义。美国“西方马克思主义者”C·阿罗诺维茨在他的一本著作扉页上写的一句话很有代表性，他写道：“理论家们用各种方式解释马克思主义，然而，任务在于改变马克思主义。”^⑦

例如，我们思想上的反对者说，弗洛伊德学说赞成那些应当列入马克思主义中的新东西。所以阿罗诺维茨断言：“马克思主义不包含对日常生活，而且特别是对文化和性关系的批判考察，我认为，这些疏忽应当加以纠正。马克思主义需要对个人和家庭进行心理分析所发现的东西，需要有与经济基础结构没有联系的思维理论，也需要国家相对自治的理论。”^⑧ 我们在这里指出从这种“新的”观点中得出的一个局部结论。例如，阿罗诺维茨对法西斯主义本质的解释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他说法西斯主义并不是一种企图制止工人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的恐怖专制，而是一种拥有大量群众的，走在“满足他们对始终与性问题有关的自由的需要的道路上的运动”^⑨。从这个例子中看出，放弃一切旧的原理而把“绝对新的”东西塞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不仅会产生伪科学的，而且会产生公开反动的谎言。

⑦ C·阿罗诺维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危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阶级、政治和文化》1981年纽约版第1页。

⑧ 同上书，第1页。

⑨ 同上。

这样,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看来,具有现实意义的东西既包括稳定的保留下来的思潮,也包括在这些思潮基础上产生的新的东西。作为科学理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本身也完全符合这种认识。

马克思主义中新的范畴和继承性范畴有内在的,也就是不可分割的相互联系;如不根据那些基本的原则(这些原则把过去认识发展的全部进程所建立的轴心作为自己的理论体系),则不可能使某一原理有真正新的东西出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一般原则,并不是一个不得不背上的包袱。在目前实际情况下,它们具有新的形式,新的表现。正因为如此我们也认为,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存在的一种形式。

马·奥热霍夫斯基:我想补充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中的继承性标准也有另一个客观基础,这就是实践。众所周知,革新任何理论,革新总的科学认识需要克服过时的观念和概念。新的东西总是在根除这些旧观念和旧概念的过程中而得到确立。但不应忘记: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的认识中哪些已经过时,哪些需要具体地重新考察、评价或完全抛弃,最终只有依靠实践。谈到实践是最终的一站,在那里将检验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中的某一步正确性时,我们首先指的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总的经验。

为解决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的任务,各兄弟党积累了多方面的经验,其中也有一些消极成分。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学者夸大它们,企图给现实社会主义的实践抹黑,并以此为借口诋毁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声誉。他们忙于编写关于“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财产平均的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等等著作。但这些作者恰恰没有对社会主义建设现实经验的分析。确实存在着某些失算或错误,这些常常受到他们的讽刺和蓄意的夸张。

然而,每一个不抱成见的人都清楚:在实现建设新社会这样一个规模宏大的任务中,而且它是在目的明确地进行有计划的创造,就有可能出现某些错误,以及超前或暂时落后的种种尝试。现实

社会主义的实践，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经验不但没有被驳倒，反而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正确性和现实意义，有能力根据时代的要求作出必要的回答。它们证实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正确性和永久的价值。

自然，任何一位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反对进一步加深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同样也不会反对进一步加深对这种社会体系的单个方面，它的一般规律和每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特征的认识。然而，我们反对一些理论家的思辨态度，试图建立一种人为的、非常抽象的社会主义“模式”。社会主义世界积累了大量建设新社会的积极经验。谁想认真地考虑未来，谁就不可能不注意这些经验。

如何评价力图用资产阶级社会学中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思想去“补充”马克思主义的企图？是否有可能或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任何补充？

阿·科辛：毫无疑问，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广阔实际范围内，它不可能囊括所有的东西，也就是不可能把各种不同质的世界过程的无穷的范围都包括进去。众所周知，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所处的时代不可能把今天的许多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因此补充是必须的。整个问题在于什么样的补充合适，怎样把它们包括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结构中去。

例如，一些资产阶级马克思学家建议用结构主义来补充，（其中有K·列维-斯特劳斯的著作）借口是，结构主义的研究似乎提供了科学研究的新方法。然而这些论断是根本错误的。比如，他们关于这种方法是最近才被发现和制定出来的说法就不正确。因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就令人信服地证明，恰好马克思的《资本论》是系统结构研究的最早的科学实验。

我们的学说的假保护人断定，如果除去马克思青年时代的著作，那么马克思主义一直就忽视人的问题、个性的问题。但这显然是对事实的歪曲。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的精神世界的问题奠定了采取真正科学的、唯物主义态度的基础，解决了有关人的本性

和社会质、有关意识的特性等主要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阐述了关于人的本性和本质的基本思想。

从资产阶级马克思学家的这类争吵中可以得出两点教训。首先，所有的新发现一开始就应该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已经做到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者共同努力所取得的成就相比较。在科学中，发现不会是重复的。一般的规律是认识和利用前辈们劳动的成果。

其次，在这方面所必须做到的，不仅要注意那些已经著名的理论原理，而且也要注意方法论原则。例如，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中的人的问题与资产阶级和假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们的提法不同，它的分析总是很具体的，也就是从考虑那些为人类真正解放所必须解决的、直接的实际任务来进行分析。

自然，首先是要建立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能够满足个人的根本利益，而且不是抽象的“一般个人”、而是劳动的个人。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它的社会一致性的增长、共产主义思想的逐步实现，那些与个人需求和个人利益的形成、个人的积极性和责任、人的因素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等等密切相关的问题，具有越来越多的独立意义。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预见，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将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除了这种新的社会联系，科学技术革命（自动化，生产中机器人的采用）的种种因素在现代条件下也把个人问题提到了第一位。最近科学的迅猛发展，为社会心理学、遗传学、神经心理学、心理生理学等等，为个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具体的材料。必须以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考察这些学科的材料。而这一点当然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的观念作出重大补充。但这绝不能靠机械的结合，而是要通过对部门学科的和哲学的认识进行综合。

一些资产阶级的和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在理解马克思主义某些原理时，完全不顾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的“活的灵魂”。正因为如此，他们试图把一些根本不相容的观点结合在一起。结构主

义，弗洛伊德主义，“哲学人类学”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实际上产生于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问题包含有合理的内核。然而他们也宣传一些错误的观点。他们与马克思主义折衷主义地混合的结果，最终是要宣传脱离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的原则，试图把哲学的、经济的和社会政治的思想推向资产阶级思想家本身所热衷的对社会现象的唯心主义解释。

马克思列宁主义并非象它的反对者们所断言的那样，它不是封闭的、教条主义的体系。它是创造性的、经常发展的、并向人类过去文化遗产中和现在成就中的一切珍品开放的理论。

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结构被改变了吗？如果“是”，有哪些改变？

马·奥热寥夫斯基：我们在交换意见中所阐明的新事物与继承性的辩证法，要求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发展过程中使它的某些原理具有现实意义。具体历史条件的改变使某些问题的研究在该历史时期具有更大的意义，于是它们引起了极大的注意。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结构不是什么新的认识只有硬挤才能“挤进去”的僵硬的骨架。在这一结构中出现了一些新兴的分支，打破了过去的一些界限。我想把它比作正常生长结果的认识之树。

这种发展并不意味着改变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主要根本原则，或是破坏了它的发展的统一逻辑。整个理论的丰富完全是向前发展的和有连贯性的。所以资产阶级思想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任何根据断定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或者安·葛兰西制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模式”，因为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个或那个时期的迫切问题上，而把另一些问题暂时放到一边或把它们留给未来去解决。

今天资产阶级思想家和修正主义者指责马克思主义者忽视异化问题，他们认为这个问题对马克思来说似乎是主要的。突出这个问题是有企图的，即企图证明它的永恒性，证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同样存在着人与生产资料，与整个社会的异化。

早与马克思主义决裂的几·科拉科夫斯基试图把异化说成是费希特学说的变种。其根据是，马克思的辩证法把个人的主观性当作历史哲学的“绝对出发点”。^⑩ 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也受到相应的主观主义的、唯心主义的论述。科拉科夫斯基阉割了它的阶级内容，把问题归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个人“非人格化”。按照他的观点，压迫阶级物质生活条件没有变化而寻找失去的主观性、克服非人道性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唯一含义。他所想象的共产主义不是一个集体主义的社会制度，而只是一个“恢复”个性的社会，那时“……人从他创造的、但不能控制的物质力量奴役下解放出来，可以决定自己个人的发展”。^⑪

科拉科夫斯基对现代人（“一般的人”）也透过个人异化的棱镜进行观察，借口什么个人仍然没有感觉到自己是宇宙的中心、是自己个人行为的创造者而表示抽象的怜悯。这种“非异化人”的概念是为评价现实社会主义的学派服务的，对于这种社会主义，除了指责为极权主义，官僚主义等等，找不到什么别的词儿，因此，科拉科夫斯基所要求的“个人绝对自由”在这里还没有达到。科拉科夫斯基对主观性的论述和把异化概念的绝对化是他把马克思的观点与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的观点、基督教的观点、修正主义的歪曲以及在这个基础上所产生的实际上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观点“结合”起来的最恰当的手段。这里面临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构、发展进程和内容本身的明显的歪曲。

重要的是，要明确地强调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发展不是什么自发的过程。它的革新、着重点的变化、某些问题的现实化总是受到实践需要和科学认识需要的制约。马克思主义思想之树生长出了许许多多的枝叉。其中，象整个科学认识一样，贯穿着分化和一体化的过程。不过，还没有一个具有相当重要意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在理论运用范围异常扩大的情况下，在人类解决

^⑩ 见几·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1978年牛津版第1卷第50页。

^⑪ 同上书，第180页。

的全部问题中，似乎已丧失了现实意义。

谈到整个资产阶级的马克思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请让我作出下述结论：他们有关马克思主义发展问题的提法由于十分抽象，因而可以在理论领域内进行肆意的歪曲。一方面，借口马克思主义已经“陈旧”而否定他们认为是最危险的东西。另一方面，则把那些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根本矛盾的“新知识”强加给它。这种相对论的、主观主义的立场的基础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客观内容的否定，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表述了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规律性。应当指出，这种蓄意抽象表达的立场具有完全明确的实际含义。而它在意识形态方面却完全不是抽象的，它的目标是要履行明确的意识形态职能——败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威信，动摇它的基础。

原载《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
杂志 1986 年第 3 期，译文
作了一些删节。

(岑川译)

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 一些现象的思考

〔英〕阿·齐曼斯基

本文的论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从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到今天的发展，最好从理论与革命运动相互影响、产生一系列周期方面来理解。这些周期又反映正统与开放和折衷提法之间的摇摆。因此，马克思主义的长期发展大致可以描述为螺旋的曲线，而不是静止的体系、直线的趋势或相同两极之间的来回运动。

现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处于危机中的一般说法，必须从这两种长期发展趋势方面来理解。如果对这个理论的起源、各种关联以及未来变化的潜力没有真正历史的理解，那就既不能充分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理论的价值，也不能完全了解对其重新进行阐述的现实需要。首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必须被理解为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一直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载体”的群众运动的产物。这些群众运动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的变化而兴起和衰落。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既被加强活力，又被减少活力，不用说还必须面对每个革命时期的具体情况。群众运动是社会的一部分，只要群众运动随着社会的特殊矛盾起伏不定，这种规律性就有可能反复发生。

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按照任何固有的逻辑以一种机械的方式发展的。它的发展毋宁说从根本上是对它的追随者的情趣和热情的反应。在深切地感受到社会和政治危机的时期，正统的革命思想就会受到重视；在稳定和繁荣时期，开放的、折衷的提法就更有意义。在西方的产业工人运动兴盛时期，作为主流的马克思主义

的阐释就反映了这种运动的问题。而在农民运动或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的斗争方兴未艾之时，马克思主义的新提法就反映了这种现实的特点。简言之，马克思主义既不是不变的教条，也不表现为长期的直线运动。相反，它的发展在本质上（“归根结蒂”）表现了它所在的社会的历史脉搏。

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周期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或许可以看作由四个阶段构成的基本周期的不断重复：一、加强活力或推动的时期；二、形成的时期——重申革命的和唯物主义的理论；三、革命提法淡化的时期；四、明显的“修正主义”占优势的时期。

这样，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划分成五个（或五个半）时期，每一时期都经历了这样一个周期。这些按开始革命高涨的时间大致划分的时期是：1843—1849；1864—1871（半个时期）；1884—1906；1917—1921；1935—1949以及1967—1970^①。反映每个阶段主要矛盾的群众运动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给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打上了它们的印记。

第一阶段。这是由社会危机引起的革命运动迅速发展的时期。这种运动的特点是有“冲天”干劲、高度热情、富于理想主义，相信通过能动的干预能引起质的变化。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在这个阶段，系统的理论通常很少发展，或者不是普遍被接受。伦理主义和质朴观念一般居主导地位。在这个时期产生出精力去创立或制订一种能够说明人民不幸的原因并指导社会变革的关于社会、危机、斗争和改革的理论。在第一次热情高涨未能实现预期目标之后，发展或革新理论的倾向在这个阶段变得最明显，结果是寻求更加唯物主义的解释。

^① 这些时期的时间划分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不同地区多少有些差异是不足为奇的，因为所有的运动不会确切地在同一时间达到高潮。

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作为小册子、论战文章或宣言书写出来的萌芽状态的理论著作，在这个时期通常由早期的年轻行动主义领袖们详细阐发，发展成为包括早期经验在内的全面的理论和经验著作。这是革命理论同革命实践高度结合的时期。早期阶段开始的群众运动依然保持其大部分力量和热情。但是这时这种力量和热情已受到组织的约束和理论的指导。革命理论有时显得空洞并与群众运动脱节。

不过，理论家们现在有时间来进行详尽的理论分析，这说明基本的社会危机正在缓和，群众的热情正在慢慢地（或者在一些情况下由于受到暴力的镇压，不是慢慢地）消退。这期间谈论的主要问题是：阶级分析、生产方式、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先锋党、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政治经济学、辩证法、矛盾、纪律等等。总之，占主导地位的是正统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范畴。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如《资本论》（1867）、《反杜林论》（1878）、《帝国主义论》（1916）、《国家与革命》（1917）、《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狱中札记》（1929—1935）、《资本的积累》（1913）、《布尔什维克革命史》（1932）、《单向度的人》（1964）、《垄断资本》（1966）、《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1974），就是在这些时期写出来的。（有些著作推迟很久以后才发表。例如，马尔库塞、巴兰以及斯威齐等人60年代的著作经过了25年的发育期。）

第三阶段。在第二阶段快结束时开始出现的理论（革命）与实践（改良）的脱节，在这期间开始占主导地位。在第一阶段的革命动乱中造就的知识分子、理论家和领袖们还在继续办报纸、写文章，提出知识分子的激进观点，然而群众运动的实践这时已明显趋向改良主义，反映出相对繁荣、宁静和平和没有压迫的普遍无危机气氛。

这期间谈论的仍然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但是在词句和理论的真实含义中反映出的内容实质却经受了往唯心主义、折衷主义、唯意志论、主观主义、民主主义、改良主义和渐进政治方向的

根本改造。甚至在正统的语言和论证方式仍然流行的时候，强调的越来越多的是渐进主义、开放性、缩小工人阶级作用、文化、个人主义、无需纪律等。例如，唯心主义就通过“思想是物质力量”的话表述出来。马克思列宁的语录被用来说明党的纪律和统一水平应该降低；妇女、少数民族或中间阶级也和工人阶级一样是政治运动的核心力量；阶级分析只是真理的一部分；马克思是支持新闻自由的，并且他首先是一个十足的民主派；等等。

在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它早期特有的锋芒（反映出它失去了冲天的干劲和意志力）。但是，理论家们却继续为那正在变得虚伪的东西饶舌。可能这方面最著名的人物要算卡尔·考茨基了。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多数共产党及其周围的知识分子可能也是如此。

第四阶段。从第三阶段到第四阶段的过渡时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正危机时期。一方面，大多数受过马克思主义正统训练的人已看得很清楚，他们的概念和言论已与当前的政治现实很少关联。历史唯物主义被拒之门外。许多开放的、非教条的以及通常比较年轻的知识分子重新发现了大量在很久以前已被丢弃了的观点。并且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保留部分同其他各种理论流派综合起来。民主主义、唯心主义和个人主义普遍流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危机强烈地被感觉到。一切都需要重新审查。创新之风荡涤了一切教条。当前一个时期的越来越是人为编造的东西垮台以后，又重新恢复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不过现在是明确的改良主义和修正理论之间的统一。

少数人死守正统范畴而不管那曾经使它们获得生命力的群众运动已经消逝了，可说是负隅顽抗。为什么没有革命，何以解释群众运动的消退，成了中心问题。各种派别都指责失败的原因是没有足够革命的分析、领导或组织。这里只有宗派的争吵，没有对基本范畴的重新考察。

维持革命唯物主义的代价，是批判理论与实践的分离明朗化。

这种分离的必然结果是教条主义（在没有相应实践的情况下维持理论）、宗派主义（不断进行关于理论的争吵而没有解决问题的实践和群众运动）和实践与理论不相干（当群众运动的领导基本上落到持修正主义理论的人手中时）。革命的唯物主义既然被禁锢在一个硬壳里，也就僵化了。但是这种不相干却使得那一度是生动活泼的、有创造性的和强大生命力的东西的种子保持着生命力。

在这个时期当中，主要群众运动成功的长处（即促进改革的很好的实践意识）也就是它的短处（即没有批判的理解力和想象力）。同样地，它的理论上的短处又正是它的长处（理论并不阻碍对短期效益的实际追求）。这时带有宗派性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情形恰恰相反。它的短处（相对缺乏与大规模群众运动的结合）却使它得以保持其长处（批判的范畴，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本性不抱幻想的长远观点）不为竞选或争取短期内大发展的企图所妨碍。同样，它的长处就是它的短处：它的长远的和批判的观点外面包着教条主义的外壳，对工人没有多大吸引力，而关于革命未能实现、各种马克思主义小组未能发展的原因的宗派性争论甚至使这个坚硬核心的许多残余分子都大失所望。

爱德华·伯恩施坦是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第一个提出第四阶段的基本原则的人^②。他的著作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50年代后期或70年代后期都能写出来。（实质上由别人写出来了。）这本著作的论点在繁荣、和平和稳定时期对那些领导群众运动的人和知识分子都有意义。不过，这也同样是事实：在群众革命热情高涨、想象力旺盛的时期，这本书就显得滑稽可笑——在1919、1945、1969年，它明显地与群众运动的现实和左翼知识分子的主张不协调。历史的车轮转得多么快！

伯恩施坦以今天听起来完全现代的语言表述了实际所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第四阶段中一再流行的基本思想。伯恩施坦断言，

② 见《进化的社会主义》1961年纽约版。

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一种长期稳定的制度，预期它在未来不会发生任何大的危机。这话在1900、1928、1960或1978年听起来并不错，但在1918、1933、1945或1968年就不谐合（而且与较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任何时候的经验都不大相符）。

“我们在一切先进国家都看到，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特权正在逐渐地向民主组织让步……一个社会性的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趋势已经出现……

只要一个国家到了这样的地步，即少数有产阶级的权利不再是社会进步的严重障碍，政治活动中否定的工作并不比肯定的或建设性的工作更迫切，那么，暴力革命的口号就变得无意义了”。^③

伯恩施坦是第一个赞美抽象民主和自由的人，他的主张与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强调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背道而驰的。他的论点在1925年、50年代或70年代后期也能同样提出来。可是伯恩施坦的主张在1933年到1945年期间的德国，或者在30年代的几乎整个欧洲，以及在今天的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中，只会引起人们的嘲笑。

伯恩施坦对于劳动价值理论、历史唯物主义、阶级分析以及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等等，也都持强烈的反对态度^④。的确，实际上80年代的改良主义者和渐进派的所有基本主张都在1899年多少得到了充分的阐述，并在20年代后期、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被一再重申。伯恩施坦的主张在这些时期受到思想解放的知识分子的欢迎，但总是随后被革命浪潮所抛弃。

正如伯恩施坦的书在气候适当的时候被一再重版，或由他人重新加以阐述，每次都有大批新的读者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革命著作，不管是他们的原著还是别人的阐述，也在不断地再版。例如，列宁在他的小册子《国家与革命》（1917）中第二次阐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的基本观点。而列宁和马克思恩格斯

^③ 同上书，第XXIV、XXV和218页。

^④ 见上书，第6—40、54—73、221页。

关于这方面的基本观点，40年代又在各国共产党出的许多小册子里第三次被重申。在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早期，它们又一次得到阐述。^⑤

伯恩施坦的理论流行的时候，恩格斯与列宁、40年代各国共产党或波朗查斯关于国家的理论就会被斥为教条主义。^⑥有时候，同一本书先是无人问津，让耗子去啃，后来又（并且是一再）被重新发现，广为流传。

新左派在60年代的发展是这种周期过程的最好例子。这种大学生运动的主流思想大体上出自社会民主党的传统（在美国出自与社会党有关的工业民主同盟），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受到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影响。在60年代前期倡导民主主义，而到了60年代末则变为倡导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革命、工人阶级等名词，在60年代早期由于它们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不谐调的气氛曾经备受嘲笑。但是在1966年以后，它们很快成了极为重要的概念。革命的青年运动使革命的语言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这种语言现在显得非常合适了。60年代早期的自由主义言论事实上现在受到新左派主流的嘲笑和怀疑，这正如美国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1970年的言论在80年代受到西方知识分子的嘲笑和怀疑一样。的确，到了1980年，事情从10年前的地方又转了整整一圈。伯恩施坦的思想现在又一次引起共鸣。

各种周期：简单的历史描述

头四个半周期现在可以大略地加以描述。最近的第五个周期将在下一节详细说明。

1843—1849年。马克思主义发源于马克思恩格斯上世纪40年

^⑤ 例如，尼科斯·波朗查斯所著的《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1973年伦敦版）一书，把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解释成符合当代知识分子口味的观点。

^⑥ 见鲍勃·约瑟夫：《资本主义国家》1982年纽约版。

代的早期著作。这些著作大部分经受了作为1848—1849年革命先导的德国革命运动的考验。由于马克思、恩格斯青年时期参加了革命的实践活动，他们的早期著作如《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以及完成这个阶段的著作《共产党宣言》(1849)充满了革命的活力。

由于1849年的革命运动被镇压，马克思与恩格斯开始了长期的流亡生活。在这革命运动的潜伏时期，改良主义的思想很快在理论上占了主导地位。例如，拉萨尔的思想成为德国工人运动中占主要地位的思想；英国的工联主义取代了宪章主义。在新兴的群众运动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改良主义而不是革命思想，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马克思恩格斯在比较孤立的情况下坚持他们的革命唯物主义也是不足为奇的。

在上世纪60年代后半期，工人阶级的激进主义得到复兴。以1871年巴黎事件告终的1864年成立了国际工人联合会，以援助各国的工人运动。马克思与恩格斯成为其中的中坚分子。但是，1871年对巴黎公社的暴力镇压以及周围其他各国的相应镇压使这个激进的工人运动夭折了。

1884—1906年。这是一个工业迅速发展、阶级斗争空前激烈的时期，1905年革命的时期（这一革命在俄罗斯帝国促成了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主张，在德国则促使人们重新坚持卢森堡的革命理论）。这个时期还发生了美国历史上大概是最激烈的阶级冲突，开展了许多次轰轰烈烈的罢工运动，并创立了“世界产业工人工会”（1905）。那时还产生了美国社会党（1901），该党党员人数迅速增长，1912年达到顶峰。英国工党成为一个大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增加了他们的选票，成为帝国最大的政党。在法国，这是一个战斗性罢工和各种倾向不同的激进左派迅速增长的年代。

在这个时期，和在以前的工人阶级斗争浪潮中一样，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大学“外面”发展的。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实际上大部分是直到二次大战以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由那些有机地

加入群众运动的人发展的(用葛兰西的话说,是由有机的知识分子发展的)。

由于德国的运动规模最大,它首先感觉到改良的压力。这样,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第一次历史性“危机”就是在德国发生的。伯恩施坦的《进化的社会主义》发表于1899年,此后修正主义得到了强有力的发展。由于罗莎·卢森堡关于暴力阶级斗争的主张看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远离德国现实,所以,尽管1905年的东方事件曾经为她的革命策略提供了根据,但是在德国它还是失去了根基。

1917—1921年。随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1914年到1918年的战争和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引起的危机,发生了第三次大规模的革命运动。战争给整个欧洲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造成的难以置信的生命损失与极大的灾难,使繁荣和民主以及对资本主义的各种乐观幻想顿时荡然无存。随着对战争失望情绪的扩展和资本的经济矛盾再次突出,富于战斗性的左派迅速发展起来。

1917年到1921年间的革命高涨,产生了卢卡奇的著作(尤其是他的《历史和阶级意识》)、葛兰西和早期卡·科尔施的著作、批判理论学派的早期著作以及把马克思与弗洛伊德综合在一起的威廉·赖希的著作。实际上,卢卡奇与葛兰西是有意想把列宁主义和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经验用适合西欧的语言表述出来。例如,纪律、政党、革命意志、军事和意识形态的领导、非法斗争夺取政权等等问题在他们的著作中占有中心地位。可以说,他们两人打算把列宁解释得使知识分子能够接受。

当1917—1921年的革命危机浪潮于20年代后期在知识分子当中最终爆发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历了它的第二个历史性危机。当早期的许多理论家这时变得很苦恼,新的共产主义运动越来越成为宗派性的东西时,有些理论家放弃了革命的分析。有些理论家先是转向了实验的、实际上是改良主义的观点,最终转向非批判的观点(例如,德国的传统批判理论)。有些理论家则变疯了(例如威廉·赖希)。另有许多理论家接受了受到越来越严格纪律约束的

共产党的新正统，抑制他们的创新趋势，以便成为依然很大的群众政治运动的一部分。

1935—1939年。随着经济萧条和战争动乱而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复兴，采取了重申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共产国际内部发展的范畴和理论的形式（这些范畴和理论大体上都是该组织分别于1928年和1935年召开的第六和第七次国际代表大会的文件中提出的）。

这个时期的精神产品，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任何其他复兴时期相比，更多的是（用葛兰西的话说）集体知识分子的产物。战前革命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争论可以很清楚地与某些个人如卢森堡、普列汉诺夫、考茨基、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联系起来，以后的情况就不再是这样了。这是因为，这个时期的各種不同思想在组织上与群众运动的联系比以前或后来的任何其他时期都更加紧密。现在一般说来很难把这个别马克思主义者看作某一种思想或理论的主要来源，即便是某篇论战文章、宣言书或小册子可能署上某个党的领导人的名字（如斯大林、毛泽东、铁托、胡志明）。^⑦应该指出的是，公开发表的被说成是属于这些个人的思想，随着党内情绪的变化而变化。这就表明了他们的产品的集体性质。

在整个50年代，随着繁荣、和平与社会稳定的恢复，革命热情消退了。结果使创造性的革命理论和想象力也消退了。因而促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危机。革命运动的衰落又一次造成了群众运动与正统理论的分离；工人运动和进步的知识分子拒绝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因为它现在对于他们的经验根本讲不通。各种存在主义思潮、大大淡化了的“批判理论”、“垮掉的一代”以及其他浪漫的和主观主义的意识现在引起了知识分子的兴趣。一切都要受到重

^⑦ 阿尔·齐曼斯基：《红旗在飘扬吗：今天苏联的政治经济学》1979年伦敦版第10章和《人权在苏联》1984年伦敦版第7章介绍了斯大林、个人崇拜以及斯大林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作用。这些分析太复杂，这里无法重复，并且这个问题太富于感情色彩，不便简略概述。

新考查。现在“没有一个人”再是马克思主义者。

当 代 的 周 期

1967—1970年群众运动的高涨，反映了中国的发展、古巴的革命、越南的战争以及美国的人权斗争。在所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这种高涨都反映在革命马克思主义高度受到重视上面。“每一个人”（至少青年知识分子中的每一个人）再一次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主要的讨论又以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进行。革命、阶级、阶级分析、帝国主义、人民战争、矛盾、辩证法等名词又（迅速地）流行起来，年轻人开始嘲笑五十年代曾经非常时髦、而现在已变得陈旧了的自由主义语言（“意识形态的终结”）。民主、选举、议会、改良、自由主义等等成了可笑的名词。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左派反对议会道路，反对自由主义（模仿他们所欣赏的中国、越南和古巴的运动）。

一个组织和出版的新热潮开始了。在这个热潮中，复兴的左派发展了它的思想。在美国，实际上每一个大的学科在1968—1971年期间都建立了激进的组织——可能最持久、最有影响的是激进政治经济学协会。创办了许多新的左派刊物，继续出版的有：《社会主义革命》（70年代中叶改名为《社会主义评论》）、《造反的社会学家》、《政治与社会》、《激进的美国》、《目的》（70年代中叶抛弃了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宗旨）、《科学为人民》，这只不过是其中少数几种比较著名的刊物。引人注目的是，浏览一下左派书店里摆出的1983年的杂志，就会发现大部分左派期刊都办到第14或15卷。因此，1968年这一代人留下了一笔仍继续存在的精神遗产，正如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的上一代人一样，他们办的刊物以相当健康的形式存在到60年代的有《每月评论》（1949）、《前卫》（1948）以及《科学和社会》（1936）。象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新主张一样，60年代后期的浪潮也有它的创新。这些创新一方面反映了它在第三世界掀

起的强大的风波，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它在欧洲和南美青年中的中产阶级基础。“第三世界”的概念（包含着既与西方资本主义又与苏联马克思主义有质的不同的意思）实际上已经成为通用的概念。“解放运动”的概念，受到越南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实际上已被应用于一切进步的运动——如“妇女解放运动”、“性解放运动”，甚至还有“社会学解放运动”。反独裁主义以及各类新生活方式的实验受到了中国青年人反独裁主义思想和拉丁美洲与东南亚游击战士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鼓舞（虽然这种两性的和生活方式的实验与“第三世界”运动的精神相距甚远）。“第三世界”“有色人种”的斗争活动以及60年代美国黑人斗争骚乱的事实使得“种族”和民族问题成为重要的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70年代期间，由于60年代复兴的革命热情消失了，象妇女运动这样的新概念倒是被促成了。

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的情形一样，早期阶段的着重点又被放在意志和想象力上面；实际上，卢卡奇和葛兰西的著作被恢复了名誉，并且比以前更多得多地被赋予了唯意志论和个人主义的解释。在复兴的后期阶段，也重新出现了对纪律和党的强调——只是在这时人们读的是列宁和毛泽东的著作，而不是卢卡奇和葛兰西的著作。批判理论重新流行，弗洛伊德特别受到重视。马尔库塞的《性爱与文明》和《单向度的人》成为极有影响的书（就象当年赖希的著作一样，不过赖希的著作还略有逊色）。

60年代的革命热情在法国路易·阿尔都塞（其次是尼科斯·波朗查斯）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中得到了最深奥微妙的反映。阿尔都塞在整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是法国共产党内一位富有战斗精神的人。他最早的著作在1962年开始发表，对50年代后半期西方知识分子中流行的马克思主义自由化如黑格尔主义、人道主义、历史主义、存在主义、折衷主义等进行了批判。他起初是前一次浪潮的产物，但他的名望和影响随着60年代新左派的发展而不断扩大，最后在70年代早期由于第三世界革命和群众性的新左派运动而达到了顶点。这样，阿尔都塞成了革命理论新潮中的一部分。

就个人而言，唯有阿尔都塞证明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正统观念的复兴，并通过青年知识分子能够接受的语言对其进行了创造性的重新阐释。他也能把列宁的语言解释得使知识分子能够接受。当然，他的列宁跟卢卡奇的列宁是不同的。卢卡奇同样是在革命的意义上解释列宁的，但他的解释更具有唯意志论和罗曼蒂克的色彩。

不过，阿尔都塞(以及波朗查斯)给予正统马克思主义关于唯物主义、阶级分析、工人阶级、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国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等进一步概念化了的理论以极大的可靠性。阿尔都塞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相对自主性等理论，赋予了正统马克思主义基本范畴以深度。最老练的欧洲知识分子再一次能够用一种能抵挡住(如果不是压住)他们的唯意志论、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对手的理论来维护正统马克思主义。

到了 70 年代，美国的黑人反抗早已偃旗息鼓；越南战争逐步降级；学生运动平静下来，大学校内再一次罩上淡漠的气氛。随着革命热情的消退，马克思主义又一次进入危机阶段，旧的问题和答案不再令人满意。新的解释流行起来，这种新的解释起初大体上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部，但是越来越超出这个范围。象五十年代一样，西方知识分子又一次离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象任何时候一样，内容比措词变得更快。在 7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实质上所有的人都依然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这个名称和有关的论述几乎失去了全部内容。70 年代后期在法国，不久以后在其他西方国家，各种各样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经验主义以及改良主义的意识形态占据了主导地位。甚至解释学和符号学的神学范畴也流行起来。

当了短暂几年知识分子左派宠儿的阿尔都塞和波朗查斯，很快就名声变坏，成为“教条主义者”以至“斯大林主义者”。这给他们施加了极大的压力，迫使他们去重新获得声誉。作为一般的凡人，他们的最初的反映是对他们早期具有洞察力的正统思想进行

基本上是改良主义的改造。波朗查斯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1978)中转向了基本上是改良主义的政治分析，而阿尔都塞则因为“斯大林主义”而公开批评法国共产党。他们丢掉了那曾使他们变得伟大的东西。由于既不能在千人指责的情况下保持住他们的方向，又不能在这个不再时兴马克思主义的世界上重新调整他们自己，结果前者精神失常，害死了自己的妻子，后者则跳楼自杀了。他们作为知识分子形象的消失，使巴黎人高度崇尚象拉冈和福柯这样明显的非马克思主义者(这两人现在是红极一时的人物)。正象在1968年事件后对法国人的尊敬使阿尔都塞和波朗查斯在知识界备受尊崇一样，受尊敬的法国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消失也很快就传遍知识界。现在“没有一个人”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

对这个周期第二阶段很重要的名词和概念——阶级、唯物主义、经济危机、帝国主义、生产方式、无产阶级领导、统治阶级、阶级分析，等等——现在听起来越来越不协调。而民主化、自治、议会斗争、文化、多种因素决定、知识分子或妇女的领导作用、符号学等概念则成了时代的回声。

起初，这种新内容被勉强塞到旧的马克思主义名词里，“社会主义的自治”或对所有人的充分民主；知识分子是“新的工人阶级”；妇女(包括有专门职业者)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在国家范围内发生；文化是一种物质力量；集中注意生产方式的决定论是否定政治作用的经济主义；剩余劳动比剩余价值更精确地表述了剥削的实质；等等。但是马克思主义范畴的延伸超过断裂点的情况很快就变得很明显，于是越来越多地抛弃旧的名词而采用新的名词。关于阶级、物质力量、党、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价值以及剥削理论等等的讨论现在完全被当作多余的教条主义包袱(显然的确是包袱)而丢弃了。人道主义、经验主义、唯意志论、折衷主义和唯心主义等现在已不再加什么掩饰，而且被拿来自豪地炫耀。

1968年前后的主要的大规模示威运动以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群众斗争中日益孤立出来(这种斗争现在是由坚定的社

会民主人士领导)。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西方的群众运动又一次完全分离了。

结 论

总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留下了革命的正统思想同改良主义之间来来回回周期性运动的足迹，跳跃之后是停滞，与每个阶段强大革命运动的具体问题相对应。应该注意，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较大的创新是在正统期间出现的，是同重申诸如阶级、革命、国家和唯物主义等这样的基本概念一起出现的，新的概念和理论的引进，是为了解决历史发展和革命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因此，尽管宣称开放和与其他思想体系综合，实际上改良主义时期是最少创造性的，大多是重复以前的思想，例如重复伯恩施坦的那些思想，比新的正统思想重复马克思或列宁的思想有过之而无不及。

实际上，富于想象力的和真正批判的理论盛行之时，恰是正统马克思主义占优势之际。正是在那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流行的各种意识形态极不相同（结果是更富批判精神），而且更可能产生出新颖的、富有想象力的远见卓识。相反，在改良主义的概念和综合占优势的时期，开放的盛行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锋芒变钝（由于它的思想更相似于那些意识形态的主流），而且极少想象力和洞察力。

这些事实只是看上去令人啼笑皆非。现实为意识形态所遮蔽。无论正统的意识形态还是修正主义的意识形态都是如此，前者根据其经典思想而宣称自己是合法的，后者则以开放为基础，也宣称自己是合法的。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严格研究表明，理论的发展不是出自于知识分子的头脑，而是出自于革命运动的需要和经验。

不论是在大学里还是在群众运动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状况基本上是由社会运动的条件决定的，其危机也是如此。在危机期

间，革命热情复苏，接着就出现了阶级斗争的尖锐时期。劳动人民的热情和想象力倾泻给知识分子。正统的、批判的和富有想象力的马克思主义复兴起来并接近领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再次变得与革命运动紧密联系时，它就重新获得了威力。

西方许多今天仍然坚持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人跟巴基斯坦、拉丁美洲、南部非洲、中东或菲律宾等不发达国家的生气勃勃的群众运动有着紧密的联系，这并非偶然。

在先进国家中，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统治时期，是与伴随严重的和持久的经济危机（甚至连续的战争更是如此）而发生强大运动相对应的。因此，可以预言，开放的和改良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当前的优势，将由于持久的经济萧条或战争而被推翻。旧时代的那种阶级斗争很有可能随着巨大的社会动乱及其引起的失望情绪而重新出现。实际上，先进国家革命运动的复兴很可能在那些伴随布尔什维克革命而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引起富有想象力的创新。

原载美国《科学和社会》杂志

1985年第49卷第3期

（李惠斌译 劳徒校）

“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 并不是被列宁否定的“旧观念” ——答张克明同志

何 宏 江

张克明同志在1986年《政治学研究》第五期上发表了《我对列宁所说“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的新理解》一文，认为根据上下文来看，“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这句话不是列宁对政治下的定义，而是列宁要否定的一种对政治看法的旧观念，他并且对《列宁选集》中这句话的中译文提出了批评，认为中译文没有把列宁所持的这种否定态度表达出来。1986年10月9日《文汇报》第354期对张克明同志的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摘要作了介绍。

对列宁的这段话应该如何理解呢？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列宁的原话。1920年11月3日，列宁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局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这段话就出自这篇《讲话》。列宁说：

“Но как понимать политику？ Если понимать политику в смысле старом, то можно впасть в большую и тяжелую ошибку. Политика—это борьба между классами, политика—это отношения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 борющегося за 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против всемирной буржуазии. Но в нашей борьбе выделяются две стороны дела: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задача разрушить на-

следие буржуазного строя, разрушить попытки раздавить Советскую власть, повторяемые всей буржуазией. До сих пор эта задача более всего занимала наше внимание и мешала перейти к другой задаче — задаче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Политика в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и буржуазного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я была как бы оторвана от экономики...”^①

从原文来看,“Политика—это борьба между классами, политика—это отношения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 борющегося за 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против всемирной буржуазии。”是一句肯定句，丝毫没有否定的意思。应该说《列宁选集》中译文没有把这句话译成否定语气是正确的。我们查对了英、德、日等各种文字的译本，也没有发现哪一种译本是把这句话当作否定语气来处理的。如果说这段译文有不足之处的话，那就是把紧接在下面的一句话中的“но”漏译了。原译“我们的斗争有两个方面”，表达较平，没有把原文中的转折语气译出来，而列宁是说“但是我们的斗争有两个方面”。新版《列宁全集》对这段话的译文稍许作了一些改动：

“但是如何理解政治呢？要是用旧观点来理解政治，就要犯很大的严重的错误。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就是无产阶级为争取解放而与世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关系。但是我们的斗争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要粉碎资产阶级制度遗留下来的东西，粉碎整个资产阶级一再想消灭苏维埃政权的尝试。到目前为止，这个任务吸引了我们最大的注意力，妨碍了我们转向另一方面的任务——建设任务。在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概念中，政治似乎是脱离经济的。……”^②。

①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406页。

② 同上书，中文第2版第39卷第406页，文中的着重号是本文作者加的。

从这段译文来看，由于后一句话中补译了“但是”这两个字，意思更为明确，决不可能导致张克明同志所得出的那种“新理解”。列宁在这里先对“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就是无产阶级为争取解放而与世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关系”作了肯定，接着指出，但是这里说的斗争有两个方面或两个任务：一方面要粉碎资产阶级的复辟尝试，另一方面要进行建设。而“在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概念中，政治好象是脱离经济的。”我们认为，这就是列宁在这段话一开始批评的理解政治的旧观点。

我们知道，列宁在谈到无产阶级国家的对内职能时，常常讲到镇压和建设两项任务。我们在这里讨论的《讲话》中的这段话同样说的是这个问题。列宁在谈无产阶级国家的镇压和建设任务时，实际上都是在讲阶级关系。镇压也好，建设也好，都是为实现无产阶级的最终目的——建成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服务的。例如，列宁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一文中讲到如何消灭阶级时就说过首先要推翻地主和资本家，其次要消灭小生产者，消灭工农之间（在所有制上的）差别。列宁指出，后一个任务要比前一个任务困难得多，必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完成后一个任务不能采用推翻哪个阶级的办法，只能把整个社会经济在组织上加以改造，只有从个体的、单独的小商品经济过渡到公共的大经济。这样的过渡必然是非常长久的。^③列宁还反复强调，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一个任务（消灭工农之间的差别）越来越成为重点，为此就需要为改造小农创造物质基础（电气化）。所以，列宁从来不是孤立地就建设来谈建设的。

列宁对于政治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他在这方面的思想是一个有机的完整的整体。对于列宁《讲话》中的这段话如同对待列宁关于其他问题的论述一样，不能断章取义，不能割裂地来看，而要联系他关于同一问题的其他许多论述来研究。按照张克明同志的

^③ 见上书，第37卷第272—273页。

“新理解”，“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是列宁要否定的旧观念，那么“政治就是无产阶级为争取解放而与世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关系”这句话也应该包括在内，也应该是列宁加以否定的，因为这两个判断句是包括在同一个句子中的。列宁决不可能只否定前一个判断，而不否定后一个判断，否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而据我们所知，这两个判断句所表述的思想列宁曾经反复论证过。如1919年1月19日他在给印涅萨·阿尔曼德的信中就说过：“政治是各个民族、各个阶级等等之间的关系”。^④特别要指出，列宁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局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讲话之后，过了四个多月，他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就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问题报告时，又一次说道：“政治就是阶级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决定着共和国的命运。”^⑤与此同时，他在写作《论粮食税》时草拟的提纲中还写了这样一段话：

“什么是‘政治’？

- (1) 无产阶级先锋队对本阶级群众
- (2) 无产阶级对农民
- (3) 无产阶级(和农民)对资产阶级。”^⑥

我们以上引了列宁在此前后关于政治的几段论述，在这几段论述中列宁都是作了肯定的判断的，没有一处是持否定看法的。既然在这篇《讲话》的前后，列宁对这个提法反复作了肯定，那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可以得出结论，说列宁在这篇《讲话》中对“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就是无产阶级为争取解放而与世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关系”这个提法采取了否定的看法呢？

我们已经说过，列宁在《讲话》中批评的理解政治的旧观点就是那种把政治同经济割裂开来的看法。在这方面，列宁在这一时

④ 同上书，中文第1版第35卷第262页。

⑤ 同上书，中文第2版第41卷第65页。

⑥ 同上书，第379页。

期中同样也有过许多论述。如他说：“政治 = 集中起来的经济”^⑦，“政治是集中了的经济”^⑧。这个思想他在 1921 年 1 月 25 日写的《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一文中，在批判布哈林的折衷主义错误时谈得更为明确。他重申：“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他还说：“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⑨ 从这几段论述中可以看出，列宁在强调政治不能脱离经济，两者不能割裂开来的同时，并不认为，经济可以和政治并列，更不要说经济可以取代政治了。

再拿张克明同志的文末提到的列宁的另一段关于政治的论述来看。张克明同志认为，列宁说的“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⑩ 才是列宁给政治下的定义。但是即使从这句话来看，也不能认为列宁在这里否定了“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这个看法，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来看，国家是一个阶级的概念。列宁说过：“国家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使用暴力的机关或者机器。”^⑪ 他还说：“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阶级始终是存在的。阶级一消失，专政也就不需要了。没有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是不会消失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阶级依然存在，但每个阶级都起了变化，它们相互间的关系也起了变化。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并不消失，只是采取了别的形式。”^⑫ 因此，我们决不能因为列宁说“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就可以把“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排除在“国家事务”之

⑦ 同上书，第 10 卷第 404 页。

⑧ 同上书，第 43 卷第 120 页。

⑨ 同上书，第 40 卷第 279—280 页。

⑩ 同上书，第 31 卷第 128 页。

⑪ 同上书，第 32 卷第 310 页。

⑫ 同上书，第 37 卷第 275 页。

外。应该说，这两个提法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补充的。

“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这段话出自《关于国家的作用问题》一文提纲。由于《关于国家的作用问题》这篇文章没有写成，列宁没有详细地展开地解释这段话的意思。但是，我们知道，列宁写这个提纲的目的是要纠正布哈林在反驳机会主义的国家观点（把国家神圣化、永恒化）时的错误看法（说无产阶级政党在原则上敌视国家），强调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国家的作用。如果我们仔细看一看这个提纲，就会明白，列宁在这个提纲中着重强调的是无产阶级国家的镇压作用，即无产阶级在夺得政权后要利用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自己消灭阶级的最终目的。这里既包括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也包括进行经济建设，即为消灭阶级创造物质条件。了解了列宁写作这个提纲的背景，再对“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这句话的上下文仔细研读，那么对这句话就决不可能得出张克明同志那样的解释了。

张克明同志在他的文章中对列宁发表这一《讲话》的历史背景作了分析，当时确实如他所说的，弗兰格尔白卫军已被打垮，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基本结束，全国工作的重心要向经济建设转移。但是当时苏俄国内的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这方面的任务依然很重，不但日本武装干涉军还没有从远东撤走，而且几个月后喀琅施塔得发生了规模不小的反革命武装暴动，国内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农民小生产者对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权十分不满。这样，俄共（布）和列宁才提出了新经济政策，调整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列宁决不可能把“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这个说法斥之为应该否定的旧观点。还应该指出的是，实行新经济政策，决不是单纯地抓粮食、煤炭，从根本上来说，其目的是要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是要和资产阶级争夺农民的问题。所以，列宁才说这场斗争要比反对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斗争更加剧烈、更加残酷。

我们上面说了列宁并没有否定“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

政治就是无产阶级为争取解放而与世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关系”这个提法。那么，这句话是不是列宁给政治下的定义呢？我们认为，列宁关于政治这个概念有过许多论述，不下几十处之多，他在不同的场合强调了不同的侧面，他并不总是象教科书那样对政治这个概念作完整的全面的论述。张克明同志把苏联学者罗森塔塔尔和尤金编的《简明哲学词典》中“政治”词条的释文没有引用列宁这句话作为否定这句话是列宁对政治下的定义的依据，我们认为这显然是根据不足的。我们查阅了《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和第5版的《主题索引》。这两本分别在1955年和1969年出版的索引中《政治——定义和实质》一栏下都列出了《讲话》中这段话的页码。可见，这两本《主题索引》的编者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认为，这段话是列宁对政治下的定义或是列宁对政治的实质的主要论述。应该说，这两本《主题索引》的参考价值要高于《简明哲学词典》。

-

“统一战线”一词的由来

夏 洪 跃

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思想，早已成为许多国家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有力武器。但是，关于“统一战线”一词的由来，学术界尚未弄清。统一战线思想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他们说：“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议”，“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①但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从未出现“统一战线”一词，而只是用“团结”、“协议”、“联盟”、“联合战线”等词来表述。

据笔者所见，首次使用“统一战线”一词的是斯大林。1921年12月18日，斯大林在《前途》一文中说：“因此，在工人阶级中间就产生了为建立工人的统一战线和争取成立工人政府的声势浩大的运动（特别是在德国），这个运动要求工人阶级中一切或多或少带有革命性的派别……达成协议和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②次年4月9日，列宁在《我们付的代价太大了》一文中多次使用了“统一战线”一词，照录如下：

“反对统一战线策略的意大利共产党人和部分法国共产党人以及工团主义者，很可能从上述论断中得出结论说，统一战线的策略是错误的。”^③“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代表需要统一战线，因为他们希望从我们方面得到过分的让步，……他们希望通过统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286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96页。黑体由笔者所标，下同。

③ 《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3卷第295页。

一战线的策略使工人相信改良主义策略是正确的，而革命策略是不正确的。我们需要统一战线，因为我们希望工人的看法正好与此相反。”“为了帮助这些群众反对资本，……我们采取了统一战线的策略，并且要把这种策略贯彻到底。”^④从此，“统一战线”一词在苏联开始传播。

中国共产党使用“统一战线”一词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1922年6月，我党在《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中提出了同国民党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问题，并于七月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中指出，在中国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无产阶级必须联合“全国革新党派”，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民主的联合战线”。1923年6月党的“三大”作出了建立国共合作的决定，但仍未使用“统一战线”一词。

据笔者考证，我党最早使用“统一战线”一词的是刘仁静。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苏联召开。刘仁静在《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中说：“要在中国消灭帝国主义，就必须建立反帝的统一战线，我们党根据这一原则，已决定和国民革命的政党即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其形式是我们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⑤1924年7月1日，李大钊在《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的报告》中也使用了“统一战线”一词。他说：“我们一直根据第四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统一战线的决议进行工作。”^⑥

在国内，最早使用“统一战线”一词的是邓中夏。1925年5月31日邓中夏在《中国劳动运动的新生命》一文中说：“……此次大会（指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笔者注）议决工农联合，而且实际上举行两次工农兵联合大示威巡行，便是建立全国被压迫革命势力

① 同上书，第296—297页。

② 《共产国际有关革命的文献资料》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1辑第62页。

③ 《李大钊文集》1984年人民出版社版下卷第781页。

之统一战线加入赤色职工国际……”^⑦。

至于党中央决议首次使用“统一战线”一词，则是在 1926 年。同年 7 月中共中央第二次扩大会议通过的《对于广东农民运动议决案》中指出：“我们除了在政治上得到左派的拥护外，还要努力在乡村间努力实行各阶级的联合战线，使各种民众在统一战线之下组织起来。”^⑧从此，“统一战线”一词在国内也传播开来，并为人们所运用。

⑦ 《邓中夏文集》1983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142 页。

⑧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6）第 2 册第 173 页。

一部研究《资本论》中的经济规律 和范畴的专著

《从当代资料看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经济规律和范畴》(1986年基辅版)是苏联经济学博士C·B·莫切尔内和经济学副博士Л·Г·安德列耶夫主编的一部研究《资本论》的专著。编者参阅了近年来国内外报刊杂志上马克思经济学家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对《资本论》第一卷中所论述的经济规律和经济范畴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分析，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和观点。本书有助于了解帝国主义垄断阶段的经济规律、经济矛盾和经济范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变过程以及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

该书共7章20节，分别论述帝国主义条件下的商品、货币、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工资形式的变化以及资本积累过程的特征。该书大体可归纳为如下几个特点：

一、每一章大体上都是先讲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经济原理，接着讲列宁“帝国主义论”中的发展。而把重点和最大篇幅放在论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代帝国主义国家现实中有哪些新的特征。

二、对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的研究作出了某些新的论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苏联学者的研究情况和论点。如关于商品货币问题，该书说当前市场已不是资本主义各企业联系的唯一场所，由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国家调整的加强，已使商品生产带有计划性。正在为使商品过渡到“商品和非商品”的状况准备客观条件。现在已不是价格围绕商品价值波动，也不是围绕生产价格波动，而是围绕国家垄断生产价格波动。国家垄断生产价格中包括了国家给予垄断组织的“贡赋”。

关于经济危机，现在虽然更频繁了，但和自发生产时不同，由

于国家的调整，危机的破坏作用可以受到限制，能较快地恢复，但基本矛盾没有解决，所以危机越来越频繁。工人的工资虽然提高了，生活改善了，但工人的劳动强度更高了。关于资本积累过程，该书指出，国有化过程虽然是曲折的，但越来越发展，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的扬弃。

三、该书包含了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丰富的数字材料，这些材料到 1985 年底该书付排时为止，有的材料不是出自一家，而是同时引用各家的材料，如关于当代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材料就同时引用了维戈茨基、库德洛夫、科尔都诺夫的三种计算。看来作者似力求做到客观的论述。

该书的章节标题如下：

第一章，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第二章，帝国主义条件下商品关系的演变；第三章，帝国主义阶段货币的社会经济内容；第四章，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特征；第五章，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第六章，工资形式和工资制度的演变；第七章，现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资本积累过程的特征。

本书正在译成中文。

(王孝勇)

《政治体制的理论基础》一书简介

本书是由 Ю·А·季霍米罗夫、В·Е·奇尔金^① 负责编写的专著(1985年莫斯科科学出版社版,共247页)。书中阐明了马列主义学说有关政治体制发展的一些论点,论证了政治体制理论的对象是跨学科综合性的科学问题,说明了社会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治体制的特征。本书作者给本书规定的任务是,综合有关政治体制理论基础的已有结论,指出该理论的本性、构成原则和作用机制。作者根据专著的基本构想,分析了这一领域中科学知识的综合性,试图确立政治体制理论的对象和内容,考察了研究的方法论和概念系统。

这种方法能够一方面证明政治体制的一般和典型属性,说明它的静态——结构,以及运行和它的发展规律性,另一方面表明试图揭示一般和特殊的相互关系,阐明社会主义社会政治体制、资产阶级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治体制的构成和运行的特点。作者在考察当代世界中种类繁多的政治体制时,首先是以考虑这些体制的阶级本性、社会使命为依据的。同时也注意到其他因素。作者意识到,本专著远未全面考察政治体制理论的所有问题。何况当代政治生活的进程不断提出需要科学思考和理论概括的种种新问题。

(王淑秋)

① 本书编者季霍米罗夫是苏联法学博士、教授、苏联科学院国家和法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奇尔金是苏联法学博士、教授、苏联科学院国家和法学研究部主任。